



小鸟

以文学之名

卷二十六 2023.02

非虚构图书馆 2020–2022 纪念特辑

顾湘、李静睿 | 小鸟年度书单

张宇成《墙》 | 24 小时文学聚会

路明《姆妈》 | 定海桥





小说

24小时文学聚会 | P5 墙 张宇成
故事群岛 | P25 为一场假想的离婚人士大会准备的演讲稿 塞尔吉·帕米埃斯
P29 舞会新秀·恋人·鸽子飞 莉奥诺拉·卡林顿
发现经典 | P37 罐头厂街 /
P41 月亮下去了 约翰·斯坦贝克

非虚构

非虚构图书馆 | P49 我们将死于梦醒 陈冲
P57 一生所学, 只为此刻 随机波动、罗新
P65 孩子们的街道 李海鹏
田野中国 | P71 一位儿童精神科医生的门诊日常 李荣荣
P77 午后与金先生聊他和他的网站 伊险峰
生活亲历者 | P91 姆妈·定海桥往事⑥ 路明
发现经典 | P97 横越美国 约翰·斯坦贝克
P103 追思姑父——赵元任先生 杨时逢

档案

小鸟年度专辑 | P111 贫瘠的一年, 危险的明史 李静睿
P117 去年, 我时常想知道那些人…… 顾湘
Newsletter | P123 如果大卫·格雷伯还在世, 会不会认为 ChatGPT 是诗意的技术? 张依依
P129 大地震之后, 为什么叙利亚人民无法得到同等援助? Snufkin

专栏

接力访问 | P133 013 万青: 一个不在游戏规则里的影像制作者 /
P137 014 池晓: 在当下, 更要学会“用擅长的方式做喜欢的事情” /
P141 015 欧飞鸿: 或许生活本身也是一种观念艺术? /
P145 016 Alexwood: 离开北京之后, 我给自己一到三年的生活“实习期” /
P149 017 安猪: 慢不下来的人, 做了一所“慢学校” /
P153 018 李超: 做盲文字体, 是我在公司需求之外额外的主意 /
P157 019 张涵露: 好的艺术应该是辛辣的 杨樱



电影《巴黎夜旅人》(2022)剧照

小鸟问答 Vol.26

小鸟 | 小鸟问答

新年快乐！祝大家都能发掘更多生活的可能！

i

正常的模式哪里有问题，为什么不快乐？

接力很热情，接受访问的人热情地推荐更多的人，丰富我们对世界的认知。读者按照反馈类型出现了两种分野，一派是，“啊，原来可以这样！”真的很有趣的人呢，也想认识这样的。另一派是，“啊，这些人有趣在哪里？生活方式？他们连工作都没有，还能谈生活方式！”有读者总结说，他们好多人都不上班，有点跟社会主流不大合拍，别人会觉得怪怪的。作为操作者，如果总结的话（虽然远没有到要总结的时候），会模模糊糊地觉得，正好是“连工作都没有”的生活模式在塑造他们的思维方式。一个人对“正常”的生活——有家有室有稳定工作——保持一种怀疑，希望有更多可能性，继而，这些可能性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生活由此变得截然不同了。

但你要知道，对于他们大多数人来说，别人的羡慕和理解其实不是问题，而是有没有一种审视生活的能力。换句话说，是不是能在那种被称为“正常”的生活之外，思考“为什么这种生活让我不快乐”。如果有问题，到底是哪里有问题。

然后我们发现的另外一点是，生活方式的选择和思维模式不仅相辅相成，一旦确定下来，也同样难以扭转。所有有勇气选择更多可能性的人，都值得敬佩（但也有一个访问者说，这根本不是勇气的问题，恰恰是只有这样做才会快乐）。

ii

波希米亚一点。

劝人波希米亚总像劝人守穷一样，不光是与社会主流价值有冲突，而且像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手画脚一样讨厌。但我们可以劝这个社会应该更波希米亚一点。不仅仅是对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更宽容的问题，而是有更多元的价值存在于多元的社会中。

iii

小鸟 2023 年度上新。新的一种人类。

从卷二十六开始，二月。我们会以另外一个维度来介绍更多的人。他们与接力访谈中的各式人物截然不同。

他们大多是紧锁眉头思考更多问题的人。以 1995 年到 2005 年出生的人为主。他们已经开始进入主流了。我们这个扩大的维度，实际上大部分的聊天——发生在 2020 年，这其间有很多变化发生，有些已经恍若隔世，但也有不变的东西。其实如果换个思路或者角度，这三年间变化或者让人产生隔世感的一切，有什么底层的逻辑吗？或许这一组文章会有一些价值。

这个新内容会出现在“田野中国”的栏目中。在 2023 年，我们也会不断调整田野中国这个栏目，以让它能更完整地记录当代。

iv

非虚构图书馆。

这一期有点不一样。这个二月，我们想为过去三年里有关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事找一篇文章——我们认为最好的非虚构文学。因此它们并不是出自同一个作者，而是一组作者。这个阵容其实应该略大一些，但有不可抗力，我们只能发我们力所能及的。它们都是公开发表过的作品。在小鸟文学的 App 里，还是和以往非虚构图书馆的格式一样，一篇是收费文章，两篇是免费文章，分别来自陈冲、李海鹏和罗新。

此外，小鸟会发布收录更多相关内容的“非虚构图书馆”特别刊，具体请查看 App 管理页面的书架栏。

v

仿佛病毒消失了。

《黑羊与灰鹰》中，丽贝卡·韦斯特说：

我们只有部分人心智正常。这部分人喜好快乐，希望幸福的时日能更悠长；希望能活到九十多岁，然后安然地死去；希望死在自己建造的屋檐下，而这屋宇又将为后来者遮风挡雨。我们另有一半的人几近精神失常。他们偏好违逆的东西胜过合意如意的东西，喜好痛苦，以及比黑夜更暗沉的绝望，希望暴死横逆，致使生活回到原点，使我们的房屋一无所存，除了被烟火薰黑的地基。

是啊。在与死神抢父母的悲壮与忐忑结束之后，带着伤痛或者庆幸的人们，无论如何要开始新的生活了。

在我们见识那么多恶之后，我们知道恶仍旧徘徊在我们的生活高处，冷冷地打量着我们，随时准备下一次掠夺。我们要提防“致使生活回到原点”的悲剧再度出演，我们要识别正在发生的“使我们的房屋一无所存”的现实，我们应该清算曾经让我们陷入“比黑夜更暗沉的绝望”境地的推手和帮凶。

这也是我们做这期特殊的“非虚构图书馆”的原因。

vi

分享博尔赫斯的一段话

“那些被判下地狱的人——上帝可没有判谁——是被魔鬼吸引过去的。那么，地狱是什么样的呢？据斯维登堡说，地狱有好多方面。有对我们的一面，也有对天使的一面。地狱是些沼泽地带，那里的城市都像遭受了火灾似的破败不堪；但那些被判下地狱的人却感到很幸福。他们是按照他们的方式感到幸福的，也就是说，他们之间充满了仇恨，在这个没有君主的王国里，他们无休无止地尔虞我诈。这是一个政治卑下、充满阴谋诡计的世界。这就是地狱。”

那些恶和丑陋的践行者和同路人，他们之所以乐此不疲，是因为他们只有在地狱这样恶和丑陋的世界里才会觉得幸福！这真叫得上醍醐灌顶了。

好奇心日报有恢复的可能性吗？

没有。好奇心日报过去是一个机构媒体，由五十多名记者和几乎同样多的运营与技术团队支持运转。现在并没有这样的空间和可能性。

这一期的封面和栏目预告

我们在微博里介绍过小鸟年度书单的逻辑：不是年度新书推荐，而是我们的编辑在过去一年里最关注的话题涉及哪些重要的书目，换句话说，与大家分享各自的知识结构。在上一卷里，我们谈论了“警权”，一个在 2022 年许多人都不太陌生、但可能并没有仔细思考其边界的话题。卷二十六里你会看到作家顾湘和李静睿的书单，她们想分享的分别是“犹太人”和“明史”。

关于上述提及的“非虚构图书馆”特辑，在此想补充被纳入特辑的作品选择标准。过去三年，尤其是 2020 年初，记录文字并不在少数。到了 2022 年底，数量虽然锐减且愈发碎片化，但我们也看到很多回顾与提醒。这三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三年。从小鸟文学的角度说，我们希望选择文学。三年之中，站在文学的视角上，什么样的文字可以将时空浓缩其中，不止是现场、情绪或者反思，不止是一地一人的经历，而是所有人的命运？这份特辑是我们的答案。

特辑结尾有一份“彩蛋”，来自齐格蒙特·鲍曼。他为“我们何以至此”给出了有力透彻的解释。

另外想分享的是一篇“24 小时文学聚会”，《墙》。按照这个栏目的惯例，我们不会录用这个长度的作品，将近 2.8 万字，是一个中篇小说的体量。虽说凭字数给小说分类的确是一种前现代行为，但是小鸟文学毕竟是个 App，这个体量让我们为读者的视力感到担忧——注意，不是注意力——的确看着有点累。但是它是一个好看的小说，科幻外壳，现实主义的内核，滚烫的情感，务实的世界。

最后我们很高兴专栏“定海桥”有新的更新，非虚构投稿栏目“生活亲历者”也是，希望有更多的作品来到小鸟的邮箱里。

本卷封面是华美风鸟，Lophorina。

最后分享一下博尔赫斯的人生信条，To be an ethical person。

多么简单。

与我们联络：留言给微博 @ 小鸟文学，或邮件至 info@aves.art。

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小鸟与好奇心”看到我们的一部分文章。

小鸟

一份新文学杂志。注意，不是文艺杂志。
我们最大的愿望是找到最好的文学作品和作者，并呈现出来。

小鸟问答

这个栏目每月一次，回答来自读者的各种问题。
它放在每月的第一篇，兼有告知功能。





电影《降临》(2016)剧照

小说

墙

张宇成 | 24 小时文学聚会

九天之际，安放安属；隅隈多有，谁知其数。

许杨：

人们发现墙那年，我刚好六岁。此前人们一直默认空间是无限的，所忧虑的只有时间。直到遇到了墙。

那时人们谈起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漠不关心或者不愿多说，最后结果却都一样。它一直是人们话语中的碎片。我一直试图拼接这些碎片，直到我自己也遇见它。那之后我也不愿跟谁讲它了。

那年全世界的天眼先后给出相同的报告。首先是倒圆锥形的宇宙微波背景被拦腰截断，我们再也没看到过我们的奇点。然后，脉冲星坐标系一大半在瞬间消失，余下的也不再远离我们。当扩大观测范围时，发现所有方向上距离我们 1200 万光年外的星系，都消失了。每次望远镜试图再次聚焦，都会变得模糊一片，像被蒙上一层雾。墙就是这么突然出现的。

那年我还跟杨丽丽住在 280 多街。那是个典型的美东大城市，海水的咸味从我一出生就来到我家。我们住的几栋楼都是华人，紧挨我们的是棕色的西语区，然后是蜡黄色的印度人。然后非裔，他们人最多。再然后犹太人，这时已经离市中心很近了。最后是市中心。中心就是中心。那时又晃又响的地铁能从那里直通我们这里，但沿途中，没有去其他人那里。每到一片区域，一种颜色就会从车厢消失。最后几站，会有西语区或者印度人陪我们。再最后，就只剩下我们。

那时所有信号都断断续续的。短短几个月有 2 万个探测器被送往墙，它们要在近地空间跃迁。我们每周日去教堂时，牧师都要先用五分钟祈祷信号稳定。我们礼拜时西语区也没有中止他们的娱乐。我们常听到来自肩式收音机的舞曲接近又远离。有次我们的圣歌和西语舞曲一齐中断，我们在突然而至的安静中沉默了几秒，爆发出猛烈的笑声。笑声中夹杂起西语脏话和巴掌声，很快又加入了我们牧师的声音。他让他们滚远点。而就在对方的英语脏话来临时，西语舞曲又和圣歌一齐回来了。

那个人来的那天和其他所有周日没什么不同。他进来时没有任何声音，只有一片光从外面倾泻而至。大人们都在背对着他，而他背对着所有的光。只有我转过头。一个黑色的东西拉起他的右手。第一声巨响的时候，杨丽丽像甩一条绳子一样把我从后门扔

了出去，在我的小臂留下三道指痕。那几分钟我对杨丽丽充满愤怒，因为我对他的右手臂充满好奇。直到后来不断涌来的尖叫声，才让我醒悟刚才看见的是一把枪。

教堂再开门的时候杨丽丽还带我去，那时我小臂的划痕已经结痂。她的视线在几张空椅子上反复游移，但那什么也没有。读博期间我第一次做哀伤辅导实习，那时第一批深空探索中唯二幸存的顾若非和徐忆北刚刚返回。在他们的反复更正下，我才发现第一批是派了 7000 多人，而非 100 多人。他们只在电视上露了一面就来了我们这，电视上的人们也跟过来。每次谈话，玻璃外都站着几十个人，航天总局、临床、军科院。叫顾若非的宇航员无论聊起什么，都会绕回 AI 探测器。它也是第一批被派上去的，处在领航探测器右翼。领航是第一个墙的目击者，当墙一下子出现在它们视野时，它怎么也不愿继续前进。右翼和左翼分别重复了五遍机器人三法则，领航却突然说：“我快窒息了。”

右翼和左翼面面相觑，那时的 AI 还没发展出意识。他们又重复了一遍三法则，得到的答复是：

“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右翼执行了销毁程序。然后不论我们再问什么，顾若非都会回到黑匣子里这句话：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作为队长，徐忆北显得思路清晰很多。在跃迁后，墙就以一个一望无际的灰色平面出现在他们面前，让他一下子对观测结果产生怀疑，它不是一个长径 1200 万光年、短径 900 万光年的椭球体，而是一个“绝对的平面”。他们分到的远探组要搭载单人航空器向尽量广的范围探索。而所有留下的人都自愿转为了爆破组，因为“当它出现在你眼前时，你唯一的本能就是打碎它”。

墙看上去是一块暗灰色的金属实质，偶尔能看到局部有些灰色像水波一样荡开、又重归平静。他们试了所有方法观测墙的另一边，但什么也看不到。从衍射谱看，墙的构成无法匹配任何一种元素，原子之间几乎没有距离，接近绝对零度。探测组所有的取样都失败了，当他们尝试高能粒子轰击墙面时，墙没有丝毫震动。

徐忆北的前两次远足发现了墙周围迷宫一般的引力场，由此把它归为“暗能量”。

徐忆北的第三次远足是到墙边一颗静止的行星。墙的突然出现把这颗行星嵌在了墙上，它的另外 1/6 在墙外或墙体里（由于墙的厚度未知）。在这颗行星上，顾若非是唯一一个摘下手套的队员，氯气在他右手上留下的疤痕至今依然清晰可见。当他触到墙面时只说了三个字：

“好冷啊。”

好在墙的表面只有零下 15 摄氏度。当时所有队员都在拼命仰望拔地而起的灰墙，没人在意别人的动作。

徐忆北的第四次远足没有目的地，他们在墙的表面像一群攀岩者一样跳跃前行。墙面平整如一，他们八个人中常常只有四个真正吸住了墙壁。最后几次访谈时，徐忆北反复提起“预设”。最后的单独访谈时，他才说起在他的第七次远足前，他忘了提前探测引力场。当时所有人都进入了一种心理木僵状态，常常一整天也说不了几句话。然后，一股未知的力量把他和顾若非瞬间拉回地球，他再也没有见过余下六名队员。

徐忆北让我一下就想起杨丽丽，在我们再不多的相处中她反复提起“梅姨”的名字。杨丽丽是梅姨生前望向的最后一个人，那时鲜血正从她的乳房中间喷涌而出。但杨丽丽把我甩出教堂后，再也没有回去。

导师把徐忆北归为自责创伤引起的 PTSD，内省型人格。我却总觉得 PTSD 之上还有另外一些东西。

我们没再去几次教堂，便踏上了回国的旅程。我们扫不出变异疫苗的标签，我便让杨丽丽伸开手掌，给她画了一个。机场所有人都戴着拴满绳子的口罩来回踱步，所有的座位都是空的。我们经过一个小房间时，一个陌生女人突然抓住我把我拉向一条长队，队的尽头是一扇漆红的门和一面洁白的墙，上面挂着十字架。队伍里两个人在彼此抓着对方的衣服，不让对方前行，他们都说自己才离上帝更近。这时杨丽丽抓住我的另一只手，她俩拉扯起我的身体。那个女人喊道，墙已经来了！

杨丽丽把我夺回来之后，一下就坐在椅子上。

“咱去的教堂只说中文。”她说。“而且那个人只打女人。”

她的话越来越慢。清晨的微光从机场窗户投进来，有尘埃在里面不断翻滚着。她接着很肯定的告诉我，这不是第一回，肯定也不是最后一回。在我们漫长的对话中她始终没有谈到墙。当我们走向登机口的时候她说：

“如果真有上帝，祂不会是这样的。”

我们最后又一齐望了一眼那个祷告室。又有更多人凑过去，又有更多的争吵。我们走进飞机的时候，空姐朝我们弯了弯沾满睫毛膏的眼睛，它们都躲在护目镜的后面。

韩杰：

在我们那，女人从不上桌吃饭。厨房就是她们餐厅，餐桌就是厨房的矮桌。她们吃边角料，或者剩菜。小时候我会跑过去，拨给她们自己碗里菜。她们就拿筷子打我，说我长大了没出息。可我还是去。只有一次我没被打。那天我过去，我妈都不看我。她的一边脸是青的，那天是她被打了。

韩力每天傍晚准时回家。他身上有股药味，又怪又香。我上小学之后，他身上药味越来越少，酒味越来越多。我三年级那年，他身上只剩下酒味了。他喝酒和睡觉分不开，睡醒之后也不去药厂。我们的 H 省紧挨首都，首都的工厂顺着铁路一座座运过来，我们的城市就在铁路上建起来。我妈念叨，这么多工厂搬来，我爸的怎么不开了。韩力说，医保担子重，要用便宜药。我妈说，那也不能把咱便宜没了。韩力就给她一巴掌，声音闷在她胸腔。我妈一边哭一边咳了几下。韩力又一巴掌，我把咳嗽也憋回去。我也是，一开始叫，后来邻居老问，我就开始学我妈。那一段我们家最大特点就是安静。

酒不是什么好东西，破坏记忆力。有次韩力出摊，回来没带液化罐。他开始喝酒，跟我说，妈的，他们收的时候我还在笑。那天我起夜时，他还在喝。他说，妈的，不该要这小子。我眼睛没睁开，嘟囔地问了一句。他就抓起我领子，把我拎起来扔到地上。又从地上拎起来，按到墙上。他的力气太大了，我感觉自己都快被按到墙里。我沿着墙滑下来，又顺着墙窜上去。第二天我们还像之前一样吃早点，他掰掰我的脸，一脸诧异地问：“你这是怎么弄的？”

韩力的话给了我很多启发，我练出走神的本领。他一打我，我的思绪就飘出去，在一边看着自己，好像他打的不是我。我看着白白绿绿的酒瓶，里面有人的倒影，都是扭着的。上中学，我跟我妈离家出走，走神却跟着我。我妈要找大夫，我说，以前我爹再混，钱还是他挣的，我还要考大学。我还是走神，因此也没考上大学。我从铁路技校混了两年出来，沿着铁轨抄读数。可超新冠来的头两年，我们组解散了。我看北京一个医院招护工，我想这行业我熟啊，就过去了。

那时的医院里，过道一半都是床。大家整宿整宿地聊墙，蛋壳、笼子，宇宙外墙。有人说世界末日要来了，但我想那玩意儿不是几千万公里之外吗？人多的地，纠纷就多。有次家属占着床边，我在床尾给病人吸痰，没给上劲儿，痰回去了。我赶紧给病人拍背。他儿子上来就给我一巴掌，说，你老缩个脖子什么意思？我又走神了，直到护士拉走我。我隐约听见他们在吵，你傻啊，护工也拿回扣，都医院的人。我只记得病房的墙白得发晃。我努力想找个污渍看，但那墙上什么都没有。

这让我想起有次帮王德利抬大体，我刚上手，大体的冷劲儿就压下来，好像福尔马林钻进皮里。大体顺着池子垒五六层，王德利从下往上，一个个钩。我到第五具就没感觉了。我手不酸了，他们变得很轻。我想，他们都是医学院教授啊，怎么挤在这。后来这些想法也没有了。我突然很慌，向四周抓。结果抓到了王德利的一只手，他的手给我插上一根烟。那只烟我跟他抽到了解剖室门口。他问我，累吧？我说，一百二，值。他说，这段实验都排不过来。我说，给我发微信就得。他说，得，咱再跑两趟，两趟差不多了。

那时候所有人都抽烟，男人抽，女人也抽。大街上都是烟蒂，好些都在燃着。如果不嫌弃，捡起来能接着抽。那天妇产科一个主治让家属捅了，因为没保住孩子。他说能保住大人就不错了，那边说五年才怀上。我到大厅时那个主治正被人抬进抢救室，血洒了一路。急诊的小大夫把眼睛捂上了。我问他，见不得血？他说，见不得给自己人做手术。

我出去看拳。外面风大，烟头烧得旺，一会儿游向一边，一会儿向另一边。拳场就在小饭馆的地下一层，人围成一圈，他们在中间打。一开始瞎打，后来都一招一式的。女的也打。我那天看的就是女打男，那个女的穿紧身衣，身条像海豚一样顺，拳套破巴巴的。那天她被打得不轻，喊停的时候躺地上起不来。没人押她，只有我过去抱她起来。我说，我带你去外科，今天急诊没地儿。她说，你把我拳套解了。我解了，看见她磨得发红的指节。她说，真痛快。我说，我送你过去。她摆摆手说，你送我去楼上。楼上人跟音乐一样杂。我接了俩扎啤，她塞给我一卷钱。我抽出来几张想还她，被她挡回来。我问她你干啥的，她说，跟人唠嗑赚钱。我说，赚多少？她说，一回千八百。我啤酒一下洒出来。她说，可我小时候，不会说话，老师以为我哑巴。我说，

你现在挺能说的。她说，你干什么的？我说，我比你运气差，我就没钱看病。她说，那你遇见对的人了，我给你打个折。我说，你到底干啥的？她说，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师。后一个词我听过，满大街都是招牌，前一个词是哪来的推销话儿？她说，你听过宇宙外墙吧？我点点头。她说，它出来之后，人的问题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我就是看这些的。我不懂她的意思，盯着她眼里闪着的光看。她没再解释。酒吧的光被人群点亮一会儿，又暗下去。她的血迹渐渐干了，眼里的光也跑到她眼镜上、她鼓鼓的胸脯上。我们聊天没断，一直持续到我们婚礼那天。她问我看上她什么。我说，这话应该我问你。她说，你先说。我说，我们家都是粗人，想有个有文化的。她说，你说的话粗，但你人很细。这时她爸把她的手交到我手里。她爸没哭。她爸是个汉子，以后我闺女嫁人的那天，我也不哭。

许杨：

像我们很多人一样，老韩也是个不太走运的人。他有点畸形，脖子陷进肩膀里，像想把所有的运气都缩进身体里。

从中学开始，他就一直站在韩力和他妈妈中间。当韩力发现儿子的体力超过自己的时候，他在老婆身上的发泄加倍了。一次他妈妈被打到酒店住，老韩还被派去看她。老韩不仅带去了三七粉，还带去了一个离婚协议模板。这个过程后来反复多次，韩力在他们搬走之后又把老婆求回去，最后一次不惜跪在儿子面前。但每一次都在他的新一轮暴力中结束。他一喝酒就开始向周围人诉说老婆儿子的不争气，他们的任何一次出手，都会让他恼怒不堪。有时半夜，他会突然走进老韩和他妈妈的租处，留下一屋酒气和几张破破烂烂的钞票后扬长而去。往往是老韩把那几张钞票揉成团，扔到屋外空荡肮脏的走廊里，然后他妈妈再把那些纸团一一捡回来。老韩带我跟韩力吃饭的时候，韩力半天没动筷子。他扭头问老韩：

“你是怎么找到这种妞的？”

我见他妈妈那次，我爸也在场。我爸跟老韩很快称兄道弟起来，但他妈妈跟老韩说话的时候，总要用几根手指挡着嘴。那天晚上老韩问我前男友的事，我说现在谁还想结婚？但老韩不一样，他的恋爱观是：

“我本来没想过讨老婆，碰见你我才想。”

那是我们认识的第一天，我把头埋进他怀里。他用舌头检查我脸上的伤口，问我女人打个什么拳，我跟他说：

“人都憋着口气的。”

我跟他都坚持要孩子，然而小语的出生却动摇了我。她出生之前我的身体肿胀不堪，被挤得生疼。她来到我家后，我每天像看护一个嫩芽生长一般培育她的睡意。而她见不得我睡，往往我刚一睡着，她就把我叫起。一个晚上她咬着我的乳头，始终不想停止哭闹。老韩安眠如常。我眯起眼看到窗外被盈盈月光覆盖的草坪，开始思考应该抱着她一起跳下去，还是让她先下去、自己后下去。当我终于把她放回床，我回到老韩身边跟他说：

“咱把小语送走吧。”

老韩扶我躺下。小语不哭了，我却开始哭。我告诉他我不配做母亲，他抱住我说：

“那你做父亲那边儿吧。”

刚生完几天反而最平静。我看着老韩抱着小语走进产房的时候，突然拿起手机，给杨丽丽打了个电话。那时我们已经三年多没联系，我叫起她的名字，她却开始确认我的身份。当我告诉她我生了个女儿的时候，电话那边传来一个男人高亢的声音：

“你磨蹭什么呢？”

然后她就挂断了电话。

在我们的课题陷入一片僵局那段，我导师常带我去跟神经生理学家梁学斌喝酒。这位白发苍苍的学者谈起手头课题时讳莫如深，他不断舞动手指，像在比划哑语。一天半醉不醒之际，他才终于谈起了它。

“它们都没走远啊。”他说。

梁学斌像说错话似的捂住了嘴，他们没有兴致再多说一句。我们走回科大的路上，三个影子被一盏接一盏的路灯抛到地上。梁学斌在他的实验室打开一个显示着五种正弦波的电子屏，又拿出了一瓶酒。

那几年通过具共情能力的镜像神经元拟合 AI，我们采集到了意识波动的五种正弦波。人类所有意识都由这五种波动组成，但除了看到它们（并确定它们是等离子态），没有任何别的发现。我刚要问起电子屏上是谁的意识，梁学斌就说：

“这是从墙过来的。”

这些信号在 22 年后终于抵达地球，与此同时我们也观测到了从地球发出的信号。梁学斌放上近地望远镜图层，一片白色，然后几团灰色像墨迹晕开一般出现。

最初对这些意识波动的观测都是在群体死亡场所，除了个别国家设置了集体枪决以加速研究，大部分都是在医院进行的。这些意识群很快便被牵引一般脱离视野，梁学斌换上木星图层。它们到达小行星带之后，其中一批通过空间跃迁留下的虫洞鱼贯而出。然后，所有的意识群都跟了上去。

“它们好像自然会寻找最短路径。”梁学斌说。

他又换上粗糙不堪的宇宙外墙图层，整个图层都打着“绝密”字样。那些意识群从墙边的虫洞出来后不久便被吸附到墙的表面，与墙合而为一。我抢过手柄，想要放大那些图像，但它们放大后仍一片模糊。这时我猛然想起徐忆北曾讲的“荡开的灰色”，我的思维完全陷入这句话里，跟着它我的身体陷入到椅子子里。

此后的五年，我们对墙的研究完全停滞。这成为我跟徐忆北见面最频繁的一段时间。心理援助后，顾若非用两年就恢复了社会功能，徐忆北却在两年的正常表现后，突然一天爆发躁郁症，此后再没好转。这又让我想起杨丽丽。杨丽丽带我回国后不久的一天回家，没看到我们似的，径直坐下开始吃饭。我爸笑着问起自己的手艺，她说她刚才去公园的路上，恰好经过少数民族地铁恐袭。她的咀嚼并没被叙述打断，好像这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但当我们指出爆炸的是十号线，不会经过她往返公园的路时，她只是说：

“谁能两次碰到这种事啊？”

杨丽丽在此后突然不辞而别，只留下写着不想拖累我和爸爸的字条。她的字迹凌乱不堪，所有的亲戚都对她的下落毫不知情。又过了一年，她的同事才透露一点风声。她单位有个少数民族男人最近突然离婚，有人见过他和杨丽丽在一处风景区留下的合照。紧接着关于她约会其他男人的消息不断传来，全部都是少数民族的。这为爸爸的伤痛叠加了莫名的羞辱。当他找到杨丽丽，满脸通红地质问她时，却发现她张着嘴吐不出话，好像忘记了汉语。只有当她扭头看向一边的我时，她才说：

“妈妈本来想打下去的。”

接着她紧紧抱了我一下，然后转身离去。

在那个清晨和字条一起留下的还有她的拳击手套，那是她刚被蛇头送到美国后买的。她最初一边在按摩店打工，一边上拳击课。我们那次见面后，再也没有联系。然而在我三十六岁一个夏日，她又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口。那天老韩一脸诧异地跑向我，说门口有个满头银发的女人在找我。她冲我露出笑脸，当我问起她来的原因时她说：“听说你有个闺女了呀。”

我再一次陷入困惑，不知她是忘了十年前我在产房打的电话，还是当时根本没听清。我把小语喊出来，让她叫姥姥。杨丽丽在看到她之后，笑容加深了。她笑的时候我却哭了起来。我赶快走向厨房加入老韩。我们再出来的时候，客厅空无一人。我最后在小语漆黑的床上发现了她们。小语正给杨丽丽指星星，一边讲哪些星星看不见了，被挡着的星系又有了哪些新名字。那张床像是有魔法似的，我被吸到杨丽丽另一边。这时她一手搂起我，一手搂起了小语。我跟杨丽丽说自己学了那么多心理咨询，却和她连天都没聊上。她一脸诧异地说：

“可妈妈挺好的呀。”

那张儿童床被晃得吱吱呀呀的，我们陷入了某种梦境。好像那张床是生活本身，床之外就是生活之外。在老韩推开门、客厅的亮光漏进来之前，杨丽丽说：

“咱们一家人在一起，好好的。”

她说这话时，我能感觉到我的泪水顺着脸上的纹路缓缓流淌。上次我见她的时候，那些纹路还不在，它们是什么时候出来的？她说那句话时，只差一点我就改口叫她妈妈，不再叫杨丽丽了。

韩杰：

我跟许杨恋爱，像过一道道门。门总粘着我。第一次上床，见朋友，见父母。我总想让她先陷进去。可她一会儿像是陷进去，一会儿又不像。我妈第一次见她，就偷偷告诉我，不能找这种家庭出来的，不交出自己。那天我问她，如果我没你以为那么好，咋办？她说，老韩，这世上哪有爱情，有的只是信。她说这些的时候眼里又在闪光。那天我把一股劲儿用到她身子里，在她里面我也碰见了这股劲儿。

月子没两天，许杨就把上孩子。孩子越长越胖，好像她的肉都长到小语身上。小语长大后所有课她都要带，包括体育，她教小语比划拳头。认识许杨之后，我只看她们打拳走过神，不过这种走神也不太一样。

她睡得晚，经常是跟我先睡，半夜再去书房。小语三年级那年，她开会越来越多，一走就几礼拜。我跟她说，你现在一下陪几百人唠，是不是一回几十万了。她说，这不是讲课。我看她文件上写“宇宙外墙”，说，那玩意儿离那么远，轮得着你操心？她不说话。她在书房支了个床，有时我一睁眼，旁边空的。我就去书房小床上抱她一会儿。再后来，她一早就去单位，我过去，那张床也是空的。

有个晚上我正熬银耳羹，她从后面没声响地进来，抱住我，身上还有墨香。她说，老韩，谢谢你。我拍拍她的手说，不就个宵夜？她突然哭起来。她问我小语睡了没。我说睡了。她伸手关上我的火，拉我进了屋。她把头埋进我裤裆里。我说，你到底咋了。她不说话，舌头越来越用力。我的围裙还没摘，围裙边盖着她头发，一起一伏的。

周末，她拉我去公园。草坪上全是放风筝的，风筝线细得像头发丝，风筝看不清是被牵着，还是自己飞。她说，老韩，我觉得我对这个家，没你对这个家好。我说，你怎么又来了。她说，我一直想弄明白墙怎么回事，这次要动真格了。我说，你什么时候回来吧。她摇了摇头。我说，回不来了是不。她接着摇头。

我又感觉自己脱离身体，向上飘进不明不暗的雾里，周围都是风筝。耳边是几年前许杨跟我说的话，她第一个哀伤辅导实习，在电话中心，接了一个地铁爆炸案幸存者。过去了六年，他家灯还是关不上。一关灯，人影、碎片、尖叫，都跑出来。想到这我开始从雾里往下坠，我想抓周围风筝，但没能拽住我的。我捶了一下公园椅子，木头发出碎裂声。

我说，你原来还是看不起我。

她说，扯这个干嘛？

我说，那小语呢？

她说，你知道我整个人都给了你们。

我不说话了，她再开口的时候声音一直在抖。没这个我们活不下去，她说。我说，是你活不下去，还是我们活不下去。

结婚没多久我妈来我俩新家。那天许杨出去了，每次我妈来，她都出去。我妈看看书房里的书，又看看卧室里的书，说她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书。我说，萝卜青菜。她摇摇头，你可别幼稚了。那天许杨加班，我妈给我做了一桌子菜，一边夹菜一边说，不会有哪个女的像你妈对你这么好的了。

许杨走的那天，我帮她收东西，好像她只是出差。她说，要封闭训练，不让带东西。我没听见似地接着收，直到包了两大箱子。她把头埋进我肩膀里，抬不起来。她说，两周后点火，你们去吧？我想了一会儿，点了点头。她说，你带着小语去吧？我又点了点头。

许杨：

本来没有家这回事，两个人长出孩子，家就长出来了。我爱上老韩不是在床上，是有次我们走在马路上，一边几个气球爆炸，我躺到地上尖叫的时候，老韩跟我说再也不让我听这种声音了。我勾着他的脖子松不开。我睁开眼，发现他是跪着的。

老韩在所有方面都力求完美，就像他不愿承认自己的每次走神。他走神时我也会抱他一会儿。他醒来我也不跟他提，只说：

“有段时间溜走了。”

在杨丽丽突然出现在我家后不久，我们发现所有重大情绪也能从地球飘到墙。之后航天局就找到了我。我跟着一个瘦高的男人走进招募室，他的脸色像那天的天气一样阴沉，语调像他的脸色一样阴沉。

“其实这五年墙的研究没停。”他说。

他转身在白板上写下“4%”，他的字迹如此清晰，以至于整场谈话我的目光都在上面逡巡。这个意识物质在墙的构成占比，和我们此前对宇宙的理解惊人一致。每当新的意识融入墙，其他组分也同比例增加，使 4% 这个比例始终恒定。这一度引起巨大恐慌，直到人们确定墙的质量只有墙内黑洞质量总和的四分之一，而且墙只影响距离 300 万公里以内的引力场。现在问题是，从墙发出的意识波动过于微弱，除了派一批心理学家去现场收集，没有其他方法。

“没关系，你有三天能考虑呢。”他最后说。

我们第二次见面就在第二天。他说探测器只能搭载 6 个人单次跃迁的能量，此前宇航员返回的唯一解释是误入了微型虫洞。当我试图计算返程的可能性时，他说：

“你知道第一年，全球发了几个探测器吗？”

我记忆中的“2 万个”还没有说出，他便接着说：

“90 万个，只回收了 20 个。”

我们与地球的通讯也是受限的。基于墨子号对 EPR 佯谬的验证，改变正反粒子中的任何一个，另一个无论身处何方，都会以完全相反的方向改变。这是我们传递信息的唯一方法，但我们这边只有 30 万对，相当于限制了带宽到 30 万个二进制。除了墙的信息，什么都不能发出来。

“如果我不去呢？”我说。

“怎么说呢，我们一共派 150 个心理学家。”他的语调仍然毫无变化。

第三天我决定去找杨丽丽。她突然造访我家后，便搬到了康复小镇，只定期见我和爸爸。我望着她桌上来自藏族的皮带、维族的茶杯和回族的帽子，几个问题渐渐清晰了起来。

“你为什么觉得是保护我们？是你非要走。”我说。

她的双眼又涌起笑意，人造阳光投入她的眼睛像映在一条溪水里。

“我一直想找个东西去恨，可是我该恨谁呢？”她说。

我刻意选了我和老韩常去的公园说这事。我说完之后他对我所有的感情瞬间褪去。让我一下没有了愧疚，倒觉得是他在背叛我。

“以前韩力看不上我。”他说，“他每次打我，我都想表现好点。表现好了，他确实不打了。我跟你也是，我也想表现好点。可你最后还是没看上我。”

然后他又走神了。

火箭点火的一刹那，巨大的爆炸声让我又一次惊恐发作。短暂的训练没人想到测试这些。我捂住耳朵尖叫起来，队长梁凡瑜一边摸着我的脖子，一边掏出地西洋扎了进去。我的双手在空中挥动起来，但始终碰不到老韩的身体。地西洋让我的心平静下来，我的身体随着箭体剧烈抖动起来。因为没有返程的选项，梁凡瑜不断摸着我的额头。窗外的世界以无法想象的速度远去，很快我们便进入无尽的黑暗。这时教堂里那个背对光的人又出现在我眼前，我看到他脸上什么也没有。整流罩分离后，梁凡瑜又出现在我眼前。

“我做了个噩梦。”我说。

“什么的？”她问。

“小语的，我还是放不下心。”我说。

出发那天黎明时分我们就集合了。我们捧着鲜花站在国旗和联合国旗的两侧，巨大的条幅像一座桥一样横在我们头顶上。两面旗帜在微弱的光芒中反复飘荡，背后是一如既往的阴天。一些人过来照相，另一些人过来拥抱。没什么人说话，沉默中偶尔爆发几声抽泣。我反复寻找老韩和小语的身影，但他们自始至终都没出现。

韩思语：

我从小就知道许杨漂亮，邻居们都说“这孩子没她妈妈漂亮”。因为这个，我总觉得爸爸对她比我好。那时候我就开始讨厌她。越好玩的事，越会被她说。她却还说，我把我和你姥姥的都给你了。

四年级的一天，我在饭桌上等她。我爸让我先吃，我让他再等十分钟。那十分钟，我看不见我卧室的光比以前柔了，我挨个看桌上倒扣的碟子，边都掉了一角。突然我就决定喊我爸来吃饭，不等她了。

第二天，许杨坐到我床上说，小语，不论妈妈做什么，妈妈都爱你。我问她，这次出多久？她说，可能挺久，小语还记得宇宙外墙吧？我点点头。她说，现在我们能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就是需要妈妈去一趟。我的心撞得胸口疼。我问她，妈你会回来吗？她沉默了好一会儿。星光压在我头顶上，很冷，很重。

有可能，她说。我又问，她又重复。有可能，就这三个字。然后她把一副破得不行的拳击手套塞给我。之前我都快忘了它们，她塞的时候我才想起来。

许杨临走前我又见了她一次，我说，妈妈是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会不等你了。她说，妈妈不该让你等。我说，姥姥走的那会儿，你是怎么过的呢？她的眼泪一下就下来了，瀑布似的。我们抱在一起，泪水多得像能代替我们连上彼此。

我记得满头银发的外婆突然出现在我家的时候，无比慌乱，眼珠到处转，有生命似的。好像她是女儿，许杨才是妈妈。很久以后，许杨也会像外婆一样回来吗？

许杨：

在刚离开地球的时候，我们总会回头看地球。飞远之后，又会回头看附近的行星。当跃迁把我们投入到黑暗中时，我们都以为跳错了地点。每个尝试望向舷窗外的人都抛弃了物理学，开始相信宇宙是由层层叠叠的物质构成的。舰船加速的时候，我们甚至能迎面感受到它。宇宙在我们前进之前开放，又在我们经过的路途后面关闭。舰船好像不是在按照我们的意志，而是按照宇宙的意志在行进。

我反复的追问让梁凡瑜对我彻底失去了耐心。毕竟是我而非别的谁在负责整船人的心理。

“你确定真没有以太吗？”我常问。

我们的船名“纵目号”取自古蜀文明。舷窗外总能看到纵目二号像一个巨型的自行车轮缓缓转动，五根等分的辐条如同五根坚硬的海星手臂连接着正中的船舱。望远镜在其中两根辐条上生长出来，像两个外凸的眼睛。它们的目的好像不是采集墙的信号，而是要竭力看到墙的另一边。古代的蜀人生活在像今天一样多雾的环境中，在罕见的阳光里远方对于他们显得遥不可及。他们当中只有领袖蚕丛双眼凸出。他们文字多变，但每个“蜀”字里都有一个“目”字。

然而我们并不需要望远镜，便能清楚地看到墙。它在如平原一般肆无忌惮地延展着。我们好像不是在驶向它，而是被抛向它。它刚出现在眼前时，所有人都聚到了船首，船外的寂静渗透进来，降临在每个人身旁。虽然离墙还有几百万公里的距离，我们附近的 9 艘舰船都开始放缓速度，联合国的、美国、北约、俄罗斯、印度、巴西。它们的步调无法协调，就像反复进出黑暗的流星一般。

物理学家第一个打破沉默：“你们说宇宙的目的是什么？”

队医笑笑：“总是去安慰。”

我摇了摇头，我只能评价人的目的。

“宇宙的目的就是让我们造这个船，这俩镜子，来研究它。”工程师说。

“可重要的东西都是看不见的。”物理学家说。

“这不现在也看见了。”梁凡瑜说，“开工吧。”

由于我们被派在最长轴，在我们到达这里之前，来自中国另外 72 个方向舰船的信息就传来了。屏幕上缓慢弹出五种正弦波。图线是一种绝对的无序，说明五种意识在以任意组合出现。物理学家跟我一起拟合出混沌模型后说：

“它好像不想让你猜到心思。”

然后我们的望远镜信号传来。第六种到第九种正弦波形出现了，它们都与前五种正弦波的函数相关。我们正解析的时候，和其他函数都不相关的第十种到第十五种出现了。最后，波形开始脱离正弦函数，变得没有固定形态。我走到舰首，看了它很久。人类的意识像雨点打在这片深远的湖面上。当无数的人类意识在它内部融合，会产生什么呢？我们最后的解析结果中没有任何孤独，也没有死亡。它丝毫不惧怕毁灭，好像相信存在之外还有存在。

随着我汇报时间的缩短，压在我身上的目光越来越沉。到第五周，我们除了绘制更多的无序波形，不再有任何收获。我向梁凡瑜总结这是一个孤立心理后，她下达了开始 B 计划的指令。纵目号的六个人将兵分两路，梁凡瑜和我前往联合国的船，其余四个人开始原位远探。

在我们出发之前，梁凡瑜带我来到通信室。十万个玻璃罩像密林一般排列着，我们每人都收到了来自家人的三分钟音频。也许是老韩让给小语，我只得到小语的。她留下的只有文字，而且显然没到三分钟。

“许杨，他们让我过来。如果你收到，我跟我爸已经忘了你了。我还好，我爸不太好。我也不太好。他们不要提，我都已经忘了你了。”小语说。

我趴到梁凡瑜的身上。梁凡瑜的身体剧烈抖动起来，我身体里的热量涌到她的身体里，又返回我的身体里。

“这是地球什么？”我问梁凡瑜，“这是什么时候？”

“我们过了一年半，地球过了二十三年。”她说。

不久后，我们乘坐的飞行舱像一个出芽的孢子离开纵目号。另外四人的告别停留在“保重”和“后会有期”里，不愿再延伸什么。刚刚飞走后，我们的目光久久停留在匀速变小的纵目号上。有天我们醒来，在视野里突然看不到它。我的队长开始大口喘气，把固定带绑在胸前，喊着“冬眠合剂”。我握起她的手，带她依次感知自己的手指、小臂、躯干、头颈。她的呼吸平静下来，我解开固定带，把她紧紧搂进怀里。我的队长不顾所以地哭起来。

“没有人给我寄信。”她说。

“我一个人惯了，没想到这个。”她说。“他们不该选我。”

然后联合国的船越来越大，我把望远镜的视野投到屏幕，两艘纵目号也同时出现。当它们停到墙旁边的时候，有六个树木一般的身影从船舱出来向墙漂去。他们每人身后都连着一条脐带般的绳索。他们先是用四肢的吸盘吸在墙面，然后开始两栖动物一般的跳跃。不时地，他们会打开手中的高能钻，但钻头连火花都产生不了。他们没有停下，而是向更远的地方跳去。我的队友们一次次弯曲膝盖、射出蒸汽、在不远处着陆的姿态，好像不是在勘探，而是在朝圣。我的脑中不断浮现起藏民在公路上长跪的景象。

韩思语：

我小学的同学，要么跟爸爸过，要么跟妈妈过。有的谁也不要。可我爸妈都来家长会。好几个同学因此不跟我玩，说我的爱太多了。我总爱跟他们凑。许杨走之后，我再也不跟别人玩了。

那时候小孩少。地铁一半座都是染色的，大街上的人群走得都慢。一个班只有二十人，什么都跑不过老师眼睛。我落单之后，班主任排了个活动，挂个大红色的横幅。家长也都来了。

她说，三十一年前，出来什么了？我们说，宇宙外墙。她说，咱们开始全民航天。咱一年级就开了天文课，现在还有高赛班。国家到现在已经派了一万多人上去，咱们班也有两个同学都是宇航员家庭。我们欢迎他们讲讲好不好？

先上台的同学，一边讲一边哭，他讲话还行，哭的时候很吵。可在哭的时候，掌声才响起来。班主任喊了几遍我名字，我才想起要上去，但我忘了她想让我讲的话。所以我站起来，走向和讲台截然相反的方向。我走到走廊，掌声还没停。掌声到处都是。后来我爸也来了女厕，拍我的后背。我盯着池子里刚吐出来的东西，告诉他也没什么的。初三我们搬家，我爸在挂东西，身后箱子没整，许杨和我俩合影一角露出来。我看着薄膜后的许杨，以为是别家的谁。那天我开始染发、烫卷，画像一团雾的眼影。我朋友多起来，穿衣服不再重样，男朋友像我换衣服那么换得勤。甚至有一天，我爸来跟我说我对班级氛围影响不好。我说，分得快就不好吗？他说，我们当初也这样，可你妈还是非跟我结婚。我火了，为什么拿我跟那个女人比？他说，再怎么她也是你妈。我说，那她还是你老婆么？他就不说话了。

许杨走没几年，我爸就沾上酒。再之后，他就垮了。他接各种各样的活儿，身上有各种各样的味儿。他进屋直接喝酒，我让他先把澡洗了。他跟我说，喝完酒才有力气。

许杨刚走的时候，他的身体像山一样结实。我睡不着就找他。他不会说话，就拍拍我肩膀，我看着他背后的月光沿着他肩窝滑下去，像滑进两处山坳。直到他用两只手推我到房间，然后给我铺床。他跟我严肃地说过，自己要是走神，别紧张，别理他就好。可我一次都没见过。他从没因为什么发过抖。直到我高三报完志愿不久的一天，我躺着玩手机，传来一阵拍门声。我打开门，他大步走进来。我问他，你没带钥匙？他接着往里走。脸颊被什么憋得通红，全身止不住地发抖。我摸他的额头，有排细细的水珠，反而是凉的。我问他怎么了。他摆摆手，我才看见他几个指节全破了。我说，你跟人打架了？他拉起我的手，找了张我卷子，翻过来写起银行密码、房产证码。他写的时候，身子不抖了。他的颤抖都传给了我。我说，爸，到底怎么了啊。他看了我一会儿，说，爸去办事儿，一会儿回来。说完他就走了。然后他再也没回来。

我唯一留着的是许杨的拳击手套，原因就是她说了一句有可能。其实她不如让我认定她永远走了。如果我们都能回去，我一定这么跟她说，别留念想，就说，我回不来，所以忘了我吧。

许杨：

我们吸住联合国舰后不久，便发现门被锁住了。我们按下紧急按钮，只摘下头罩，就浮进空无一人的控制室。梁凡瑜像蜕皮一般把宇航服脱到控制室的地板上，带我出去。在一处拐角，一阵淡淡的血腥味进入我的鼻孔，我拉住梁凡瑜，而她说：

“你又过敏了？”

然后我们的后脑勺被重重地打了一下，晕倒过去。

我们又一次进入控制室，被绑在椅子和地板连接的立柱上。梁凡瑜皱巴巴的宇航服在我们面前蛇一般地蠕动着。一个男人看到我便放下手中的豌豆胶，来到我的胸口重重地踩了一下，然后回去继续吃。他没给我们堵嘴，因为他踩完之后，我感觉肋骨都陷进胸腔里，卡住我的声道。每隔一段时间，那个男人就会被另一个接替，然后是第三个。

我们无法辨别昼夜，那三个人的换班成了我们的全部节律。有一轮，第一个男人蹲到我面前问我名字，他说叫 Aris。梁凡瑜代替我回答“*你*”，接着他用一根修理钳结束了对话。也有一些时候，他们三个都不在。梁凡瑜就在这些时候跟我讲起 B 计划：我们收到家信不久前，北约就发动了第二轮信息战。与此同时，我们在五个方向的舰船都看到北约的船接近墙，在墙面伸出一根细杆，做起连续抛掷。而在距离这些船 500 万公里之外的地方，又有另一艘船停在墙面。他们叫它“弹球计划”。很早前就发现墙的引力不仅会把粒子吸在表面，也会提供一个沿切面的加速度。由于墙是几乎无摩擦力的椭球体，因此可作为一个超大型粒子加速器。那几艘北约的船，像扔一个弹球一样把粒子抛出去，它就可一直加速下去，直到遇到 500 万公里之外的回收器。在这个过程中，每个粒子都会成为高能粒子。此前类似的研发都告失败，是因为宇宙微波背景中的低能粒子会中和高能粒子。墙出现之后，很多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都收到了更多高能粒子的信号。人们突然想到墙正好可以挡住宇宙微波背景。

每个高能粒子都具有摧毁一颗恒星的力量。当第一批弹球被成功回收后，科学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分化。一部分人决定放弃科学，而另一部分人成立墙教，好像人的本性不是信仰未知，而是信仰力量。人们翘首以盼墙的下一份礼物。但墙是沉默的。在此后二十年，它都像此前一样沉默着。

弹球在墙表面呼啸而过、惊扰意识波动的场景不断出现在我眼前。这项超级武器的制造，似乎和那已故去的万千灵魂密不可分。我对梁凡瑜说起我的担忧，她却一脸轻蔑。

“即便是活人，他们也会用的。”她说，“何况是死人。”

最终让我放心的不是人类对弹球的控制，而是得知我们也已在研制同样的弹球。实际上，纵目号留下的四个人是到墙面抛掷弹球的，是真正的行动组，我和梁凡瑜才是远探。那三个人处理我们的方式很简单，我们的上身紧贴着自己的膝盖，同时被另外两个膝盖压着，直到被捆成球形。我的队长是先被扔出舱外的，在她匀速远离我的过程中，我看到她的皮肤迅速地塌陷下去，冰晶瞬间结满了她的脸庞。在我被扔出去之前，Aris 平静的微笑一直停留在我的视野里。

“我们既然是囚徒，”他说，“做好囚徒的事就好了。”

在我们被绑住的最后几天，我盯着窗外的黑暗，发现它不是一整片，而是分成了更明亮的黑暗、更吵闹的黑暗、和更沉寂的黑暗。我眼前的黑暗先是闪耀起来，然后又归于沉寂。在黑暗中我能看到老韩走神后的意识，其中充斥着骚动和孤独，同时也有一种温柔显现。然后我看到了一场沉静悠远的睡眠。我曾经一度恐惧小语的到来将永远剥夺一部分自我，她出生后很长一段，我都想把她送人。但当她逐渐长大，我看到她像我一样打拳、看星星时，我又找回了那部分自我。当她再把这些东西教给杨丽丽的时候，我开始相信这些自我要比原先的更好。她最后跟我说的一句话是：

“妈妈你会回来吗？”

她的眼皮用力地闭着而微微颤抖。我摸着她的脸，不知道除了允诺，还能说什么。

“有可能。”我说，“很小的可能，但是有可能。”

她抱着我沉沉睡去。一小时后，我把那副拳击手套放在了她的怀里，接替了我的位置。

韩杰：

停宇航津贴后，我开始真的倒霉了。那是许杨走的第五年。他们说全民航天，就是全民支持航天。那年北约开始搞机器人、搞新原子弹，我们也搞。津贴是一点点变少的，等全没的时候，我们只好搬家。搬完那天，我到小语屋子帮她挂那七张照片。从小我就带她拍照，两年一回。那些照片本来隔一截挂一副，现在都挨一起。我从她小时候看到她大，又从她大看到小时候。我扭头的时候发现她不在了。她正在院子看地上打转的叶子。后来她变了好多，学校不让干的都干。她天天从我眼前过，又好像在别处。小语课外班越来越花钱。医院一个月开八千，课外班就花五千。我白天在医院抬病人，晚上就去帮王德利抬大体。每天能多一百五。有天护士长突然跟我说，院里要进一批机器护工。我说，病人能好受吗？护士长说，省钱。以前是机器比人值钱，现在反过来。那天我就这么被省了出来。我走的时候没有医护也没有病人注意我，好像我从来没来过这医院。

我看到快车公司招人。这工作除了吃饭没点，尿蛋子憋得慌，都挺好。但没几个月，机器人驾驶就批准了。空的车，人一进去，车自己走。慢慢地，大街上到处晃悠的人多起来。人们渐渐分成两拨，吵墙的事，有时还动手。我还是那句话，宇宙跟我们这种人他妈有什么关系？大街上开始贴招募“破壁者”的海报。我一看，给钱挺多，能够小语后半辈子。再后来，开始给没工作的人发机械补贴，街上的人就少了。可这些钱

还是不够，我又去找王德利。那时候有种新的编制，只有他们不下岗。可王德利告诉我，解剖系就这么一个编制，给我了，他就没了。我说，我闺女要上大学，要不你借我，之后我再还你。他说，你是愁挣钱，我是愁花钱。我说，你他妈什么意思？他说，我闺女直到她上大学那年，才知道她什么病。一进医院，人家都是希望别看出啥，我们是想看出啥。我说，那她现在呢？他说，刚知道怎么回事时候，我有钱，可买不着药，现在是终于有药让我买了。最后他没给我编制，只给了我一包烟。

我出来后，看到大街上发“麻糖”的机器，突然有了点想法。那时候街上免费发麻药，做成口香糖，嚼几下人就飘起来。烟酒限量，但人们还是想。我转头问王德利哪进的烟，我知道哪搞酒。我租了辆小摩托，后座绑俩折叠板。几个礼拜下来，哪儿有监控我都熟。可平衡不好掌握，不被逮，就要去背阴地儿，可那又没客人。有天就是换地儿的时候，远处一个人影过来。我没看见制服，光看见它灰溜溜的身子。它伸手按我摩托，我发现是个机器人。我推车接着走。后座里的酒咣当咣当的，让我直想乐。没想到它另一只手也按过来了。我说，兄弟，你这一般怎么私了？它说，从事售卖限制品，请你配合调查。我说，我自己喝点。它说，你已经触犯了城市管理条例第 6.2.5 条，我们有证据。我说，证你大爷。它想挪我车，我掏出后备箱里的钢条，把它打烂了。好在它上司是个真人，扣下我的货就让我走了。之后换了政策，没有机器人穿制服，都改成真人。可没几个月，我就又摊上个小年轻，他过来时候一直冲我笑，他说这是微笑管理。他都把我两条烟塞自己包里了，可我走没多远，他又来抢我车。我说，我东西都给你，这车是我借来的。他说，你东西都给过我了，我就是来要车的。我就打了他一拳。这时我猛然想起，自己从来没打过人。他反手打了我一拳，我就又给了他几下。他说，老子要碾死你。我取出那根钢条，接着打他，直到他什么也骂不出来。我大脑一片空白，然后韩力和别的一些事儿涌过来，乱糟糟的。直到他开始求我，那些事儿才一股水似地流出去，只剩下小语。我停下来，跟地上的制服说，你滚吧。

回家的路短，去派出所的路越走越长。警察已经站好一排。一个白头发的说，得换个地儿待着了。我头顶的汗又下来了，我说，不用再审吗？他摆摆手，录像都看了。

我说，再审吧。后面一个小年轻说，快走吧，最后一趟车了。

我上了一辆坐满人的小巴。六七点的阳光透过栅栏进来，一片金属灰。到那之后，一边过一个淋浴头，一边机械手查体。它们好像在我身体里搅，伸进我屁股里时候，我叫了一声。然后去一片草场，我是最后一趟车，所以被挤到最边上。有人推我的时候，铁丝网就贴到我身上。阳光也透过这些铁丝网进来，我想怎么跟之前六七点的一样？才意识到已经第二天早晨了。铁丝网外站了排机器人。我旁边有个老头说，别伸手，有电。我说，怎么这么多人？他说，进来好些精神病。我说，怎么不去精神病院？他说，因为关了好些正常人。这个仓好，排队快，半年就能审。而且一般发南城二监，每顿三个菜，天天有热水澡。然后他突然停住，压低声音说，不过我听说二监快满了，如果到四监就不行了，狱头贪。我说，你挺有经验的啊。他说，里边可比外边舒服，就是进来越来越费劲。这回我先抢了个包，结果人家说兄弟有难处啊，还从口袋摸了张卡给我。我见着个漂亮妞，把裤子一脱，结果她叫了一声说，两千一次，只用手。最后我上街，去撕破壁者的海报，才顺利进来。我说，我跟你走吧，带我去二监。他上下看了我一下，问我叫啥名。我说，韩杰。他说，王德全。我说，你这名儿跟我一个好朋友很像。他笑笑说，他叫啥？我说，王德利。他摇摇头说，不认识。

我影子似的跟着王德全，我手里东西总是比别人多。他让我把东西送给管教，说，送东西，才能得东西。入冬，王德全的哮喘出来了，没法儿下床。我花大价钱给他买了布地奈德。我把呼吸罩按到他嘴上，他吸着吸着坐了起来。我说，见好真快。他突然一把搂住我说，上次给我买药的还是我闺女。布地奈德快吸完的时候，他跟管教待的时间越来越多。发车那天，草场上又人头涌动。他没出现，我走一会儿，就回个头。快上车的时候，他的粗气声过来了。他手里拎着两个大包，比我们一队人加起来东西都多。我说，这么多东西，喊我一声啊。他跟车门口的管教对了下眼，管教伸出警棍挡在我胸前，他就这么从我面前走过去了。我喊，王德全，王德全。他不理我。那辆车开远了，车窗里全是后脑壳。后来管教才告诉我，那是去二监的最后一趟车。我就这么去了四监。

我进来的第四个月，小语才来看我。她问我怎么样。我说，挺好，就是地方小。她说，我住的地方也小。我们笑了一会儿。她说，案子还得排几个月，我也不知道给几年，那王八蛋非说自己离不开拐了。我说，你别操心这个。她说，我后边给你存点钱。我笑笑说，里边发的都没处花，你给我个地址。她没笑，说，房子我早退了，搬大学宿舍了，我后来没考上你说的。她拿出录取通知书，举到玻璃前。我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计算

机语言专业”，我看到红章的时候，她两行眼泪正从红章下面滑下来。我说，民政局来人了吗？她说，爸，我都这么大了。然后她终于笑了一下。幸亏你是在我这么才犯事，她说。我看着她，笑不出来。

那片草场视野好，能看见星星。我想许杨是飞到了哪颗星。以前她老说我憋着口气，可天上的人，又怎么懂地上的这口气？

韩思语：

上高中之后，我就跟我爸隔了一层。他看不惯我，我看不上他。我高三报志愿，是从分低到高来选的。分最低的叫计算机语言，我打听一圈，没人感兴趣。计算机的语言，计算机自己都能写好。我跟我爸说的时候，他一脸正经地打断我。我说，这专业是硬需求。他不信，让我选意识科学、强人工智能什么的。我就说，反正你也不懂。他抢过电脑，勾上几个带人工智能的，直接提交了。我爸的脸颊和指节都红彤彤的，他就连给我报志愿的时候身上都带着酒气。

我爸刚进去那段，我不敢回家，就去找当时的男朋友，给他讲我爸。他皱着眉头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我给了他一巴掌，当天就分手了。我给我爸写信说，我想明白了，咱家能出来个好人吗？他给我回，你男朋友说反了，是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我第一次从看守所出来，大街上有两拨人在吵架，一拨说多亏了墙，造出新原子弹。对面那拨说要打破墙。他们周围贴着宣传海报，说把人的波长调成跟墙一样，能和墙融合、穿过去。我想这两拨人没必要吵，都可以报名，崇拜墙的跟墙融合，讨厌墙的去破壁。我想，要不我也报个名得了。这时我打了个激灵，我爸闯进来。他进去了，我反而跟他近了，人就是这么个动物。我迈开步子走出去，那天是我第一次上街。我看不见一群穿制服的人走近那两拨人，不再发怵。

我大学的课不仅内容重复，连问题都是重复的。每节课都有人问，为什么要学 AI 早就会的东西。我们被叫做“考古系”。可这系很适合我，简单重复。我一打字，代码在我眼前长出来。除了键盘声，什么都听不见。除了上课，我还得搞钱。那时候同学都用一个叫“糖配”的软件，女的一进去，填年龄三围，男的一进去，填月付金额。我想这个好，很纯粹，省纠缠。我遇上四个没什么头发的大叔。他们说着离不开我，可我一涨价就全走了。到第五个，竟碰上个同龄人。我问他哪来这么多钱。他反问我，什么才叫钱多？我不说话了，想着怎么给他涨价。他接着说，我不在乎的东西，反而会来。我说，那钱是你挣的吗？他就不说话了。

他本来住上海，跟我在一起之后，就说自己住北京了。他非要跟我去看我爸。我说，在商言商，你这样我只能换人合作。他说，那好吧，我安排他好点儿。有次我跟他去外滩，江对面都是高楼，每栋楼只亮一半，可凑一块还是很亮。我仰起头，不仅看不见星星，连夜空都不见了。他问我是不是喜欢天文。我说望远镜我早扔了。这时候一些焰火升起来，有的亮得久，有的亮得短，但终究都会灭。他说，现在焰火都是改良的，视网膜影像能持续五分钟。我说，你是不是 VR 玩多了。他说，你为什么玩糖配？我说，说一辈子也做不到，何必呢。

我们沿着江边走，船在顺着我们飘，风在逆着我们飘。他突然说，我就一直想跟你说——这时我们路过一个发麻糖的，他跑过去。机器只说话不出货，他就用皮鞋踹机器，大衣被鼓鼓地吹起来。我赶紧跑到另一处拿了块给他。我说，你嗑这个啊？他说，这是我们家产品。我说，你到底干嘛的？他说，你可以查查，樊育恒。我一查，发现他爸是远翼的高管，当时的前五大 AI 公司。他说，我以前一说完，女的就变样了。我说，变什么样了？他说，反正不是你这样了。

他接着说，因为人都只往上看。但在底下的人，又看不到上面。我说，你丫什么意思。他说，首先强 AI 出来了，大部分人给它们打工，后来他们也不用打工，政府养着，政府的钱 AI 公司出。很快，所有工作 AI 都能替代，底下的人越来越多，上面的人越来越少。所以才要这个，他指指发麻糖的机器。

他说的时候，江上的货船正飘进自己的轰鸣声里，而轰鸣声正飘进它们更前边的黑暗里。我知道船上没人，它们进入黑暗的样子就像巨大的鲸鱼。风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吹，但总在顺着它们吹。我说，那这样，咱俩不太合适。他张着嘴半天没有声音。这时我已经走开了。他说，我们公司也做好事，飞船都用我们系统，怎么说，我们是打前锋的。他拉着我的大衣，都快把我大衣脱下来了。我停下来盯着他说，我甩你跟你没什么关系。他才放开了我。

本科毕业，我的老师推了十个人读博，我是其中一个。博士毕业，她又把其中两个推到她项目。她没带我去学校，而是去了航天局。我说这跟计算机语言有什么关系？她

说她也是接到通知。可刚到航天局，她就被挡在门外。她以为是她的项目，实际上是我的项目。一个瘦高的男人带我进了个屋子，他的两颊像被嘴巴吸了进去，表情也是。他说，你见不惯太空、宇航什么的，但这不是你所有心思。几千万光年之外，我们在好多个位置都收到了几组有规律的声波信号。这些声波都出现在脉冲星和墙的引力平衡点。我们还不知道声波来源，但因为脉冲星是整个宇宙都用的定位系统，所以很有可能，是来自墙另一边的“他们”。

他接着说，我主要来跟你讲这关你什么事儿。第一，把什么样的设备放在那，都收不下这些声波，只能靠人感知。我们听到的只有宇航员的复述。第二，他们的复述很统一，信号就是几种计算机代码的拼接。第三，翻译这段声波的过程，相当于当场破译密码。我们想来想去，只有你的专业能做。

那为什么选我？我说。

所有推荐的，我们都做了意识测试。只有两个人有那个。他说。

哪个？我说。

黑匣子。我们不知道黑匣子里是什么，但能看到它。能听见这段声波的宇航员，也都有黑匣子。他说。

我去不了。我几乎不假思索地说，然后我站起身。

你不用再做别的工作了，你爸也——。他说。

我俩都听过这话。我说。

但你比她当时要稀罕得多。他说。

我从航天局出来，想去找我爸，到半路我又返到学校。老师一见我就说，这么好的机会让你赶上了。我说，您打住。我就往家走，到家门口我看见一个男的坐在那。我远远地问是谁。他说，找你这么久，没想到是航天局先把你定位了。他的胡子像芦苇一样又高又密，说话的时候，嘴像一口井一样一开一合。我往后退，他又过来抓我大衣。这时我才认出来是樊育恒。我说，你去搞艺术了？他说，我跟家里闹掰了。

我们刚进门，我老师的电话就追过来，让我这段安心待着，不排代码。我打开手机，先提示我一条转账，说明天还要再发一笔。然后是仓库的信息，我爸让我给他回电话。我说，*你妈的。樊育恒问，你摊上什么事了？我说，毕业招聘。

我给我爸回电话，他说宇航局给他打电话让谈谈。我说，你跟他们说没什么好谈的。他沉默了半天说，他们说你心里一直有个事儿。你再想想，他们开了红色专线。我说，被子送到了吗？他说，盖了几天了。挂断电话后，我问樊育恒，你说人干嘛非往天上跑？他说，可能因为待地上不舒服。我说，你变化挺大的。他说，你有事跟我说，我虽然闹掰了，但还能拿钱。

我说，你的钱你自己留着吧。他说，你又有人了？我说，你到底干什么来的？他说，我就想告诉你我一直忘不了你。我说，你知道吗，我周围有人老说长久长久，可最后比谁都短。他搂住我，这次我没躲。

我打开手机日历，算起刑期。我去看我爸，跟他说我想好了的时候，说到第三遍他才听清。他没回话，脸上落满了水。访室的椅子要比囚室的高，但我感觉他一直在俯视我。他伸出一只手贴在玻璃上，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就也把手放了上去。我们的两只手好像隔着玻璃碰在一起。他的掌纹印在玻璃上。我跑开的时候带了一片风，很快把我的掌纹蒸发了。

然后，我去跟樊育恒说我要走了。他说，你要是走了，我也活不下去了。我说，人都是吸着别人的命才活，可没了别人一样能活。他说，你就没爱过我吧。我说，你是我唯一动过心的。他说，那我到底做错哪了？我想了想说，你什么都没错，可能正因为这个我才要走。

韩杰：

四监里我交的第一个朋友，是个强奸进来的瘸子。我问他为什么不找站街的，他说连这个钱也没有。他跟我一样，也是医院护工下岗，可他比我贼，走之前偷了一箱麻药。他说他一般趁聊天的当打麻药放倒，完事后灭口。一般是越反抗的越有杀心，越顺从的越想放走。他放过一个小年轻，麻药劲儿不够，打完了她还一直说话。他为了节约，不想再打一针。她问他有没有女儿，他说跟老婆一块跑了。她说，要是大叔你家人听说你出事，得多难过啊。他说，他们才不管我死活呢。这时候他停下来了。她说，大叔你要是放了我，我来管你。他就把她放了。后来就是这个女的去告的线索。我问他后不后悔，她说她现在还给他写信。

情绪报告仪进来那天，我们又多了个姓林的新管教。我们每天回监，都要在门口大表

画钩，“很好”、“普通”、“很差”。我们都瞎勾，没人管。那天门框上装了个像X光机的东西，说能测心情。我过门的时候，仪器说“很好”，我就勾了下“很好”。林管教伸手指住我，把我的脸从右边扇到左边。他说，都进来了，还好？我赶紧把勾挪到“很差”，他又把我的脸从左边扇到右边，说，你要差，那我也好不了。我赶紧勾“普通”。从那天起，我们所有人的心情都是“普通”。

林管教长得带女人味，不像做管教的。所以犯人们总盯着他看。可他一发现，就给几巴掌。他刚入这行，很有想法。我们的脸总是火辣辣的，好像把他想法印在了我们脸上。林管教把再教育内容改了，引入一个像躺椅的机器，一躺上去就做梦，说能监测和消除我们心里最大的恶念。我一开始的梦，都是跟机器人打架。后来许杨、小语也出来了。不知怎么地，她们就机器人混在一块，半人半机器，我打了半天，发现是她们。我上去抱住，一会儿又发现是不认识的机器人。

一天我从教育室出来，迎面一个佝背的身影走进去。他低着头，头顶像顶拖了线的白帽子似的。我扒住他，我说，王德全，你怎么来了？他的泪水流进皱纹里，像流进田里的小堑。他说，我接受再教育。我说，醒醒，是我。他说，我不想醒。后面的管教把我扒拉开了。再见他是几天后，我们上晚操。那段星尘悄无声息地来了，说是北约试验了新原子弹，把木星的一个卫星炸了，灰尘都飘到地球上。可我还是一下就认出了他。他说，我认得你，当初你把我甩下，自己来了四监。我合不拢嘴。他说，我费了半天劲，才把自己折腾到四监。我说，二监怎么了？他的嘴唇开始抖。他说，他们天天让我做梦。我老梦见两个人审我，为什么要去做海报。我说我以为这是个公益活动。他们说，你就不能有点理想？然后他们就打我。破壁是尖端探索，多有意义。后来我也这么想了。有次我出来，梦游似的，想着我也要破壁。破壁，破壁，我走到铁丝网，开始翻。结果挂到顶上，翻也翻不了，回也回不来，这时候电流来了。王德全身子抖得厉害，讲不下去了，我想搂着他，但我一碰他，他就触电似的弹开了。

林管教在四监待了七八年，他走之后很长时间，我们的日子都过不下去。这主要因为他把自己也放进去了我们的梦，每次梦的结尾都是他。他会说，监狱只改变那些愿意变好的人，有的人能从所有事上吸取教训，有的人一辈子都在一个事上栽跟头。好些个二进宫的，开始分不清他是在现实里，还是在梦里。听说他走，他们都哭了。那天我也哭了，王德全问我怎么了，我说，我想他打我的巴掌了。

人进大牢，就像一块石头扔进湖里。外面的人是浮着的叶子，总感觉跟他们连着，但他们没法跟着往下沉，除非把他们拽下来。有次我在教育室梦见了小语，她浑身都是金属的，除了头。第二天她真来了。她说，爸，我想好了得跟他们上去。我算了你还有七年，我们半年到跃迁点，执行任务四个月，算成地球五年，最后半年飞回来。那时候离你出来还半年，我来接你。我说，这就是个学习项目吧？她摇摇头。我问她，研究课题？她还是摇头。我问她，那你干嘛去？她说，一开始我觉得是为了什么去，离开什么，研究什么、自由什么的，但后来发现都不是，我就是觉得得去。我这辈子都没追求，这也不是我追求。我好像是，为了去本身才去的。这时我的一只手按在了玻璃上。她的脸都变形了，不知道是因为我眼里的水，还是她脸上的水。我看着我的叶子，想着她能伸手碰我一下。但她没有。她伸出指尖刚碰到玻璃就缩了回去，直到她跑开。那时我的手心里玻璃都是热的。

她飞走那天，管教通知我减刑两个月。然后我开始反复梦见一片阳光明媚的草地，坐着小语和许杨。不光她俩，我妈和许杨她爸也在，韩力和杨丽丽也在。他们有说有笑的。我想过去，但走了好久，他们还是离得那么远。阳光像一块冰挡在我们之间。小语先看见了我。她站起来跟我说话，可她说话的样子又好像不认识我。

她问我，你来干什么？

王德全的梦跟着他到了四监，他又越了两次狱。他知道自己被判无期之后，变了个人，每走步路都琢磨琢磨，睡觉一个姿势，刷牙逐一刷每个牙缝。我跟他说，很多无期都改有期。他跟我摆摆手说，你操我的心干嘛？我操我的心干嘛？

我们都不知道彼此刑期。慢慢我也不确定自己刑期。我们在灰尘里看不见人，可王德全总能找到我。有时我错觉，雾里只有我和他两个人。有次我们看着雨珠打在草上，他突然跟我说，你的身体在里面，但你的灵魂可以去外面。有次我们仰头看天，风把云推得很快。他突然说，你看不见空气，但空气在流动。

四监比二监好，一周有三天是劳动。二监天天再教育。我和王德全一直在一组，做陶艺的时候面对面。有次我说，我到底什么时候能出去？他说，你不记着刑期？我说，

我算不清减刑。他说，那你就做吧，等陶器做差不多了，你就出去了。我就开始做陶器。我想捏个陶人。我从来没捏过。我先做身子，一转盘，身子就圆起来，我一压，它就瘪下去，腿也盘起来。我把它的两条腿重新摆好，让它们既压着对方，又被对方压着。我把头刻上表情，它嘴在笑，眼睛也在笑。

我再抬头的时候，教室都空了，只剩王德全还在转他的盘。我的手上都是泥巴，我把头粘到身子上，卸下磨盘。这时门口站了两个管教，让我收拾收拾，可以回家了。我走的时候回身看了眼王德全，他冲我笑，笑得就像我捏的人，或者我就是照着他捏的人。我还没走到门口，东西已经摆到门口。我扭头说，东西都不要了，被子、衣服都给我里面的朋友，他们都要。

韩思语：

太空像一个巨大的子宫，孕育我们又不知它在孕育。无法想象的巨大和灰尘一般的渺小同时出现。我们曾路过一片海盗船状星云，同行的天文学家说里面有上百个太阳系正在孕育。也曾有两个比我们船体还小的星系被彼此引力纠缠，像一对无法靠近也无法分别的人。我反复想起失重训练，我们穿着宇航服在水里做动作。水池墙壁上刻的字被粼粼的水波弯曲着：九天之际，安放安属；隅隈多有，谁知其数。我们被一圈潜水员包围着，他们透过氧气泡注视我们，像水本身一样沉默。

我们的船取名祝融号，跟七十年前探索火星的计划同名。他们希望我们来取火种。望远镜对墙的发现微乎其微，便被移除。留下来的舱体改成一个向四周辐射光芒的太阳形。祝融号按照原计划到达报道最多的位置。墙和脉冲星的引力像无数根细线穿过我，把我固定在那个点。我动弹不得，直到最后队友把我拽回船舱。

每段声波之间，都会有一段完整的间歇，正像是一段段焰火。我甚至能听到记忆中滋滋作响的火花声。按照密码破译的规则，我先找重复最多的音节。那是一个火花湮灭时的尾音。当我记下它时，关于其他音节的猜想自然展开了。墙外文明的语言也遵循着二进制，如果用字母体系的语言来表达，组合含义太多，我便开始考虑单音节词，自然首先想到汉字。

按照原计划，我只有四次机会去平衡点。第四次的时候，我才听懂第一句话。许杨突然闯进我的脑海，我们曾正看着同一片黑暗。我开始猜测她当时来这的心情。那时那段声音清晰了起来。它刚一清晰起来，我便确定了它的内容。

所有不可言说的就必须保持沉默，他们说。

你是什么意思？我说。

他们重复了两遍原话。当我再次反问的时候，他们说：

所有可以说出的也不必说出。

此后他们便沉默了。当我把这两句话带回船舱，队友们一脸困惑地问，这个破译真的对吗？

我选了字符语言这边，只是另一条路组合太多。我说。

地面控制把这两句话和之前的声波比对，发现此前的声波只对应第一句。也就是说他们回答了我的反问。

十分钟后，地面控制才重新开麦，我能听到背景中夹杂着欢呼声。他们说要开始B计划，我要再做两周，相当于地球大半年。他们知道这样我可能错过爸爸出来的时间，但三天后B计划的对话方案依然出现在屏幕上。它们一个个字符地蹦出来，背后的十万个粒子也相同地跳跃着：

(1) 你们是谁； (2) 为什么现在和我们交流，以及我们的关系； (3) 墙是什么，为什么出现在这，它和你们的关系； (4) 我们观察到的事物是否真实，如果有其背后的真实本体，事物和本体的关系是什么； (5) 我们是否具有意识，意识的本质是什么； (6) 宇宙的意义、意识的意义以及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7) 时间维度、可能性维度或其他更高维度的形态，以及空间三维和这些维度的关系； (8) 是否存在多元宇宙，我们宇宙和其他宇宙的关系是什么； (9) 你们和我们如何在可观测现实、本体、各维度和多元宇宙中继续存在、或如何继续不存在； (10) 我们存在中的伦理法则是什么，是否可能实现群体幸福。

我要按顺序把这个十个问题提给他们。我问完前五个，他们没有回答。当我全部问完时，他们抛给了我一个问题。

你是谁？他们说。

韩思语。我说。

不对，这是你的名字，我问的是，你是谁？他们说。

在你们高高在上的文明下，人类正经受巨大苦难，尤其在墙出来之后，我们就是让你们随意玩弄的吗？我说。

你在这里，你想知道，但你还是更多东西。他们说。

我只要答案！我说。

但我只能跟你说话，而话只要一说出来，就是在掩盖事实，而非揭示事实。我知道你只关心事实，但你不该把我说的话和它想成一个东西。以后你会发现，你的问题也不是真的，因为你只要提问，问题就要用你的话来说出。你的怀疑本身，也是无法确定的。这就是墙，你有你的墙，我也有我的墙。他们说。

他们说到这里的时候，两个队友把我拽了回来。地面控制用一成不变的声音告诉我，随着声波信号的增加，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分析出炉了。他们抛给了我若干个比喻，比如以前人们以为海螺里是海浪的回响，后来发现只是鼓膜动脉血流。

你知道回音壁原理吧？地面控制说。一堵圆形的围墙，声波会在墙里一些位置累加。他们从那一串声波中提取出了规律的意识波动，这才发现我们认为来自墙外的声音，其实来自墙本身。墙的声音在墙内四散而开，直到反复交叠、震荡、在引力平衡点汇集。从来没有墙外文明，跟我们对话的是墙。

当地面控制说完，我的笑声像洪水一样突然而至。这场笑是从我坐在地上开始的，他们想扶我起来，但我的笑却把我往下拽。我捂着肚子躺倒时，队长把冬眠合剂扎进我的胳膊。但笑一直尾随着我，据说我在睡梦中还会突然爆发笑声。当我终于醒来的時候，他们已经在讨论下一步方案。我被两个人扶到床上，床又被推到通信台前。

虽然跟一开始想的不同，但这也是重要突破。地面控制说。

然后他们让我再过去一趟。我说，你们换个人吧。地面控制说，这次只有两周。我说，是半年。地面控制说，你父亲那边都安排好了。我说，我跟你们不一样。地面控制说，他一出来就有人接，全程照顾。房子还原了你们以前的。我说，我跟我爸住的那个？地面控制说，你想哪个都行。

那天晚上，我一直看向不远处的平衡点，但什么也看不见。队长过来跟我一起看。他说，你爸知道你没去这两周，也不会高兴。我说，你完全不了解我们。他说，我没资格说，但你没资格不去。他指指祝融二号说，前两个听到过的人，把声波给他们，还是什么都不懂。他又指指墙说，北约开战了，用慢速弹球炸了贵州一个村子，我们也炸了他们一个，好在没再打别的。

我再上去的时候，能感觉到墙微笑了一下。后面的每次对话，我都尽量背下来，再声波复原比对。但破译越来越难，墙的语言逐渐把我带入一片雾当中，就像记忆一样。我以为它说过的，它可能没说，我忘记它说过的，它可能跟我反复提起。

最后几天，每当我进入对话，我都感觉墙不再是墙，墙成了一片森林。我是在跟森林交流。它们传来的不是一个声音，而是一片声音。好像风吹过树林的时候，经过的叶子都在沙沙作响。在最后那天，我感觉自己和它融为一体了，我也成了森林。那一瞬间无数的情感向我涌来。我一下就明白了墙最初问题的答案，我是谁。我无法用语言表述自己，而成了在那一瞬间拥有的无数感受。

我们的对话在这里被截断了，我们都陷入沉默。在沉默中，我所有过去的思想都已落下，所有未来的思想都未升起。我被打开了一片比白色还要洁白的空白。

我比最小的更小，也比最大的更大。我同时在很多地方，也在一处经历很多时间。我和其他的我最初处于极端对立的状态，我们发现对方存在的第一想法就是消灭他。墙告诉我，它经历的意识融合和这个过程无比相像。但成功之后，过去所有痛苦又消失殆尽。当我和其他的我终于握手言和的时候，我感受到那片空白像一只手一样包裹住我，手心传来源源不断的暖意。

这时墙说，我们的对话接近尾声了。它好像从第一天就知道B计划的全部。墙说，很多不可言说的东西，都是可以显示出来的。你已经找到了这些东西。但你的任务也刚刚开始。

墙说，你听懂了吗？

我说，刚才我好像完全懂了，现在又好像不懂。

墙说，所以不需要想我的话，只要听到我在说。不用提问，因为我们一直在说话。

回去的时候，我的宇航服上湿漉漉的。我的面罩上蒙着一层水珠，让我的视线一片模糊。队友惊讶的声音接连传来，其中一个说，应该是暖的气体液化下来的。可外面都是真空啊？队长摘下我的头盔后，我说，结束了。他说，任务结束了。我说，我跟墙不再说话了。然后我就睡着了。我醒来的时候他跟我说，有了你妈妈的信儿。我说，我妈？他说，你妈妈的意识波动一部分加入了墙，另一部分停在一个引力平衡点上，碰巧被

祝融六号碰到。有种头盔，关联近的人，就能跟那段意识共振。把它吸引回来，留在身边，还能重建那个人。但只能一个人戴，两个人就会干扰。

我说，我已经没有妈妈了。

他说，祝融六号还等在那，地面给我们机会。我们去汇合，你可以把那段意识带回来，也能带回地球。他们测了信号，大概能重建三天。

我说，过去要多久？

他说，还要另外两周，就是你要再晚回去半年多。

听到这里，宇航服上的水一下跑到我的身上，我滑到地上。

求求你们，别让我选了，求求你们了。我说。

我爸出来后被安排在一处高档公寓。我回去那天，他正躺在阳台布满阳光的椅子上。椅子正有规律地摆动，他的白发已经爬满额头。对我来说，他是从一个精壮的中年人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当他在我面前睁开眼的时候，满脸诧异。直到我说了三遍“小语”，他才猛然想起什么似的，拍起我的肩膀。他冲到厨房冰箱，一只拖鞋留在阳台。那时正值盛夏，他想给我拿两只我儿时爱吃的棒冰。但他翻箱倒柜，也找不到那种棒冰。当他终于从冰柜底部抽出一根其他牌子的棒冰时，他发现包装袋软塌塌的，冰箱的制冷系统早已停止工作。这时他一屁股坐在地上，浑身颤抖起来。

冰箱坏了。他说。

我叫他们修，很快。我说。

可他还是坏了。他说。然后，他捂住胸口，好像那里压着什么东西。他再说不出来话。我猛然意识到他是走神了。我的爸爸一辈子都没在我面前走过神，直到现在。我把他搂到我臂弯里，他抓着我仰起头。我凑近他的嘴巴，我以为会听到我的名字，但听到的却是许杨的名字。

他喊第三次“许杨”的时候，我说，回来了，我回来了。

他停止了抽搐，两只手从胸口滑到地上。我爸爸在我的臂弯里陷入了一场无比安详的睡眠。他睡着后，恍惚间我看到他脸上所有的皱纹都抚平了，白发缩了回去、柔软的黑发重新生长出来。好像他一下子又从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变成一个我怀中的婴儿。

韩杰：

一个叫曾航的小伙子把我带出四监，带进一处公寓。他笑起来跟屋外阳光一样好看。他也是一身黑衣。我跟他说，你这穿得跟大牢里似的。他就笑笑。我说，我女儿在哪？他指指天上说，还有半年。我说，她现在怎么样？他说，执行任务，局里最重视。我说，能跟她通个信吗？他说，你身份有点难，有话我帮你带。

家里的东西都很整齐，挂的位置跟原来一样。一开始他每天都来，我能听见他在厨房炒菜。后来饭菜通过门口一个横板送进来。没人进来，我就出去找人。小区人都在做手工，他们做的奇形怪状，我走过去说，你们整得挺有创意。其中一个说，随便捏捏就行了。我说，有工作就不错。他们说，现在谁还没工作？隔壁桌一个也穿黑衣服的小伙子冲我笑了一下，他的手又细又长。

又过了两个月，曾航来了，他说小语还要再过半年才能回来。我说，现在孩子都忙。然后他掏出六瓶药，说体检出来我有退行性变。我说，什么性变？他指指脑子，说，每天吃一片，这是三个月的量。我说，现在怎么造的都跟真人一样了？他说，之前发现了意识共振。我说，你给我看看里边呗。他摆摆手，我疼也是真疼。我说，那你能陪我待会吗？他点点头，陪我坐到阳台上。我说，咱俩挺不公平，你知道我的事，我一点不知道你的。他说他阅历太少了，他原来就是南方一个小山村的，那年北约做出慢速弹球，扔到他们那，村子一下就没了。后来用意识共振复原了他们意识，放进现在身体。不过小区模拟人也不光是他村子的，好多就是现造的。我说，你现在感觉什么样？他说，就是中间溜了好多时间。我说，那咱俩感觉挺像的。我们看着顶上的太阳一点点向西边滑，阳光越来越弱，我们的影子越来越长。我看着阳光勾出他的身形，线条像条海豚，让我想起许杨年轻时候。后来他一句话没说，我也一句话没说。夜幕起来的时候，我说，谢谢兄弟。他说，有事屋里喊一声，咱就通话。

我不想做手工，就待屋里等。过去的事越来越模糊。我开始分不清自己是在里边还是外边。有天当我站到有门把手的门前，想不起来该做什么。有天半夜起来，我站床边喊报告，没人理我。我憋得难受，揉开眼睛，才发现是在家。

小语回来的那天，我以为回来的不是她。这孩子都跟她妈走时候差不多大了，这些日子都去哪儿了？

韩思语：

许杨的意识被放进一个头盔交给我，头盔轻得像小时候玩的气球。许杨刚出现在我面前的样子，好像比她走的时候还年轻。她想碰我的脸，但她的手马上从我的头里穿了过去。

你都这么大了。她说。

她跟我爸重逢的时候，表情虽然无比惊讶，但并没向前走一步。她上下打量着他，像在找什么东西。

当时我爹站在我屋门口，正问我想不想带他出去走走。当我告诉他许杨也在这里时，他只是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像是听到了久未谋面的老友。

她现在在哪？他问我。

他的眼神跟随我的手指一起来到窗边。那时正站在阳光中的许杨对他来说是透明的，但他的微笑是如此持久，好像已经很久没见过晴天似的。慢慢地，我发现那片阳光并非空无一物，而是充满了上下翻滚的尘埃，它们游动、追逐，毫无顾忌。我爸爸是对着它们微笑起来的。

我知道你会回来的，他说。

这时许杨的眼眶才湿润起来。她仍然没有往前迈一步，她托我问话的语句，像是对一位陌生的长者。她放弃了在他身上的寻找，不愿再看他。

我们一起沉默地走上大街。我爸爸的表情像是第一次来这个小区。我这才明白他之所以让我带着出门，是因为他已经忘了大部分的路。他曾突然甩下我们跑进一家店问路，到了后又忘了自己为什么来这。

我看到无数个外形近乎完美的男人和女人，都穿着纯黑的衣服。他们每个人见到我都点头致意，好像知道我是新来的。人们把家里的东西也搬到大街上。在人潮之中，有人做手工或者敲电脑。有的家人在路边吃饭、碰杯，津津有味。还有几个人在路边冲澡，水顺着他们的头发流下来，帘子上能看到他们身体的影子。

我们去了一家商场，在发型的问题上我跟许杨吵起来。她让我梳她的发型，而我最讨厌的就是她的发型。我们走进一家照相馆，留下一张有空缺的照片。我们路过一条街，许杨说很像我小时候练拳的街。尽头是个死胡同，旁边房子像要拆的。她说要带我再练习一次，在给我示范格挡右勾的时候，她把手放到我的胳膊肘。我没有躲开。我爹在一旁看着，这条路他似乎一下就认出来了。许杨问起那双拳击手套的去处，我爹很肯定地说，已经找不到了。

由于许杨无法离我太远，那晚我只好跟她一起睡。我的床复原了以前的样子，但没有了吱吱呀呀的声音。我们躺在床上时，我爹翻来覆去的脚步声传来。他嘟囔着，门把手去哪儿了？我把爸爸领进房间，他才笑起来说，原来在这呢。然后他一屁股就躺到我的床上。我的床再次挤下三个人，只是我接替了当初杨丽丽的位置。许杨说，回来真踏实。我说，我也上去了，墙是会说话的。她说，它说什么了？我说，听的时候懂，后来又不懂。她说，我当时就觉得，人凑在一起，就比人强。我说，墙能弄懂，人不好懂。我爹说，人就是，对人好，对人坏，都没理由的。我们仰望向头顶无比晴朗的夜空，我看到墙正挡住一部分星星，但还有另一些在闪耀着。许杨把手放在我的手上，说，妈妈实在是太想你们了。我说，妈，我懂你意思了。

最后一天快结束的时候，我把头盔放进低温冬眠装置，和我爹一起登上火箭。因为他是高龄宇航，需要躺一段冬眠舱再出来。在漫长的旅途中，我成了唯一清醒的人。我最多时间是和船上两个模拟人一起度过的，这些我们曾厌恶无比的AI，现在看起来是如此亲近。整个葬礼他们都陪在我们身边。我们选的墓地是在一颗充满氯气的小行星。它正好被墙穿过，墙的突然出现，把它的位置瞬间固定下来。自从发现人的意识飘向墙的过程，就有人提出把这样的行星做成墓地。在这里去世的人，意识不用穿越茫茫无尽的黑暗，可以直接融入墙。我们走过远处的人民公墓，走向靠近墙的革命公墓。

我重新打开头盔，妈妈虚弱的身躯出现在墓碑旁的一张床上。棺材上铺着一面大红色的国旗和一面天蓝色的联合国旗。在模拟人准备的意识波动监测器上，我妈妈的正弦波逐渐破碎，就像是一座座桥悄然断裂。她把手放在我手上，一直不愿移开。我在她身上看到了越来越多自己的轮廓，我的妈妈逐渐消失，我自己的样子却逐渐清晰。到最后，我不是在看她，而像在看着镜中的自己。

在我们所有人都注视我妈妈时，一旁的墙突然消失了。它的消失像真空一样寂静无声，以至于几分钟之后，我都以为它还在那，直到其中一个模拟人发疯似地跑向飞船。在另一侧的余光中，我看到一边的恒星又开始了缓慢移动。然后，那个模拟人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告诉我们，墙确实消失了。

他的声音像被来自地面的情绪煮沸了。我望向灰墙本来应该在的地方，宇宙重新开始不绝地延展，我好像用肉眼就看到了它的加速膨胀。我的笑容伴随眼泪一起到来。远方所有的星星都出现了，并在我的泪光中闪烁不定。我低头伏在妈妈的耳边说，墙消失了，墙消失了。

在我跟墙的最后一次对话中，我在一片森林当中行走。它像我曾穿过的黑洞一样，收束了我的世界，在我绝望不得前行的时候，在另一面重新打开。再打开的世界是一片没有树木的空地。阳光在这里终于倾泻而至，连鸟鸣也穿越厚厚的枝叶抵达。在这里，我才看到森林不仅是森林，还是树下五彩斑斓的花，举着空气的野草，游动的蛇，以及黯然生长的蕈类。

与此同时，森林也打开了无数个其他的世界。在不同的时间中，人们重复着所有故事，或者干脆推倒重来。这些世界之间几乎没有界限，任何人都能像跨过一座矮墙那样跨过界限，和另一处的人握手。

我看到我们一家三口在一起，家人的家人们也在一起，他们爱的人、恨的人、过去并不在意的人都在一起。我们彼此联结，没有任何间隙。在我和我妈妈相处的十年中，她从没犯过错，直到现在。墙消失了，我们又属于我们自己。它永远地消失了。

许杨：

当小语告诉我门口站着的确实是老韩时，我不愿承认。当我们在地理上相隔，我无比想他。而当我们在时间上相隔，我便真的远离他了。我在那一瞬间想起的是我们之间所有不和。我在那十年里一直相信，他的方法只会把孩子带上歧途。我突然明白，是他的一再退让，才让我们得以保留感情。

我对小语说：“我还爱你爸，就是这个人不是你爸了。”

因此我在那颗行星上再次苏醒的时候，并没期待老韩的到来。直到当我的手去找小语的手时，他的手找上了我的手。我一直以为他看不见我，但他放的位置是如此准确，以至于我能感受到他手心的暖意。我又重新回到无边的黑暗中，我的头顶是遮挡住我所有星辰的墙。

随着我的意识逐渐模糊，墙逐渐弯曲了起来，像摇篮似的拥抱着我。摇篮里装着无穷无尽的海水，温暖的洋流源源不断从海底传来，它们欢腾着奔向我，产生急速翻涌的旋涡。我才明白，我并不是归于寂静，而是走向喧嚣。这时小语急切的声音传来，她想要把我从海水中拉起来似的握着我的手。

“妈，墙消失了！”她说。

“妈，你是不是不走了？”她说，“你别再走了……”

我抬起头，看到头顶上的灰墙纹丝不动，所有的星辰都只在它的后面。小语大概是糊涂了。但没关系，因为海水实在是太温暖了，它重新怀抱起我。

“傻孩子，墙怎么会消失呢？”我说，“它一直在呢，一直在呢。”



张宇成

笔名凌风，医学博士，写作现代小说、科幻、诗歌。作品散见于《青年文学》《湖南文学》等。

24 小时文学聚会

他们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写作，不管他们赖以谋生之道是什么，在写小说的时候，他们的职业都是小说家。欢迎来到 24 小时文学聚会。每周六见。



电影《分手的决心》(2022)剧照

小说

为一场假想的离婚人士大会准备的演讲稿

塞尔吉·帕米埃斯 | 故事群岛

和她在一起总会让人觉得在每道深渊之后，必定会有另一道深渊

要离婚的伴侣不应等待倦怠的降临和欺骗的诱惑。当爱情因为亲密和狂热仍在推进时，伴侣们理应在全盛时期就慷慨大方地保持原样，并怀着对出色工作的满足感，协商出一个不会辱没彼此经历过的日子的终点。这样可以省却放手造成的痛苦和诠释各种感情所带来的惩罚，也无需将那些感情作为借口，把情义转化成排斥与冷漠。和能觉察出下坡路危机的优秀运动员一样，爱人们也应当靠忠诚和勇气相互保护，这跟对自由的尊重是内在相关的，当关系仅仅因为固执而延长时，自由便会衰退直至腐坏。磨损无可察觉这一说法并不真实。早在化脓之前，创伤便会显现在细节之中，伴侣们会探察得到，却会下意识地否认，或许是惰性妨碍了他们的决策能力，又或许是他们相信更好的时光将会到来。尽管看似不会，但这样的拖延有可能是会有成效的。证据就是这种拖延常常会体现在子女和共同生活的时间上，这些共同生活的日子足以对我们大加改造，当我们想做回曾经的自己时，会发现情感演变要比经历这些情感的人更为迅捷。这样的脱节会引发误解，并将无视各类型明显事实的几率翻倍。愧疚感也会加剧结局的平庸性。正因此，在关系真正破裂的头几秒钟内，我的反应是留住住我们共同拥有的整段历史，而非一起度过的头几年时光。我重新想象那幅场景，或许跟你们中许多人经历过的很相似。她对我说出了长久以来我便期待她对我说的话：我们得谈谈。她不爱我了。她认识其他人了。他们正在相互了解。一开始，我感到燥热和羞耻。那是两种矛盾的感受，无法预料又来势汹汹。我得说明，燥热更多源自情绪而非生理。而羞耻则正好相反，令我肌肉紧张，也摧毁了支撑正常性的支架，在未最终承受所有风险之时，我们曾在此寻求庇护。我不必多加思索便知道我们适才激发的变化已无回头路可走，却会造成许多后果。悲伤不久便至，带着一种令我惊讶的紧迫感，我给自己立下了不要自欺欺人的规定。既然我早已直觉感知到这些，那便不能装作是件新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为了省去彼此间不必要的窘迫，我将原则置于情绪之前。我们间产生的鸿沟被精简成她交叉手臂、眼帘下垂的模样，跨出平常的界限令她疲惫不堪。我找出了我羞耻感的根源，那是我意识到我爱她这件事已对她无所裨益，哪怕是一种自愿而非有效的陪伴所带来的安慰也于事无补。我们在厨房里，这地方一直让我觉得是说出实话的恰当地界。在厨房里，亲密性是相对的。那里能听到从天井传来的洗衣机烘干和脱水的提示音，而冰箱精神病般循环的嗡嗡声成了公正的调解人。我看她，但没有告诉她，我要为在其它时刻曾责怪过她而感谢她，那是她在深奥难解的沉默中寻求庇护的计谋，直到一切都凝聚成一则无可挽回的讯息，那便是：和她在一起总会让人觉得在每道深渊之后，必定会有另一道深渊，而这条讯息又会在新一轮的沉默之前显现。这一次，表象并不具有欺骗性。日光灯让我们的表情变得严峻，也遏制住了哭泣的冲动。我们五分钟前才分开，我却觉得像是过了十年。此刻我终于能够承认这一点，那就是我早已下意识地为走到这一步做好了准备。我已经闯过了所有的训练阶段，那些最激愤和最满怀希望的阶段。我发现我拥有的方法的数量令自己都感到惊讶。我急不可耐地想要探明这一准备工作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我避免迁怒与哀叹的大爆发。我可以将关系的破裂变成一种为我们所经历的一切赋予内在联系的行为，而不要再过多玷污我们自己，我们曾深陷在而今早已过时的尊重之中，这一切已被玷污。我们相识时，一切都是即兴的。所以，如今我可以预见到，在我们刚开启的冷淡期内，我们应当更为严谨，不能任由自己因为随性放任而蒙蔽了双眼。至于对关系破裂时的爱意会浓于早先下坡路阶段的这份笃信，不知为何对我却像是起到了镇痛剂的作用。

二

我们不是一对好的伴侣，这一点我俩都很清楚，但我们却拥有对此缄口不提的良好品味。当两个人相识并感受到互相吸引时，之后回想起初次相遇的情景所参照的叙述通常都会宽厚而平和。不过在我俩身上，诱惑并非是双向的。早在多年以前我便早早作好了不受诱惑的准备，而且我也从未想过自己能有幸遭到像她那样的人诱拐——对于所发生的一切，这是最贴切的动词。以某种追溯过去的审慎观点来分析的话，我推测出这一切都是我从未曾知悉的先前的现实所造成的后果。她会对我感兴趣应更多归因于她的经历所产生的后果——那是在我之前的多米诺骨牌，而并非出于我诱惑他人的天赋。无论是幸或不幸，你正在经历这些时并不会意识到这一点，只有在此之后你才会察觉。我俩是在一次聚会上认识的，我们对彼此充满好奇，我体验着这种好奇，觉得自己像是中了彩票，或是成了一场邪恶赌局的受害者。由于在那个时候我仍用喜悦来配备新鲜感，所以我领悟到这一经历将不可重复，也将短暂易逝。证据在于，在许多天后的第二天（回忆将这么多天变成了单一天），在我离开她家时怀着被选中之人的欣喜若狂——我在大街上起舞，模仿着当时正在播放的一则香水广告——我从未曾想过我们还有再相见的可能。尽管这么说不好，但在双方配对时，还是不要忽略一些明显的迹象为好。通常，两个人的结合总会体现出美貌、地位或智力上显而易见的不般配。我在这三者的比较之中都处于下风，唯一能跟她打成平手的地方似乎仅在于为人和蔼可亲（说的是当时的我所具备的和善之处）、有为体验各种满足时刻提前做好准备的心态，这些时刻全是机缘巧合赋予我的，而当时候到了，也能心甘情愿地学会失去。为此，我很惊讶她还会再想见我，而更惊讶的是，几周之后我们竟然难分难舍（当我写下这个形容词时，我感觉到了它的脆弱）。到了这一步，我将全心地体会这一份对等的爱情，那种感受跟我经历其它不对等的爱情时同样强烈。我要回到关于彩票的直喻上来，或许赢得彩票的人的确能够觉察到威胁，而他还是会带着积极的看法继续向前，哪怕只是为了追究赢取彩票这一荣誉之事到底会给他带来怎样无可预料的灾难。那是我最乐于回想的几年，惊喜与丰富度都恰到好处，还有许多次的旅行，至少对我而言，那是一种持续的感恩状态。换句话说，尽管我可以认为爱是相互的，然而我也知道，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一个像她那样的人是不可能会爱上一个像我这样的人的。我这么说不是因为虚伪的谦逊或是要把自己当成受害者，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我虚荣，所以我才选择尽最大可能地延续这段爱情，并自信已经找到了维系爱情的方法。可是，从精彩向寻常的自然过渡凸显了我们的缺点。其中有一个特别之处：我的缺点在她看来要比我眼中的她的缺点更为严重。我缺乏耐心，还会运用一种有损健康的能力去承受痛苦，这一做法毫无必要，并且不合时宜。虽然我童年的境遇能替我在心理分析师的审判席上作出辩护、减轻情节，可在实践中这种痛苦会跟毫无戏剧性可言却同样令人生厌的嫉妒混为一谈。而且，这种痛苦很无趣。人们很少谈及无趣，但我想借本次分手人士大会的气氛告诉大家，无趣是毒害情感关系的首要因素。我是个极其无趣的人，多亏了作家的工作，我得以编造出一套有关灰暗平凡之人的伟大之处的哲学，让这样的凡人去直面有关贪得无厌的冒险家的文学套路，还有对变化、新鲜感以及杜撰的颂赞。这一手段的初衷是为

了不要让人觉得哪怕我自己不曾设想，却还是颇为轻易地成了一个亦悲亦喜的乏味之人。事实是我对此也有自知之明，所以，很容易便会预见到这一点终究会成为一个麻烦。但是，不知道到底是因为什么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爱情仍在继续，至少表面如此。由于我们这些无趣的人会觉得让自己乏味无聊是件无趣的事，所以我并未觉察到这一情况会将像她这样的人的期待磨损到何种程度，她可是一点都不无趣的人——或者她也无趣，只是方式不同。而且，正因为我了解所有关于无趣的秘密，我想当然地认为自己能够更容易地度过所有伴侣都会经历的停滞阶段，也觉得她是不用让我过多改变自己习性的合适人选。我没有咨询过任何人，但据我所知，婚姻治疗师们都会建议增强沟通、彼此坦诚，并促成有关“我们”的谈话。可我却并不认可将坦诚提升到信条的高度。我偏好直觉甚于确定性。

由于我俩都保持着尊重与喜爱，我也继续鲁莽贪婪地挤榨着彩票因子，于是一切都温和恬静。就在那时我知道我们并非佳偶，而造成这一不相称局面的责任更多出在我的身上，而不是她。这就是个简单的数学问题。如果两人中有一个人具备能跟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类成为好伴侣的一切条件，而另一个人则没有，那这事就是明摆着的了。不过我并不想拿这种难办的不对称问题让你们感到无聊，我就快说完了。在我们去葡萄牙旅行时，有一天我们去参观仁慈耶稣朝圣所^[1]。那地方得开车去，而且从停车场开始还得爬上没完没了的朝圣者台阶后才能到达。在我记忆中，爬台阶的过程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伟大时刻之一。伴侣在静默中要比在谈话间更亲密。在爬升过程中，我边走边估算自己自打我俩认识之后胖了多少。那是一个不太恰当的念头，但我作为朝圣者的零经验也贡献不了更多，而且我的精神境界跟我的体力一样不堪一击。每一段台阶都是下一段台阶的前厅，直到最后我也不知怎地我们便爬到了最上面。风景壮丽宏伟，一如朝圣所的纪念性，不过这一番努力明显影响到了我们。如果说在开始爬升之前我们还是彩色的，那么登顶的时候我们就成了黑白的。就在那时，从朝圣所的某道缝隙里冒出一个流动摄影师来，模样就像是上世纪的兰布拉大道尽头那些摄影师。他拿着一台能进博物馆的相机，显然是为了唬住容易受骗的游客们，而这一招在我们身上奏效了。他展示给我们看的样片都有种刻意的庸俗感。一个心形的相框里，框着一对对被幸福牵扯到一起的情侣们，照他们表情中那股不合潮流的淳朴劲头来看，他们简直像是《从猫泉走下》^[2]那首歌中的姑娘和士兵。不过我们可是现代人，要照着自己的感情来。当我们拍那张照片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带着浪漫的诚挚感行事，反而表现出讥讽，我们更多寻找的是戏弄模仿的乐趣而非对值得嵌入相框的一种情绪的纪念。当我们摆姿势的时候，我们效仿着老一套的俗气样子，但是当摄影师在几分钟后把照片——黑白的，就像六十年代照片连环画里的煽情人像照——交给我们时，我发现，尤其是通过她的表情和在她的美貌以及我因为神圣的台阶而加剧的软弱感之间的那道鸿沟我们不是一对好的伴侣并非偶然事件而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不过，我并没有承认这一真相——却被摄影师狡猾地揭露了，谁知道他是不是来加速结局到来的，偏偏选了我俩显得最为无依无靠的那张照片——也没有勇气在当时不经麻醉便向她提议分开，反而选择了等待乏味无趣的降临。我没有为那些最美好丰盛的年月感到庆幸，那时的爱情还被亲密跟狂热驱动着，我反而在面对手中的照片做出无可辩驳的诊断时，都未能勇敢又妥善地在被驱逐之前放弃。

[1] 指山上仁慈耶稣朝圣所，位于葡萄牙北部的布拉加市郊外，以宏伟爬升 116 米的“之”字形巴洛克台阶而著称。

[2] 此处指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传统舞蹈萨尔达纳舞曲《从猫泉走下》，这首歌的副歌部分随后成为了当地著名童谣。



塞尔吉·帕米埃斯

西班牙作家、翻译家和记者，用加泰罗尼亚语写作。1960 年生于巴黎，1971 年移居巴塞罗那。长篇小说《本能》（1992）摘得加泰罗尼亚语文学最负盛名的贝特拉纳奖。帕米埃斯将阿波利奈尔、雅歌塔·克里斯多夫、达尼埃尔·佩纳克和阿梅丽·诺冬等法语作家的作品译成加泰罗尼亚语。

译者：马科星

先后毕业于南京大学西语系和巴塞罗那大学，获社会与文化方向的博士学位。译有阿根廷作家吉列尔莫·马丁内斯的《牛津迷案》、西班牙作家胡安·萨雷斯的《不定的荣耀》、西班牙作家霍尔迪·庞蒂的《遗失的行李》等。

《为一场假想的离婚人士大会准备的演讲稿》
选自塞尔吉·帕米埃斯短篇小说集《穿风衣的艺术》，由群岛图书授权发表。
copyright © 2018, Sergi Pàmies

故事群岛

威廉·特雷弗说，短篇小说是惊鸿一瞥的艺术。来吧，登上这个精选世界短篇小说的“故事群岛”，在惊鸿一瞥中，体味人生种种无奈、困顿、痛苦……



图为 E.R.Hughes (1912) Night with her Train of Stars,
图片来自 [Birmingham Museums Trust](#) on Unsplash

小说

舞会新秀·恋人·鸽子飞

莉奥诺拉·卡林顿 | 故事群岛

“准备好您的画架，小姐，
这里就是您画肖像的地方。”

01

舞会新秀

在我初入社交界的时候，我经常去动物园。我去得实在太频繁，导致我了解动物胜过了了解和我同龄的年轻女孩。我正是为了逃避世俗才每天去动物园的。我最熟悉的野兽是一只鬣狗。她也熟悉我。她聪明得很。我教她法语，作为回报，她教我她的语言。我们就这样度过了许多欢乐的时光。

五月一日，我母亲为我举办了一场舞会。一连好几个晚上，我都感到痛苦：我一直讨厌舞会，尤其是那些以我的名义举办的舞会。

一九三四年五月一日上午，一大早，我去拜访了鬣狗。

“烦死了，”我说，“我今晚必须去参加我的舞会。”

“您很幸运，”她说，“我倒是乐意去。我不会跳舞，但我毕竟可以聊天。”

“那里会有许多东西吃，”我说，“我看不见食物一车一车往家里送。”

“而您还在抱怨，”鬣狗反感地说道，“我呢，我每天只吃一顿，看看人们给我吃的都是些什么垃圾！”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我差点笑出来。

“您替我去舞会就行了。”

“我们不够相像，否则我会去的。”鬣狗有些难过地说道。

“听着，”我说，“在晚会的光线里，人们看得不那么清楚。如果您乔装打扮一下，没有人在人群里认出您。何况，我们个头差不多。您是我唯一的朋友，我请求你。”

她思考了一下。我知道她打算接受我的要求。“好的。”她突然说。

清晨时分，这里没有多少警卫。我很快打开了笼子，溜到了街上。我叫来一辆出租车。到家的时候，所有人都还在床上睡着。在我的卧室里，我拿出一条晚上要穿的裙子。裙子有一点长，鬣狗穿我的高跟鞋走路时有些艰难。我找出一副手套，用来藏起鬣狗的爪子，

那双毛茸茸的爪子实在是不像我的手。当太阳照亮我的卧室，她在房间里转了好几圈，走得越来越熟练了。我们忙得不可开交，而我母亲要来和我说早安，她开门的时候，鬣狗差点来不及躲到床底下去。“你房间有股难闻的气味，”我母亲开门的时候说道，“晚会之前，你用我新得的浴盐洗个香水浴。”

“知道了。”我对她说。

她没有久留。我想一定是因为这气味对她来说太冲了。

“早饭别迟到。”她离开房间时说道。

主要的困难，在于找到方法给鬣狗的脸化妆。我们一连尝试了好几个小时，她拒绝了我所有的提议。最后她说：

“我想我找到解决方法了。您有女仆吗？”

“我有。”我困惑地答道。

“那好，就这样。您叫她过来，等她进门，我们就扑上去，把她的脸撕下来。我戴着她的脸参加晚会。”

“这不可行，我说：‘如果没有脸，她很可能死。会有人发现她的尸体，然后把我们关进监狱。’

“我很饿，可以吃掉她。”鬣狗反驳道。

“骨头呢？”

“也吃掉，”她说，“就这么办？”

“但你要保证，先杀死她，再撕下她的脸。否则，她会很痛的。”

“好，我无所谓。”

我叫来女仆玛丽，内心有一些烦躁。如果我不是如此讨厌舞会，我不会对她做这样的事情。就在玛丽进门的时候，我面向墙壁不看她。我承认一切发生得很快。一声短促的大叫，结束了。鬣狗吃她的时候，我看着窗外。几分钟后，鬣狗说：

“我吃不下了。还剩两只脚。如果您有一只小袋子，我可以今天晚些时候再吃。”

“您可以在衣橱里找到一只绣着百合花的袋子。把里面的手帕取出来，用这个袋子吧。”

她按照我说的做了。然后她说：“您现在转过身来，看看我有多漂亮！”镜子前面，鬣狗陶醉在女仆的容貌里。她仔细地吃掉了脸周围的部分，好留下她恰好需要的部分。“确实，”我说，“做得很完美。”

傍晚，当鬣狗打扮好了，她对我说：“我感到精力旺盛。我想今晚我会十分顺利。”

听见楼下不时传来音乐，我对她说：“现在就去吧，请您记住，不要站在我母亲身边，她一定会发现您不是我。别的人反正我都不认识。好运。”我抱了抱她之后就离开了，但她身上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

夜幕降临。白天的情绪令我疲惫，于是我打开了一本书，在敞开的窗户旁边休息。我想起自己在读乔纳森·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或许就在当时，厄运终于显现出它的第一个征兆。一只蝙蝠从窗户里飞进来，发出微弱的叫声。我怕极了蝙蝠。我藏在一椅子后面，牙齿都在打颤。我刚刚跪好，翅膀的拍打声被来自房门的一声巨响掩盖了。我母亲进来了，被吓得脸色惨白。“我们刚坐到桌边，”她说，“那个代替你的东西站起来叫道：‘我的气味有点难闻，是吗？好吧，那我不吃蛋糕了。’紧接着，她把脸撕下来吃了。一跃而起，她消失在窗外。”

(由亨利·帕里索编辑)

02

恋 人

一天夜里，我在路过小巷的时候偷了一只甜瓜。藏在水果堆后面的店主抓住我的胳膊对我说：

“小姐，这样的机会我已经等了四十年。四十年来，我藏在这堆橘子后面，只盼着有人来顺走我的水果。原因是什么？我来告诉您，我来讲讲我的故事。如果您不听，我就要把您交给警察了。”

“我听。”我说。

他抓着我的胳膊就把我往水果店里拽，拽到水果和蔬菜中间。我们穿过店铺尽头的一扇门，来到一间卧室。那里有一张床，床上躺着一个女人，一动不动，很可能死了。我想她待在那里很久了，因为床上覆盖满了草。

“我每天给她浇水，”店主思索着说道，“四十年来，我不清楚她是死是活。这段时间里，她不动，不说，也不吃。奇怪的是，她的身体仍是热的。如果您不信，请看。”

说着，男人掀起了床单的一角，我看不见下面有许多鸡蛋，还有几只刚出生的鸡崽。“您看，”

他说，“我就在这儿孵我的蛋。我也卖新鲜的鸡蛋。”

我们各自坐在床边，水果店店主又说道：

“相信我，我很爱她！我一直爱着她！她是如此甜美！她有一双灵巧、白皙的小脚。您想看看吗？”

“不想。”我回答。

“好吧。”他长叹一口气，接着说道，“她是如此美丽！我，我的头发原来是金色的；她呢，她曾有一头迷人的黑发！（现在，我们的头发都白了。）她的父亲是个怪人，在乡下有一栋大别墅，收藏着大量的羊排。我们就是因此认识的。我呢，有一个小小的天赋，能用自己的目光把肉变得干燥。推脚先生（这是他的姓氏）听说了我，邀请我去他家把那些羊排变干，以防它们腐坏。阿涅斯是他的女儿。我和她一见钟情。我们一起坐船从塞纳河离开。我负责划桨。阿涅斯对我说：‘我爱你，我只为你而活。’我用同样的话回应她。我相信，是我的爱让她的身体直到现在都保持着温热；她死了，也许吧，但温度还在。”

“明年，”他望着远处继续说道，“明年我要放几个西红柿；我觉得西红柿说不定会在她的身体下面茂盛地生长……夜幕降临，我不知道能在哪度过我们的新婚之夜。阿涅斯面色苍白，看上去疲惫极了。终于，在我们刚划出巴黎的时候，我看了一家临河而开的酒馆。我把船划过去，走上一个昏暗、简陋的露台。那里有两头狼和一只狐狸，它们在我们周围转悠。没有其他人了……”

“我敲了门，又敲了敲，紧闭的门散发出一种可怕的静默。‘阿涅斯累了！阿涅斯累极了！’我竭尽全力地喊道。终于，窗口出现了一个老妇人的脸，那张脸说：‘我什么都不知道。狐狸是这里的老板。让我睡觉吧。别打扰我。’阿涅斯哭了起来。没有别的办法，我必须去问狐狸。‘你们这儿有床位吗？’我问了好几遍。它完全不回答；它不会说话。那张脸再次出现，比上次更老了，它被一根细线吊住，正从窗户里缓缓地下降：‘您去问狼吧；我，我不是这里的老板。让我睡觉吧，谢谢。我明白过来，这张脸疯了，继续下去也没有意义。阿涅斯一直在哭。我绕着酒馆走了好几圈，最后，我打开了一扇窗，我们从那里进去了。我们置身于一间高级厨房，一口烧红的大锅里正煮着各种蔬菜；蔬菜自己跳进沸水里，这把我们乐坏了。我们饱餐一顿，然后在地上睡觉。我把阿涅斯搂在怀里。我们根本睡不着。可怕的厨房里包罗万象。数量可观的老鼠聚在它们的洞口，用尖细的、令人不适的小嗓唱着歌。肮脏的气味飘过来又散出去，一阵接着一阵。这里有风。我相信，就是这些风带走了可怜的阿涅斯。她再也没有恢复过来。从那天起，她越来越沉默……”

水果店店主被泪水模糊了视线，于是我带着甜瓜逃走了。

1938 年

（由 H. P. 校对）

03

鸽子飞

“路上有人。有个人正往我家这边来，一个奇怪的人，尽管我只是远远地看到了他。”我从阳台上探出身子，看见这个人影迅速变大，他正全速向我靠近。我觉得那是个女人，因为又长又直的头发垂落在马鬃上。那匹马很壮，骨架浑圆有力，马的颜色很怪，粉中带紫，是李子成熟的颜色。这种颜色在英国叫做“roan”。只有马这种动物拥有这样的粉色。骑马的人穿得有些邋遢，让我联想起高原上某只穿长袍的绵羊。然而，颜色倒是十分丰富，近乎华丽，在飘起的羊毛之间，能看到一件金色的衬衫。的确，如果凑近了看，这件衬衫破了洞，还有点脏，但还是令人印象深刻。

她停在我的阳台下面，从头发后面看着我。

“一封信，”她对我说，“需要立刻答复。”

她有一副男人的嗓音，我发现很难以区分她的性别。

“您是谁？”我谨慎地问道。

“费尔迪南，塞勒斯坦·德·艾兰斯－德鲁 * 的报信人。”

这嗓音非常柔和，无可争辩地来自一个男人；一股混合着向日葵、香草和汗液的香味飘进了我的鼻腔。我俯下身，从他手里接过信，趁机看了看他那张被头发遮住一半的脸。他的脸很白，嘴唇涂成了紫红色。他的马甩动着粗壮的脖子。

“女士，”信上写道，“愿您仁慈，愿您用伟大的仁慈见证我深沉的痛苦。您将会学到对你非常有益的东西。

“请将您本尊托付给我的报信人，也将您的画布、画笔以及艺术家职业所需的所有东西

都托付给他。

“我请求您，小姐，以深沉而痛苦的敬意来接受我的情感。

“塞勒斯坦·德·艾兰斯－德鲁。”

信纸散发着向日葵的香气，上面还装饰着好几个金色的皇冠，皇冠上插着羽毛、剑和橄榄枝。

我决定随费尔迪南去他主人家，因为信中的承诺令我心动，尽管我完全不认识这个塞勒斯坦·德·艾兰斯－德鲁。

很快，我就坐到了费尔迪南身后宽阔的马屁股上。我的行李系在马鞍上。

我们向西出发，将穿越一个荒凉的国度，那里到处都是阴暗的密林。

正值春天。阴沉、灰暗的天空洒下温热的雨点。树木和田野一片浓绿。我时不时地就会睡着，好几次差点从马上摔下，还好我紧紧抓住了费尔迪南的羊毛长袍。他并不关心我，他在想别的事情，嘴里唱着《垂死玫瑰的叹息》。

它的花瓣在我胸口发冷，
热泪也无法令它回温，
在丝绒里，
在我的玫瑰那温柔的肌肤里，
噢，我的玫瑰！……

最后几句歌词完全唤醒了我，因为它们是用一种暴烈、野蛮的方式在我耳边吼出来的。“白痴！”我气愤地喊道。

费尔迪南平静地笑了笑。马停了。我们身处一个宽阔的院子，几百米外有一座大房子。这座房子由黑色的石头筑成，轮廓十分雄伟。它的外观阴森森的，让我瞬间萌生了想要回家的欲望。每个窗口都放下了百叶窗，烟囱里没有一丝炊烟，乌鸦在屋顶各处栖息。院子和房子一样荒凉。

看上去，房子的另一边似乎有一座花园，因为我透过一道锻铁制成的大门看见了许多树木和苍白的天空。这道门很奇怪，用锻铁表现出一个坐在圆环里的巨大的天使。天使把头向后仰起，一副恐慌的模样。在右边，圆环高处，一小注同样用锻铁制成的水流正流向天使。

“我们在哪儿？”我问道，“我们到了吗？”

“我们在艾兰斯－德鲁。”费尔迪南在一阵沉默后答道。

他看着房子，没有转过头来。我觉得他似乎在等待某个人、某个东西或某个事件。他一动不动。马非常安静地站着，和他一样注视着前方。

突然，钟声持续敲响。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钟声，既低沉又有穿透力，像是一根骨头在敲打一只黄铜圆盘。回音环绕在我们周围，流淌在树林间，宛如一股金属般的液体。房顶上的鸦群飞散开来，不见了踪影。

我正要发问，一辆由四匹黑马拉着的马车从我们身边如影子一般飞过。马车停在大门口，我注意到这是一辆葬礼马车，上面奢华地装饰着雕像和鲜花。这些马和报信人的马是同一个品种：身型圆润，皮毛光滑，颜色是麝香葡萄似的黑色。房子的大门开了，走出四个抬着棺材的人。

费尔迪南的马开始嘶鸣，那四匹黑马一边附和一边扭头看我们。

四个抬棺材的人穿得和费尔迪南差不多，唯一的不同在于他们的宽袍用色暗沉，有紫色、红色和猩红色，颜色都非常深。他们的脸很白，化着和费尔迪南一样的妆。他们的头发都又长又厚，乱七八糟，就像在阁楼上存放了很久的来自另一个时代的假发。

我还没来得及看清楚这一切，费尔迪南一鞭子抽在马身上，我们便沿着一条大路飞奔而去，身后是溅起的尘土与碎石。

这段旅程速度太快，我还没有机会看清周围的情况。但我隐约看见我们进入了一座森林。果然，费尔迪南在一块林间空地上停住了马。地上覆盖着苔藓和野花。在几米开外的地方摆着一张扶手椅，上面披盖着紫色和绿色的天鹅绒。

“请下马，小姐，”费尔迪南说，“带上您的画架去树荫下面。您口渴吗？”

我回答说我很乐意喝点东西。我从马背上滑下来。费尔迪南递给我一个瓶子，里面装着十分甘甜的液体。

“他们一会儿就到，”费尔迪南看着森林的暗处继续说，“太阳很快就要落山了。准备好您的画架，小姐，这里就是您画肖像的地方。”

在我忙着准备东西的时候，费尔迪南卸掉了马鞍和缰绳，然后躺在地上睡了；他的马趴

在他旁边。

天空泛出红色、黄色和紫色，黄昏降临了。天开始下雨，硕大的雨点落在我身上和画布上。

“他们来了。”费尔迪南突然喊道。

空地上很快就站满了人。这些人蒙着面，多少有些像那些抬棺材的人。他们在我和扶手椅周围围成了一个足够大的圆圈。他们相互低语着，偶尔有一个人爆发出一阵尖利的笑声。他们大概四十多岁了。

不一会儿，一个清晰响亮的声音从圆圈后面传来：

“这样，居斯塔夫……不，不是的，我可怜的朋友，往左……”

“谁能想到她会这么重！”一个更低沉的声音回答道，“她可不胖啊。”

我环顾四周后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印象：我被一群奇怪的绵羊围住了，它们打扮成这样是为了一种阴暗的北欧仪式。那些笑声诡异得如同羊叫。

圆圈里的一部分人走开了，我已经见过的那四个人抬着棺材后退着走了进来。

一个又高又瘦的人跟着他们，用明亮的嗓音说：

“把它放在扶手椅旁边。盖毯已经喷过香水了吗？”

“是的，艾兰斯－德鲁先生，一切如您吩咐。”

我好奇地看着这位先生。他的脸被遮住了，但是有一只非常白的手在他周围挥来挥去，姿态如同大象的鼻子。他戴着一顶巨大的黑色假发，僵硬的发丝一直垂到脚面上。

“艺术家，”他说，“她在吗？”

“是的，艾兰斯－德鲁先生，她在那里。”

“啊！我看见她了。小姐，您赏光前来真是我们的荣幸！欢迎您……”

他走到我身边，拨开挡在脸前面的那些头发。千真万确，那是一张绵羊的脸，覆盖着一层柔软的白色皮肤。他的嘴唇很薄，是黑色的，很湿润……奇怪地颤动着。我有些抗拒地用自己的手握住他的手，因为他的手太光滑了，光滑得过分。

“我十分欣赏您的作品，”塞勒斯坦·德·艾兰斯－德鲁低声说道，“您认为您能达到一种非常精确的相似度吗？”他指了指棺材的方向，此刻，棺材被打开了。

两个人从里面抬出一具年轻女人的尸体。她很美，有一头浓密、丝滑的黑发，可是她的皮肤已经发出闪烁的磷光，隐隐透着紫红色。一股恶心的气味向我袭来。艾兰斯－德鲁先生见我屏住了呼吸，便露出迷人的微笑表达歉意。

“销毁我们所爱之人、倾心之人的尸骨，”他说，“这太难了……我相信您一定会为此同情我的……我的妻子两周前过世了，而现在的天气如此阴沉、潮湿……”

他说到一半停了下来，一只漂亮的手抬在半空中。

“好了，尊贵的小姐，请发发善心。我先不打扰您创作艺术了。”

我在调色盘上挤好颜料，开始描绘艾兰斯－德鲁夫人的肖像。

那些长得像羊的人在我周围玩起了“鸽子飞”的游戏。“鸽子，飞；绵羊，飞；天使，飞……”

黄昏无止尽地延续着。夜幕似乎迫近了，却没有降临，林中空地上昏暗的光线倒还足以让我继续画下去。我后来才发现，被四周这一圈树木围起来的光不是来自别处，正是来自艾兰斯－德鲁夫人的身体。树林陷入漆黑之中。我太专注于绘画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只剩下我独自面对那个死去的女人。

我对这幅画像很满意，后退了几步好观察它的全貌。画布上的人长着我的脸。

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然而，当我焦急地看了看模特，又看了看画像，我无法否认这个事实。我越是观看那具尸体，那张白脸的相似度就越发惊人。在画布上，那张脸无疑就是我的脸。

“这种相似度超乎寻常，我赞美您，小姐……”

艾兰斯－德鲁先生的声音从我的左肩后方传来。

“现在是正午，但我们在森林里意识不到太阳。何况，艺术是一种魔法，能将几个小时甚至几天都化为几秒……难道不是吗，小姐？您觉得，您能否在没有模特的情况下完成这幅画像呢？我可怜的妻子，您知道的，已经过世二十一天了。她一定在渴望那份她受之无愧的安息！……死后工作三周可不是常有的事。”

他挤出一抹微笑，好增加他的幽默感。

“我可以在艾兰斯－德鲁为您提供一间舒适、明亮的公寓。小姐，请允许我与您同乘我的车。”

我像梦游一样跟着那顶移动着的巨大的假发。

工作室是一个大房间，在尽头带有一个宽敞的阁楼。这个房间曾经极尽奢华，而现在，刺绣的丝绸帘子已经破了，落满了灰，精雕细刻的家具缺胳膊少腿，有些地方的镀金已经剥落。几个天鹅或人鱼形状的大画架散乱地立着，像是其他东西的骨架。蜘蛛结了许多网，令房间看起来凝固了。

“这是艾兰斯－德鲁夫人以前的工作室；她就是在这里过世的。”

我翻了翻她的衣柜。许多衣服、假发、旧鞋子乱七八糟地堆在一起。这些东西都具有化装舞会服饰的特点，有几件让人联想起马戏团。

“她一定独自在她的工作室里乔装打扮了。据说夫人喜欢演戏。”

一本用绿丝绒装订的日记是我众多发现里尚且有趣的一个。扉页上装饰着她的名字，用一种非常仔细又莫名带有孩子气的字体刻写着：“阿加特·德·艾兰斯－德鲁。请务必尊重这本书，因为它的内容不是为了被他人看见，只呈现给埃莱诺，阿加特·德·艾兰斯－德鲁”。

我开始阅读：

亲爱的埃莱诺，当读到这本书时你会哭成什么样呢？我给它喷上了广藿香，这样你会更好地想起我。气味是回忆里最敏感的部分。你该哭成什么样啦！我倒是很高兴，我希望你流很多眼泪。

今天是我的生日，当然，也是你的。同龄是多么有趣啊！我多想见到你，可这对来说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就在这里把一切告诉你……一切。（上帝啊！别让塞勒斯坦听到我说这话。）显然，婚姻是一件残酷的事情，而我呢！母亲在信中写道：“我的宝贝，我编织了各种小物件给你……或者给你非常亲近的人。给一个必定会在你这里出现的小家伙……噢，埃莱诺，我和塞勒斯坦生孩子就像我和我工作室里的一把椅子生孩子一样容易听着！新婚之夜！），我睡在一张挂着亮粉色帘子的大床上。半小时后，门开了，我看一个身影：一个身披白色羽毛、长着天使翅膀的人。我对自己说：“我肯定要死了，因为死亡天使来了。”

这个天使就是塞勒斯坦。

他突然把羽毛长袍脱下来扔在地上。他赤身裸体。如果说那些羽毛是白色的，他的身体则白得致命。我想他肯定是把发磷光的颜料涂在了身上，因为他像月亮一样耀眼。他穿着蓝底红条纹的长筒袜。

“我好看吗？”他问，“大家都说好看。”

我被迷住了，无法回答他。

“我亲爱的阿加特，看着自己在镜子里的模样，继续说道，“您不再住在乡野村夫的家里了……（这里，大家称我为‘夫人’。）”

他重新穿好羽毛和翅膀。突然，我觉得好冷，我的牙齿开始打颤。现在，好好听我说，埃莱诺。我越是看着塞勒斯坦，我越觉得自己轻飘飘的，仿佛一片羽毛。他开始用一种奇怪的方式在房间里打转。他的双脚似乎渐渐脱离了地面……然后，他从门里滑进了走廊。我从床上起来赶到门边。塞勒斯坦走进了黑暗中……他的双脚不再接触地面了……我很确定我在说什么。他的翅膀缓慢地振动着……可是……

你现在知道我的婚姻是如何开始的了！

我有一周没再见到塞勒斯坦。而且我几乎见不到任何人，只有一个名叫加斯通的仆人。他给我带东西吃，那些食物总是甜的。我住在我的工作室里，我现在依然如此。我是如此难过，埃莱诺，以至于我的身体都变得透明了，我流了不知多少眼泪。人有没有可能融化在水里，不留任何痕迹？我总是一个人，所以我和镜子里的形象建立了一种恋爱般的友谊……可是，埃莱诺……这就是最糟糕的事情：最近我几乎看不清镜子里的自己了……是的，非常可怕，但这是真的。当我看着自己，我的脸就会变得模糊……而且……我猜想，不，我确定……我透过我的脸看见了房间里的物品。

现在，我哭得太厉害了，我已经看不见我正在写字的这张纸了。

埃莱诺，我每天都会消失一点点……我从来没有这么喜欢自己的脸！我试图给自己画像，好把它保存在我身边，你明白的。可是……我做不到，我失败了。

然后还有另一件事：物品竟然变得清晰起来，有了生命，比我更有生命力。你知道吗，埃莱诺，我有多么害怕……听着，这里的椅子都很旧了，其他家具也一样。上周，我看一个小小的绿芽从其中一把椅子上冒了出来……是春天里树上会萌发的那种嫩芽……而现在……太恐怖了……它长成了一片叶子……埃莱诺！

几天之后。

房间已经满了……所有家具都冒出了绿芽，有些长出了叶子，又小又脆弱，绿得十分温柔。布满灰尘的旧家具上长出如此鲜嫩的叶子，看上去很是可笑。

塞勒斯坦来过了，他什么也没发现，但他用十分光滑的手摸了摸我的脸……那只手过于光滑了……他说：“您永远都会是个孩子，阿加特。看着我，难道我不是惊人地年轻吗？”然后

他停下来开始笑。他笑得很大声。

“您一个人表演戏剧？”他问。

这不是真的，埃莱诺……我乔装打扮只是为了更加孤单……不再孤单……我到底要说什么呀！……

“阿加特，当你还是小孩的时候，有没有玩过‘鸽子飞’？”

塞勒斯坦看着镜子，向我提出了这个奇怪的问题。我回答说我小时候很喜欢玩这个游戏。

“那好，我们玩吧！”塞勒斯坦喊道。

房间里来了好多奇装异服的人，像绵羊……不过，埃莱诺，他们是裸着的……他们的服饰不是别的，正是他们的毛发。他们都是化妆成妓女的男人。“上帝的羔羊。”塞勒斯坦说。

我们围坐在一张圆桌旁，突然，有二十几双手从头发里伸出来。我注意到他们的指甲都涂了油，可是非常脏。他们的手苍白、发灰。

这些都是瞬间的印象，毕竟我的眼里只看得见塞勒斯坦的手。我向你发誓，埃莱诺，他的手湿润得要滴出水来了……而且那么光滑，颜色也非常奇怪，像珍珠。他也在看自己的手，带着神秘的笑容。

“鸽子，飞！”他喊道，于是所有的手都像翅膀一样举到空中。我的手也举到了空中。

“绵羊，飞！……”塞勒斯坦又喊道。

那些手在桌上抖了一下，但都没有举起来。

“天使，飞……”

目前为止没有人弄错。

突然，塞勒斯坦的声音变得尖锐刺耳：

“塞勒斯坦……飞！”

埃莱诺，亲爱的埃莱诺，他的手……

到这里，阿加特的日记戛然而止。

我转头去看她的画像：画布上空空荡荡。我不敢在镜子里寻找我的脸。我知道我会看见什么；我的双手如此冰冷！……

(由雅克琳娜·谢尼厄 - 让德龙整理)

*原文为 Célestin des Airlines-Drues, Airlines 在英语里指航空公司，Drues 在法语里指羽毛丰满，因此 Airlines-Drues 也可以理解并翻译成“丰羽航空”。



莉奥诺拉·卡林顿

墨西哥作家、艺术家，超现实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1917 年出生于英国一个富裕家庭，少女时代先后被两所修道院学校开除。1937 年与超现实主义艺术家马克斯·恩斯特私奔，成为巴黎艺术圈宠儿。1940 年，丈夫被纳粹逮捕，卡林顿精神濒临崩溃，被送往精神病院。从医院逃走后去了美国和墨西哥。晚年投身墨西哥妇女解放运动，在墨西哥度过余生，直至 2011 年去世。

译者：郁梦非

南京大学法语系翻译硕士毕业，图书编辑。已出版译作《亚米拿达》《轻文明》《鲍勃·迪伦的歌》（合译）等。

《舞会新秀》《恋人》《鸽子飞》均选自即将出版的《卡林顿短篇小说集》。由一页 Folio 授权发表。

故事群岛

威廉·特雷弗说，短篇小说是惊鸿一瞥的艺术。来吧，登上这个精选世界短篇小说的“故事群岛”，在惊鸿一瞥中，体味人生种种无奈、困顿、痛苦……



图片来自 [Kostiantyn Li](#) on Unsplash

小说

罐头厂街

约翰·斯坦贝克 | 发现经典

怎样才能鲜活地描绘出那缕诗意，
那股恶臭，那阵刺耳的噪声

罐头厂街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蒙特利半岛。它是一首诗，一股恶臭，一阵刺耳的噪声，一片深浅不变的光，一个音调，一种习惯，一阵思乡之情，一个梦。一切在罐头厂街聚集成群，又四下分散：生锈的锡块和铁皮，碎木片，凹凸不平的地面，杂草丛生的前院，成山的垃圾，沙丁鱼罐头厂的波形铁板，廉价的酒场舞厅，餐馆和妓院，人头攒动的杂货店，实验室和便宜旅馆。这里的居民呢，曾有人说“妓女、皮条客、赌徒和杂种”的混合体，换言之，也就是普通人。如果换个不同角度的窥视孔来看，他也许会说“圣人、天使、殉教者和信徒”，意思并没有任何改变。

早上，等捕捉沙丁鱼的船队有了收获，围网船就吹响鸣笛，拖着沉重的渔网慢慢开入海港。满载而归的船只吃水很深。它们沿岸停靠，旁边就是罐头厂伸入海中的无数根长尾。这是句经过深思熟虑的比喻，因为如果罐头厂伸入海中的不是长尾，而是血盆大口，那从工厂另一端涌出的沙丁鱼罐头恐怕会更加骇人，至少就比喻意义而言。罐头厂的笛声随之响起，整个城镇的男女老少迅速换好衣服，跑到罐头厂街来工作。上流阶级随即也坐着闪闪发光的轿车赶来了：警监、会计、坐办公室的老板。下一拨从镇上涌来的是意大利人、中国人和波兰人，他们不分男女都穿着长裤、橡胶工作服和防水围裙，冲到工厂里洗鱼、切鱼、包鱼、煮鱼、装罐头。整条街隆隆抖动，咔哒作响，时而呻吟，时而尖叫。鱼群组成的银色河流从船上源源不断地向外喷涌，船只在水面上越升越高，直到舱内空空如也。罐头厂隆隆抖动，咔哒作响，吱吱呀呀地叫个不停，直到最后一条鱼也已经洗净切好，煮熟装进了罐头。然后工厂的鸣笛再次响起，疲惫不堪的意大利人、中国人和波兰人三三两两地出了门，全身都湿淋淋地散发着腥味。他们摇摇晃晃地上山回城，罐头厂街再次恢复原状——静谧而又神奇。日常生活重新开始。流浪汉之前都厌恶地躲到了黑丝柏树下，现在又都出来了，坐回空地的生锈管道上。朵拉店里的姑娘也冒了出来，天气好就晒太阳。医生从西部生物实验室漫步过街，去李忠的杂货店买两夸脱啤酒。油漆工亨利站在杂草丛生的空地上，像万能梗犬一样在垃圾堆里四处翻弄，为正在建造的船寻找木头或金属零件。夜色渐浓，朵拉店门口的街灯亮了，在罐头厂街洒下不

灭的月光。西部生物实验室有访客上门，医生又去李忠那儿买了五品脱啤酒。

怎样才能鲜活地描绘出那缕诗意，那股恶臭那阵刺耳的噪声——还有光线的质地、音色，习惯和梦？采集海洋动物标本的时候，有些扁虫一碰就碎，脆弱得几乎不可能保存完整。你只能凑近一把小刀，让它们自己扭动着爬上来，再小心地移入装满海水的瓶子。也许这本书也该以同样的方式来写——展平书页，让故事自己爬进来。

李忠的杂货店算不上什么清洁楷模，存货量却堪称奇迹。在这间狭小的屋子里，一个人能找到幸福生活所需要的一切：衣服、生鲜食品、罐头、酒水、烟草、渔具、机器、船、绳索、帽子、猪排。在李忠这儿，你能一口气买到一双拖鞋、一件银色和服、四分之一品脱威士忌和一支雪茄。你可以根据不同心情挑出各种商品组合。至于李忠唯一没存货的生活必需品，空地对面的朵拉店里就有。

杂货店天一亮就开门，等所有流浪汉把最后一枚硬币都花干净，或者回去休息了才闭店。倒不是李忠有多贪婪。他并不贪，只是如果有人想花钱，他的店就在那儿开着。李忠在整个社区里的地位让他自己也难以置信。开店开了这些年，罐头厂街上的每一个人都欠他的钱。他从来不会催债，但如果欠款积得太多，他就不让对方赊账了。比起上山进城，顾客们往往都会选择还钱，至少努力还一部分。

李忠长着圆脸，待人彬彬有礼。他的英语发音一板一眼，只是从来不发 R 音。唐人街的堂口混战在加利福尼亚爆发期间，李忠有时会被敌人悬赏捉拿。他总是偷偷跑到旧金山去找家医院藏身，等风波过了再回来。没人知道他的钱都花在什么地方，也许他根本就不赚钱，也许他的财富都放在那些没收回的债里。但他过得很好，也深受四邻敬重。他十分信任自己的顾客，除非只有白痴才会再信下去。他也会在生意上犯错误，但他总能靠着善意扭转局面。和“宫殿旅舍烤肉馆”的往来就是这样，要不是李忠，谁都会觉得那样的交易纯属赔本买卖。

在杂货店里，李忠总是站在烟柜后面。他左手边摆着收款机，右手边则放着算盘。玻璃柜里有棕色雪茄和香烟，有德拉姆牛牌、公爵混合牌和五兄弟牌的烟草。他身后墙上的货架里摆着一品脱、半品脱和四分之一品脱装的酒，牌子有老格林河、老汤豪斯、老上校，还有大家的最爱，老田纳西。老田纳西是种四个月熟成的混合威士忌，非常便宜，这儿的人都叫它“老网球鞋”。李忠选择站在顾客和威士忌之间自有他的道理。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曾尝试转移他的注意力，叫表兄弟、侄子、儿子或媳妇站在店里别的地方等他过去服务，但李忠从来没有离开过烟柜。柜子顶层的玻璃就是他的办公桌。他那双肥胖又灵活的手摆在玻璃面上，十指仿佛是蠢蠢欲动的小香肠。他的左手中指上戴着枚金色的婚戒，那是他身上唯一的首饰。他会用那枚戒指无声地敲击橡胶零钱垫，那上面的橡胶凸起早已磨平。李忠的嘴型饱满，言辞温和，笑起来时嘴里的金色闪光显得富足又温暖。他戴着副半圆形的眼镜，看什么都透过镜片，望向远处时总要仰起头来。他用小香肠似的手指一刻不停地敲打算盘，加加减减，计算利息和折扣，用棕色的眼睛友善地扫视店内，向过往的客人露齿而笑。

某天傍晚，他站在烟柜后的老地方，为了保暖在脚下垫了叠报纸。他回想着当天下午做成的一桩交易，还有不久后又做成的另一桩交易，又是好笑又是悲伤。如果你走出杂货店，斜穿过杂草丛生的空地，绕过罐头厂里延伸出的巨大生锈管道，你就会看见杂草中的一条小路，跟着小路走过黑丝柏树，穿过铁轨，再沿着一条满是坍塌的鸡肠小道爬上坡，你会看见一座又矮又长的建筑，以前是用来存放鱼粉饲料的仓库。整个仓库就是一间带顶的房子，本来属于一位名叫霍拉斯·阿布维尔的先生。霍拉斯有两个妻子，六个孩子，每天都过得忧心忡忡。在过去几年中，他凭借恳求和说服的本事，在李忠的店里积起了一大笔债，整个蒙特利都没人能比得上。就在这个下午，他走进了杂货店。见到李忠脸上掠过的严厉神色，霍拉斯疲惫而敏感的脸顿时抽搐了一下。李忠的肥胖手指敲打着橡胶垫。霍拉斯把双手平放到烟柜上。“我欠你不少钱吧。”他直白地说。

听到这样一句前所未有的开场白，李忠咧嘴一笑。他严肃地点点头，等着瞧霍拉斯这回又会耍什么把戏。

霍拉斯伸出舌头舔舔嘴唇，从左到右都舔了个遍。“我不想让这事压在孩子们头上，”他说，“你瞧，现在你连一包薄荷糖都不让他们拿了。”

李忠表示同意。“不少钱。”他说。

霍拉斯继续说：“你知道我那个地方吧，沿着小道上去，放鱼粉的。”

李忠点点头。那是他的鱼粉。

霍拉斯急切地说：“如果我把那地方送给你——够抵债的吗？”

李忠仰起头，透过半圆形的镜片盯着霍拉斯，头脑里飞快地调出各种账单，右手不安分地伸向算盘。他思考着：仓库不值几个钱，但如果罐头厂日后想扩建，那片空地也许能值不少。“够啊。”李忠说。

“那好，把账本都拿出来，我给你写个转让书。”霍拉斯显得迫不及待。

“不用书，”李忠说，“我写个纸，说你清了。”

两人完成了交易，李忠还送了他四分之一品脱的老网球鞋。霍拉斯·阿布维尔挺胸抬头地走出门，穿过空地，走过黑丝柏树，越过铁轨，沿着鸡肠小道走回曾经属于他的仓库，然后在一堆鱼粉上开枪自杀了。虽然这与故事本身并不相干，但自此之后，阿布维尔家的孩子们就再也没缺过薄荷糖，不管是哪位母亲生的。

让我们回到当天傍晚。霍拉斯躺在三角凳上，身上插着注射防腐液的针。他的两个妻子坐在门前的台阶上，紧紧抱在一起（葬礼之前，她们一直都是好朋友）。葬礼之后，她们领走各自的孩子，再也没和对方说过话。李忠站在烟柜后面，善良的棕色眼睛向下低垂，满心沉浸在中国式平静而永久的悲伤中。他知道自己对此无能为力，但他仍然希望自己能事先就知道，兴许还能伸出援手。李忠非常善解人意，明白自杀是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但他也清楚，有时朋友能打消一个人轻生的念头。李忠包办了葬礼的全部费用，并为霍拉斯悲恸的家人送去了满满一洗衣篮的日用品。

就这样，阿布维尔的仓库归李忠所有了。仓库有完好的房顶和地板，有两扇窗户，一扇门。当然，它里面还有一大堆鱼粉，充满了微妙而强烈的气味。李忠一开始想把它当成存放杂货的库房，但随即又打消了这个念头。仓库离杂货店实在太远了，而且随便什么人都能从窗户进出。他用金戒指敲打着橡胶垫，思考着这个问题。这时店门开了，麦克走了进来。麦克是一群男人中最年长的，是其他人的领袖兼老师，偶尔也是他们的剥削者。这群人都没有家庭，没有钱，除了食物、酒精和个人满足外也没有别的追求。很多人都会在追求满足的过程中毁了自己，在疲惫中半途而废，麦克这群人却不一样。他们追求满足的方式随和低调，不走极端。他们现在就住在李忠店外空地上巨大的生锈管道里：麦克，力气很大、年纪很轻的海瑟，在拉·易达当临时酒保的艾迪，还有偶尔为西部生物实验室捕捉青蛙和野猫的修伊和琼斯。应该说，下雨天他们生活在管道里，而天气好的时候，他们就睡在空地最高处的黑丝柏树下。黑丝柏树低垂的树枝搭成了凉棚，让人可以躺在底下，眺望罐头厂街生机勃勃的人群。

麦克进门的时候，李忠的身体微微僵硬。他迅速扫视店内，想知道艾迪、海瑟、修伊或琼斯有没有一起跟进来，在货架间四处晃悠。

麦克无比诚恳地亮出了手里的牌。“李，”他说，“我和艾迪他们听说，阿布维尔那地方现在是你的了。”

李忠点点头，等着他说下去。

“我们想问问你，能不能让我们搬过去住。我们会给你看好房子。”他飞快地补充：“不让别人闯进去，打坏东西什么的。你也知道，小孩可能会砸坏玻璃——”麦克如此提议，“要是没人看着，那地方说不定会起火。”

李忠仰起头，透过半圆形的镜片盯着麦克的眼睛，敲打的手指因沉思而放慢了节奏。麦克的眼神里满是善意和友情，诉说着想让所有人都幸福快乐的愿望。但李忠为什么会觉得有些走投无路呢？他的头脑谨慎地运作着，仿佛一只猫在仙人掌丛中轻巧地穿行。麦克这一手玩得相当巧妙，听起来纯粹是助人为乐。但李忠的头脑仍然灵敏地捕捉到了其他可能——不，不是可能，而是必然。他的手指敲得更慢了。他想象着自己拒绝麦克的提议，然后窗上的玻璃就碎了。麦克会第二次提议住过去看着房子——遭到李忠的第二次拒绝。李忠能闻到火灾的浓烟，能看见小小的火苗沿着墙面向上窜。麦克和他的朋友们会帮忙把火扑灭。李忠的手指在零钱垫上停了下来。他输了。他对此心知肚明。现在他能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挽回颜面。在这方面，麦克应该会相当慷慨。李忠说：“你愿意付钱租我那儿？你愿意和旅馆一样住？”

麦克露出大大的笑容，回答也确实慷慨。“嘿——”他大声说，“好主意。成啊。多少钱？”

李忠想了想。他知道，具体价格并不重要，反正他也拿不到这笔钱。还不如出个尽可能挽回颜面的数字。“一周五元。”李忠说。

麦克一路配合到最后。“我得跟伙计们谈谈，”他迟疑地说，“一周四元不行吗？”

“五元。”李忠坚决地说。

事情就这么定了，所有人都很高兴。就算其他人觉得李忠赔大了，至少李忠自己不是这么算的。窗户上的玻璃没碎，也没有发生火灾。虽然他没收到任何房租，但只要租客手里有点儿钱，他们也从来不会花在杂货店以外的地方。何况他们也经常有钱。这样一来，

他就拥有了一群定期上门的稳定顾客。不仅如此。如果有醉汉到杂货店来闹事，如果新蒙特利的小孩们跑过来抢劫，李忠只要打个电话，租客们就会冲过来帮他摆平。这样的关系还有另一个好处——你不能偷恩人的东西。李忠省下的豆子罐头、番茄、牛奶和西瓜足以抵消房租。至于新蒙特利其他杂货店的失窃事件突然增多，那可不关李忠的事。男人们搬了进去，鱼粉挪了出来。没人知道是谁起的名字，但仓库从此就被人称为“宫殿旅舍烤肉馆”了。管道里和黑丝柏树下没有地方摆放家具，或其他美好的小物件——它们既是我们文明的痼疾，也定义了文明的边界。但在宫殿旅舍里就不一样了。男人们开始行动。屋里出现了一把椅子，一张床垫，然后是又一把椅子。五金店提供了一罐红油漆，店主对此并无不满，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屋里每增加一张新桌子、一只新脚凳，它们就会上一层新漆，不仅为了美观，也为了改个样子，免得前主人路过时认出来。宫殿旅舍烤肉馆开始正式运作。男人们坐在门前，越过铁轨、空地和街道，望着西部生物实验室的窗户。晚上，他们能听见实验室里传出的音乐。当医生过街去李忠店里买啤酒时，男人们的目光都注视着他。麦克说：“医生真是个好人。咱们该为他做点儿什么。”



本文摘自《罐头厂街》，注释从略



约翰·斯坦贝克

1962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生共创作 27 部作品，代表作包括《人鼠之间》《小红马》《愤怒的葡萄》《伊甸园之东》等。其中《愤怒的葡萄》获得 1939 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和 1940 年的普利策奖。

发现经典

这里是已经出版、我们认为不应该被湮没、遗忘和打成纸浆的旧书。



电影《他们最好的》(2016)剧照

小说

月亮下去了

约翰·斯坦贝克 | 发现经典

“由你发布命令，奖惩也由你作主。
这样，他们就不会惹事了。”

到了十点四十五分，一切已告结束。市镇被占领，守军被击溃，战事结束了。侵略者周密策划了这次战役，如同对付大的战役一般。就在这个星期天早晨，邮差和警察乘坐有名的商人柯瑞尔先生的船外出钓鱼。这是一条整洁的帆船，柯瑞尔先生借给他们用一天。邮差和警察看见那艘暗色的运输舰装满了士兵，从他们旁边悄悄驶过，这时他们已经出海好几英里。他们两人是市镇的公职人员，这事无疑有关他们的职责，于是掉转船头返航。但是，等他们到达港口的时候，敌军当然已经占领了市镇，警察和邮差进不了市镇大厅里自己的办公室，但是他们据理力争，结果当了俘虏，被关进市镇的监狱。

总共才十二名的当地守军也在这个星期天早晨出去了：有名的商人柯瑞尔先生捐赠了午餐、靶子、弹药和奖品，请他们举行一次射击比赛，地点设在山背后六英里路外他那片可爱的草地上。当地守军都是一些松垮的大个子青年，他们听到飞机的声音，看到远处的降落伞，就加快步伐赶回市镇。他们到达的时候，侵略军已经在公路两旁架好机枪。这些松垮的士兵既没有打仗的经验，更没有打败仗的经验，竟用步枪开火，结果六名士兵被打得浑身穿孔，三名半死不活，余下三名拿着枪逃进了山里。

十点三十分，侵略者的军乐队在市镇广场奏着动人而哀伤的音乐，市民们个个瞪口呆，站在四周听着乐曲，望着那些肩挎手提轻机枪、头戴灰色钢盔的人。

到了十点三十八分，那六名被打得千疮百孔的士兵被下葬，降落伞折叠起来，敌军驻进码头附近柯瑞尔先生的仓库，仓库里的架子上早已备好了这支军队需用的毯子和帆布床。

十点四十五分，老市长奥顿已经接到侵略军的首领兰塞上校发出的正式通知，要求十一点整在市长五间房子的官邸接见。

官邸的客厅舒适宜人。烫金椅子——上面铺着用旧了的织锦缎，直挺挺地排着，像一班多得无事可做的用人。一座拱形的大理石壁炉里烧着无焰的小红火，炉旁放了一只着了色的煤斗。壁炉架上一边一只大花瓶，中间放着一座有波纹的瓷钟，还吊着一群会旋转的小天使。客厅的墙纸是暗红色的，金色图案，木器是白色的，又漂亮又整洁。墙上的

油画大都描绘英勇的大狗奋力拯救遇险的儿童；只要有这样一条大狗在旁，不管水灾、火灾还是地震，都伤不着一个孩子。

火炉边坐着温德大夫。他留着胡子，单纯而慈祥。他既是这个市镇的历史学家，又是医生。他惊愕地望着，两个拇指不断地在膝盖上转动。温德大夫这个人非常单纯，只有思想深刻的人看得出他的深刻。他抬头望了望市长的仆人约瑟夫，看约瑟夫有没有注意到他转动拇指的本领。

“十一点？”温德大夫问。

约瑟夫心不在焉地回答：“是的，先生。通知上说是十一点。”

“你看过通知？”

“没有，先生。是市长念给我听的。”

约瑟夫正忙着检查每张烫金的椅子是不是放在原位。约瑟夫老是冲着家具愁眉苦脸，不是嫌它们唐突无礼、淘气，就是怕它们着了灰尘。在奥顿市长当人们领袖的这个世界里，约瑟夫就是家具、银器和碟子的领袖。约瑟夫上了年纪，长得瘦削，态度认真，他的生活如此复杂，只有思想深刻的人看得出他的单纯。他看不出温德大夫转动拇指有什么妙处；实际上他还有点心烦。他疑心现在正发生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什么外国兵进了市镇啦，当地守军被杀被拘禁啦，等等。迟早约瑟夫会对这些事情得出自己的结论。他不喜欢轻举妄动，不需要摆弄拇指，也不愿意家具惹事。温德大夫从原来的地方把椅子挪动了几英寸，约瑟夫不大耐烦，等他将椅子挪回原地。

温德大夫又说：“十一点，他们到时候就来了。一个有时间概念的民族，约瑟夫。”

约瑟夫没有听进去，只是回答：“是的，先生。”

“时间与机器。”

“是的，先生。”

“他们匆匆忙忙追赶命运，好像不能等待。他们用肩膀推着滚滚向前的世界往前赶。”

约瑟夫回答：“对了，先生。”这只是因为他懒得说“是的，先生”这几个字。

约瑟夫不热衷于这样的谈话，因为这种谈话不能帮助他对任何事情得出任何看法。如果约瑟夫当天去同厨子说“一个有时间概念的民族，安妮”，那就毫无意义。厨子安妮会问“谁？”，又会问“为什么？”，末了会说“胡扯，约瑟夫”。约瑟夫从前试过，他把温德大夫的话传到楼下去，结果总是一样：安妮总说这些话是胡扯。

温德大夫的目光离开他的拇指，看着约瑟夫排椅子。“市长在干什么？”

“正换衣服，准备接见上校，先生。”

“你不帮他换？他自己穿不好。”

“夫人在帮他换，夫人要他穿得整整齐齐。她——约瑟夫有点脸红，夫人在修剪他的耳毛，先生。痒痒。他不让我剪。”

“当然痒痒。”温德大夫说。

“夫人一定要他剪。”约瑟夫说。

温德大夫突然笑了起来。他站了起来，伸出手来在炉火上烤，约瑟夫熟练地窜到他身后，把椅子放回原地。

“我们真妙，”大夫说，“我们的国家在灭亡，我们的市镇被占领，市长准备接见征服者，而夫人呢，正按住市长的脖子，叫他不要动，替他剪耳毛。”

“他的毛发长得多，”约瑟夫说，“眉毛也长。市长对于拔眉毛比剪耳毛更恼火。他说痛。我怕连他的夫人都做不好这件事。”

温德大夫说：“她会尽力而为。”

“她要他穿得整整齐齐。”

从门口的玻璃窗上，一张头戴钢盔的脸正向里张望，门上有敲门的声音。温暖的光亮仿佛一下子消失了，整个屋子蒙上了一层灰暗。

温德大夫抬头看钟，说道：“他们提前了。让他们进来，约瑟夫。”

约瑟夫走到门前，把门打开。一名士兵走进来，身穿长大衣。他戴着钢盔，胳膊上端了一挺轻机枪。他向四周迅速地扫了一眼，然后站到一旁。他后面有一名军官站在门口。军官的制服很普通，只有肩章说明他的军衔。

那军官走进门来，看着温德大夫。这军官有点像漫画中的英国绅士：头戴垂边帽，脸是红的，鼻子长却讨人喜欢；身穿那套制服，与多数英国军官一样，显得很不自在。他站在门口看着温德大夫，说道：“你是奥顿市长吗，先生？”

温德大夫微笑着回答：“不，不，我不是。”

“那么，你是官员吗？”

“不是，我是这个镇上的医生，是市长的朋友。”

军官问：“奥顿市长在什么地方？”

“正在换衣服准备接见你们。你是上校？”

“不是，我不是上校。我是彭蒂克上尉。”他鞠了一个躬，温德大夫微微还礼。彭蒂克上尉继续往下说，但说的时候似乎对他不得不说的话有点为难：“我军规定，先生，在司令官进屋之前，必须对屋里有没有武器进行搜查。我们不是不尊重你们，先生。他回过头叫：“上士！”

上士很快跑到约瑟夫跟前，用手在他的口袋里上下一摸，报告说：“没有什么，先生。”

彭蒂克上尉对温德大夫说：“请原谅。”上士走到温德大夫面前，拍拍他的口袋。他的手摸到外衣内兜时停住了。他很快伸进去，拿出一只扁平的黑皮盒子，交给彭蒂克上尉。彭蒂克上尉打开盒子，见里面只有一些简易的外科器械：两把手术用小刀、几个针头、几只钳子、一枚皮下注射的针头。他关上盒子，交还给温德大夫。

温德大夫说：“你知道，我是一个在乡下行医的大夫。有一回，我只好用切菜刀做了一个阑尾炎手术。从此以后，我总是随身携带这些用具。”

彭蒂克上尉说：“我想这里有几件武器吧？”他打开自己放在衣兜里的小皮本。

温德大夫说：“你这么清楚？”

“是的，我们派在这里的人已经活动好久了。”

温德大夫说：“我想你不妨告诉我这个人是谁。”

彭蒂克说：“他的任务现在已经完成。我想，告诉你也没关系。他叫柯瑞尔。”

温德大夫惊讶地说：“乔治·柯瑞尔？啊呀，这简直不可能！他为这个市镇作出过不少贡献。你看，今天早晨他还给射击比赛发了奖品。”他边说眼睛边转，开始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他的嘴巴慢慢合起来，说道：“我明白了，他为什么举行射击比赛。对的，我明白了。可是乔治·柯瑞尔——简直不能叫人相信！”

左边的门开了，奥顿市长走了进来，他正用小手指挖着右耳。他身穿晨礼服，颈间挂着市长的职务链。他脸上一大撮白胡子，两只眼睛上面各有一小撮白毛。他花白的头发刚刚梳过，现在又不服，争着要竖起来。他当市长的时间很久了，成了这个市镇的模范市长。即便成年人，一见“市长”这两个字，不论是印着的，还是写着的，脑子里就会出现奥顿市长。他同他的官职融为一体。官职赋予他尊严，他给这官职的是令人温暖之感。

他身后是市长夫人，小个子，满脸皱纹，模样凶狠。她以为市长这个人是靠她用整个服饰创造出来的，是她设计出来的，她相信如果重新开始，她可以把他塑造得更好些。她一生中只有一两次了解他的全部，但就她真正了解的部分来说，她的确了如指掌。他有什么小嗜好，什么痛苦，什么无聊的事情，都逃不过她的眼睛；但是他思考什么，梦想什么，渴望什么，她从不了解。一生中有好几次她被弄得头晕眼花。

她绕到市长身边，抓住他的手，把他的手指从他受害的耳朵里拉出来，把它放回他身边，好像把婴儿的拇指从他嘴里拉出来一样。

“我就不相信像你说的那么痛，”她说，又朝着温德大夫，“他不让我修剪他的眉毛。”

“痛。”奥顿市长说。

“好吧，你要这副模样，我就没有办法了。”她拉了拉已经笔挺的领带。“很高兴看到你也在这里，大夫，”她说，“你看会来多少人？”接着一抬头，见到彭蒂克上尉，她说：“啊！上校！”彭蒂克上尉说：“我不是上校，夫人，我是为上校做准备的。上士！”

那上士还在翻坐垫，检查画框背后有没有东西，这时快步跑到奥顿市长前面，用手上下摸市长的口袋。

彭蒂克上尉说：“对不起，先生，这是规定。”

他又翻看自己手里的小本。“市长，我想你这里有武器。据我知道，有两件吧？”

奥顿市长说：“武器？我想你是说枪支吧？是的，我有一支手枪，一支猎枪。”他不高兴地说，“你知道，我不常打猎了。我常想去打猎，可是季节一到我又不去了。不像过去那么有兴趣。”彭蒂克上尉追问：“枪在什么地方？市长。”

市长擦擦脸，想了想。“我记得——”他对夫人说，“是不是在卧室那只柜子后面，同手杖放在一起？”

夫人回答：“是的，那个柜子里每件衣服的针缝里都有油味。我还想叫你放到别处去呢。”

彭蒂克上尉向门口叫道：“上士！”上士很快进了卧室。

“这是一件不愉快的任务。我很抱歉。”上尉说。

上士回来，拿了一支双铳枪，还有一支带肩带的很好的猎枪。他把它们放在门口的边上。

彭蒂克上尉说：“就是为这个，谢谢，市长。谢谢，夫人。”

他转身向温德微微鞠躬。“谢谢你，大夫。兰塞上校马上就来。再见！”

他从前门出去，后面跟着上士，一只手拿了两支枪，右胳膊挽着手提轻机枪。

夫人说：“刚才我还以为他就是上校。这年轻人长得不错。”

温德大夫讥诮道：“他不是上校，他只是保卫上校。”

夫人边想边说：“我不知道会来多少军官。”她看了眼约瑟夫，见他竟厚着脸皮听她说话。她朝他摇摇头，蹙了蹙眉目。他回过身去继续干他的杂活。他又重新擦拭起来。

夫人问：“你看会来多少军官？”

温德大夫气愤地拉出一张椅子来坐下，说道：“我不知道。”

“嗯。”——她不满地望着约瑟夫——“我们一直在说。我们该给他们泡茶呢，还是喝酒？如果是泡茶或者喝酒，我不知道他们来多少人，要是什么都不招待，那又该怎么办？”

温德大夫摇摇头，笑着说：“我不知道。很久很久了，我们没有征服过别人，别人也没有征服过我们。我不知道怎么做才合适。”

奥顿市长又用手去抠他发痒的耳朵。他说：“我看哪，什么都不该招待。我相信人民不喜欢我们招待他们。我不想同他们喝酒。我不知道为什么。”

夫人于是请教大夫：“古时候的人——我是说将领们——是不是用喝酒表示互相之间的敬意呢？”

温德大夫点点头。“是的，古时候是这样。也许当时情况不同。国王和君主之间打仗好比英国人打猎，打死了一只狐狸，他们就聚在一起进行狩猎早餐会。但奥顿市长可能说得对：人民可能不喜欢他同侵略我们的人在一起喝酒。”

夫人说：“人民在下面听音乐呢，安妮说的。人民可以听音乐，我们为什么不能恢复文明的礼节呢？”

市长盯着她看了一会儿，说话声音尖锐。“夫人，我想请你允许我们不喝酒。人民现在不知道怎么一回事。他们在和平时期生活得太多了，想不到会打仗。他们选我不是为了不知所措。镇上六个青年今天早晨被打死了。我想我们不会举行狩猎早餐会。人民参加战争不是什么游戏。”

夫人微微低下头。她一生中有好多次发现她的丈夫变成了市长。这一点她明白：不要把市长和丈夫混淆起来。

奥顿市长看看表，约瑟夫进来给他一杯浓咖啡，他心不在焉地接了过来，说了声“谢谢”，喝了一口。他表示歉意似的对温德大夫说：“我应该知道，我应该——你知道侵略军有多少人吗？”

“不是很多，”大夫说，“我看不满二百五十人——不过全配备了那种小型机枪。”

市长又喝了一口咖啡，又提了一个问题：“全国其他地方怎么样？”

大夫耸了耸肩，又放下来。

“没有一个地方抵抗吗？”市长失望地问。

大夫耸了一耸肩。“我不知道。电线不是割断了，便是被控制了。听不到消息。”

“我们的人，我们的兵呢？”

“我不知道。”大夫说。

约瑟夫插了进来。“我听说——是安妮听说的——”

“听说什么，约瑟夫？”

“六个被机枪打死了，先生。安妮听说三个受伤，被抓去了。”

“可我们有十二个。”

“安妮听说三个逃走了。”

市长马上转过身来，追问道：“哪三个逃走了？”

“我不知道，先生。安妮没听说。”

夫人用手指检查了一下桌上有没有尘土。她说：“约瑟夫，他们来了以后，你等在电铃旁边。我们可能要一些小东西。穿你的另一件上衣，约瑟夫，有纽扣的那一件。”她想了想，“还有，约瑟夫，叫你做的事情做完之后，你就出去。你站在那里听人说话，给人印象很坏。这是小家子习气。”

“是的，夫人。”

“我们不要酒了，约瑟夫，不过你要准备一点香烟，放在小银盒里。给上校点烟的时候，不要在鞋上划火柴。要在火柴盒上划。”

“是的，夫人。”

奥顿市长解开上衣扣子，取出表来看了看，又放回去，扣上扣子。有一颗纽扣扣得高了，夫人过去将它重新扣好。

温德大夫问：“几点？”

“差五分十一点。”

“一个有时间概念的民族，”大夫说，“他们会准时到这里。你要我走开吗？”

奥顿市长表示吃惊。“走开？不——不，留在这儿。”他轻声笑道，“我有点怕。”他表示歉意，“嗯，不是怕，是紧张。”他失望地说，“我们从来没有被人征服过，这么长时间了——”他停下来听。远处传来军乐声，是一支进行曲。他们全转到军乐声的方向听着。

夫人说：“他们来了。我希望来的人不要太多，一下子把这里挤得满满的。这间房子不大。”温德大夫讥笑说：“夫人想要凡尔赛宫里那个百镜厅吧？”

她抿住嘴唇，朝四周一望，心里已经在盘算那些征服者来了之后的情况。她说：“这间房子很小。”

军乐响了一阵，又慢慢低了下去。门上传来轻轻的敲门声。

“这会儿谁敲门？约瑟夫，要是别的人，请他晚些来。我们正忙着呢。”

那人继续敲门。约瑟夫走到门前，先打开一条缝，再开大一点。一个灰色的人影出现了，戴着钢盔和粗大的手套。

“兰塞上校向你们致意！”那个人说，“兰塞上校前来会见市长。”

约瑟夫把门开大。戴钢盔的传令兵跨进门，向房里四周迅速地扫了一眼，接着站在一边，喊道：“兰塞上校到！”

又一名戴钢盔的人进门来，他的职位只在肩章上表明。随后进来的是一个身材矮小的人，身穿一套西装。这上校是个中年人，阴沉坚毅，面带倦容。他肩膀宽阔，像个军人，但没有一般士兵那种漠然的神色。他身旁还有一个秃头的小个儿，脸色红润，两只乌黑的小眼珠，外加一张肉感的嘴巴。

兰塞上校脱下钢盔，朝市长很快地鞠了一躬：“市长！”又向市长夫人一鞠躬，“夫人！”他说，“请把门关上，下士。”约瑟夫很快地关上门，颇为得意地看着那个士兵。

兰塞疑惑地瞧着大夫。奥顿市长说：“这位是温德大夫。”

“是官员吗？”上校问。

“是医生，先生，也可以说是本地一位历史学家。”

兰塞微微鞠了一躬。他说：“温德大夫，恕我无礼，但在你的历史书上会有一页，也许——”温德大夫笑着说：“也许许多页。”

兰塞上校稍微侧身，向着他的同伴。“我想你认识柯瑞尔先生吧。”他说。

市长说：“乔治·柯瑞尔？当然认识。你好，乔治！”

温德大夫马上插话，怪有礼貌地说：“市长，这就是我们的朋友，乔治·柯瑞尔。为侵占我们这个市镇出谋划策的乔治·柯瑞尔。把我们的士兵调进山里去的、我们的赞助人乔治·柯瑞尔。我们餐桌上的客人乔治·柯瑞尔。把我们镇上每件武器列了清单的乔治·柯瑞尔。我们的朋友乔治·柯瑞尔！”

柯瑞尔生气地说：“我为我的信仰效劳！那是一件光荣的事情。”

奥顿的嘴微微张着。他不知怎么回事。他孤立无援，先看着温德，再看看柯瑞尔。“这不对吧，”他说，“乔治，这不对！你是我的座上客，同我一起喝过葡萄酒。还有，你帮我一起筹建了医院。这不对呀！”

他定神牢牢地瞧着柯瑞尔，柯瑞尔也狠狠地回看着他。他们长时间的沉默。接着市长的脸慢慢地收紧，变得十分严肃，整个身子也挺直起来。他对兰塞上校说：“我不愿意同这位先生在一起谈话。”

柯瑞尔说：“我有权利留在这里，我像他们一样，也是一名战士。我只不过没有穿制服罢了。”

市长重申：“我不愿意同这位先生一起谈话。”

兰塞上校说：“是不是请你现在离开，柯瑞尔先生？”柯瑞尔说：“我有权利留在这里！”

兰塞上校尖声说：“是不是请你现在离开，柯瑞尔先生？你的地位还能比我高？”

“不，先生。”

“那请走吧，柯瑞尔先生。”兰塞上校说。

柯瑞尔生气地瞪了市长一眼，转过身，很快走出门去。温德大夫咯咯一笑，说道：“在我的历史书里，这够我好好写一段了。”兰塞上校目光犀利地看了他一眼，但没有作声。

这时，右边的门开了，浅黄头发、红眼睛的安妮一脸虎气地走进来。“后面走廊上有许多兵，夫人，”她说，“就在那里站着。”

“他们不会进来的，”兰塞上校说，“这只不过是军事程序。”

夫人冷冷地说：“安妮，你有什么事情，叫约瑟夫传个话。”“我不知道，可是他们想进来，安妮说，‘他们闻到了咖啡的香味儿。’

“安妮！”

“是，夫人。”她退了下去。

上校说：“我可以坐下吗？”他解释说，“我们好长时间没有睡觉了。”

市长自己也像刚睡醒似的。“可以，”他说，“当然可以，请坐。”

上校看看夫人，她坐了下来，于是他也疲惫地坐进一张椅子上。奥顿市长似醒非醒站在那里。

上校开口了：“我们希望我们能好好合作。你看，先生，这好像冒风险做生意，而不是别的。我们需要这里的煤矿，需要捕渔业。我们尽可能好好相处，摩擦越少越好。”

市长说：“我听不到消息。全国其他地方怎么样？”“全占领了，”上校说，“事先计划周密。”“没有一个地方抵抗吗？”

上校同情地看着他。“没有抵抗就好了。有的，有些地方抵抗，但这只能造成流血。我们计划得非常周密。”

奥顿抓住这点不放。“但还是有抵抗。”

“是的，不过抵抗是愚蠢的。就像这里，一下子就被摧毁了。抵抗既可悲又愚蠢。”

温德大夫明白市长急于知道这一点的心理。他说：“是愚蠢，但他们毕竟抵抗了。”

兰塞上校说：“只有少数人抵抗，已经平息了。整体来说，人民是平静的。”

温德大夫说：“人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正在明白，”兰塞说，“他们不会再愚蠢了。”他清了清嗓子，声音变得轻快些，“现在，先生，我谈正事。我确实非常累，但是我必须作好安排才能去休息。”他往前坐了坐，“我与其说是一个军人，不如说是一个工程师。这整个工作就像一项工程，而不是征服。煤必须从地下挖出来，并且从海上运走。我们有技术人员，但当地人必须继续在煤矿挖煤。这一点清楚吗？我们不想采取严厉手段。”

奥顿说：“这一点很清楚。但如果人民不愿意挖煤呢？”

上校说：“我希望他们挖，因为他们一定得挖。我必须弄到煤。”

“但是，如果他们不挖呢？”

“他们一定得挖，他们是听话的人民。他们不想遇到麻烦。”他等市长回答，可市长没有回答。

“是不是这样，先生？”上校问。

奥顿市长扭了一下链条。“我不知道，先生。在我们的政府领导下，他们是听话的。你们领导下他们怎么样，我不敢说。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你知道。我们建立政府以来，已经有四百多年了。”

上校很快回答：“我们了解这一点，所以我们想维持你们的政府。你还是当你的市长，由你发布命令，奖惩也由你作主。这样，他们就不会惹事了。”

奥顿市长看着温德大夫。“你怎么考虑的？”

“我不知道，”温德大夫说，“这倒很有意思。我看会出事。老百姓心里可能怀着恨呢。”

奥顿市长说：“我也不知道。”他对上校说：“先生，我是人民的一分子，可是我不知道他们会干什么。也许你知道，他们可能同你或者我们所了解的完全不同。有的人民接受指定下来的领袖，并且听从他们。但我是我的人民选出来的。他们选了我，也可以罢免我。如果他们认为我倒向你们一边，就可能把我罢免。我真不知道。”

上校说：“你让他们守秩序，你就为他们尽了义务。”

“义务？”

“是的，义务。保证他们不受伤害是你们的责任。他们要是反抗，他们就有危险。我们必须弄到煤。你明白。我们的领袖没有告诉我们怎么去弄到煤，他们只是命令我们去弄。你得保护你的人民。你必须叫他们干活，从而保证他们的安全。”

奥顿市长问：“但是，假使他们不顾安全呢？”

“那你必须为他们着想了。”

奥顿颇为自豪地说：“我的人民不喜欢别人替他们思考。可能与你们的百姓不同。我虽然糊涂，但这一点我有把握。”

这时约瑟夫快步走进来，向前站着，急着要说话。夫人说：“什么事，约瑟夫？拿银烟盒来。”

“对不起，夫人，”约瑟夫说，“对不起，市长。”

“你要什么？”市长问。

“是安妮，”他说，“安妮在发火，先生。”

“怎么啦？”夫人问。

“安妮不愿意那些士兵站在后廊上。”

上校问：“他们惹事了吗？”

“他们在门外看安妮，”约瑟夫说，“安妮不愿意。”

上校说：“他们在执行命令。他们不碍事。”

“可是，安妮不愿意他们这么看她。”约瑟夫说。

夫人说：“约瑟夫，告诉安妮小心点。”

“是，夫人。”约瑟夫走了出去。

上校疲倦得眼睛下垂。“还有一件事，市长，”他说，“我跟我的人可不可以住在这里？”
奥顿市长想了想说：“这个地方小。还有更大、更舒适的地方。”
约瑟夫回来，手里拿着银烟盒。他打开烟盒，递到上校面前。上校取了一支，约瑟夫得意洋洋地给他点上。上校深深地喷了一口烟。
“不是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发现，如果团部设在当地政府机关里，就会更加安宁一些。”
“你是不是说，”奥顿问道，“使人民感到其中含有合作的意思？”
“是的，我想是这个意思。”

奥顿市长无可奈何地看着温德大夫，温德只报以苦笑。奥顿轻声说：“我可不可以谢绝这番美意呢？”

“很抱歉，”上校说，“不行。这是我的领袖的命令。”

“人民不会喜欢这么做。”奥顿说。

“老是人民！人民已经被解除武装。人民没有说话的份儿。”

奥顿市长摇摇头。“你不了解，先生。”

门口传来一个女人发脾气的声音，“砰”的一声，接着传来一个男人的叫喊声。约瑟夫急匆匆走进门来。“她在泼开水，”约瑟夫说，“她在发火。”

门外传来发命令声，笨重的脚步声。兰塞上校吃力地站起来问道：“你管不住你的用人吗，先生？”

奥顿市长笑了笑。“管不住，”他说，“她高兴起来是一名很好的厨师。有人受伤了吗？”他问约瑟夫。

“水是开的，先生。”

兰塞上校说：“我们只想完成任务。这是一项工程。你得训练好你的厨师。”

“我做不到，”奥顿说，“她会辞职不干的。”

“现在是非常时期。她不能辞职。”

“那她会泼开水的。”温德大夫说。

门开了，一名士兵站在门口。“要不要逮捕这个女人，长官？”

“伤人了吗？”兰塞问。

“伤了，长官，烫的，有人被她咬了。我们已经把她抓住了，长官。”

兰塞好像拿不出办法，便说：“放了她，你们撤出走廊，到外边去。”

“是，长官。”那士兵随手把门带上了。

兰塞说：“我完全可以枪毙她，也可以把她关起来。”

“那就没有人为我们做饭了。”奥顿说。

“你看，”上校说，“上级命令我们与你们的人民好好相处。”

夫人说：“对不起，先生，我去看看士兵们是不是伤了安妮。”她走了出去。

这时兰塞站了起来。“我说了，我很疲劳，先生。我得去睡一会儿。为大家好，请和我们合作。”

奥顿市长不回答。“为大家好，”兰塞上校说，“你愿意吗？”

奥顿说：“这是个小市镇。我不知道。人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

“但是你愿意合作吗？”

奥顿摇摇头。“我不知道。等全镇上下决定怎么办，我也可能怎么办。”

“可你是领导。”

奥顿笑着说：“你可能不相信，但事实如此：我们的领导在全镇。我不知道怎么会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但事实就是如此。这说明我们行动起来不像你们这么快，但一旦确定方向，我们会一致行动。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还不知道。”

兰塞疲乏地说：“我希望我们能够合作。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方便一些。我希望我们可以信任你。我不希望考虑采取军事手段来维持秩序。”

奥顿市长默不作声。

“我希望我们可以信任你。”兰塞又说了一遍。

奥顿把手指塞进耳朵，转动他的手。“我不知道。”他说。

这时夫人走进门来。“安妮火极了，”她说，“她在隔壁房间，正跟克里丝汀说着话。克里丝汀也在生气。”

“比起安妮来，克里丝汀是一名更好的厨师。”市长说。



本文经人民文学出版社授权，摘自《月亮下去了》



约翰·斯坦贝克

1962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生共创作 27 部作品，代表作包括《人鼠之间》《小红马》《愤怒的葡萄》《伊甸园之东》等。其中《愤怒的葡萄》获得 1939 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和 1940 年的普利策奖。

发现经典

这里是已经出版、我们认为不应该被湮没、遗忘和打成纸浆的旧书。



电影《爱》(2012)剧照

非虚构

我们将死于梦醒

陈冲 | 非虚构图书馆

父亲犀牛般的盔甲破裂了，
暴露了他跳动的心脏。

黎明时分我走出隔离酒店，月亮还高挂着，天空慢慢泛出蓝色的光，希望在夜和昼之间仿佛重新诞生。一股莫名的感激涌上心头，父亲还健在，我很快可以见到他。

一进家门，我留心到餐桌上堆满了打开的相册，走近看，大多是父母在各地海滨、河边、湖畔或者游泳池拍的。他们曾每天早上一起游泳，几十年如一日。二〇二〇年年底我离开上海前陪他们去了泳池，那天母亲下水没一会儿就累了，说想先上去。父亲哄着她多游一个来回，我还表扬了她，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她已经病魔缠身。一个月后，母亲被两个救生员从池里拽上了岸，那是她最后一次游泳……

保姆说，你爸最近一直在看相片。

我望向父母的卧室，门关着。母亲离开九个月了，我仍然恍惚，好像她随时会从里面走出来。

母亲被确诊为淋巴癌之前，父亲已经知道凶多吉少。那时快过年了，我以为他是想了年再带她去检查。我朋友雪莱去看他们后，给我发信说，你爸爸不舍得送你妈妈去医院，他说他看得多了，这样送进去就出不来了。

父亲还是在年前把母亲送进了医院，我赶回上海时，他自己也因心脏病复发住进了同层的另一间病房。哥哥比我早五天到沪，他隔离完到医院才知道那里有了新的规定，从国外回来的人要二十八天后才能进病房探望亲人。他提议让母亲坐上轮椅推到院子里见一面，但是母亲那天坐不起来。第二天哥哥求了一个熟人，带他坐货梯上楼梯进了病房。

视频里母亲在呻吟、叫喊，她是个有忍耐精神的人，现在的疼痛一定是超过了她的极限。父亲只能沉默、无奈地坐在一旁，爱莫能助，束手无策。

我们有一个在澳大利亚的朋友，她是我表妹的大学同学，曾在平江路的家里住过一阵，我们都叫她小于。小于出国前是医院麻醉科的医生，她建议母亲用一个叫 Propofol(异丙酚)的麻醉药，让她减轻痛苦，得以睡眠，第二天可以有力量进食和承担进一步的治疗。但是母亲的医生说，医院从来没有这样用过麻醉药，无法承担这个风险（当

年迈克尔·杰克逊就是打了过量的 Propofol 后死掉的）。

我给父亲打电话，能听到母亲在一旁发出痛苦的声音，我怕他耳背听不清，大声问，你能不能请医生给妈妈打麻醉药？他也大声回，不行的，你们是要她安乐死吗？说着就把电话挂了。我叫哥哥去医院，无论如何也要说服父亲。他说，我现在进不去啊。我说，要是我，就宁愿压一个枕头在妈妈头上，我宁愿她死。说着我就忍不住哭了，这些天憋在肚子里的眼泪全涌了出来。哥哥听我一哭，也哭了起来。我们两个人就那么无助绝望地在电话两头哭。

第二天我又给父亲打电话，他说，你跟妈妈说说话吧。我叫了声妈妈她就哭了，轻轻喊妹妹啊，妹妹啊，说不出别的来。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妈妈你受苦了，我马上就来看你了。过一会儿，父亲接过电话，用沙哑的声音说，妈妈累了，明天再说吧。我突然心痛、内疚，他每天陪在母亲身边，看到她受折磨也一定是心力交瘁，我们凭什么在远处责怪他。

我第一次跟哥哥去医院看望母亲，父亲的助理让我们在电梯对面一间空的缓冲病房，等待父母从他们各自的病房过来跟我们聚会。

母亲被护工在轮椅上推过来，她低垂着头，紧闭着眼睛，瘦得形同骷髅。我胸口抽紧——有些事我们永远无法有足够的准备。她用尽全身力气紧紧抓住轮椅的手把，好像在悬崖峭壁，松开了就会一落千丈。我蹲下轻轻唤妈妈妈妈，她睁开眼看见我，就委屈地叫，妹妹啊，妹妹啊。我抱住她的头，她努力睁眼，好像有千言万语却没有力气说。我问她，妈妈要喝口水吗？她说要。我请护工端来温水和吸管，但是她吸了两口就吸不动了。我和哥哥一边一个，抚摸她紧抓着轮椅的手，她慢慢地放松了一些。

在从医院回家的车上，我怅然地望着窗外，梧桐树嫩绿的新叶在阳光里像宝石那样闪烁，一株红色的冬梅、一棵白色的白玉兰偶尔划过。路人们提着袋子进出商店，握着手机、香烟坐在树荫下，外卖小哥们在人群缝隙中穿梭……那是个再普通不过的日子。我脑子里出现了一首歌：为什么太阳依然照耀，为什么海浪拍打岩岸，难道它们不知道这是世界的末日？

父亲趿着拖鞋的脚步声让我回头，他的脚步踉跄，眼神疲乏，比半年前我离开的时候更老了。我叫爸爸，他应了一声就没有其他话了。我指着一张相片问，你们在哪里拍的？他认真看着我的嘴形，然后说，这是丹麦海边的美人鱼铜像。这之前我并不知道父母一起去过丹麦。

其实我更想说的是：我一直都在牵挂你，你还好吗？一个人过习惯些了吗？我经常梦见妈妈，你梦见过她吗？你怎么挨过孤独的日子？但这不是我们之间可能发生的对话。父女一辈子，我们从未用语言交流过感情。除了母亲，父亲不对任何人打开心扉。我只见过他一瞬间易受伤害的样子，那是在母亲化疗了一个月以后。

那天母亲躺在硬邦邦的 CT 桌上向我和哥哥大声叫喊，我吃不消了，我真的吃不消了，你们快来救救我！医生随手拿了一件保护背心让我穿上，却没有找到第二件可以给哥哥。我们就这样犯规进了 CT 间，一面一个拉住母亲的手，在她耳边轻轻重复，马上就好了，马上就好了。父亲跟医生在隔壁的房间研究母亲的 CT 结果。父亲看过无数例类似的病人，这回轮到了他的爱人。从 CT 上看，母亲的肿瘤没有太大的改观。

回病房后，我把 CT 结果告诉了二姨和小姨。小姨发信说：“根据你妈的情况，舒服地走比活着受煎熬好。你爸硬拉着她，太自私了，劝劝他吧。”她建议我直接问母亲是否想走，我却无论如何也不敢问。母亲睡着后我回信给小姨，“她没有跟我说不想活。如果妈妈给我明确指示她想走的话，我会义不容辞地去完成。她虽然呻吟叫喊，但是没有说她想走。”小姨说，“据说人到了那一步都有求生欲，那就要说服她进食。”二姨也发信给我，“我姐这么痛苦太可怜了。”我回，“父亲就是无法让她走，要不惜代价让她活下来。他说，叫你们回来就是来跟她道个别。意思是别的不要管。”二姨说，“他说道个别也就是你母亲没救了，那让她安静一些把她想干的事干完，不要再活受罪，你爸也回家，合家团圆地走到终点是对她唯一的爱护。强拉着她受非凡的苦，那是残害她，不人道啊。”

有些话太难启齿，我怕自己说不清楚，就给父亲写了一封信：“通过这段时间对妈妈的观察，她只要是醒着的时候都是非常难受的。有时稍微好些，有时很难挨。今天我和哥哥在她身边一个半小时，她坐了一会儿想躺下，躺了一会儿说还是坐起来吧，

坐起来后还是解决问题，找不到一个舒服的姿势。为了抵抗身体上承受的折磨，妈妈躺着的时候双手总是紧攥着床边的栏杆。我跟她说如果是痛，医生可以给镇痛的药。她说没有用的，我不是痛，是难过。妈妈的感觉和表达都是清晰的。护工和保姆当着她的面议论，说她整天吵，横不得竖不得，说她大便在身上……好像她是个无理取闹的小孩，是个白痴。妈妈自尊心很重，很骄傲，忍无可忍了才这样的。在她这个岁数，在目前皮包骨头、生命力日益下降的情况下，这样的煎熬是否值得？为她换来的是什么？更长久的煎熬吗？”

我郑重其事地把信交给父亲，他读完后什么也没有说，把信折好放回信封里还给我。我不罢休，鼓起勇气跟他说，妈妈太苦了，不要治疗了。父亲不看我，也不做声。我说，我们接她回家吧，能不能找到足够的吗啡？我们陪着她，给她打针让她走。父亲还是不看我，停顿了片刻后他说，哪里去找那么大的剂量？今天我去陪她，让她多吃点，她说想跟我一道回家……说到这里父亲哽咽了，眼睛红了，泪水在眼眶里涌动，但是他没有让它流下来。他说，你们回家吧。那一刻，父亲犀牛般的盔甲破裂了，暴露了他跳动的心脏。

我每天上午去病房陪着母亲煎熬，夜里神志恍惚地幻想如何去解救她。一天吃早饭的时候我跟哥哥说，我还有二十八片安眠药，今天带去医院，看看有什么机会喂给妈妈。哥哥说，那怎么可以？你又不知道吃了安眠药以后会发生什么情况，说不定她更难受，再说被人发现了你要坐牢的。

母亲的病床靠窗，朝南，病友的床靠门，拉上了白帘子。温暖的阳光从窗口照进来，把我的影子投在墙上。我凑到母亲耳边问，妈妈，你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事吗？妈妈，你有任何愿望我都会拼命为你实现的。她说，你跟我一起祷告，要记得祷告。

记得大概在七八年前，母亲坐在卧房的小书桌前发呆，一本打开的书上画满了线，她的健忘症已经发展到无法享受阅读了。我走过去摸摸她的肩膀，她转头说，活着很没劲，没什么可开心的事。不记得我说了什么，也许什么都没说出来。她接着轻描淡写地说，我不会自杀，因为我不能这样对待你爸爸。

还有一次，我在屋里找不到她，觉得奇怪，因为母亲除了跟父亲去游泳一般不会出门的。一股风刮到我的脸上，窗帘飘起来，我这才发现阳台的门敞开着，她靠在阳台的栏杆上，稀疏的头发被风吹得很乱。我走过去叫她，她的眼神从很远的地方收回来。几十年前刚搬进这个公寓的时候，她说喜欢这个阳台，但是让我们千万不要用力靠在栏杆上，万一是豆腐渣工程，掉下去就没命了。我直觉到母亲在思量生死，轻轻把她拉回屋里，说，我想听你弹钢琴。

母亲自始至终没有提出要提前结束这场磨难，那是求生的本能吗？还是爱？

父亲打开钱包，问，你需要人民币吗？我看到里面多了一张母亲年轻时的照片，那是他按照钱包的尺寸印出来的。这是他自己在家里打印的吗？还是去外面专业的地方印出来的？我也有一张同样的，那张是父亲自己放大后染了色的。照片里母亲大概二十出头，我从没见过另一个女人有如此天然和宁静的美丽，有如此深邃和神秘的眼神。母亲走后我配了镜框，放在了换衣间的橱柜上，每天可以看到。

有时在完全莫名的情形下——或许半夜三更惊醒过来，或许大白天在微波炉前热午饭，或许傍晚在淋浴时哼歌——我眼前会出现母亲骨瘦如柴的身体，被静脉针扎得一片片青紫。我想，父亲选了这张照片不是为了记住，而是为了忘掉——他想用母亲最美好的样子去冲淡她被病魔摧残的记忆。

化疗期间母亲经常拔掉点滴管，胳膊手背上的静脉血管全都无法再用了，必须把点滴装置埋在皮下，从颈动脉输液。这个小手术平时只需局部麻醉，但是因为母亲在清醒的情况下不会配合手术，所以必须用全麻。父亲担心全麻的风险，跟医生说，我可以在手术室里按住她。但医生说，你一个人不可能按住她的头和双肩，她挣扎时带来的风险会高过全麻。

我不信教，对自己和宗教都抱有同样怀疑的态度。但是母亲病重的那十个月，我每晚在黑暗中祷告，求上帝保佑她。回想起来，那些时刻我并不“虔诚”，有时会在心里大喊：你到底要她怎么样？你为什么这样折磨她？你为什么不阻止我爸爸？

一天，哥哥和我跟往日一样到医院探望父母。母亲突然精神了许多，她吃了半个我们带去的苹果，还跟着哥哥手机里的音乐唱了《田纳西华尔兹》。父亲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他坚持治疗的信念和承受力终于点亮了希望的火苗——也许母亲的病能得到治愈。从那天开始，她奇迹般地好转起来。

我生日那天，正在重庆拍摄《忠犬八公》，父亲打电话给我，好像完全不记得生日的事。他说，妈妈想跟你讲讲话，我要去楼下办公室给病人会诊。

母亲问，妹妹你在哪里？我说，我在重庆拍戏，你记得重庆吗？你记得在歌乐山的事吗？她说，在歌乐山的时候最开心了。她无法更具体地表述，我便提醒她，记得姚牧师吗？她说，姚牧师最好了，教我唱好多歌。我又问，圣光中学里面有教堂吗？她愣了一会儿后说，我们只要有几个人凑在一起就是教堂了。母亲失忆以后，经常用各种巧妙的方式来掩盖自己头脑的空白。我不知道她的回答是在搪塞我，还是她在头脑里看到了那片雾蒙蒙的竹林，听到了回荡在山谷的祈祷和歌声？我不禁感动，这是一个多美好的回答。

我跟母亲说了再见，还没来得及关机就听到她在那头自言自语。原来她不懂怎么关父亲的手机，不知道还跟我连着线。母亲发出各种困惑的呻吟，好像不知道她接下来将面对什么，该干什么。然后，她开始急促地祷告。待她停下片刻，我轻轻叫了声妈妈。她慌忙地问，妹妹？你在哪里？我说，在重庆拍戏，在跟你通电话，我们一起祷告吧。我按照她曾经教我的祷文说：亲爱的主，感谢你所给予我们的一切，求你饶恕我们的罪过，指引我们的言行，听我们的祈祷。求你赐给我们平安、健康、力量、智慧和勇气，与我们同在，求你保佑妈妈……母亲马上添了一句：亲爱的主，我把妹妹交给你，求你保佑她家庭美满事业成功，求你指引她，做你的好孩子，不做你不喜欢的事。那天我六十岁，却还是个孩子——母亲的，上帝的。那是我所有生日中最难忘的礼物。

从重庆回来后，我每天上午陪母亲在病房里唱歌，父亲也在一旁听着，有时眼光变得遥远。记忆里那些母亲摆脱了苦难的日子，屋里总是充满了阳光。窗户很大，太阳照在她的脸上，她专注的歌声充满了少女的渴望：小鸟在歌唱，野花在开放，阳光下面湖水已入梦乡，虽然春天能使忧愁的心欢畅，破碎的心灵再也见不到春光。我走山路，你走平原，我要比你先到苏格兰。但我和我爱人永不能再相见，在那最美丽的罗梦湖岸上……她走后我才知道那是一首苏格兰民谣，叫《罗梦湖》。

有一天，母亲在唱《在那遥远的地方》，唱到“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的时候，她突然说，这句倒是蛮性感的。我惊讶不已，如果没有音乐伴随着这词，她绝对没有能力产生这样的联想。我再一次被音乐的神秘所迷惑，我猜它始于人脑最原始的中枢，是先于语言的东西？音乐通过母亲脑中已经病变的边缘通路穿刺到她已经萎缩了的海马体、杏仁核，刹那间的感官记忆，像一次短路的火花，照亮她黯淡的意识，那个时刻她感受到了喜悦。

母亲总是早上四点就起来去父亲病房找他，搞得他不够睡，很疲劳。我跟她说，你早上千万不要那么早就去找爸爸，他休息不好身体会垮的。她很愧疚地答应，明天让他睡饱，但是到第二天就忘记了，又一大早去找他。有时候，母亲还会当着医生护士的面跟父亲发脾气。他自己也是个脾气很大的人，但这种时候只好把她当小孩哄，从不怪她。我想起《本杰明·巴顿》里布拉德·皮特演的角色，在生命的尾声变成一个婴儿，躺在恋人怀里。

母亲去世那天早上，父亲看到她痉挛的样子，脸色灰白，差点摔倒在地，哥哥请驾驶员送她回家躺到床上。那一晚父亲彻夜未眠，但是第二天早上他还是去了办公室。那之后的两周他都失眠，但是每天坚持上班。最爱的人不在了，七十年共同的记忆、日常生活中的“日常”也都随之消失。但最爱的工作还在，它像地心引力那样将父亲安全地拴在一个熟悉的地方。

早上七点三刻，父亲跟我说，我上班去了。他的语气严肃、平静，眼睛里流露出活力。他从上海医学院毕业的时候，被分配到了一个犯罪研究所，由苏联专家培训破案。那是安全局研究所的前身，工作性质的政治性很强。

报到的时候，父亲看到另外几位都是政法学院毕业的人，就跟负责人说，我只会当医生，不合适做破案工作。负责人说，我们破案有爆炸、燃烧、痕迹方面的工作，需要懂物理化学的人才。父亲说，我是医学系的，没有学过什么物理化学，药学系的人这方面也许更强一些。但是那个负责人还是没有被说服，父亲只好硬了头皮说，我还有一个问题，你们在档案里有没有看见，我当过反革命。负责人一个电话打到上医，结果档案的的确如此，他就让上医马上换一个人来。

当时有两个没人愿意去的科，一个是组织胚胎科，另一个是放射科，而最没人想去的就是放射科，当年只有一台拍胸片的机器，什么其他设备都没有。父亲被退回学校后就自告奋勇去了放射科，那是一九五六年，他二十五岁，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后，

他直接骑车去南京路为母亲和自己各买了一条裤子。不知为什么，他们多次说起这件事，仿佛那是生命中十分特殊的一天。六十六年过去了，华山医院放射科早已鸟枪换了大炮，九十一岁的父亲仍然在那里为人看病。

记得一次，母亲需要去华山分院的 PET 中心做全身扫描，天不亮我和驾驶员就赶到病房去接父母。父亲还在洗漱，他说，不用那么早就去。我说，昨天医生关照了一定要在六点钟前到，不然就要排长队等很长时间，妈妈会太累。他说，不会的。到了 PET 中心，父亲熟门熟路，跟那里的医生们聊起中心的各种人和事，我这才想到他是中国放射学的元老之一，是国内应用 CT、MRI、DR 和 DSA 等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开拓者。父亲桃李满天下，到 PET 中心就像回到老家。

母亲开始第三轮化疗以后，我跟父亲说了我即将回美国的计划。他知道这事迟早会发生，但还是瘫在椅子上半天没说话。然后他说，不能多陪你妈妈几天了？我说，我四个多月没回家了，趁妈妈现在还稳定我先回去一下。他说，现在从美国再回上海的话，要隔离三个礼拜了，你知道吧？我说我也听说了。父亲说，万一她发生什么意外，你赶都赶不到。说完，他打开手提电脑阅读起影像学的文献，哪怕住院他都从未耽误过对专业知识的学习和思考。我看着他的背影，感到他的孤独和疲劳。患心脏病的父亲，照顾着患失忆和癌症的母亲。如此艰难的时候，孩子都不能在他身边。当年把我们送去了那么远的地方，他有没有后悔？几年前有一次，好像是父亲需要处理什么复杂的事务，令他烦恼和疲惫。他跟驾驶员说，小孩都是白养的，一点用都没有。上海封控期间，父亲的日子非常难熬，他不会用微信，更不懂怎么在网上抢菜。我很久都买不到回沪的机票，最后买到了又被熔断了两次。父亲耳背，我怕电话讲不清楚，就写了微信请表弟转告。父亲看完后说，大概都是借口。

我奶奶父母的坟在老家江西南昌郊外。记得父亲跟我说过，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当地政府要在坟地上面建公路。父亲接到通知后去那里迁祖坟。按当地习俗，挖坟时请了一位风水先生同去。挖开后，父亲看到坟边小溪的水不知在哪年哪月改了道，他祖父母的棺材已经浸泡在地下水里。棺材被抬起后有六条鱼在水里慢吞吞地游。再仔细看，父亲发现因为它们一辈子没有见过日光，所以眼睛是瞎的。算命先生看到这个景象，考虑了一下说，要把家里的六个小辈送到国外去。父亲有些震惊，奶奶这条线下来到我这辈，一共有八个后裔，其中有六个在国外生活。也许父亲埋怨的是命运，而不是我们的不孝。

航班是晚上起飞，白天我最后一次去医院陪父母。我们跟往常一样在病房里唱歌，然后一起吃午饭。母亲吃了几口就不想吃了，父亲从他的小冰箱里拿出一块栗子蛋糕，说，阿中啊，甜品。母亲便笑眯眯地接过来吃。我好奇，在六十六年的婚姻里，他们有过别的渴望吗——那些互相无法满足的渴望？那似乎是人之常情。他们也一定有过对方无法分享的欣喜、无法分担的痛苦，或者在孤独难挨时的诱惑？我大概永远都不会得到答案。

从病房回到家里，猫咪围着我叫，我蹲下来摸它。它刚来父母家时，送猫的朋友常来问问它的情况，母亲会说，这只猫聪明得不得了，都可以当我的研究生了。或者，这只猫懂事得不得了，以后我们不行了就全靠它了。这些年来，父母看电视的时候，它总爱在父亲的膝上躺着；母亲弹钢琴的时候，它总爱在琴凳的一端坐着；我每次开门，它都迎上来叫我，用脸蹭我的裤腿。猫咪被撸得舒服了，睁开眼睛深情地望着我，懒洋洋的身体呼噜呼噜作响。家里还剩一罐鱼肉罐头，我打开放给它，它吃得很快，完后仔细地舔自己的毛，完全不知道我将不得不把它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所有的爱从一开始就在走向终将的失去，连猫也无法避免这必然的命运。

父亲现在很少在餐桌吃饭，早饭一般在书房的电脑前边写书边吃，午饭和晚饭就在电视机前边看剧边吃。一天，他难得跟我一起在餐桌吃饭，想到了猫咪，跟我说，猫咪现在可以回来了。我说，先不急，你一个人在上海，我和哥哥都很不放心，疫情期间来回飞实在太困难了，你还是来美国跟我们住一段吧。他说，我最近在研究脑部毛细血管病的预防和治疗，太忙了走不开。疫情一结束我还要去老挝，国家领导交给我的任务还没完成。

父亲内心深处有着强烈的流浪癖，十分向往远方和未知。七十年代，他带了一个医疗队去多哥工作，途中在巴黎停留了一天。那是他第一次离开中国，被世界的丰富和宽广所震撼。也许，流浪的种子就是那时埋入了他的心田。

医疗队宿舍里的用水质量很差，父亲就每天跟同事一起，带着大桶去爬山，再把山里的泉水一桶桶地运回宿舍，他说那是他这辈子喝过最甘甜的水。当地一个酋长的

大老婆常找父亲看病，酋长也就成了父亲的朋友。大老婆住在泥巴和干草糊的房子里，窗帘和床单都是各国访问者送给酋长的国旗。

多哥非常贫穷，但是在那父亲远离了国内的政治运动，尝到了自由的味道。几个月后，他就向驻多哥中国大使馆申请把我们全家都调去多哥，理由是作为医生他可以比官方更有效地了解当地民情，促进中多友谊。我们一家差点成了多哥人，幸好大使馆没有批准他的要求。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父亲每年十一月都到美国参加放射学的年会，他还常去欧洲各国考察交流，为华山医院带回了世界最先进的医疗技术和设备。澳门回归后，他带领华山的医疗队，为澳门卫生司所属的多家医院发展和培养医疗骨干。随着母亲失忆症的加深，他就越来越走不开了。偶尔，他会带着母亲去离上海不太远的城市参观和讲课。有几次，趁我或者哥哥在上海的时候，他会把母亲交给我们照顾，然后飞去外地出差。现在，父亲念念不忘的是老挝。

大约在六七年前，父亲告诉我，中央批示成立了中国精准医疗战略专家组，我的影像中心就是研究“精准医学和精准影像学”的。有个老挝人来华山医院参观访问，邀请我去为他们建立一个精准医疗的医院，这个老挝人以前是国家领导在高中的同学，现在领导把这个项目交给我去做。老挝天气热，我要去裁缝店做两套麻布西装。说着，他拿出一张他们在华山医院的合影给我看，老挝人身穿米白竖领上衣，斜披着一条五彩缤纷的肩带，父亲身穿一件大红色的衬衣，容光焕发。

后来疫情席卷全球，再后来母亲病倒，老挝之旅就此搁浅。母亲走后，父亲越来越沉默不语，唯独在提到老挝的时候，他会提起精神来说话。中老铁路开通后，他多次在地图上仔细安排从上海去万象的路线，说，现在我可以坐火车去了，顺便一路玩玩。

我说，老挝疫情一直没有间断过，现在已经与病毒共存，你这个年纪去太危险了。他说，那个老挝人去年中风瘫痪，最近死掉了。我说，那就不要再想去老挝的事了。他说，他死之前把建医院的事交给了一个朋友，我们联系过了。我答应了为他们建医院，以后还是要去的。

这事听上去越来越玄了，我和哥哥都不能确信它是否存在，但我们也不能说它不是件真事。父亲的确是极其优秀的医院创业和管理专家，在他当院长的十一年中，华山医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以全市最高分被评为三级甲等医院；老挝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导派父亲去那里投资建医院也没有不自然的地方。父亲坚持说，老挝的医院一定会建的。

我想起弗吉尼亚·伍尔芙在《奥兰多》中的一段话，大意是：幻想对于灵魂就像大气层对于地球。如果没有了那层温柔的空气，万物将失去生灵与色彩，大地将变成一片灰烬，滚烫的鹅卵石将灼焦我们的脚底。实话说，到那时我们就完蛋了。生命是一场梦，我们将死于梦醒。谁剥夺了我们的梦，就剥夺了我们的生命。

也许老挝之梦对于父亲就像大气层对于生命。谁知道呢？说不定真的有一天，他会带着我和哥哥坐上中老列车，去那里陡峭的高山、狭窄的河谷、茂密的森林中探险；真的有一天，他将完成国家领导交给他的任务，为老挝建造出一个最现代化的医院。也许“我们是谁”这个问题的核心，就包含在我们所有的梦想和那些一厢情愿的神奇念头里，毕竟我们最强烈的渴望和恐惧都源于和坐落其中。梦想比现实中发生的事更真实地谱写了我们的传记。

父亲每天下午把自己关在卧房里四五个小时，有时更长，天黑了也不出来。他在里面想什么，干什么？我无法知道，只能想象他是在与悲伤对话。悲伤说，陈星荣，你不可能像爱张安中那样爱任何人了。父亲说，是这样的。悲伤说，也没有人会像她那样爱你了。父亲说，是不会有了。悲伤说，你再也听不到她唱《当我们年轻的时候》了。父亲跪下来，说，我投降，你饶了我吧……

琼·狄迪恩在女儿和丈夫相继死去之后写了《奇想之年》一书，她说悲伤像风暴中的浪涛，打得你膝盖发软，眼睛昏黑。也许在一波巨浪平息下来的间隙，他去打印了那张母亲的照片，放到钱夹里。走出卧房时，他是个刚从海啸中幸存下来的人。

年轻人也许可以从失去中找到意义，在治愈中得到成长，他们的面前还有着很长的路和其他的爱。对于九十一岁的父亲，失去相濡以沫近七十年的老伴，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令人绝望的事。从母亲确诊到十个月后去世，从她去世到今天，父亲到底有过多少幸福的时刻使他如此顽强地生活？当他从折磨中得到喘息的时候吗？好

比漫长黑夜后黎明的曙光，好比严冬过后万物复苏的景象。

好比七十年前，在前景最无望的那天，他得到了母亲爱的誓言。

“肃反运动”中，父亲和几个好友被打成“胡风反革命小集团”，揪出来在全校批斗。

因为共青团领导知道父母在恋爱，母亲被点名在大会上揭发父亲。众目睽睽下她浑身发抖脸煞白地站起来，只说了一句话，他们都是好人。

“……那时我和陈星荣好，但关系尚未明确，想等两年再说。我见他坐在角落里写着什么，就走过去问他。他轻声说：写交代。我问：交代什么？他放下笔说：他们要我回忆出所有干过的坏事、丑事，并交代当时的思想活动，不论事件大小，再小的也不许遗漏。我想安慰他，但所有安慰的话都显得苍白。我们才二十出头，正是人生最灿烂、最有朝气的年龄，进了一流大学，将来成为好医生，治病救人，无上光荣。可现在他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成了阶级敌人，将受到怎样的镇压和发配？这一生的日子将怎样度过？那一刻我就做了决定，跟他说：不要交代了！你放心，不管他们把你打成什么，我只嫁给你！他似乎有些吃惊，接着就哭了。我们抑制不住愈来愈响的哭声，忘记了这是在图书馆。但是周围座位上，坐在磨砂玻璃挡板后面看书的人始终保持肃静，默默地给了我们同情和支持。”

我很难想象父亲大声哭泣，那该是什么样的幸福啊。也许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幸福——它的前提是足够的痛苦。父亲钱夹里的照片，就是那时的母亲。

整理母亲的橱柜时，我发现一个文件夹，上面写着“妹妹资料”，里面是我一九八一年申请出国的文件和信件。其中有一封父亲为我写给有关领导的信，密密麻麻三页纸，写在华山医院的信笺上，一共修改、抄写了四遍。我完全忘记了这回事。我的申请遇到了阻碍，得不到批准。当时父亲在纽约做访问学者，为了我的人生能有更开阔的地平线，他特地提前回国来帮我奔走。信写于一九八一年四月五日，我于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六日飞往纽约。那天父亲说，你今天下午走吧？我睡午觉不去送你了。我说，哦，那我不吵醒你。

留学四年后回家，父亲照例没有去接我，但是我出现在他面前的那一刻，他情不自禁将我一把抱起来。我双脚离地悬在他的怀抱里，片刻，感到惊喜、幸福和莫名的尴尬。那是我成年以后他唯一一次抱我。父亲从没说过，不过我知道他一定是非常想念我的。

又到了离开的日子，我和父亲一起无言地吃早饭，他吃两个鸡蛋白喝一杯西瓜汁，然后吞下每天早上该吃的药和维生素；我吃两个苹果喝一瓶酸奶，再把他给我的维生素吞下去。早饭后他就回到电脑前看脑部核磁共振的图像，母亲的健忘症给他带来很大的刺激，使他对脑部毛细血管走火入魔。我一个人呆坐在那里，不知怎样让他知道我很爱他。我与父亲有太多没说的话。

朋友在微信里建议，“你给他留张条子，回忆些过去难忘的细节，放在他会看见的地方。”

我回，“好的，我试试。”

我没有给他留条子——又一次屈服于惯性，还是天性？

飞机开始升高，窗外渐远的灯火和渐厚的云层仿佛奇妙的海底世界，父亲大红色的泳帽出现在我的脑海，它在水里时而浮起时而沉没，不管池子里人多多少，不管他游到哪个角落，我都能从眼梢看见那团红色。不知父亲有没有留意我的蓝泳帽，感觉到某种心照不宣的亲情？

本文经作者授权转载，首发于《上海文学》2023年第1期。



陈冲

出生于上海，旅美华裔著名电影演员、编剧、导演。从小生长在一个医务工作者家庭，受父母影响，养成爱读书的习惯。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0年入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攻读写作硕士学位。二十多岁开始发表作品。

非虚构图书馆

最好的非虚构写作者和他们所记录的。



图片来自 [Jaume Jovell](#) on Unsplash

非虚构 一生所学，只为此刻

随机波动、罗新 | 非虚构图书馆

我们能看见什么，又能相信什么？

编按：2020 年 2 月，播客“剩余价值”（后改名为“随机波动”）播出了和罗新的访谈。此为文字版，原题《瘟疫、语言和具体的人：与历史学家罗新的聊天》。

2 月 7 日，罗新在微博上写了八个字，“一生所学，只为此刻。”这是一个怎样的此刻？有谁同在感受此刻，铭记此刻？一位历史学家的一生所学可以如何解释或烛亮此刻？站在这一时刻望向过去和未来，我们能看见什么，又能相信什么？

在一场罕见的春雪之后，剩余价值邀请罗新老师一起录制了这样一期节目。我们把“此刻”细细分割剖解，从瘟疫封城聊到语言污染，从战时状态聊到民族主义，从饭圈用语聊到个体叙事，最终我们发现，所有的一切收束于“人”。

我们说人，是说人是最高贵的，哪怕死亡近在咫尺，作为人的内心很多东西是不应该去掉的，否则便不再是人。我们说人，说的是作为权利单元、而非利益单元的人，其基本权利是任何人都不能剥夺、不能破坏的，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得到法律保护的。我们说人，是有别于体制的鲜活的人，是可以通过努力来维护语言、不说谎话、干净坦荡、与人共情的人。我们说人，是没有什么值得表彰的功绩却值得尊重的普通人，他们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体的人，是没有边界的人，无论身在何方、是何民族，跟我们一样的人。我们说人，因为相信人是现代文明的重要基础，每一代人都有自救的努力和途径，是因为希望不从别处来，而正从人身上来。

在这一个多小时的节目中，我们聊的是瘟疫、是历史、是中国，我们聊的也是社会痼疾、是此时此刻、是我们所有人。

01

疫情过后，我们可能会陷入相当长的心理创伤期

剩余价值：疫情期间隔离在家的这段日子里，你的状态如何？

罗新：我跟大家一样，最初阶段就是天天刷微博、刷微信，天天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但是这种疯狂的状况也不可能持续很久，大概过了不到

一个礼拜，我就决心还是强迫自己每天只在很短的时间内看一看，其他时间还是应该看书。到再过一段时间就干脆恢复原来的工作，开始写东西。

我看的书跟自己这一阶段的关注的问题有关，也就是跟疫情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比如我重新读了《瘟疫与人》，同时又读完了去年到处给人推荐自己却没有读完的《不平等社会》——这本书把瘟疫作为了改变不平等社会的人类可能的 4 种方式之一。剩余价值：我们也先后经历了被信息疯狂轰炸，到崩溃、情绪失控，而后是失语，再到现在逐渐趋于平稳的一系列状态。也在这个过程中感到了一种危险，即例外状态的常态化。

罗新：我们现在还处在伤痛的边缘，还没有到最危险最可怕的时刻，但是我们也知道，人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痛。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几个月以后很可能很多人都不再记得今天的情绪和思想，很可能会很快跟过去重新衔接起来。

不过我说的这种情况更接近 2003 年的 SARS 时期，大概这次和 SARS 不一样。不同的原因不仅是因为这一次的病毒似乎打击更强烈、造成的痛苦更大，而且可能跟在 2019 年底之前许多人——特别是知识阶层的、读过一定的书、又在做文化事业的这些人——的心理情况的发展有关。当然我们对失去的生命，对仍然处在痛苦之中的、前途未卜的人们感到伤痛，但大家说的“愤怒”主要不是来自病毒的直接打击，而是病毒间接地帮我们把另外一个世界的另外一面捅开了。从这个层面看，人们在此次疫情之后的心态会与 SARS 之后不同。

也许三五个月之后疫情就会过去，但是历史上人类遭遇如此重大的非战争性、非政治性的伤害——以饥饿和瘟疫为主——之后，通常会陷入相当长时间的心理创伤时期。心理创伤会带来很多变化，在好多地方甚至已经形成了文化性的变化。那么在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里面会怎么样呢？在一个国界已经不那么重要的当下，这也许不只是中国的问题，而是世界性的问题，又会引起什么大的变化呢？就不得而知了。

剩余价值：您比我们年长许多，在您之前的经历里，有过与当下类似的心理创伤的感受吗？

罗新：我有过，但是是政治性创伤，是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精神上比较成熟的时期。二十五六岁的时候经历的伤害很大，那是终身的。但这一次跟那种纯粹的政治上的打击不太一样，这种会更让人觉得，人怎么这么脆弱？社会怎么这么脆弱？

我是读历史的，会读到很多类似的故事，但读书跟自己亲身经历的差别还是很大的。我过去会说，总会有牺牲的，人类的进步总是以牺牲为代价的。现在我就是这个牺牲——如果是我自己也许还不要紧，但如果是我家里人，如果是我儿子，如果是我父母，我能不能接受？我能不能这么坦然地说，让他们牺牲，让历史因此得到进步？这一次我就面对这个问题，因为我的家人现在正面对威胁，他们就在湖北，就在武汉。

02

强调“战时状态”，不仅给公权力也给地痞流氓开放了可能

剩余价值：那么你最早得知武汉封城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受？在现代城市管理中，封城似乎也不是一个会经常出现的决策。

罗新：（在现代社会）是不可能出现的，这是全世界第一例，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例。过去古代发生某种瘟疫，都是在一些很小的聚落，当然都是残酷对待的。我没有具体地学习过欧洲这方面的处理方式，但是近几百年来我们留下的历史记录说，对于在中国发生的（瘟疫），都是把一个村庄围起来焚烧，但里面很多人没有得病，逃出来也都是当即被烧死。

你可以狠着心说，这种方式是为了让瘟疫不流传到更多的地方去。但是对 1000 万人口的城市实行封城，这太不可思议了。1000 万人，相当于三国时代全国的人口，更何况后来事实上形成了封（湖北）省，各个省甚至各个小区也在封。大概全世界能做到（封城）的国家也不多，因为在西方，在民主国家，这是一个法律问题，不是任何一个行政长官能够决定的。

我们现在听很多人大谈“战时状态”，但随便一个行政官员就能够宣布“战时状态”吗？这必须是要经过最高立法机构决定的。封城或者诸如此类的极端措施带来的伤害，一定会比病毒本身还要大。

剩余价值：我们就从封城这个话题过渡到这次疫情中暴露出来的语言危机。“战时状态”“战疫”等话语充斥，我们在一些媒体上也见到了“生产一线也是战役前线”“早日

打赢这场硬仗”“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这类说法。一个公共卫生危机事件被提到战争状态，军事化用语激增，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罗新：军事术语侵入日常生活语言的情况，当然由来已久，这恐怕是 20 世纪的特点。另外也和中国在民族国家建设的过程当中，始终处在对内对外的战争状态有关。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无论是国民革命还是后来的共产主义革命，军事所占的比重都非常高，对军事文化的崇拜也变得非常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军事语言，而军事语言的侵入对整个文化的伤害或者影响是很大的。

如果我们觉得应该改变我们的文化的话，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从自我做起，少说这种军事性语言。我们有足够的语言和足够的词汇来表达我们的思想，用不着使用这些斩钉截铁的、非此即彼的排他性的军事语言。至于体制如何使用这些语言，它有自己的惯性，很难改变，但是作为普通人应该这种自觉意识。过去我们没有这种自觉意识。我在好几个场合说过这个话题，但是没有人有反应。可这次反应特别强烈，所以这可能是一个机会，让人们意识到这种语言的空洞和危害。

当你强调这是“战时状态”的时候，事实上不仅是给最高的公权力开放了极大的可能，也给那些地痞流氓开放了一种可能。我们这两天看微博上微信上传播的那些小视频，有人把在家里打麻将的人都赶出去游街。起码的法律都被破坏了，基本的人权都给毁灭了。为什么？因为在“战时状态”。因为我们在“战时状态”，我们就什么都可以做，所以使用这种语言的危害性是极大的。

剩余价值：包括“毫不留情”（absolutely without mercy）这种说法，我们小时候其实也经常会听到。哪怕是针对吐痰这种不文明行为，在标语上都显示为毫不留情地、坚决彻底地铲除。

罗新：坚决彻底，毫不留情，这些都是荒唐至极的词汇。他们就相信自己能做得到，为什么？因为他们完全忽略了人性，因为他们觉得人性在这时候可以做出牺牲。我封城、封闭小区，让大家都自觉地在家待着，什么时候你让我出去我就出去——如果人真的是那样的人，倒也可以这么做。但人不是那种动物，人跟别的东西不一样。他们理想状态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思维——这是最理性的解决方案。我认为最有效的对抗病毒的方式就是隔离，这是医学，这是科学上的说法。既然如此，我们何不采取最有效的、最大程度的隔离，但是他们不知道，最理性的办法是不可能在人间实现的。

人不是纯粹理性的动物，人是理性和感性共存的动物，是很复杂的动物，这就是为什么计划经济是不可能成功的。不是因为计划经济背后没有科学道理，而是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人类，不是数字。如果我们随随便便就容忍几千万人为了一个更大的目的做出牺牲，我们还做人干什么？我认为，人这个东西是最高贵的，哪怕死亡降到我面前，我内心很多东西是不应该去掉的；如果把那部分去掉了，我就不再是人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能不能够为了一大部分人牺牲一小部分人，以及这种牺牲背后是否有科学道理，都是很可疑的。

03

现在的共产主义是打着共产主义旗帜的民族主义

剩余价值：除了军事化用语，我们也观察到了大一统民族主义话语的盛行。《人民日报》关于洛杉矶侨胞捐赠物资的报道里提到，侨胞捐了物资之后没有留名字，只留下 4 个字：“中华儿女”。还有一些标题说，我们抗疫的组织体现了“中国速度”。作为一位始终关注和研究民族主义的历史学者，你怎么看这些现象？

罗新：这次本来不涉及民族主义问题的，因为民族主义话题总是在灾难面前消退，这是全世界的通例。但是这一次民族主义重新冒了出来。一个表现是这次的日本捐赠。日本的捐赠物资附上了一些我们也许读过但日常生活中不熟悉的诗句，同时这些诗句又那么应景，所以大家都很感动。

这种感动之下有对日本的好感、对日本的文化高以及心态好的表扬，这个时候民族主义就消退下去了。过了一段时间，有人开始追踪这些话，想知道日本人是怎么知道这些诗句的。在发现有些诗句是在日本的华裔留学生写的之后，有人马上就亢奋起来，说：“你看，这些并不是日本人写的，日本人怎么会知道这个？”好像因为是中国人写的，我们的颜面一下就回来了。从中可以看出，这些民族主义者前一段时间觉得自己受伤了，现在必须把伤口舔一舔，于是抓住了这个机会。

剩余价值：最近有很多人把此次疫情事件跟切尔诺贝尔相提并论。有一条微博说，

最后挽救了苏联人民、让切尔诺贝尔被重视和得到认真处理的，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有可能会毁掉整个欧洲，苏联是不能付出毁掉整个欧洲的代价的。于是在这种重大危机面前，其实是国际主义救了本国的人民。而在中国当前这个情况下，连国际主义都没有。不仅如此，中国作为一个所谓的大国的影响力，似乎体现在如何能够影响一个国际组织帮它一起撒谎。

罗新：所以我觉得民族主义在这里面还是一个挺重要的面相。中国现在的共产主义已经和经典共产主义有很大的不同，你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但我们说它其实是打着共产主义旗帜的民族主义。因为共产主义的本质是国际主义，强调的就是大家都一样，大家都是一回事。《共产党宣言》里说的最清楚，“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国际主义很难搞民族主义，很难认为自己是最好的、是最独特的、是优先的。在这一点上，我对苏联的情况不了解、不熟悉，但是我想至少在苏联的意识形态结构里国际主义占的比重是很高的——不管他在实际决策的时候国际主义占多大比例，至少在意识形态里面，在口号里面占比很高，可是现在在中国，国际主义没有了。即使在实际行为当中还看到大规模援助贫穷国家、非洲国家，但这些不一定是出于共产主义的需要，而出于其他考量。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很多代中国人的内心深处都缺乏对其他国家的人的那种平等的、尊重的、感同身受的博爱。

近代中国其实一直都有博爱的说法，我们现在一点都没有。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绝对的爱，爱都是有阶级性的——在 1949 年之后，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些。博爱两个字被污名化了，被完全破坏了，自然也就谈不上真正的国际主义了。

在我们的文化、法律体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里，人不是一个有权利的东西，人是一个利益的单元。所以在这个时候，当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受到威胁的时候，当然要做出保卫利益的本能反应。但是必须要教育，必须要让我们所有人都意识到自己有基本的权利。这些基本权利是任何人都不能拿走，不能破坏的，是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得到法律保护的。

04

“集中力量办大事”意味着所有功能的停摆

剩余价值：从 2017 年年末开始，权利被拿走被破坏的情况一再发生。从自己的住所被破门而入，到因无法回到出租屋而被驱逐，我们好像一直都处于一个被剥夺的状态，包括我们的言论自由、我们的居所、我们的安全，即便是看病，也是有关系有特权就有床位。很多我们所信奉的东西完全失效了，在这种不安全感的驱使下，最后的结论就是我要买自己的房，我要买自己的车，我要变成有特权的人。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这也是为什么李文亮去世让大家的情绪达到了一个高点，就是你始终是一个被剥夺的人，然后现在有一个被剥夺的人作为一个牺牲者，死在了他受剥夺的起点上。那天群情激愤，大家都说我们今后就要做一个说真话的人，如果不能说真话我们就不说，但这样一种美好的良善的愿望能实现吗？当言论自由被剥夺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抗争、怎么去奋斗，去争取我们说真话的权利？

罗新：所以我在微博里说，天亮之前会更冷更黑。也就是说，你以为这个时候你感受到了别人，别人和你一样愤怒，别人和你有一样的情绪，有一样的认识，甚至有一样的决心要改变，但是接下来面临的情况可能会让你很失望。这些人的声音你再也听不到了，这些人的脉搏你再也感受不到，你可能感受到的是来自一个更强大的力量的压制。

很有可能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也许不会是短短的几个月、一年、两年，而是相当长的时间——是更黑暗的，是更糟糕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为什么要写“一生所学、只为此刻”？就是等，在这个时刻你怎么度过？对我们的考验在这里。

剩余价值：从愤怒到真正的行动之间的距离太远了。

罗新：对。在现代世界我们怎么行动？在现代体制下，个人或者没有很多资源的人怎么行动？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想除了争取自己做一个干净的人之外，很难有别的行动。直接的街头政治时代，恐怕已经过去了。连小区的管理都如此网格化、如此极端，一个大的人群做什么行动真的很难了。但是我们这次已经看到，这样的一个体制应付不了任何危机情况，而危机的情况并不来自我们上街去游行。

剩余价值：它可能应对的最好的危机情况，就是大家上街去游行。这个事情也会让我们看到治理里面有很多不均质不平衡的地方。过去我们认为，你的信息对于管理

者来说完全透明的，你买火车票飞机票都有电话号码和身份证号，甚至你上车还有人脸识别。可为什么当一个列车上出现疑似感染者的时候却无法找到他？原因就在于，这些信息是掌握在治安系统里面，而不是掌握在卫生系统里面的。而卫生系统想要调动这些信息要走一个漫长的手续，这个手续甚至长到还没有发一个微博有效。这挺让人绝望的。我们上交这些信息、让渡这些权利，本来是为了有一天能够更好地被服务和被保护。事实上完全相反，当我们需要被保护的时候，这些信息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罗新：系统不是没有用，系统是做单一用途的。这其实就是周雪光教授在访谈里说的，当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的时候，地方反而瘫痪了。他们有那么多资源，却调动不起来。权力只有一条线索，权力本身是集中化的，在这种情况下，上面一根线一收，底下的线全都绷着朝上，横向的东西没有了，而社会真出问题的时候需要横向的力量。

剩余价值：我们国家已经没有社会了，因为它长期抑制社会的成长。所以这次我们就会发现，武汉一开始在那种无政府状态的情况下，志愿者是可以组织起来的，他们其实构成了整个城市物资运送的毛细血管或者通道，但是他们可能受到的阻力恰好是来自政府的，这是一个非常诡异的现象。

罗新：我们社会生活的丰富性总是不容易被充分尊重。越是到现代社会，我们社会的各种功能越是丰富。但是当权力、资源、决策过于单一和集中的时候，当我们说“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时候，就意味着所有功能都要停摆，这是现代社会承受不了的。如果我们是一个小村庄，大家这一天晚上都不吃饭，都来做同一件事，是可以的。但在这么复杂的现代社会里，一旦某些功能停摆，都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当媒体不发达或者媒体被管控的时候，这些伤害是看不到的。比如武汉有那么多透析病人现在不能做透析了，比如一个妈妈带着自己得了白血病的孩子在大桥上哭。这些人的利益全都被牺牲掉了。他们都跟病毒没有关系，他们不是携带者，不是有危害的人。他们应该获得同等的尊重，这是我们人类生活的本质。

剩余价值：李海鹏之前发了一条微博，大概就是说可能疫情结束之后，大家又会称赞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才控制住了疫情。一个举国体制的隐患到最后可能变成了一个举国体制的胜利。

罗新：历史学者认为，在西方，你看到所有的战争、灾难性的革命或者是体制性的崩溃，其后果可能是引起了一波新的历史上升期。比如美国在经济大萧条之后，经济反而有所回升，反而开通了一条向上爬的新道路。但是研究者也发现，在东方不一定是这样，灾难之后可能是更大的灾难，更大的灾难后面还有更大的灾难，引发灾难的那些因素不仅得不到修正，还得到了强化。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人们说，都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我们该不该反思了？要小心，可能没有反思，可能是强化。

05

饭圈话语泛滥、低幼化与资本逻辑

剩余价值：除了军事化用语、民族主义用语之外，我们也注意到了这次疫情当中饭圈用语在社交网络上的弥漫，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雷神山医院的直播。最开始大家可以在央视网上面观看雷神山建医院的一个实况直播，后来就发展成很多人一边看一边发弹幕，给每一个叉车和推土机都起了名字，然后给它们打榜。

有人批判说，工地上分明有真实的人，有真实的劳动者，但没有人去关心他们的权益——他们是不是拿到了工钱，他们有没有被感染——反而去关心叉车。

当时有一条微博被转发了几万次，说的是这种低幼化其实是一个心理学现象。精神分析认为，如果你有一个比较强势的、专断的、自恋的父母，你的小孩就容易变得低幼化，因为父母一直不想让他长大，一直要巩固对这个孩子的控制权。在这次疫情期间，一些人会把新冠病毒称为“阿冠”，或是把武汉称作“小笨蛋”，把一切疫情的事实用一种给小孩子讲故事的方式和口吻讲出来。

一方面，这确实是一个低幼化的问题，因为这类话语的本质是把一些可能有潜在伤害的、有危险的东西无害化；另一方面，它背后粉丝打榜的逻辑其实还是一个资本的逻辑，是很长时间资本所驯化的一种非常简单的情感模式——我喜欢你，支持你，给你打钱。这个模式可能是更强大的一个动因。罗新老师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罗新：没听说过。

剩余价值：这种语言背后的逻辑是非常可怕，它事实上就是把国家实体化为一个偶像，

然后让本来应该是国家主人的人民，变成了国家的粉丝，这是一种非常糟糕的叙述方式。而且这样的叙事也不限于孩子之间，它是一种成人之间的低幼化交流模式。这种低幼化的形式又更容易招募一些年轻的群体，这也可能关联到我们刚才聊的语言现象——军事用语其实是一种简单粗暴的语言，饭圈用语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简单粗暴。它可能看上去更萌、更无害，但传达出来的是很绝对的、很简单的，甚至是抽离了最核心的思想和最重要的东西的这样一种话语。一旦这样的话语被习得，就可能会改造你的思想、影响你的行动。

通过和年轻群体接触——比如在微博上看到他们的留言——我也会发现，在中国成长的小孩从小到大接触社会接触太少了，基本上成长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面，所以很多时候对社会的理解真的是来源于一种意识形态教育，而不是真的在社会上生活过，然后从他的经历当中学习到了这些。很多时候你没有办法否认这是一种天真，但是一种被利用的天真，是被国家征用和收编的。其实在这件事情上，国家又很机智。罗新：这样的机构都知道找什么样的人，比如说希特勒就知道不能找大学生，不能找大学教授，这些都是应该被排除在外面的。他要找什么人？找中学生。一般都找初中生，十二三岁、十四五岁的人是最有希望的，所以冲锋队培养未来的领袖都是从这个年龄开始培养。

06

每一代人都很了不起，都会有办法获得自救

剩余价值：我们的另一个观察是这次疫情期间个体叙事的崛起以及它的重要性。在这次疫情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层面的叙事的撕扯和张力，一方面是治理术层面的，是国家机器将人口作为整体的一种控制，是牺牲一部分人去保全另外一部分人，是夺走一部分人的生命来保护另外一部分人这样的叙事。但另一方面，我们在社交网络上，在微博肺炎求助者超话里面，甚至在豆瓣、在朋友圈都可以看到个体的呼号和呐喊，个体家庭的支离破碎。这样的叙事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并且这个叙事在李文亮去世那天晚上达到了一个制高点。这是一个情绪的高潮，大家看到，像他这样的一个普通人，因为说了真话，得到了这样的一个下场。我们每天看到的是数字，是转化“存量”、新增病例和治愈人数，已经有一点接近麻木的状态了。但这样的个体叙事其实让我们保持清醒，不要麻木，让我们知道在肺炎中普通人和个体所付出的代价。

罗新老师之前在微博里面也有说到，“中国古典文明的新生，必在发现或者重新发现个体人。”您在最近几年的研究中也有一个向个体的转向，所以我们也会好奇你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罗新：这当然不是最新的、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在 SARS 期间，在 2008 年汶川地震期间，都可以看到好多非常个体化的、对个体受害者的，以及在灾难当中个体表现的描述。但是没有这次这样密集、这样好，而且不再以表彰、以歌颂为目标，就是要写出人在这个时刻的特质。

这反映了这十几年来一代新的记者、编辑训练自己的结果。他们的写作显然不同于过去的写作者，不同于我这一代人和比我更老的人，现在人的观念已经变了，写作方式已经变了，所以我们看到很多非常棒的、过去可能在中国的文献里从来没有过的、这么多的关于在灾难面前普通受害人个体生命的描述。这些人既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也没有什么大的、值得表彰的功绩，但这样的生命值得被尊重，这是中国文化的新生希望所在。

如果我们都能够做到这样，并且以后还能做到这样，那就不在乎什么独裁者、什么体制了。真正能够改变中国的就是这些东西，只要能够从这一点意义上改变，中国就还是很有希望的。

我们要记住一点，每一代人都在说现在的孩子没救了，在我上学的时候，77 届、78 届的人就说，你看 80 级以后的都是什么人，今后的中国怎么办。到我这一代再看，我跟我儿子一起读书，很多东西他读不懂，他不知道磨盘是什么、碾盘是什么、镰刀是什么，既不知道也没见过。在这种情况下，你往往会觉得，下一代人怎么办？其实没有关系，每一代人都很了不起，他们会有办法获得自救的。人的本性里有自我教育的一面，当然人的本性里有被愚弄的东西，但也有会挣脱谎言的一面。

相信人很重要。而相信人，是现代文明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首先，人不是抽象的人，人都是具体的人。其次，人是没有边界的人，在中国的是人，在另外一个国家的也是人，

跟我们一样的人。人都是一样的，人没有什么大的区别。魔鬼也好，圣人也好，都是人。

注意到这一点很重要。希望从哪里来？就从人身上来。

自古以来有一句名言，有的地方就有希望。就是说，你不要看现在的小孩那么傻，说那样的蠢话，没有关系的，他们将来也会变成跟我们差不多的人。当然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就像他们的父母有责任教育一样；但是他们自己也会有办法的，就像我们小时候也找到了办法自我教育一样。

我们小时候的愚蠢荒谬比现在的小孩要多，文革教育出来的孩子都是那样的人。我上大学的时候，听到国歌和国际歌，激动得眼泪都要流出来，听到“民族”两个字的时候简直激动得不行。所以，他们也会找到自我救赎的道路的，因为我们都是人。

剩余价值：我还有一个追问。2017年你接受“界面文化”采访的时候提到，我们现在总是强调自己跟他人的不同，或者这一代人跟下一代人的不同，但其实你要去发现他们身上相同的点，比如我们一样都是有感情的人、都是有希望的人。那么您觉得共情是可以向上共情的吗？您说的这个人与人的共情，更像是同为被压迫者之间的一个共情，我们能够跟官僚体系内部的人共情，甚至跟极权者共情吗？

罗新：我们学历史的人，学到的都是跟我们不一样的人，都是帝王将相。如果我们将回到历史中，一定都是整天被人删贴、被人封号的悲惨的人，是根本不会被写到史书里的人。史书里边都是体制里面的人——不管是失败的还是成功的。但是你会看到，其实这些人跟我们也差不多，他们也在挣扎当中，在 struggle。

剩余价值：但如果达到了这个程度的博爱，我们还能够从愤怒走到行动吗？

罗新：捍卫人的利益，就是我们最重要的行动。当我们相信人的时候，不是说我们接受人所有的东西，而是说有些东西我们不能够让渡。你封我的号，我就是不高兴，我不能因此变得高兴起来。我的基本权利被侵犯，我就是要反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行动的基础。同时，你要相信别人也都是人，我们不能够因为我的奋斗就解除别人做人的权利。



罗新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系教授，专业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和中国古代民族史。专业代表作《中古北族名号研究》（2009）、《黑毡上的北魏皇帝》（2014），著有旅行文学作品《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2018）和学术随笔《有所不为的反叛者》（2019）。



随机波动

由三位女性媒体人发起的一档泛文化类播客，每周三中午 12:00 更新，新浪微博 @ 随机波动 StochasticVolatility。

非虚构图书馆

最好的非虚构写作者和他们所记录的。



图片来自 [Jimmy Jin on Unsplash](#)

非虚构 孩子们的街道

李海鹏 | 非虚构图书馆

对刚过去的夏天的一段回忆

夏末的一天我家停过一次电，恢复通电的那一刻，我的房子像一艘行将解体的船一样吱嘎作响，电器在各个地方发出苏醒的声音，打印机弓簧齐鸣，轰轰烈烈地运转了一通，吐出了一张白纸。这一刻，恰是对这个夏天的比喻。约瑟夫·海勒的话是另一个。他出生在纽约的科尼岛，成长在常以随意的态度道出可悲真相的 20 世纪，他回忆说，**科尼岛对孩子来说是美丽的，而对成年人来说是丑陋的，在这一点上，它常常是生活本身的写照**。在这秋意在地球上的某个地方像灯光一样被点亮的时刻，要描述刚刚过去的夏天予人的感受，没有比这句话更合适的了。

我不免时时默念这句话。因为这个夏天，我恰好常在孩子们身旁。既然疫情着实严重，幼儿园长期停课，我们邻里之间不得不成立了一个带娃互助小组，于是每周一次，六个孩子会在我家度过一个白天。在别人家里，他们烘焙小陶器，玩乐高，做室内运动。跟着我，他们鼓捣显微镜，学习东北话和性别平等，拍摄父亲节的黑人祝福视频。我们共度了十来个相当欢脱的夏日。

我向来是小孩子的粉丝。别人移情和投射到明星身上的，我移情和投射到小孩身上。我尽量待他们如待成人。而每当傍晚时分，他们兴奋地喊叫着跑向外面的街道，我也回转到现实中，如梦方醒。

这个夏日的丰美繁盛，不可思议，一如既往。暑热炎炎，我发现自己半是冷静舒适，半是跟喝了一杯似的，陶陶兀兀。说有些疯狂、分裂，也无不可。除非，疯狂分裂的是这个世界。我读过的某些句子，触景生情，在耳际砰砰炸响，尤其是在黄昏，看着孩子们奔来跑去、嬉戏不停之时。看着他们，我简直入迷，也许面露忧虑。他们骑自行车，20 时 7 速，狂奔又突然刹停；玩滑板，勇敢地双脚上板；玩轮滑，画葫芦，过桩——这六个，都不到六岁，让我不由得大为钦佩——永远满头大汗。就连最小的那个，3 岁半的邻家女孩，也在疾速狂奔的单板车上故作漫不经心地瞟向我，暗自得意。我不得不每天赞美她几十句——我很乐意。世界在冒烟，像受伤的船。而孩子们永不疲倦，跳跳杆的笃笃声持续到夜阑人静。他们，像我曾说过的，像法拉利。他们铮亮。而我，身为耆老，如一块锈迹。我像他们这么大是什么时候？昨天。岁月是种天灾。在 4 月末幼儿园停课之初，孩子们的新自行车还嫌大，到 7 月初复课，

他们中的三个已经掉了两颗乳牙。

他们都有牙盒，以为自己的牙价值连城。我小时候，牙都扔到屋顶上。如今的屋顶对牙而言太高了。

初夏干旱，我吃樱桃和草莓。天气庄严又温柔，仿佛 1982 年某天，鼓乐队里的某个跟屁虫，为了炫耀，在放学路上吹响了军号。在我日渐苍老的心里仍有一个青少年不时追问：你可曾见过如此美好的夏日？随即情势陡转，天色如漆，雷雨阵阵，蔷薇一次次被打下黄弱的小叶子。生死更迭，不事稍停。**何草不黄，何日不行**。天空似河水翻涌。小区居民曾被指令进行两次共 6 天的集体核酸，在干旱时期。人们排着长队，拉开安全距离，是烈日的炙烤和众人的沉默，让画面显得空旷。孩子们也对着棉签仰起了小脸——他们的小脸，在彼时彼刻，稍加端详，会让你突然忧虑得喘不过气来。雨歇之际，儿童自行车碾过水洼，抛出道道晶亮的弧线。

排队的队伍里，自然，多数人比我年轻。对于一个滞留着班里最小的孩子的记忆的人来说，殊可异哉。

如今的阳光让人耳鸣。一切都是亮闪闪的。屏幕在夜里也夺人眼目。不过，在我的眼底依旧留有一间古早年代的书房的残影，一张两头沉的写字桌，一种发霉的色调，一个裸露的灯泡，像桔汁在滴下。窗外的树叶瑟瑟抖动，可见安宁只是偶得。在这荒诞的残影中有着真实的事物。

回顾往昔，不无遗憾——这一点，恐怕代代皆然。**直到垂垂老矣，我仍会悔恨于青春岁月中那些虚掷的夜晚**。这是叶芝的话。年轻时我记住了它，又没有记住，如今则像一只笨熊，站在溪流中央，徒然想逮住每一只跃出水面的鲑鱼——书——咔嚓咔嚓吞下。我的确不停地买书和不停地看。生命是彻底不够用的，而我又携带着将要消亡的某些东西。这种幻觉，让人紧张。

六月，弹窗让我吃了一惊：眼药水？眼药水。于是我拜访了居委会，填了表格。如今我已天下皆知——起初是在医院，扫健康码和行程码之后，还要填表，它们因此了解了我的各种信息，再后来——传染的是什么——任何一家饭店都了解了。

我的十个手指，已经不够数自己见识过的新世界。在这个夏天，我又目睹了它几乎每天都刷新版本。也许你还记得上海的那些影像。医用防护服，闪着耀眼的白色，配有浅蓝色线，化为一片景观的潮水。我记得轮检——用的不是这个词——划区，记得食品配送、“团长”、封门闭户，还有人群合唱。也记得“我们是最后一代，谢谢”。还有一个经历着精神眩晕的街道领导的喊叫，“你是我的臣民！”在那种前因暧昧而后果锋利的抓马气氛中，老克勒们依旧骄矜，下楼做核酸，要穿三件套。奇幻感，一波接续一波。我盯着手机。似乎我喝茫了，或者我是一只乌鸦，透过锁孔窥视着这一切。又也许，你不记得了。**没有残渣残留，就像一颗玉米不加消化地通过一只鸟的体内**。来自于乔治·奥威尔。现实依旧密不透风。一切神奇又枯燥，新鲜而老。雨日，樱桃树是雨的银行。晴日，像集束炸弹坠下，壳斗迸裂，橡子滚落一地。我不免思忖自己是否已疯。我冲冷水澡，审慎思虑。确有一个可疑之处，就是这新世界对我有利，我却甚欣喜。

五年前，我感觉到了某种气候变化。到了算账的时候了。而一旦回到书房，我立刻就躺在沙发上，倍感舒适。没关系，这就是开始。当自己的处境不算顺利时，我并不期望外部世界而非具体的别人，会更顺利。细节地，我不期望小区的车库里塞满新的奔驰大 G——来自邻里的成功指针的压力；宏观地，我不期望经济活动的电钻继续火星四溅——显然那将助长市侩的贪婪无度和无知者的傲慢自大，带来更多网络时代的破玩意，更多的反文化。一己之私令我期望自己赚不到什么钱，别人也赚不到。我总是天遂人愿，于今亦然。风口的飞猪侠们砰砰落进了冰缝。奔驰大 G 们不曾到来。时代的变幻，恰好吻合了我这个魔法师的隐秘又黑暗的欲念。

可是我不甚欣喜。因为我忧心忡忡，感到一个**对孩子来说是美丽的世界，像薄脆的玻璃，令人担忧；而对成年人来说是丑陋的世界，像——什么都不像，除了现实——**令人只想掩鼻而过。

* * *

我已经很久不曾想起《永别了，武器》的开头了。即便对我来说它也过时了。**夜里我们看得见炮火的闪光**——什么人会忽略这个句子？对 20 世纪的男孩们来说，这种美和经验，令人心潮涌动。当然，还有，**那年深夏，我们住在村子里的一幢房子里，望得见与我们隔着河流和平原的群山。河床里有鹅卵石和大圆石头，在阳光下又干又白，河水清澈，河流湍急，深处一泓蓝色。部队打房子边走上大路，激起尘土，**

洒在树叶上，连树干上也积满了尘埃。那年树叶落得早。

暑热之中，保守派控制的美国最高法院，以天父降临式的风格，反对堕胎，又威胁到新闻业的准则。特朗普撒下的毒丸。文明世界就像一个小孩看着 mm 豆在手上融化。一位生活在美的女性朋友，一个极其聪明的人，在朋友圈里引用了昆德拉用过的小故事。移民官问一个人，要移民去哪儿，给了他一个地球仪，让他选择。那个人查看了之后，问，“你还有没有别的地球仪？”

昆德拉 93 岁了。我读了一本他的传记，内容几乎没有。存在主义的遗珠，依然存在。太棒了。一位上海的朋友，新闻业的遗民，55 岁，则在六月底死于心肌梗塞。他的追思会，我没有参加，也许颇有声势，以至于我看到一位知识分子嘲讽地说，新闻界的人，大势已去，还在自以为是。我没有引用原句。再直白没有的势利眼，如今也被允许了。让新闻业的消亡成为事实的，不是它的消亡，而是没有任何替代物。互联网曾许诺了先进的替代品，但只是在承诺它一窍不通的东西而已。这一切，甚少激起谴责。人们更喜欢谴责失败的家伙们还相信自我价值。

在孩子们处于林间的“秘密基地”，被蚊子咬，就像被一柱柱香火抵住皮肤。这个夏天我可能被咬了两千个蚊子包。孩子们被给予一项特权，在我的蚊子包上按指甲印。“那你为什么总穿短裤？”一个孩子问我。“因为这是夏天啊，”我以及时行乐主义者的口吻回答，“不是每天都是夏天。”

被叮咬的火烧火燎，恰似网络给人的感受。在微博上，我躲在角落，甚至感到蚊子大，我小。我看到的是身份政治，是排斥异己，是猪巫，是流行化的全景监察与精神洗澡。在一种热衷于整人的气氛中，流量号的蚊子们，一旦发现人味儿，便吹响喇叭，小透明们——子孓们——闻声而动，结成规模惊人的团块，前去噬咬。这一切，再迟钝的人，恐怕也感觉似曾相识。这是对孤独危机的回应，我尽量理解。是竞争口径的收窄和堵塞，导致人性尖叫。是红绿灯导致撞车。也是社交媒体，助力于沉渣泛起，让电子人，一些憎恨人性的比特，挥动词语大棒，相互复制。依照社达规则，这一片野蛮怪诞之中，必定孕育着某种我理解不了的伟大事物。

我不禁又惊又喜——在某个方面。在早期互联网时代，我曾很擅长骂人，享受扮演坏男孩的乐趣。“随便吧，”如今，我已改邪归正，不过我的每条微博都可以翻译成同一个短句，“白痴们。”

乌克兰在打仗，世界再次变得男性化了，醉酒的那种。时隔 799 年之后，唐努乌梁海人和布里亚特人再次西征，在我外祖父的蒙古族祖先们曾征伐过的那个区域——速不台在那里以欺诈和虐杀，给俄罗斯注入了蒙古基因。由此，我了解了 M777，精确的榴弹炮。海马斯。针刺。标枪。我对武器兴致寥寥。我回想起大学军训时 56 式半自动步枪击发之后回膛的感觉：没有感觉。也许手枪击发会是性感体验。手枪的冲击力作用于手。手，是一个感官，而肩膀不是。

对于男性气概，我向来不太感冒。可是说我没有男性气概，我又不乐意。这种分裂，非我一人独有，或可说，见诸于 20 世纪我喜欢的每一本书中。《永别了，武器》正是其中之一。在很久以前，海明威的关于远方炮火的句子，由此注入我的意识，改变了我看生活与历史的方式。

在这个夏天，炮火的闪光，的确映射在我的虹膜上。温压弹的恐怖白光，在乌克兰，在地球曲面之下，火山爆发般升起，又像珠链般落下。历史摘下领带，穿上军靴，走出证券交易所，回到了炮兵阵地。还有别的闪光。穿着闪亮白色防护服的人群像酸奶部队四处流溢。看不见的东西在焚烧的闪光。钱。人性。电焊的光。将来，这将被记忆为一个焊铁门的夏天。金属被烧灼的滋刺声，一如皮肤在起泡。在历史深处我则看到烧庄稼，烧宫房。在美国南方，又有人从福克纳小说里走出来，烧马棚。我看了《燃烧》，一部韩国电影。我再一次看了《出租车司机》，朱迪·福斯特租用的那个房间里烛影憧憧，像个庙。如果说有什么是这部 1976 年的电影中有而现在的电影中没有的，那就是胆色。入夏时我还写了一个关于火的短篇故事。

有一晚，我去了延庆看星星。我蹲下来，给我的小孩指出我记得的那几个星座。仰头观望时，她无限信赖地抱着我的胳膊。那些遥远而微渺的星火，幽深沉静，一如四十年前。其中仍有无法破译的真理。跟四十年前一样，我仍想知道，在那深不可测的星空当中，有没有谁能看见我。

* * *

在夏日里最美的一天，小鸡们来到了我家，宛如四位公主，窸窸窣窣，窃窃私语。我用蒸熟的小米喂它们，赞美它们是最棒的——令小区里同时团购来的同类们相形

见绌——而它们干的全部事情就是拉屎。当它们长出硬羽，看上去真不协调，身体娇小柔软，翅膀却巨大挺括——扛着翅膀踱步的样子，就像罗锅背着肩膀——似乎仍抱有狂野的飞行梦。我吹捧它们貌似天使。

然后流浪猫吃掉了它们中的每一只。流浪猫吃掉了小区里所有的小鸡。它们还捞鱼。自然，也捕鸟。

一小滴悲伤，在我心里绷紧，又被一阵滑稽的笑震颤出波纹。为什么我越来越多地在悲剧的边缘隐隐发笑？因为只要重复得足够多，任何东西都会产生喜剧效果。小鸡常在猫的利齿下，一如历史常在英雄的利剑下。**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预先地被谅解了，一切也就可笑地被允许了。**

在夜里，我则有种相当奇怪的感觉。类似于有点儿渴。我花了一些时间，才辨认出它是青春期的紧张。

如今，某些时候我的意识流连在 1980 年代沈阳的环路无轨电车上。有些时候，我对于 1980 年代中期九路菜市场的水泥储货仓里卷了边的圆白菜和闪亮的紫茄子，怀着相当荒谬的感情。我几乎难以自控地要写关于 1980 年代沈阳生活的小说，问题是，那时是什么样子，我不记得了。何况那根本不是好主意。现在，只有最不精明的人才会写现实主义小说，从每个角度说都是如此。而那种感觉，也不是怀旧。它是一种恍然若真的置身于过去之感。它到底从何而来？

于是我意识到，我这一代人的生活是对称的。青春期时紧张不安，成年后信心十足，如今再次紧张不安。正是这第二阵紧张感，在潜意识里，在某些出神的时刻，把我带回了早年所在的世界。

夏夜里，多年前的沈阳又浮现在枕边。你可以想象无数个泰特美术馆。无穷无尽的蒸汽朋克。真的蒸汽，四处喷涌。我见识过那个世界。我在北京，不过 20 年而已。在那之前，我另有认同与情感。20 年前，因为一桩集体辞职事件造成的空缺，我才有机会得到南方周末的工作。当时的辞职者中，就有前文提及的去世的前记者。在他们辞职的理由中，有一句是，“我们是雅典的公民，但现在是斯巴达的臣民。”我从来没有接近过这种表达方式，却颇能理解。无论你批评它自负又不切实际，或者赞赏其吐属不凡，它都是那个时代特有的声音。在“宇宙的尽头是编制”的今天回想这些，我感到的是一份天真、一份苍老和一份岁月蹉跎的永恒。

无力匹配其翅膀的禽类。在釜忘沸的游鱼。猝死的前记者。在小区街道上扮演超级英雄的小孩们。生活是被逐出天堂的过程。当然，生活更关乎被逐出天堂之后如何孤独地走完接下来的路。

夏日的时光列车巡回在当下史中，经过一站站的“静默管理”之地。而我回想和审辩的，是经济奇迹曾让我们这一代男性中的多数人都有用处。如今我已能明白，被需要就等于受宠。我们因此所获颇丰——对比更早和更晚的男人。更不用说对比女性。回顾往昔，男性是一个阶级，是伴随着一定剂量的罪恶感的事实——不足以令人胃疼，但令人不安。曾经各式人等都分得一杯羹。我曾习惯于每做一次变动，换工作，搬家，交往新的女士，都感觉像穿过一道有光的魔法门，到访更奇妙的世界。我们享有和平、开放、繁荣、娱乐、开化的风气、便利的旅行、高性价比的服务业，以及我们认为志业的：一点自由，一滴进步。在那重重混乱中有着分明的秩序——浩浩汤汤的潮流。然而，**死亡并不要求我们有一天的空闲时间**。塞缪尔·贝克特。凡事皆有一死。我不是最该感到遗憾的。我可能已是史上离开天堂走廊的最老的男人了。

偶尔，我会以一种过时的认真，探询人们了解真实的世界的能力，是否已经一去不返。答案是不。不比是更糟。真实被看见了，又被否认了。有一群社会演员，永远拍年轻人马屁以把汤勺伸向最深的碗，我读到了其中之一的说辞：如今的年轻人读书少，思辨弱，但是有一种能力在发展，就是虚拟能力更强。虚拟能力更强？如果我从中读到了讥诮的味道，恐怕不是他的本意。

这个夏天还发生了什么？埃隆·马斯克在生孩子。普通人类在枯萎，而当代成吉思汗大生特生。

知了白天叫，蟋蟀晚上叫。**七月在野，八月在宇**。每个傍晚都在一种永恒不朽的周而复始中慢慢转暗。树莓季节到了，果实累累，堪称灾难。有一天，我读到吴宓日记里的一句，“欲望尽绝，淡泊无营”。我自忖，是否自己也重蹈覆辙，准备拒绝现实世界？不。其一我不配，其二我不能。保持活泼，保持欲望，保持有用，非此不可。当我的小孩飞奔过来，跳进我的怀里，一个巨大的事实是：我是一个父亲。这曾是不可想象的。而如今，我的热血可以为之流淌在石头上。

终于，幼儿园要开园了。我喜欢那家幼儿园，老师们对待孩子们彬彬有礼，要求孩

子们做游戏也要认真。你会感激这样的机构再次运转——事到如今。未来世界会如何？会飘着冷却的灰烬，还是被玻璃壳之类的玩意覆盖？或者，更简单，把孩子们变傻？如今你如何还能预知未来？

开园前两天的傍晚，在小区内部街道上，发生了一桩小小的冲突事件。我小孩和她的两个小闺蜜，气势汹汹，冲着对面的三个孩子又喊又叫。对面的是乔乔和一对姐弟。“嘿！”我提醒她说，“放轻松，乔乔是你的朋友。”可她摆出义不容情的架势，叉着腰，仰起下巴——是我曾告诉她，被人挑衅时要抬起下巴。可现在，看上去是她在挑衅别人？我不喜欢这个场景。在这个夏天，孩子们飞速长大，已经懂得了拉帮结派。我几乎能看到她像只小动物一样肌肉紧绷。

这时一位邻居解释，孩子们只是在玩游戏。我松弛下来。可那种淡淡的危险的味道，余味犹存。

还记得霍尔顿·考菲尔德的计划吗？**我老是想象一大群小孩儿在一大块麦田里玩一种游戏……我会站在一道破悬崖边上。我要做的，就是抓住每个跑向悬崖的孩子……他们跑起来不看方向，我得从哪儿过来抓住他们。**J.D.塞林格，1951。你可曾想过现实生活中的霍尔顿是什么样子？你以为的霍尔顿，反戴鸭舌帽；真实的霍尔顿，两鬓飞霜。假设在夏日傍晚，在孩子们无尽嬉戏的街道，在错愕与醒悟的时刻，有人已经不太记得这段话，只是感觉到了它——它化作一团模糊却强烈的意识，陡然翻涌，那么换做一个神经质的人，也许会突然热泪盈眶。



李海鹏

曾在《南方周末》《人物》《时尚先生》等媒体工作，写作者。

非虚构图书馆

最好的非虚构写作者和他们所记录的。



电影《被抹去的男孩》(2018)剧照

非虚构 一位儿童精神科医生的 门诊日常

李荣荣 | 田野中国

我们在社会新闻里看到的每个悲剧，
是多年制度和社会文化施加于具体的人的伤痕。

01

一号难求

暑期的一天清晨，C市Y医院精神科门诊区的走廊上挤满了患者和家属，其中大部分人拥堵在了儿科诊室的门口。此时不到8点，该诊室的医生王瑜还没来，她的两个研究生正站在诊室门口登记加号患者的信息。8点一到，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出现在了人群身后，眼尖的人立马围过去“王主任，给我们加个号吧，我们来一趟不容易”。王主任，我们上个星期就没挂上号，这个星期又没挂上号，给我们加个号吧”。其他人听到声音也赶紧转身，一边让出通道好让医生进屋，一边也焦急地恳请医生加号。

C市是D省的省会，Y医院是当地最知名的三甲医院。2015年，Y医院精神科的“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特色门诊”开诊，其治疗范围包括多动症、抽动症、孤独症、智力发育迟缓、精神分裂、情绪障碍、睡眠障碍、进食障碍，以及行为问题、学习问题、适应问题及亲子关系问题等等。开诊至今，越来越多的家长带着他们的孩子来此寻求专业帮助，精神科住院病房甚至出现了以儿童青少年为主的情形。

2020年，首都医科大学崔永华教授等研究者以6-16岁的少年儿童为对象进行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存在情绪及行为问题的人数比例高达17.6%，且这一比例在过去三十年来呈上升趋势。2022年，《柳叶刀·精神病学》在线发表的一篇文章再次指出，中国6-15岁少年儿童中存在抑郁症状者的比例达17.2%。

不过，儿童精神医学领域的医疗资源非常有限。根据《柳叶刀·精神病学》发表的一篇文章所统计，我国儿童精神科医生不足500人。儿童青少年本身未完全发育、症状不稳定、表达不清楚等等，各种因素都增加了诊断的复杂程度。擅长成人精神障碍治疗的医生即便经验丰富，也不一定能针对儿童青少年的问题给出恰当诊断。

由于医生有限，Y医院精神科儿科门诊目前仅有一位专副主任医生王瑜。王瑜每周出一天半门诊，其中一天为普通专家门诊，人多的时候得看上百位就诊者；另外半

天为特需门诊，一般情况下也得看八到十位就诊者。科里另有两位兼看成人与儿童的主治医生，抢不到王瑜的号时，家长们也会找这两位医生，但更多的时候哪怕是得赶在医生上班前去诊室外排队等着加号，他们还是会想尽办法挂上王瑜的专家号。

02

厌学和自伤——

家长心里过不去的两道坎

教育在中国社会向来是充满焦虑的场域。在人类学者关宜馨的民族志 *Love's Uncertainty: The Politics and Ethics of Child Rearing in Contemporary China* 和许晶的民族志《培养好孩子：道德与儿童发展》中可以看到，儿童青少年置身于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之中，其家庭很可能面临着在培养有道德的、幸福的人，与培养有竞争力的、成功的人之间选择的两难困境。有时候，现实过于残酷，家长的天平不得不向竞争倾斜。当天平太过倾斜时，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也许就会出现了，而精神科门诊恰是发现这些后果的场所之一。

临床时间久了，王瑜总能从缠绕着不同生活脉络的精神疾痛中归纳出某些相似性。例如，相当一部分家长意识不到孩子情绪出现了问题，直到孩说什么也不愿意去学校，或是看到孩子用刀片割伤自己时，才骤然发觉需要去医院了。

王瑜曾回忆起2003年她读研究生时的一个片段：一位德国心理治疗师给她们上儿童心理课。课堂上，这位德国治疗师说起了自己的观察：中国父母与德国父母相当不同。德国父母会因为一个五岁的孩子遗尿来精神科咨询，但中国父母不会这样，他们会一直忍着，也许直到孩子青春期还在遗尿才会考虑带孩子去就诊。但是，中国父母绝对会因为孩子不愿意上学来看病。当时，王瑜还是一名没有临床经验的硕士研究生，德国老师的话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她没有任何直观感受。多年后，她自己成为一名儿童精神科医生，那位老师说过的话一下子又冒了出来。去不去学校、愿不愿意学习，的确是很多家长判断是否要带孩子到精神科寻求治疗的主要依据。我在门诊的观察也印证了她的观点。

周一至周五是王瑜的门诊时间。一般情况下，她需要从早上八点看到下午六点。遇到假期人多的时候，晚上八、九点结束门诊也是常有的事。挂号人数多，分配给每位就诊者的时间自然有限，家长们很难完整描述孩子的行为或是自己的困惑，更别说讲述这背后复杂的生活脉络了。但在这有限的时间里，家长们说的最多的就是孩子学习成绩下降、学习没动力、厌学甚至休学在家。

某周一，先后有八十多个孩子在父母的陪伴下前来寻求帮助，其中约半数家长或孩子提到了学习压力。在家长的描述中，有的孩子要不就是每次考试就腹泻，要不就是一走进学校肚子就疼。还有的孩子既不去上学，也不与家长交流，除了吃饭基本不出自己房间门，“成天躺在床上不愿意动，洗个脸都是懒懒的”。也有的孩子遇到学习困难就划手自伤，“天呐，太可怕了，手臂上密密麻麻的伤疤，就像划在我心上”。周三上午是特需门诊。特需门诊挂号费高，挂号人数相对较少。某天特需门诊来了十位就诊者，提到学习成绩下降、学习压力大、不愿意或无法去学校上学的就有七人，其中四人有自伤行为。

一个孩子成绩优异考取了重点高中，但入学不久后排名开始下降，焦虑抑郁的情绪随即出现。然而，越焦虑排名越下降，排名越下降焦虑越严重，最终只能休学在家。家长暂时回避时，孩子和王瑜抱怨，父母虽然嘴上说不给压力，但他们无微不至的关心，还有在亲戚朋友面前时时以自己为傲的做法无一不让她感到压力重重。

另外一个孩子小学中低年级时成绩不错，高年级之后成绩开始下降，脾气也变得冲动暴躁起来，初中开学不久就不愿意去学校。父母没办法，只得将他从重点中学转到普通中学，但他依然情绪低落，甚至一遇到学习困难就用刀片在手臂上划口子。还有一个孩子成绩下降后出现情绪问题，但父母并不理解她的抑郁情绪。母亲指责她玩手机引起成绩下降，父亲嘲讽她矫情、考不上高中，最终导致她情绪崩溃出现自杀行为。

有时候，遇到家长或孩子诉说心情低落、烦躁违抗、不愿意去学校等情况时，王瑜会让就诊者把袖子卷起来查看，这样的时候她经常会看到孩子胳膊或手腕上留下了密密麻麻的划痕。除了用刀割皮肤外，也有孩子会采取拔头发、击打坚硬物体、将物体嵌入到皮肤中等方式来自伤。王瑜说，精神医学称这种故意伤害自己身体但没有自杀意图的行为为非自杀性自伤。不管采取什么方式，孩子们这么做的目的—

般都是为了分散注意力以逃避无法忍受的情绪或感受。至于他们为何反复出现自伤行为，则是因为这种伤口不深的自我伤害会在体内产生内啡肽，而内啡肽往往又会导致自伤者上瘾，以致胳膊上旧的疤痕还未消除新的疤痕又已出现。

王瑜和她的同事曾在 D 省某个有较多留守儿童的县做过相关调查，发现在 10–18 岁的学生中，约 40% 曾经有过自伤行为，其中 18% 有过重复性自伤行为。由于自伤比率高，王瑜曾在“好心情”平台上给家长们讲授相关知识。通过她的科普讲座，家长们会了解到，进行建设性沟通，关注自伤背后的情感，而不仅仅是自伤行为本身，更有可能帮助孩子走出自伤。

03

器质性因素与社会性因素——

医生眼中导致情绪与行为障碍的两种可能因素

从家长的角度讲，厌学、自伤往往是他们带孩子来看精神科医生的主要原因。从医生的角度讲，厌学、自伤则是少年儿童出现情绪和行为障碍的常见表现。在这些因为厌学、自伤来就诊的孩子中，有人被诊断为了我们时常听说的抑郁障碍、焦虑障碍，也有人被诊断为了我们较少听说的“通常起病于童年与少年期的行为与情绪障碍”。

目前，国内精神科的诊断标准受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编定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与世界卫生组织编定的《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第十版）（ICD-10）影响。虽然前者没有“通常起病于童年与少年期的行为与情绪障碍”这一分类，但后者则将其视为一个大的诊断分类。在临床中，该诊断往往用于表现出精神医学所说的情绪障碍、品行障碍、对立违抗障碍、注意缺陷 / 多动障碍等不同精神和行为障碍，或者日常语言所说的行为问题、学习问题、亲子关系问题等的儿童青少年。该诊断虽然宽泛甚至模糊，但却抓住了相当一部分就诊孩子的特征。其实，在儿童精神科医生看来，儿童青少年处于身心快速发育的阶段，有的问题是青春期成长发育的阶段性问题，有的问题则可划入精神障碍的范畴，还有的问题牵涉精神医学所说的“共病”。边界的划分在此不容易，诊断也会相应发生变化。“通常起病于童年与少年期的行为与情绪障碍”看似泛泛而谈，实际上有利于医生继续观察与调整治疗方案。

当儿童精神科医生多年，王瑜总结了导致儿童青少年出现情绪与行为障碍的两大类常见因素。

一类是个体器质性因素相对明显。比如说，智力发育迟滞或注意缺陷 / 多动障碍，就是精神科医生眼中引起儿童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障碍的器质性因素。在精神医学看来，智力发育迟滞属于神经发育障碍；注意缺陷 / 多动障碍也属于神经发育障碍，虽然其病因和发病机制尚未确定，但主流精神医学推测是多巴胺能神经传递出现了某种问题。在医生看来，患有智力发育迟滞或注意缺陷 / 多动障碍的孩子通常会因为跟不上同龄人或是扰乱课堂秩序而经常被老师和家长批评，随后有可能出现厌学、对立违抗等行为，发展到最后需要到精神科寻求专业帮助。

另一类则与家庭生活、父母教育、人际关系、学校氛围、社会要求等社会性因素有关，或者说致病的社会 – 心理因素相对明显。例如，社会的整体教育环境过度“鸡娃”、父母要求过高，成长过程中父母因各种原因缺席，青春期谈恋爱遭到父母严厉制止，父母离异、亲人离世、家庭骤变故，突然遭遇个人不幸事件等等，都有可能诱发孩子出现情绪和行为障碍。事实上，很多孩子出现问题往往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王瑜见过不少孩子，小学时各方面表现都很好，青春期突然遭遇家庭变故，如家庭经济困境与父母离异相继出现，而此时学习难度不断增加，成绩越来越差，种种问题如滚雪球般的袭来，情绪难免出现了问题。

当然，具体到每个个体，王瑜很难精确锁定具体致病因素。更多的时候，王瑜只能认为个体同时受到了生物 – 社会 – 心理三重因素的影响。

04

一个“共病”情绪障碍与多动症的个案

——医生诊疗过程初探

相比难以精确锚定的致病途径或病因，王瑜在进行诊断以及考虑药物治疗时，更关注的是可观察的症状或行为。事实上，精神医学至今并未确定精神障碍的各种生化异常指标，诊断过程中也没有验血、核磁共振之类客观检查指标来加以辅助。因此，医生更多是从观察症状（包括情感症状和躯体症状）入手，同时通过询问行为与情

绪表现来进行综合判断。此外，在观察与询问的基础上，医生还需借助各种心理测评量表来评估就诊者的精神状态。看似简单、流程化的观察、询问以及量表测评其实相当依赖医生的临床经验。

以某个案为例，在家长的主诉中，上中学的孩子表现出熬夜、焦躁、砸物品、歇斯底里、成绩下降、情绪低落、害怕上学、与父母关系不佳等诸多问题。这时，医生的临床经验往往体现为从日常语言描述中辨识核心症状，以及当“共病”存在时决定治疗的先后顺序上。

凭经验直觉，王瑜推测孩子出现了抑郁、焦虑问题，于是让他完成相关测评量表。与此同时，在她的诊断经验里，有一部分孩子并未遭遇任何家庭变故，但他们在青春期突然出现了抑郁、厌学等表现，而这有可能与其幼时便患有但被忽略了的注意缺陷 / 多动障碍（ADHD）有关。于是，王瑜进一步追问孩子学业表现，得知他在小学中低年级时成绩不错，但时有上课不专心，写作业磨蹭等问题，高年级尤其是上中学之后成绩开始不断下降，随后对学习的抗拒心理日益明显。这时，王瑜开始怀疑孩子可能患有注意缺陷 / 多动障碍，于是让家长和教师（由家长通过手机转发）完成相关测评量表。

接下来，当各种量表显示这孩子的确患有中重度抑郁障碍与注意缺陷 / 多动障碍，并且在排除了其他器质性及情绪问题后，王瑜就要决定抑郁与注意缺陷 / 多动障碍的治疗顺序。因为该个案当下最严重的是情绪问题，因此需要先服用抗抑郁药物，同时辅以心理治疗，待调整好情绪问题后再服用改善多动症的药物。

最后就是药物的选择了。国内目前批准用于儿童青少年的一线抗抑郁药为氟西汀，改善注意缺陷 / 多动障碍症状的一线药物为盐酸哌甲酯和托莫西汀。此外，舍曲林、氟伏沙明目前被批准用于儿童青少年的强迫症治疗，但这两种药物用于成人时既可抗强迫，也可抗抑郁，故王瑜有时也会考虑用来治疗儿童青少年的抑郁障碍。此时，具体如何用药，如何考虑不同药物之间的相互反应、如何降低药物的副作用等等，都要求她结合神经生物学、药理学知识与这个孩子的临床症状来综合考虑。例如，有的药物起效慢、代谢时间长，有的药物起效快、代谢时间短，药物特性与现实需求结合好方能获得最佳疗效。又如，有的药物会让服药者体重增长，有的药物又会让服药者体重下降，如果能恰当的配合使用，就可以抵消彼此的副作用。当然，若不是王瑜耐心讲给我听，这种发生在医生脑子里的复杂考量，远非作为外行的我所能轻易观察到。

精神科有各种各样的量表被用来评估就诊者的精神状态，在这个“共病”个案的诊断中，王瑜就用到了不少。事实上，标准化的诊断量表提高了诊断信度，使得相同症状在不同医生那里都能得到相同诊断。但诊断的复杂在于，单纯依靠量表并不能得出恰当诊断。原因很多，例如标准化的量表并不能反映具体症状的来龙去脉，而在理想的诊疗环境中，不了解具体症状的来龙去脉，医生就不能轻易下诊断。又如不同的精神障碍有时会有相似的症状与行为表现，于是，选择使用哪些量表、如何解读量表都需要医生的经验判断。因此，经验娴熟的医生会尽可能提高观察与询问在诊断过程中的比重，以便尽量了解症状出现的生活脉络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可靠诊断。

然而，也正是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儿童精神科门诊的某种现实困境——医疗资源极度稀缺，门诊人数不断剧增，这必然导致医生分配给每位就诊者的时间有限。相应的，症状背后的社会脉络与生活世界难以成为临床医生的关注重点。

05

凝视症状与聆听疾痛：

儿童精神科门诊的现实困境

精神医学史学者爱德华·肖特在其著作《精神病学史：从收容院到百忧解》中指出，精神病学一直在两种有关精神疾病的见解之间做着痛苦抉择。其中一种见解强调患者生命的心理社会面向，将症状归因于社会问题或往昔适应不良的个人压力。另一种见解则强调神经科学，对大脑化学、大脑解剖和药物治疗感兴趣，将精神性痛苦的根源看作大脑皮质的生物学问题。精神医学在当代的发展正是伴随着这两种见解的此消彼长。随着新型抗精神病药物、抗抑郁药物的出现，以及分子遗传学和神经影像学技术在精神病学中的运用，当代精神医学进入了奉生物医学模式为主臬、以药物为主要治疗方式的时代。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中期，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谭亚·鲁尔曼曾在多家医院进行长期田野调查，对精神医学内的这种典范转移以及影响该转移的管理式照

护和医疗保险政策作了深入讨论，并出版了民族志《两种心灵：一个人类学家对精神医学的观察》。在民族志里，鲁尔曼提到了一个细节：诊室里，一位曾打算深耕精神动力取向心理治疗，后又转向生物医学模式的医生正在与一位患者交谈。这位患者本想向医生好好倾诉一番母亲何以是自己生病的根源，但医生却对此丝毫不感兴趣，他只想知道新药如何在患者身上发挥作用：“这个病人告诉她灵魂的历史，而他则透过这些话听到了她大脑的样貌和平衡状态”。

当代中国精神医学领域，药疗化的生物医学模式在相当程度上亦是主流。与此同时，由于缺少客观上可测量的病理特征，精神科医生尤其关注就诊者主观上感受到的诸多不适与内心体验。有经验的医生深知，单纯依靠诊断手册得出诊断并予以药物治疗未必能帮助就诊者完全走出情绪阴影。换句话说，深思熟虑的诊疗不仅要关注症状，更要关注人与生活。不过，现实的遗憾也会时不时地显露出来：普通门诊条件有限，医生有时不得不选择“见病不见人”的方式，将用药物来缓解症状作为当下的主要追求目标。

Y 医院精神科儿少门诊大概十平米的房间里，放着一张桌子和三、四把椅子，不大的桌子把屋子分成了两个空间，靠窗方向坐着王瑜和她的一位研究生助手。王瑜负责观察、询问、决定就诊者做什么检查和测评以及最终下诊断，助手则对着电脑打印各种单据。靠门方向的椅子留给了就诊者及其家属。诊室门口则站着另外两位研究生助手，由她们负责维持秩序，以及加号、引领初诊者完成各种测评量表等工作。一天从早到晚得看七、八十甚至一百多个号，王瑜并无时间聆听太多细节，一旦抓住症状线索，她就得打断仍想表达的就诊者。时不时地，还会有尚未等到叫号但却焦急不堪的家长挤进来询问。有限的时间与嘈杂的诊室，难以支撑起一个让每位就诊者都能充分叙说其疾痛故事的空间。最后，脉络各异的精神疾痛等来了写有舍曲林、氟西汀、托莫西汀、阿立哌唑、盐酸哌甲酯等精神科药物的一纸药方，以及请家长保管好药物、坚持足剂量足疗程治疗、依序减药再停药的用药叮嘱。当然，医生在给儿童青少年用药时非常谨慎，并不会给症状较轻的孩子开药物处方。另外，正如前面提到那样，医生脑子里的综合考量是作为外行的我观察不到的，就诊者缺少充分叙述其疾痛故事的空间不表示医生的诊断与用药是随意的。

时间稍微不那么紧张时，王瑜会开导家长因材施教，理解青春期孩子的特殊感受，与当下无比“鸡血”的社会气氛保持距离，又或者会请家长暂时离开诊室以便单独和孩子交谈。很多时候，她没法与各个孩子详谈，只能通过多次复诊来不断增进对他们的理解，或是让情况复杂的孩子挂特需门诊。总之，在有限的条件下，医生只能用药物来回应症状。药物对于缓解症状无疑是有效的，尤其是在各种情绪问题的急性发作期，药物很有可能阻止了情绪恶化乃至更严重的后果出现。然而，药物疗效有时仅是针对当下的症状而言，加上少年儿童精神发育的特殊性，很多孩子还需要药物之外的心理治疗。

只有在时间相对充裕的特需门诊，症状背后的人与人生才有可能出场。由于每次只挂 6-8 个号，且一般情况不再加号，王瑜分配给每位就诊者的时间可以有半个多小时甚至更多。除了药物治疗之外，她还可以适当做一些心理治疗。一般情况下，在听完家长描述就诊原因后，她会请他们到诊室外等候，由孩子自己来述说其情绪问题。这时，王瑜会慢慢引导孩子将其痛苦与困惑说出来，并一边帮助孩子分析其情绪或行为问题的原因，一边拿着纸笔教导孩子记录情绪管理日记。很多时候，王瑜还会引导就诊孩子发现他们可能感兴趣的事情，鼓励他们进行户外活动，有时甚至还会举自己成长、工作的例子来缓解他们焦虑、紧张、抑郁、对抗等等各种情绪问题。与孩子交谈一会儿之后，王瑜又会请孩子暂时离开诊室，让家长进来单独与他们交流并沟通用药方案及复诊时间。显然，特需门诊为就诊者述说他们的疾痛故事提供了空间。

然而，即便是 300 元的挂号费已经预先排除了大部分就诊者，特需门诊仍然一号难求。

06

医生个人也有力所不及之处

王瑜重视心理治疗与硕士研究生期间导师的研究取向有关。博士毕业入职医院之后，掌握心理治疗方法不再是其所在科室对医生的硬性要求，她主要是在工作之余参加各种培训或医学会议来不断更新知识，然后又通过临床实践来提高治疗技艺。医院和科室有时会给医生转发心理治疗培训相关信息，但一般情况下都是医生个人自愿

选择是否参加培训，并且培训与否也不纳入年终或职称考核。从中可以窥见，在 Y 医院的精神科，生物医学模式才是主流。事实上，药物治疗效果易于量化评估、药物治疗费用相对较低、心理治疗耗时长且结果不确定、社会上心理治疗资源良莠不齐等因素的存在，也让不少医生倾向生物医学的药疗化模式。

从患者支付的角度来讲，目前国内将心理治疗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刚刚开始试点。不难设想，若支付问题没有解决，中低收入阶层患者便极有可能负担不起心理治疗，那么精神医学理论上推崇的联合药物治疗与心理治疗的方法便会面临现实困难。

除了药物治疗与心理治疗外，家庭支持也是儿童青少年走出情绪与行为障碍的关键因素。父母的育儿观念、家庭的经济条件等因素都会非常现实地影响孩子的康复过程。王瑜见过一些孩子，他们的父母一方面与医生积极沟通，另一方面宽容理解孩子的厌学与休学。不仅如此，有的家长还会专门安排时间带孩子外出旅行，支持他们发展兴趣爱好或是选择非主流教育道路。相对说来，有如此条件的孩子会比其他同龄孩子更容易走出情绪困境。但显而易见的是，不是每个家庭都能做到这一点，或是能承担如此选择的后果。

病情反复，乃至出院又住院的孩子并不少见。医生也会有挫败感。

毕竟，没有什么医学治疗可以解决原生家庭的问题，也没有什么医学治疗可以解决社会问题。当精神科医生多年，王瑜深知精神疾痛总与生活及社会环境相缠绕，但很多问题她无能为力。



李荣荣

人类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目前关注人类学伦理道德研究，近期开始围绕精神医学开展田野调查。

田野中国

基于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面向大众实践公共写作，用文字留住日益消减或者瞬间消失的各种现实。



图片来自 [Kin Li](#) on Unsplash

非虚构

午后与金先生聊他和他的网站

伊险峰 | 田野中国

一言难尽的“左”和“右”，
还有当年编辑部里的“政治正确”

(一)

这么说已经是两年半以前了。2020年9月3日下午，去观察者网拜访金先生。

观察者网在上海番禺路一个园区里，老房子，我们爬到三楼，楼梯右手开着门的小房间里，助理模样的人打招呼，推开里间的门，说客人来了。然后把我们领到正对着楼梯的会客室。

会客室的桌子上随意摆着一些纪念物，比如一套显然不大会有人看的书——《任正非采访记》，好几本，翻开来，大字，很多内容以前在网络上流行过，大意是“警惕寒冬”之类，也有一些看起来很内部，同样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冷峻风格。窗户间的墙上挂着的装饰品也颇有来历，一个相框里是一张签名纸，很隆重，能够分辨出李世默、张维为等人的名字；另一处挂着大照片，C位的人我认识，是邓小平，一群人分列左右。

正打量这群人，希望找到几个熟面孔的时候，金先生到了。

“我在这照片上找半天，这也没有你啊！”

“这照片早了，哪有我，这是1987年，张维为的。他那时给老邓做翻译嘛。这是张维为。”金先生指着其中一位年轻人，又点向另外几位，“这是钱其琛，这是李道豫，这是王光亚，还有这几个我叫不出名字来，都是外交部的。”像是突然想起来，为什么这里会出现这张照片，“张维为成立这个中国模式中心，他不喜欢那边（应该是指杨浦五角场的复旦大学），就想在市中心要一个办公室。”也就是这里。

我们有十几年没见过面了，他瘦得惊人，一如既往。我说你瘦了，他说他一百一十斤，大学毕业到现在，没有变过。

我盘算了一下，他是1965年生人，110斤的元年，应该也是在拍这张照片的1987年。一晃三十三年过去了，不变的东西太少了，当然也包括他不断变化的身份。

金先生现在的身份是“观察者网”总编辑。

见到他之前，我和杨樱正在做一个1995年到2005年间出生的人的田野调查。在做《好奇心日报》的后期，我们逐渐发现用户评论里的争执与过往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在这之前，《好奇心日报》做过一些类似于《22岁，他们在想什么》、《这个社会对年轻人太好了吗》之类的专题，了解并探讨年轻人群的观念。与很多人一样，我们注意到相当一部分年轻人，从有记忆起就处于一个上升的、越来越富裕的社会中——称他们为“富裕一代”并不为过；这一代人中的一些人会被称为“小粉红”，包括举报、“出征”、“工业党”、愤怒的爱国者等等一系列现象更常态化地出现在互联网社区里。在2019年——新冠疫情出现之前——如何面对年轻人，成为困扰很多人、尤其是他们的父辈的问题。

我们的田野就是想试着去找一些答案，或者说试图摸索出我们面对的到底是什么。

“跟自由派们聊呢，他们就有失落感，为什么他们以为代表进步、普适的价值观与年轻人的世界有了隔膜。这里也有父子两代人之间的沟通问题，也有阶层流动、社会财富分配、社会提供的机会这样的矛盾在其中，”坐下来，我跟金先生很正式地说明我们此行目的，“这些可能也不是太大的问题，我们会用发展来解决存在问题，用经济学家那种乐观——增量解决存量，来向前看，过去几十年中国似乎也一直是这么做的。但发展总会慢下来的，增量不足的时候，可能各种问题也就跟着出来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群人不了解另一群人，上一代不理解下一代，接下来可能就是社会进一步的撕裂。我们关心的是，社会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观察者网”是专业媒体网站中，政治光谱比较鲜明的一个，在年轻的互联网用户中有知名度和拥趸。所以，我们想了解的是，同样的问题，“观察者网”怎么看，还有，它为什么受欢迎。

“你知道有个纪录片，《通往北京的道路》，被B站一个up主号召举报，下架了。前几天我们跟这个up主聊，他谦虚，说主要是被观察者网的董嘉宁转了，他有力量，推动了一下。他不喜欢你们，但觉得你们的声音大，给他带来巨大的流量。”

金先生不动声色：“如果我想说的话，外面乱七八糟要请我说的多啦，复旦大学传媒学院、中国传媒大学……没有什么好讲的。完全不在一条道上。学校里面也不行，因为我们不熟。你们来，我们是可以聊的喽。很长时间以来，（熟人）在一起是不聊政治的，避免聊……跟伊险峰这样的（人）。”

他把脸转向杨樱，当我不存在，并且粗暴地把我甩到南方系，“南方系这样的人多了，不聊政治。你知道他们要说什么，他们也知道你要说什么。”

“我们主要是跟一些小朋友聊了聊，包括他们的家庭。我们一开始想了解，1995年出生的小朋友，为什么会跟八〇后、八五后这一代反差比较大。杨樱回应金先生的话。关于年龄段的划分，类似于“八〇后”、“九〇后”这种说法——在这个年龄概念刚刚出现被关注的时候，人们往往会放大新一代与过去一代或者几代人之间的差异，好像截然不同破天荒一代横空出世了。但过了几年，随着新一代过了青春期，上了学毕了业入了职员结了婚乃至生了孩子，人们会发现早期那些被放大的差异消失了。但这一次感觉似乎略有不同，一代人的特征会在一个很宽的区间中游移，但毫无疑问有些高亮的点，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他们表现出来的“不一样”的那一部分，未来到底多大程度上会持续下去，是否会成为主流。

杨樱继续说：“现在的小朋友对国家、政府、政治话题有更多兴趣，我们八〇后那时候是没感觉，这些东西离我们生活很远。小朋友会经常谈政治话题，不知道是不是与互联网有关，他们天然就在那里，就跟他们天然对物质的充足理所当然一样。”

比比划划说话间，录音笔不合时宜地发出“哔”的一声。

“你们在录音啊？”金先生抬起头。

“还没开始录呢。一会儿录。”

“现在年轻人在想什么，为什么很多人会感慨跟他们想得不一样，小粉红是怎么回事，九五到〇五年之间出生的人有什么特点，”我接过话头，“观察者网是一个绕不过去的网站。”

“绕不过去了都，嚯嚯。”金先生准确地抓住了这句恭维。

“所以得跟你聊啊！”

“我这些年是很少说话的。我在这个……我做的这个事情……最好不录音。我们所做

的事情，准确地说理解我们的人，太难了。”

“难在哪里？”

(二)

“难在左和右。就是，右边的人说我们左，左边的人说我们右。”

这倒是实情。有现成的例子：干净利落地批判并成功促使全网下架《通往北京的道路》的 up 主“一马当先陈玉成”，虽然受益于观察者网 up 主董嘉宁的影响力，但他在和我们聊天的时候，反复表达自己一点也不喜欢观察者网。理由是，“它是亲资本的”。以“观察者网”的政治面貌和民粹主义风格，它应该远离大资本才对，但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标签叫“李世默”。这位投资银行出身的纯粹意义上的“资本家”，是“观察者网”的投资人以及精神领袖，也是代言人和形象大使，也正因为此，那些纯粹的、眼里不揉一粒砂子、笃信非黑即白的激进年轻人，会觉得这里有一个巨大的 bug。这就是金先生谈及“左边的人说我们右”的一个重要表象：“右边的人说我们左”，这在常规理解范围之内，它们在新闻和新闻事件背后，总是扮演那个喊打喊杀、激进鹰派的角色。

我和金先生的话头就是从“左右”开始的。

“太难说了。开始的时候我还想怎么说明这个问题。后来我觉得不对，今天不能再用‘左’和‘右’。这是工业化时代产生的一种模糊的尺度。互联网时代不一样。传统的‘左’和‘右’是线性的，这边左，那边右，非常粗略的不准确的，一个人的政治立场，不能就这么一点点东西来定义。这是不对的。”

“你看最早的巴黎，极左和极右在一起。看激进和保守大致从方向上就能判断。但今天是互联网时代，一个人有了互联网，观察世界的颗粒越来越细了，观察一个人的坐标不能只是这一条横线来定义。要有 n 个坐标、系数，多维的系数来定义。特朗普这个人就说不清楚，到底是左还是右？一个大资本家出身的人，怎么看起来是左的了？一帮穷人在支持他！”

不过，这看起来不是最让金先生踌躇的事，真正让他释怀的是事儿变得不重要了。“过去的政治光谱无法丈量现在的人群，现在应该有多个标签多个指针。互联网越来越细，精确，现在说左右，年轻人是不理你的。一拿左右说话，（我们的用户）人不待见，他们就觉得你是老的。”

释怀的结果就是可以拿来自嘲：“极左和极右现在是好有共同语言啊。他们都骂我们嘛，可有共同语言了。”

“你最初困惑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因为做观察者网吗？”

“那可早了，”虽然他把我给划归到南方系，但他是货真价实的南方系一员，“首先是国内和国外的左右是不一样的。《纽约时报》是偏左的，自由派的，在我们这里自由派是右的，南方系是右的。南方系和《纽约时报》是要对版面的。”

“对版面”这种说法老派且夸张，如果理解成金先生的幽默自嘲可能也不算离谱。南方系确实代表了一种风格。它通常指《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等《南方日报》集团下的市场化媒体，在 1990 年代至 2010 年代因为新闻理念的探索、报道方式和报道领域的突破赢得广泛受众关注，获得巨大成功。在 2000 年前后从都市报和新闻周报领域扩展到财经、时政、娱乐等领域，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扩张。在报道领域里最成功的扩展是南方系旗下的《21 世纪经济报道》，而跨地域扩张最成功的是北京的《新京报》。金先生当时是《21 世纪经济报道》上海分部的主管——他有自嘲的资历。

“开始是左右无法搞清楚。我们国内的革命史当中，激进的，过头的，政治挂帅的，才叫左。”金先生继续解释。

“确切地说，‘左’只有‘极左’，而且一定要加引号。右是真的右，而且不加引号。”我自认对宣传报道用语规范有很深刻的理解。我附和。

“左么，三十年代，上海有《申报》，有‘自由谈’，老板就会说，左就是发行量。骂就是发行量。当时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特别激烈的时候，《申报·自由谈》一天到晚是鲁迅的文章。民国时代，左就是流量。左翼作家联盟那些人，可有流量了。发行量。”

“现在，互联网上，互联网是通的。国内对左右的评判体系跟国外不一样。你说《大西洋月刊》是偏左一点，自由派一点，在我们这里是说右。”

“什么时候你被人认定是‘左’的了？”

“刚开始就说我左。那时候主流话语，是南方话语，是他们最牛逼的时候，几大门户网站，都是自由精英在那里说话，这是主流。我跟他们说话不一样，说我们左。”

金先生说的“他们”，并不是具体的人，而是他所服务的那个“单位”。某种意义上，他一直都是在跟自己的职场生涯较劲。

这个说来话长。《21 世纪经济报道》的时候，2000 年 10 月份 11 月份他们来找我，上海记者站是我创办起来的，2001 年元旦创刊。

我知道我跟他们有所不同，共同的是我们都要做一些事。那时候我们都在传统媒体，都是想做好新闻，干点新的，那时冲出来一批偏市场化的财经媒体，《21 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后来的《第一财经日报》，其它还有好多外围报纸，《中国经营报》啊，《粤港澳信息日报》啊。

财经报道是当时的爆发点。中国进入 WTO 以后，开放程度一下子提高。财经领域的话语强起来了。需要对市场进行解释，融入或者接轨，人家的轨道到底是什么尺寸的，得有一个说法。先接轨总是经济接轨。

最明显的，沈颖他们也不是想好了怎么走。刚开始我们一样的都差不多，慢慢摸索。市场化一定会带来政治上的自由化，这是苏联的提法。新思维、开放市场，政治上必然要有相应的变化。冷战模式是这么搞赢的。

市场化、私有化这些东西他们也不是处心积虑搞。那时，国际上“历史已经终结”了嘛，福山说了；中国自己也已经宣布市场化。实际上那时候，我觉得，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样，就这么往下走了嘛。大家之前都有体制内媒体束缚的经历。现在宽松了一点，更会觉得这个是方向。

我们跟好多经历这一段历史的各行各业的人聊天，他们也是这种看法，市场化之后相应地在社会、制度上面的变化，似乎有一个盲目而且乐观的共识：不是有无的事，只是早晚的事。苏联解体在前，俄罗斯经济改革的休克疗法也吓到了大家，普遍觉得先把家底搞得扎实一些更稳健。

“但实际上，中国跟其他地方都不一样，根本没有那么快。”金先生讲这段故事时声音一直比较低，透着不那么坚决，这个时候好像突然想起来了一些具体的事，左和右，理念上的冲突慢慢浮上来……

好多细的事情。比如说，新闻理念冲突。那时我自己还写稿子，有一次被毙掉一篇。上海漕河泾引进一个外资项目，从煤到石化产品，与巴斯夫合作的，很大的一个项目，100 多亿美元，谈了好久。我一直跟着这个项目，谈成了。谈的过程还挺辛苦。唉，写出来，编辑部不用。

我说为什么不用。他说不是新闻。我说为什么不是新闻。他说没“出事”啊……这不是新闻。

他们的理念是要么是突破性的，比如第一家与外资合作的电信企业，当时我们的头版头条，第一家美国电信企业，这个行。它代表方向性。100 多亿美元，（听起来数很大，）不能算。你打开《21》看，全部是各种冲突，出事的，让你焦虑的新闻。那时《21》还是周报，他觉得这是日报做的。我把他写成故事。他说不是。

这就是一个冲突。对我来说是一个新闻。编辑部那里，就是西方式的：政府搞成这样一件事情，很正常。我说这个有价值啊，住在本地的——我是上海本地的哈——这项目来了，是不是有污染，孩子是不是可以在这里工作，还有银行什么的。他们觉得不行。如果出事了算，比如没谈成，可以的——中国和巴斯夫之间，酝酿好久，谈了很多，最后崩掉了，怎么崩掉的，这是新闻。

金先生认为广州编辑部不懂新闻，不懂上海。他资历老，把编辑部主任叫到上海来辩论，“教育围攻他”，没有什么结果，“他就是不发啊，稿子扣在那里。他是编辑部主任，他不排上，沈颖看不到啊。”

理念的冲突很快被发展所淹没，又是用到“增量解决存量”这一法宝的时候了。“21 世纪报系”这时在沈颖主持下有了雏形，上海成了布局重镇，与《书城》杂志合作出版、《良友》杂志开始筹备、一家以“影响力至上”为宗旨的新型都市主流大报也开始酝酿。“与出版社合作《书城》，这些都是我去谈的。20 年前了，国有的出版社，你要说服他（把刊号）让出来给我们办十年。把原来的编辑挪掉。沈颖是总编辑，我是常务副总编辑。这个应该嘛，我在这里主政上海嘛，这些都是我要弄的，找房子，这些都要弄。这是我谈下来的。”

我最早注意到金先生的名字就是在《书城》上，《书城》那时想做中国的《纽约客》，

从版式到栏目配置，气势不凡，志存高远。

但是，“增量”发展得过于迅速，沈颢布局中与上海文新报业集团合作的主流大报《东方早报》很快就在 SARS 阴云中筹备。《新民晚报》前资深记者金先生，既熟悉南方系风格、又有上海媒体业运筹能力——双方都认可的角色不多，金先生迅速参与其中。我是在这个时候认识他的。

筹备过程当中“21 世纪报系”的其他几家报纸频频触雷，引起管理部门警觉，上海业务几近退出，只是沈颢当时搭建的团队有一部分留了下来，这其中也包括金先生。理念冲突还在继续。他讲他的人生。

我跟他们意识不一样。编辑部里都是外地来的新上海人。我就比较接地气。而且知道政府是怎么运作的。

我大场镇来的，考到复旦新闻系，我是骑自行车上学的。很近嘛。我到现在小学同学，中学同学还来往，亲戚各种在上海有很多。我市区里亲戚也有很多，我户口是在威海路的。看这个城市跟他们不一样的。

《东方早报》里没有人跟我想的一样。我工作之后在《新民晚报》，前 15 年是跑政法的。政法是非常真实的，我骑个自行车在大街小巷，什么样的坏人都见过，什么样的好人我都采访过。我做过狱警。还被弄到外面看过犯人。我去采访死刑犯人啊，监狱里面，接触各种法庭。听无数案子。各种律师。我《新民晚报》的记者，他要借我来扬名。“法律广场”（栏目）是我开的，我自己可以写评论的。政法涉及到最高层的，法庭上人们各种，律师检察官法院，我门清。

他们不知道。一个人大学里出来，进入到像“东早”这种单位……司法系统现在与媒体关系已经变了，现在他防着你的。我们当时是一伙的，政府把我们当自己人。党的喉舌。我刚工作的时候……参与过高等法院的判决书的书写。热门的案子，社会高度关注，不得了。把我叫去一起写，写疑难判决书都会请我去的。

现在防得厉害，那时候高度信任你。你在党报嘛。然后你就知道政府是怎么运作的，特别是政法机关。无数的法庭，公安司法，你知道权力是怎么运作的。

后来我看报纸写的东西，我说不对，不是你写的那个样子。

比如说拆迁。我们的编辑部的记者，他有个非常先入为主的印象，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被拆迁的人一定是弱势，政府一定是强势。但在上海，至少我看到的，那他妈的，我跟那些编辑说，老百姓算计得不知道多精，你以为他弱势，你以为他需要帮助，你以为他受欺负，你以为他鸟事不懂，需要你点化他们，怎么跟政府去搞。你们根本不懂，老百姓是怎么跟政府算计的。

你不能先入为主啊，有的时候是弱势的。但很多情况下，不是这样的。政府妥协得他妈的像孙子一样的，就为了拆掉他……包括上访户，我高中同学，区里边信访办，日子过得跟孙子一样。那么你以刻板印象来说，公权力是坏的，一定会欺负老百姓，老百姓私权力一定会被侵犯的。这种刻板印象按你政治正确的写法，口袋里就这几把解剖刀，可以解剖所有事情。

实际情况不是这样，你要实事求是。就是说在信访的事情上，它确实有欺负人的地方，但倒过来的也有，不讲理的人和事。搞得非要无理争出三分理来，这种事也有很多，政府也很头疼，为此要给他们几个人付出的司法成本、行政成本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倍。作天作地，那种人多得很。编辑部里的小孩子是不了解这些东西的。

“不多说了，”大约是得到了一个可以总结陈词的段落，又觉得还没有说尽兴，金先生把批判的语气改为语重心长，“我是说，要在采访第一线，你要跟不同的人接触。我是跑政法的，政法的最真实，跑上海的大街小巷，我跟一般的新闻人不一样。外地小地方、农村小县城里考到名牌大学，然后在一一线城市里做（新闻），根就拔掉了。他们过得都是不真实的生活。家门出去到校门，校门出去到政府工作岗位。大学里也没有什么太多交流，学校里也不一样，没有什么社会拷打。而在里面，像这些进了上海上大学的人，除了认识一个房东之外不认识什么人。房价又很高，愤怒得不得了。他们不分析自己的历史，不去分析自己的来历的。像我小学中学同学，他们一路上都怎么变化，我的邻居如何改变，我都是看得到的。对生活的理解，很真实。”我们一直听着。肯定可以说点什么，但最终决定什么也不说。

“这些报纸的总编辑也一样。他们形成一种质疑公权力的政治正确，《东方早报》、《21 世纪经济报道》都一样，一定是政治正确。编辑部里的政治正确。”这是真正的总结陈词，“这我是不同意的。这些年轻的大学生、高材生，他们掌握了话语权。”

你可能没有留意金先生叙述往事的时间锚点。那是 2000 年代初，准确的时间是 2003 年，《东方早报》创刊。

七年后，金先生争夺话语权的机会来了。随之而来的，差不多可以说是一个时代。

（三）

跟很多同行一样，金先生目睹了这个行业几乎一夜之间在移动互联网面前的溃败。报刊亭不见了，那里可能被围成一个地铁工地；广告客户说起了流量和 KOL，还有“转化”，这些东西当然可以替换成传统媒体所擅长的发行量和“影响力”之类的词，但是，“量化”、“量化”、可以见得到的“量化”，而不是摸不着边际顺嘴就说的没边没沿的数字。传统媒体还没学会怎么在“量化”上找到优化数字投机取巧的办法，自己就被淘汰了。2011 年的时候，金先生开始打新的媒体的主意。一是在《东方早报》做八年了，时间久了总是应该动一动；二是有一天周末值班，一篇稿子引起高层震怒，他受了处分，处于停职状态。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发行量。“报纸肯定不行了，东早发行量也有限，它是文人圈子报纸，不是大众报纸。大众报纸我干过，《新民晚报》发行量 180 万。上海这么大一个城市，人口增加这么多，你发行量才十万左右，不就是一个圈子报纸吗？这不是我想要的东西。”

那时候金先生被安排了一个闲职：管网站——下半夜两点左右把当天报纸内容放到网上。没有人看，还不如报纸。地域性的报纸还有十来万读者，网站面对整个互联网世界，每天点击也就三四万，到了六万，这就最多了。

接下来的经历，金先生跟当年所有苦闷的媒体从业者一样，完全懵掉。“挂报纸上的内容不行，想办法自己做点，跟领导要了十几个人，怎么也没用。”石沉大海。懵过之后，是有点紧张——这也跟所有人的心路历程差不多。“报纸若干年后就没了，你的网站也会没的。那你干什么？你的行业你的工作不都完蛋了吗？行业结束了对不对？这个问题我想，我不考虑谁来考虑呢。我想不出办法来。我都干一辈子新闻了。”然后再想，更深刻。“我是干什么的？”天问一样。

那时互联网已经很热闹了。门户网站颐指气使的派头还在，“门户网站火，没有我们什么事。那些人也不是媒体人。我们把内容弄过去，编排一下，卖钱。我们是做严肃新闻的。”

不光金先生在这里问天问地满脑子哲思，懵掉的领导也一样。那时官方也组织大家更多去学习。金先生那时还跑到加拿大去考察。

“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定势肯定是，如果我们遇到了什么问题，那就去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答案肯定在那边！”金先生抚今追昔，“一般都是，但这一次互联网这个事情，不一样。中国老百姓更爱手机，说我们沉浸度也好，渗透度也好，都比美国厉害多了。我们手机里 app 那么多。他们的媒体还是传统媒体。他们的危机感很小。他们新媒体也有，但与传统媒体是两回事，不一样的事情。”

与此同时，大 V 已经在微博上陆续出现了，不得了，而且特别不得了的是他们还在机上。

那时节，大家想的无非就是这几种情况：

一、手机报。金先生认为这东西搞不出名堂来的。

二、报纸上的内容一定得有一个在网站上存在的理由。这东西一定有需求，网上总得有人做东西。金先生认可。

再往下，金先生的东方早报网站经验稍微发挥了一点作用。

一、要做一个媒体，没有纸媒基础的东西。

二、报纸编辑部是没有前途的，编辑部做不出新媒体。

2011 年，金先生当然还不会说“自媒体”的概念。原来的肯定不行。“所以，必须离开。”

“也不敢马上动手。离开媒体以后你在网上做报纸是非法的，非法搞屁啊？如果你跟体制内的做得一模一样，多余。如果你要做得不一样，两个问题：你凭什么？你要说什么？文本方面的东西你能解决，后来我写的东西真是互联网上流量很大的文章咧。”

金先生认为自己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流量很大”的文章。“写法跟报纸不一样，同样的思想，同样的故事，就是文本不一样，文风不一样。”

他认为这是“凭什么”的一个很重要因素。第二个就难了，“你要说什么”，实际上是立场和价值观的问题。同样一件事，你要表达的是什么。事隔多年以后，我们能看到“观察者网”在不断地用它们自己的方式来说一些大家习惯看到的新闻，与自由派

报纸不一样，与官方媒体也不完全一样。金先生说这是“政治问题”，他在“动手”之前一定要想清楚：你要做得不一样。

回顾金先生的创业资产，你得把他让人感觉纷乱的职场生涯放在一边，仔细看来其实也就两个，你要说三个也行：

一、大众媒体的经验，以及，再做一个大众媒体的执念；

二、他的价值观。

金先生“不敢马上动手”，他的迂回策略里还包括了与一家杂志的合作，做网站之前就先要合作起来了。“操作很复杂，要解决很多问题。你在互联网上做整天讨论政治问题的网站，无缘无故做肯定不行的。”

你得承认金先生的谨慎是必要的，“观察者网”持续至今，除了大家都知道的政治站位，还有这个杂志为它提供的资质。

“那时候有钱了吗？”我问。

“钱的问题，从来没有人问过这些，也从来没有说过这个事。观察者网硬做出来。但从来没有说过。”金先生说的“硬做出来”，指的是钱一直不那么充裕。金先生的故事与其他那些传统媒体里跑出来的内容生产商也没有太大差别，想好做什么，讲一个故事，做花哨或者朴实的 PPT，然后跟一个一个的风投见面，抱怨投资经理们的短视和“听不懂”，回答他们最愚蠢的问题，比如：

问：按你这么说，如果腾讯要是也做的话，你怎么办？

答：腾讯就是有两亿块钱也做不出来。

投资人继续半信半疑，终于有两个人愿意试一试。一个是后来众所周知的李世默，另一个投资人，金先生不肯说，只说金融危机一来，就“完蛋”了。

李世默是金先生的老相识，比金小三岁，在《21 世纪经济报道》之前他们就认识，那时候李世默还没发财。金先生找到他的时候，“他也看不出这东西有什么前途”，而且，“这是一个非法产业，你得有牌照的嘛”。半信半疑，给了不少的钱，“连天使都算不上”，开始孵化这个项目。

“我一开始就胡来。没有自采，找帮东早做网站的那家技术公司。让他过来，帮我做一个很简单的网站。用了别的网的模版，花了几万块钱。”金先生带了四五个人，年轻人，开始创业了。

创业就在我去的那幢老房子里。一对德国夫妇手中退租一楼两楼，金先生接下；三四楼属于另外一个公司，后来变成“观察者网”的会客厅，以及金先生的个人办公室。装修一开始就简单，他不讲究。这地方，金先生待了十年，并且还会继续待下去。

到目前为止，金先生与传统的媒体出身的互联网从业者相差无几。我们问他是不是担心“观察者网”办不起来。他说也有这种担忧，但对它的价值取向、政治光谱和立场没有太多担忧。而且做的过程当中，他说这个网站也教会了他一些东西——比如对互联网的认识。

这可能是金先生的一个人生分野——不仅仅是职业分野——即他意识到，原来“知识分子的互联网”和“普通人的互联网”是两个东西。

互联网是个什么东西？怎么走？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都是模糊的。操作起来以后，刚开始以后，要怎么做，不仅改标题，各种改，搞得越来越少。看看也满好，看着他们做，一点点调整嘛。影响越来越大。相互促进的一个结果。然后是微信微博，这样说吧，普通人加入互联网以后就变了，本来是知识分子、读书人在玩。2011 年前后大 V 牛逼啊，沸反盈天。薛蛮子之类的。那时候普通人还没进来，都是知识分子。一旦普通人进来，小孩进来了，就把他们推翻了。

把一个不真实的世界推翻了。因为这些人，薛蛮子，脑子里那些东西，观念，是虚假的，不真实的，所以它经不起互联网的拷打。互联网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真实。所以为什么，不是匿名的原因，不是所有人都说话的原因，你任何一个成为热帖，有无数人给你校正。你要存在下去，就要经过互联网的审查。

就像这次人民日报，找牛人推荐书。马东啊，高晓松啊，推荐书。他都不知道为什么被骂死。拷打就是这个。他们是不真实的，他们几个牛人，央媒，就是傻瓜，因为他们代表互联网上的牛人，让他们去讲。扯淡。这个问题我在观察网内部讲为什么。

没有人讲得清为什么。跟何冰老师的“后浪”为什么会被骂一回事。

“我喜欢互联网。”在说起年轻人推翻了互联网的既有秩序之后，金先生感慨起来了。

“你能预见到会遇上这些小孩吗？”

“当然不能，意外。”

“你能看出王骁的潜能吗？”王骁是观察者网视频内容的主播，当时在 B 站上火爆。

“看不出来他有这么大能量。王骁 2016 年就来了。这个与平台有关，它很重要。抖音和 B 站两个平台不一样。B 站是一个圈，约束，同学一样的。快手抖音，没文化，真正的大众。它也是一个了不起的存在。我不是说它不好。”

“他们怎么来的？”

“王骁是自己来的。我挖不到人。王来的时候什么也不是。我们培养起来的。”

“怎么培养？”

“就我一个大人，其它都是小孩子。”

“他们做 up 主，每天更新，你给他们压力？”

“他们自己的积极性高。有钱，”他压低了声音，“挣到钱分给他啊，奖励多啊，绩效还很灵活的。他们几个人的收入，个人工资，他在 B 站上有投他的广告，我要给他一定比例。他好多钱。一个人今年就……”金先生不肯说了。“他 90 后，还小。”

“你的工作时间怎么安排？”

“开会。很多群，效率高。我下面有一批人。十年了。所以现在可以跟你们聊这么长时间。十年了。最大的八九年。网站是 2012 年正式变成这个样子。之前是共识网那样。中层流动很少。我下面有一个平的三十个人。三十个人下面是正常员工。”

“小朋友会直接来找你吗？”

“现在要挣钱，要招人，要运营。我有时还要面试。每个平台运营都不容易，都要有一个小主编。下面每个都要管的。技术现在有一个小团队。五个人。编辑部在里面那个楼。当然要坐班。”

金先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四)

金先生沉浸在他的兴致中。他说现在观察者网有一百六七十人，“观视频”有七八十人，后面这个主做长视频，不是他一手做的，现在合并了进来……都是李世默投资。那几个在 B 站声名大作的人，董嘉宁、王晓等等都是“观察者网”的编辑，是短视频为主的。他还说现在版权谈判地位在改变，去年（2019 年）下半年开始平台竞争激烈了，要好内容，认为自己有优质内容的金先生就有了更多的谈判空间，“中国互联网总的流量饱和了，十亿人，用户，每个人一天五个小时，就这些了”——金先生现在眼里都是全网总量这样的数据，“我增加的就是你少掉的，现在进入到存量竞争了，优质内容成为有竞争力的利器，他们开始不惜工本地抢”……金先生认为这里有他的“观察者网”一席之地。不过，他还没有控制下游平台的能力，他还要琢磨着如何“根据平台来打造适配内容”。他有三块钱可赚，一是广告，二是版权，三是会员，他说广告收入现在是大头，主要在微信微博，未来可能还有网课。

这是个让他找到自己存在感的工作，来自于他的创造性，经历了一段被人视为不可理解的或者古怪的存在阶段之后——对，与其说它是异类的，不如说老金那里很古怪，他的朋友和前同事们对他的媒体的评价差不多就是这样，尤其是在他的艰难探索期。如今他自认再度回归“大众媒体”，但远没有适应这一身份，始终保持在应激状态。几乎每隔一会儿，他都会警觉地看着我们，“不知道你们到底在写什么……”“我还没搞清楚你们什么目的……”

差不多又过了一年半，一次旧同事聚会，我和金先生都在，他还是从这句话说起：“不知道你把我写成什么样了……”

当时我们谈兴渐浓，很快溢出“不谈政治话题”这个约定。本来就是，谈论“观察者网”怎么可能离得开政治光谱这件事呢？何况它开始赚钱了，它有自己的受众，而且看起来主流的样子，让你觉得它的背景深厚。你看微博里，不管是群起而攻之的花式举报，还是有冤枉呼天抢地的上访，大事小情，都有人“@”一下观察者网，与它同列的有可能是“团中央”“紫光阁”“环球网”以及几个大 V。观察者网事实上是一个政治色彩或者说是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网站。

“我那时候也不真实。我不是从来就是这样的，我也是一点点变化过来的。我尊重历史。

三十年前我也上街的，那时候已经工作了。所以你要说我说的是个自由主义者，是威权主义者，是专制主义者，还是共产主义者？你得要问他是在几岁的时候。大学里的时候我也是一个亲西方的自由主义者，或者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这番告白，原因是来自于我们说到了“真实世界”。到底什么是真实的，哪些是错觉。早先曾经与另一位媒体同行苏先生探讨谁是主流的问题，在我们自身营造的信息茧房里，我们认为与我们接受立场和价值取向的人是主流，小粉红是个反常现象，与改革开放四十年在精神文明世界里建设出来的结果有不匹配的地方，苏先生一语惊醒梦中人，“你才是反常的！”

其实整个访问项目的探讨也是从这个话题也是开始：谁是正常，谁是反常，它是主流还是支流，它是一个人群还是一个时代。

“任何时候，我倒是真正能够多元的。每个人都是一点点过来的，和而不同。自由主义者是没有度量的，你跟他不一样，他就不跟你来往，对不对？”

这句话的信息量很大。金先生说的是我们身边的自诩为自由主义者的朋友们，其实他们占了我的朋友和同事们的大多数。金先生认为自己不是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对非自由主义者也很提防；再有就是自由主义者在这个群体中相对占多数，大概他们不缺朋友，很多时候对非自由主义者秉持“道不同不相为谋”的状态；还有一些时候，因为非自由主义者与当政者走得更近，所以他们不愿意与之为伍——也是一种可能……金先生因此有了一点优越感，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

“就说中美。很多人认为是我们干出来的，其实不是这样。中国到了这个程度，块头这么大，造成了威胁。到这个程度的德国、日本，美国都干涉了。任何国家到这个程度，美国都要干涉。”

“你这是老大一定要打老二的意思？”这么多年来，我总能听到从上到下从有钱到没钱各色人，包括男女，都信奉这个理论。

“这是次要的。主要是，中国，从来没有一个国家，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非西方国家，在不屈服美国的情况下，完成工业化。没有的。”

金先生这句话略有语病，但我们还是领会了他的观点……“可是，中国不是自己完成的，是借助于全球化完成的。”

“这是互通有无的。中国的 WTO，谈 13 年，是他们需要我们。这个事情，我们在进入 WTO 之后，美国人钱赚得多得不得了。”

“是互惠的关系。我们延续这个互惠的关系不行吗？”

“延续不了啊，”金先生看我一眼，大概是责怪我的幼稚，枉为他的前同事，“美国把 WTO 拆了，它退出去了。现在它要全面退出去。而我们是按这个规矩来的，全部在 WTO 基础上裁决。他们不愿意。”

钱赚得多得不得了，为什么还要退出去？这个问题我并没有得到答案。是他们请我们进去的，是他们赚了好多好多钱，是他们把 WTO 拆了……“一切责任都在美方”，有点这个意思。

“尊重事实。事实搞清楚再说。观察者网就是要搞清楚事实。”金先生大概从我疑惑的目光里看出来需要加一点力气来讲这个事。

回到你们所谓的，小孩子为什么红。你们所谓的“讲讲生活方式，说说文艺”——不是挺好吗？我要说：那是不真实的。那是非常短暂的中美蜜月期，是非常不真实的。是美国人把苏联干掉了，一下子失去了目标，1989 年，1991 年嘛，苏东巨变；那时候中国很穷，我们的存在根本忽略不计。我看着你不可能起来嘛，你不能对我怎么样，根本就看不起中国人。这时共产主义已经是失败的意识形态，你没了靠山，对不对？你们穷，没了靠山，又有当年大量同情中华民国的人的所谓亲中派、亲华派，都愿意支持中国。他们根本不把中国当未来的威胁。

九十年代，1989 年之后，它很快就原谅了中国。西方太自信了。

这个时候，就是去政治化的。过去这些年中，所有的政治话语，大趋势，就是意识形态去政治化，持续达 20 年。

1989 年之后，四项基本原则还在啊。老百姓已经挣脱了原来的阶级斗争，生活已经完全去政治化了，去日本打工，去美国，到处跑，赚钱。消费主义，持续二十年。美国人觉得中国这么穷，挣点就挣点呗。我们那时候那点 GDP，美国人不担心。

冷战，这是真实的世界，世界是有壁垒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从二战到冷战，二

战之前是一战，一战之前也是战争，一直打仗，这么长时间从来没停过，只有到 1990 年的时候，有个短暂的虚假的繁荣。福山说历史结束，就这样了。但这是不真实的，假的。我们也在这个时候增长。

八十年代，里根到复旦来。那个时候是蜜月期。里根演讲时，我不在现场。但学校有广播。我是大一哦。那是学校的大事情，翻译竞赛、听力竞赛、演讲，然后才定下来参与的学生。学校里面就尽量搞得干净一点，消防队冲一下水。

蜜月期，苏联那时没还有崩溃，我们站在美国阵营这一边。中美苏三角，中国站哪边，另一边就吃不消。中苏不是吵架吗，赫鲁晓夫吵架，美国人马上拉我们。邓小平复出之后，替美国人教训了越南。小平出来第一件事是替美国人教训越南，然后美国人全面拥抱。打越南之前，小平跟美国讲，我什么时候打。现在历史公开了。我把越南狠狠教训一通，美国人爽得不得了。这些全是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打起来了，对不对？

中国跟他们之间，这是超意识形态的。还要对付苏联，苏联还在呢。越南背后是苏联，越南小霸，武器装备是苏联的，中国人来打。这个时候，中美关系进入蜜月期。然后再改革开放，什么是改革开放啊，就是向西方开放，向非洲开放个屁啊。向美国开放。怎么改革开放就是对西方开放，苏东地区跟我们没关系，跟我们闹掰了。向世界接轨，是向西方接轨。全面西化。

“这是一段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金先生总结。“现在的小孩子是正常的，你们头脑里是不真实的世界。”

“哪怕它存在了四十年？”我头脑中翻腾起这个问题，并没有说出来，就像我不是太同意他说的一战前这个世界同样是一个战争接着一个战争……金先生一定会怪罪我这是西方中心史观，让我看一看八国联军。

“美国人现在对我们的态度是常态。”

“与你说的蜜月时期比，中国现在在重回意识形态。”

“是不是，中国现在不讲意识形态。”金先生说话声音渐次提高。“中国人讲的是什么？讲国安，国家安全。这是超意识形态的东西；讲民生。中国老百姓讲实在问题。我们讲过共产主义吗，讲过社会主义吗，讲过意识形态吗？一点都没有。”“每个国家背后都有安全。我管理我的国家安全，当然要立法。我们没讲意识形态，是他们在讲意识形态，所以他们输掉了。讲意识形态，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当时高高在上，整天讲意识形态，这个是一定要输掉的。像台湾，对我们讲什么，整天讲民主自由，他们是在讲意识形态，我们在讲什么？我们在讲做生意！对不对？倒过来了。你要搞清楚。中国没讲意识形态。蓬佩奥骂中国人什么，共产党国家，专制。中国说了什么呢？中国人说你破坏多边主义，你在危害世界安全，你在霸凌贸易，你在打压我们的民营企业。中国人讲意识形态吗？完全倒过来了啊。我说的这些你理解吧？这完全是倒过来的。是他们在大讲意识形态。把意识形态搞下去，把自己给搞坏了。我们当初是吃过这个亏的，整天说人家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剥削，闭着眼睛说人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历史课本呢？墙呢？”我嗫嚅着吐出几个字，在谈锋甚健的金先生面前很没有底气。“不对。什么是意识形态？什么是政治？有政党的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为了一个眼下的目标而进行的政治动员，一套叙事，任何时期的意识形态是不一样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这是不一样的。为了一个阶段性的目标，不是长期的目标，制造出的一套动员话语。这是意识形态。爱国主义不是意识形态。中共没有大肆搞意识形态，顶多讲爱国主义，爱国主义不是意识形态，哪个国家不讲？意识形态是个动员叙事，不是我们的精神生活。”

他喘口气，想起来还有“墙”。“墙是必要的，现在是必要的，它有时间性的。以后美国也会有墙。现在他们已经把我们搞掉了，把微信搞掉，对华为乱搞，没有什么证据。这是一个攻守之势。攻守之势易眼。宣传部，以后我们不一定会有，他们会有。没什么诧异的。我跟你说。他们现在越来越敏感。就会搞这些事情。知道伐？冷战最高潮的时候，麦卡锡主义也会出来的。”

金先生越聊越勇，“我们中美之间的防火墙，最大的是语言的墙。这个墙挡住的东西不多的。真正的墙是语言。中美之间的隔阂是语言。他们看我们的网站是没问题的，语言太难了。我们又没有墙他们。这个隔阂是最大的。”

我得承认，在辩论这个领域，金先生远远超过我们。我要停下来想好半天，才能辩

认出他的话中，哪些概念被重新置换过了，恨不得翻书找出来一句再回给他。当然，我没有这么做，因为即使我做了，我也敢断定他可以秒回——他似乎不像我有那么多负担，比如记忆不准怎么办。《纽约客》的作者格拉德威尔写过一本叫《异类》的书，说一个人反复训练自己一个技能，一万小时，你就可以在这个行当里出类拔萃。金先生是这一行当的翘楚。

“我的工作很特殊，搞媒体，就面对党的管理和老百姓的认可。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他可以骂总统，我们就不能骂。他这个很自由地办一份报纸，我们为什么不能。通过学习和自我学习，解决这个问题。这些问题太大了，我是经过长时间学习，看书，跟人辩论，自己做东西，琢磨出来的。关于墙啊，辩论，我跟美国人、德国人辩论好多次，他们说不过我。”你看，他说这句话，全是实打实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骂总统，为什么我们不能自由地办报纸，但他说他解决了。

“有一段时间我很好争论，《21世纪经济报道》后期，以及到《东方早报》。面对面。那时候好争论。越争越明白。我不是要赢别人，我争论的时候不是要压倒你，那是特朗普和拜登辩论，他们不是争对错，他们是压倒对方。没有利害关系，为什么要压倒彼此呢。同事啊，同学啊，各种各样的人，有的时候在外面开会都跟人吵。没有什么利害关系。”

金先生的争执颇有名气，近些年停止了。“我认识很多人后来只是棋友……争没用，后来也就不争了。我做观网，我要说的话在网上表达，我跟你们争个屁啊。几乎没有跟我想法相近的人。李世默算是一个相近的人，完全一样谈不上，我强调一个度嘛。大部分都是重合度很好。我们之间不仅比较高的重合度，我们还相互刺激，（有启发），我们相互之间聊聊就把事情搞清楚了。”

“观察者网用户和读者的政治光谱与你们一样的吗？”

“不需要一致。各种话题会吸引各种不同的人。25到45岁，70%都是男性。”

“跟你看法相同的人越来越多了吗？”

“主要是年轻人，这一点还是挺让我欣慰的。我们最厉害的地方，是在B站。年轻人的变化。”

（五）

我们在写《张医生与王医生》那本书的时候，说到王医生的女儿住校，一周回一次家，王医生夫妇本来想抓紧机会在饭桌上商量女儿出国上学的事。但很快发现，这事儿不能提，开始是女儿指责爸妈崇洋媚外，后来是质疑“你们咋不爱国呢”，再后来是直接摔饭碗走人。

一位杂志主编，基本上可以视为公共知识分子，他觉得自己的儿子是小小粉红——等到他发现这一点的时候，他连抱怨的机会也没有了。

一位活跃在政商界的大人物，在说到他年幼的儿子未来在哪里成长的时候进退两难：在国外受教育会变成一个洋人，在国内则会变成他的敌人。他很痛苦。

这几乎是与我们聊天的“长一辈”共同的担忧和话题。他们遇到的困境我在一本写印度德里中产阶级的书里看到过。那些富起来的中产阶级担心没有时间和孩子在一起会有所缺失。“我没时间和我的孩子们在一起。我太太一直和我提这事。我每天早上看到他们半小时，然后可能每周和他们一起呆两个晚上。”仅此而已。他所想的无非是，等到儿女们19岁了，至少他们会有钱。“如果我们没有钱，而他们在抱怨不能上好的学校或者其他任何事时，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唔，至少我花时间陪你们了？’”另外一个故事里，克里斯汀·卡里尔记录的一段故事中说：

有个年轻的伊朗女子在留美期间成为虔诚的穆斯林，开始戴起头巾面纱。她那世俗派的父亲在伊朗飞机场接机时，大吃一惊地说：“我以为我是送你到美国念书，不是到库姆。”

这是发生在伊朗革命前后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是那位活跃在政商界大人物所没有想到的，可能回来的不止是个洋人。

“我留给你什么了”，是中产阶级父母一直困惑的问题所在——他们最迫切的担忧是没有足够的让子女受到最好教育的钱，而在这之后深层的担忧是除了钱，他们好像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留给下一代。这是我们跟所有对话者最关心的项目之一。

与金先生聊天的时候，突然发觉有一点可能以往忽略掉了。“留给你什么了”，这个

句式的潜台词是指父辈对下一代的影响，也就是说，这往往被理解为一种单向传递。而我们觉得自己忽略的东西是：两代人之间的影响，可能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

探讨到“编辑部里的政治正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问起观察者网的年轻读者们。金先生说：“代际之间突然变化了。他们不是我们教育的结果。我们那些老的媒体人，既没有教坏他们，也没有教好他们。东早是个小媒体，圈子媒体，对大众也没有什么影响。所以他也不可能教坏——这坏打个引号哈——对公权力，也不是我们这些媒体教好了这样。也不是这样。金先生用了一个老词来界定他们，“他们是互联网一代。”虽然这个界定本身很古老，但在金先生这里有些新意，这些新意来自女儿。“从她们身上发现了这样一群人。因为什么呢？在家里，父权被推翻了。给他们武器的是互联网。父权被推翻了。上高中时就推翻了，”他在提到“推翻”的时候总是略压低一点声音，“她们有了手机，有了这个神器，她知道得比你多，比你快。同样的思想，她知道得比你快；不同的思想她比你知道得多，类别多，不同的语境、不同的圈层，她都比你掌握得多。你说不过她啊。”

他在提到手机的时候，也同样是进步主义占据头脑的样子。

“连你也说不过她们？”

“说不过。”

“你发现你女儿比你厉害，这个临界点是什么时候，是因为讨论什么问题了吗？”

“《三体》。这个书重要啊。我们好多信徒。从她们身上，我了解互联网，互联网对于她们来说和对于我们来说意义不一样。她们自己没有这个意识。”金先生补充说。那天恰好有一条新闻，《三体》将与Netflix合作。我们与金先生谈话的当时此刻是不是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已经记不清了。我记得金先生说起和女儿讨论《三体》的表情。眉开眼笑，像是甩出一个大包袱。他是真的开心：既找到了一种信念的同志，又领风气之先，与女儿建立起来一种联盟。

“到编辑部去看看？”我提议。

不管提了几次，金先生始终没有同意向我们引荐他手下热门up主，“到现在我都不不是很清楚你们到底想了解什么。”于是我们决定先去看看编辑部。

金先生没有拒绝。走过院子，院子深处是编辑部的楼，走廊里有先进工作者一样的光荣榜，“总编辑奖”。“太传统了，现在不搞了。”金先生说。

迎面过来一个人，金先生说这是第一个来的复旦员工，中文系的硕士。我想起他说所有人都是自己培养。又有一个化着淡妆看起来刚下直播的西装男，下边穿着西装短裤，这个是王晓，介绍认识，“好奇心日报的创始人。”金先生想不出怎么合适地介绍我们，大概也是不肯介绍我们进一步采访他的编辑的原因。

说话间，一个穿着暗色细斜方格旗袍的女子在走廊里打电话，“那是新之。”听出来她在采访，在问跟三体有关的事。

当天晚上，新之论“《三体》与Netflix”的视频已经上传到B站了，11分钟。是金先生说的“同一件事，用我们的语言，我们的解读”。

视频的两句话仿佛隔空呼应了那天下午和金先生的聊天：“这事儿如果发生在五年前，会让中国的《三体》迷们惊喜激动，然后放鞭炮庆祝的天大的好消息。但是，此一时彼一时了。”“现在是2020年，《三体》不再是轻易被一家游戏公司买断版权的小众IP。而我们所处的世界，正遵循着《三体》中那句著名的话：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

附：金先生论“合法性与自由”

（我们的）意识形态存在合法性。具体的事情，不是说任何事情我都站在政府这一边。你要这么理解我：任何事情，政府都可能犯错，党也有可能犯错，我们会批评啊。说不出来我也会不同意啊。“观网”也有批评报道。

在对与错的世界里，我是自主的；在善与恶的世界里，我站队了。

你的问题是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就是，自由主义就是精英主义，这个互联网，天生是反精英主义的。本质上的不能两立。互联网上必须放弃精英主义。

为什么你读了大学之后你会更崇尚自由呢？因为你获得了更大的资源，证明了自己某种方面的才能。然后才想（更大的空间）。我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自由越多，我发挥余地越大，更充分。非洲大草原是最自由的。只有狮子才可以随地睡觉。其

它动物必须要保持足够的警惕，只有狮子，只有王，才是真正自由。所以崇尚自由是根本不自由的。

奴隶社会最自由。我牛逼就可以把别人变成奴隶。然后就稳定了。你不同意，我可以打你啊，我甚至可以打死你。彻底自由就变成奴隶社会。彻底自由就是非洲大草原。如果这个社会没有政府，大家都是自由的，孔武有力，我们几个人有枪，就作威作福。对不对？如果你想获得更多自由，就是奴隶社会，为所欲为，你有能耐你做奴隶主。人人都想努力最小化，利益最大化。这是人的本性。奴隶社会是最自由的，就是强者的自由。

你们这些考上名牌大学的人，你们这些崇尚自由主义的这些人，牛逼啊，只要有足够的自由，我就永远是人上人。自私。

这就是真实的东西。互联网推翻了这些东西。

这是不对的。没有好处。虚假。

你说普适价值，（那我）最后再说几句。不会是来自选举。共产党不是选举出来的，所以合法性没有。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反对就是“没有让我选举，没有让我投票”，对吧？如果你是民选的，你没什么好说的。

集中的是这个，你不搞普选。对不对？

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制，然后，人民在两党之间选择，看上去人民行使选举权，行使选择的权利，是他们在选。但是要看历史，共和党和民主党原来是一个党，他们是后分开来的。国父们推出一个宪法，这时候只有一个党嘛。后来联邦党，闹出两个党来，内部分为两派。实际上，民主党 + 共和党 =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不是一直在台上吗？他们也一直在台上。党内不同派别选上去。是华尔街认可的，你们双方谁上都可以，拜登还是特朗普，谁上都可以。美国共产党也从来没有上过台。所以，合法性来自哪里，合法性不来自选举，合法性来自于战争。

他们合法性来自于打败了英国，来自于领导美国人民独立和胜利，他们的能力和德行得到了证明。美国人民认可他也可以成为我们领导。1783年，美国那几个人写那么几行字，美国人就认了，你现在让任何人关起来写。一个礼拜，说这是美国人的宪法，你说还会有人认吗？

打赢了战争，你独立了，你有资格写宪法。他的合法性来自于宪法。所以把自己合法，来自于宪法，宪法来自于战争。你独立了。也就是毛泽东的那句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合法性都是这样。中国历史上哪个不是打出来的。中国的皇帝没有合法性吗？这不扯淡吗。我们的唐朝，宋朝没有合法性？就因为没经过选举。

合法性就是政治。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欧洲现在所有国家都有一个王国在那里，合法性是要这个王国来盖章的。这些王国和合法性都是战争——到历史里面去找，都是战争带来的。

她所以成为女王，是因为战争。

你们的普适价值，包含很多内容的。这只是一个合法性的问题。从合法性里推导出来的。根本上，历史就是这样。历史没有道德。这是全世界公认的。

（插问：“回到之前说的‘不真实’的那段时间，海湾战争、苏联解体之后，人类不应该想办法延长这个时间吗？”）

所以多边世界是好的啊。未来是有可能的啊。中国当年，和而不同，天下那么多种族民族在一起，和平了很多年。所以中国哲学现在是有前途的。我们站这边也是因为这个东西。

中国的天下观念是有前途的，衔接人民共同体是顺的。所以千万不要看选举，看美国选举投的是选举人票，不是选总统。美国诉求，美国精英和普通人也不一样的。

中国诉求，对中国，普通老百姓还是不好。蓬佩奥说的话那是非要干掉中国。上来没多长时间。下去之后，他就会换一种说法，忽悠你倒掉也是一个办法。拜登不就是这样的吗。希拉里、奥巴马不就是这样的吗，他就是忽悠你。

不要轻易说选举，这是扯淡。在我胜利的时候，难道我要去广场上来让人去投票？

几年前我跟人讨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很多年，我在十几年前，就这么想这么说。

历史证明我是对的。就是这样。所有的合法性，人类历史到现在以来，就是这样。

你问我的事，都是这么多年来没跟人讲过的东西。我跟你讲的时候，也在考虑到底应该是什么讲法。我跟你政治立场不一样。



伊险峰

出生于辽宁海丰张，满族。人生第一份工作是在沈阳铁路局，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媒体，也写东西。

田野中国

基于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面向大众实践公共写作，用文字留住日益消减或者瞬间消失的各种现实。



图片来自 [Zheyi Ding](#) on Unsplash

非虚构

姆妈 | 定海桥往事⑥

路明 | 生活亲历者

定海路贝肯鲍尔，四四九弄阿兰德龙，
东宫舞王，从这一刻起，自由了

他又梦见了姆妈。

姆妈衣衫褴褛，神色凄惶，张嘴说什么，他一句不记得。也许在梦里听见了。醒来，心扑扑直跳，说不出的难受。近来老做这个梦，陈禾倚在床架上，点一支烟。凌晨三点十五分。不指望再睡了，他想，得找人问一问。

托了朋友，找到一位算命先生。先生问了姆妈生辰八字，燃一炷香，闭目入定。少顷，先生睁开眼，说，你姆妈，是缺钞票用了。

陈禾顿足称是。前年是姆妈百年诞辰，他和姐姐、弟弟一起，找到一个浦东的寺庙，给姆妈做道场。和尚们念了一天的经。住持说，令慈已经投胎往生，今后不必再祭祀。去年冬至，今春清明，他没给姆妈烧锡箔。他责怪自己，不该轻信住持的话。姆妈吃苦头了。

以前也梦见姆妈，大多是自己闯了祸，赌博，要么跟人打相打，关进老派；厂里要开除。姆妈就到处求人。醒来自己都好笑，又觉得心酸。姆妈这一辈子，没少给自己操心。关于姆妈最早的记忆，是四岁的冬天。建国不久，蒋介石飞机常来轰炸杨浦工业基地。半夜，他被爆炸声惊醒。窗外火光熊熊，探照灯刺穿云层，高射炮像一串串糖葫芦。姆妈给三个小囡穿好衣裳，抱着弟弟，领他和姐姐下楼。借用楼下邻居的客堂间，地上铺一床褥子，四人和衣而眠。老百姓朴素的想法，万一房子着火，可以逃快一点。寒冬腊月，他禁不住发抖，不记得是冷还是害怕。姆妈就抱着他。不知过了多久，他睡着了。

姆妈老家在泰州白马乡，十三岁来上海，在日本人的裕丰纱厂当包身工。解放后，纱厂收归国有，更名国营上海第十七棉纺织总厂，简称国棉十七厂。姆妈是细纱车间的挡车工，上班就是来回不停巡视，连接断掉的纱头。车间三班倒，早班六点钟到下午两点，中班两点到晚上十点，夜班十点到第二天六点。人可以轮换，机器不停。姆妈早班回来，捅开煤炉，给三个小囡烧早饭。等他们一个个吃完上学去，姆妈再上床补觉。夏天夜里，姆妈下了中班，会在定海路上买一只西瓜。到家，把小囡叫醒，起来吃瓜。姆妈坐在边上，扇子摇摇，笑眯眯看。姆妈不吃。

每次开学前，姆妈到处找人，借三个小囡的学费。每个月还一点，一直还到下学期开学前。还干净了，才有脸再借。十七厂发工资的日子是每月 13 和 28 号，陈禾一直惦记着，只有这两天有大饼油条吃。刚出锅的油条喷香酥脆，他想，等以后自己赚钞票了，一天要吃十根油条。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打小，陈禾会补套鞋，修阳伞，翻被子。姆妈做棉袄，他负责撬边、剪纽扣洞。姆妈养花，他帮忙剪枝、松土。姆妈花养的好，一到夏天，栀子、茉莉、白兰……开的热热闹闹。邻居讨几支回去，棉线缝衣襟上，能香好几天。

他不记得阿爸的模样。听姆妈说，阿爸在十七厂当门卫，三班倒，有时也敲竹杠。苏北农妇拎一只鸡，来厂里找丈夫。鸡留下，或者捞几只鸡蛋。解放后被告发。加上拜过“老头子”，成了反革命。阿爸讲义气，担了几个人的事，结果被重判。先送学习班，后押至苏北大丰农场，劳动改造三年。

姆妈成反革命家属”。人家在弄堂养鸡，姆妈不能养。树中间拉一根绳子，天晴时晒被头，姆妈不准晒。姆妈心里多少委屈。一户金姓人家，用篱笆在门口圈一块地，成了私人小花园。陈禾不小心把球踢进去，男人出门便骂，妈个巴子，你爹反革命，你也是小反革命，一家反革命。金家儿子大两岁，把陈禾堵在学校，索要两毛钱赎球费。当时行情，一只“永”字牌儿童足球，价值三角四分。陈禾给不出，脸上挨两记耳光，火辣辣疼。回家跟姆妈说，学校组织看电影，要两毛钱。姆妈说，我哪里来钱。陈禾就眼泪汪汪，姆妈走到哪里，他跟到哪里。邻居都讲，小家伙可怜的。姆妈叹一口气，贴身衣兜取出一沓零碎纸币，抽出两毛钱，递给陈禾。

大丰农场来信。姆妈不识字，牵着陈禾，找邻居陈老先生念信。陈老先生以前开过私塾，写的一手好毛笔字。念着念着，姆妈眼泪水下来。阿爸突发急性盲肠炎，农场医疗条件恶劣，没抢救过来。距离释放日期不到三个月。

他第一次出远门。跟着姆妈，火车坐到镇江，再换船，到泰州俞垛镇乡下，那是阿爸的老家。一进门，看见一口漆黑的棺材，他一吓。棺材是三爹的，三爹是阿爸的阿爸的第三个弟弟。三爹很慷慨，让出棺材，给阿爸先用。

姆妈去大丰接阿爸，他住三爹家里，每天和一帮小孩疯玩。稻草结网，捉来蜻蜓和蚂蚱。要么偷偷下水，摸田螺，采菱角。俞垛是有名的鱼米之乡，水稻田里，黄鳝一只只冒出头，有酒盅那么粗。没人吃。等忙完阿爸后事，姆妈要带陈禾回上海。他抱住一根牛栏，哇哇大哭，说什么都不肯走。

姆妈技术好，厂里出了名的。姆妈纺出的纱布，粗细均匀，罕有白点瑕疵。因为阿爸的事，姆妈入不了党，评不上先进，始终是个普通工人。十七厂有个黄宝妹，跟姆妈一个车间，著名的劳动模范，见过八次毛主席。导演谢晋来厂里拍电影《黄宝妹》，由黄宝妹本人主演，姆妈亦有出镜。影片里，有一些黄宝妹的事迹，实际是姆妈做的，“艺术创作”嘛。在一张演职员合照里，姆妈站在第三排，头戴工作帽，带着拘谨的笑容。三十五岁的谢晋坐在第一排，咧着嘴，笑得阳光灿烂。

小学四年级时，陈禾被苏联专家选中，去北京学跳舞。所有服装，包括内衣裤，国家全包。“三年困难时期”，伙食一日三餐，有荤有素，白面馒头随便吃，演出完加一顿夜宵。学校常有领导人视察。几个月后，寄回与大人物合影，弄堂轰动，姆妈脸上有荣光。第二年，大型舞剧《鱼美人》首演，陈爱莲领衔，他在后边踩高跷。到第四年，一日姆妈下了白班，见他抱着膝盖，一个人坐在家门口。

姆妈又惊又喜，说学校放假了？他说没，逃回来的。姆妈说，被打了，还是被欺负了？他摇头。姆妈急了，说那赶紧回去吧。他抬头看姆妈，眼里噙满了泪水。

事情是姆妈后来问出来的。陈禾有个堂叔，在湖北某地文化局工作，有点文化。堂叔给他写信，好多字他不认得。出于无条件的信任，他把信拿给班主任看。信里有一句“虽然你阿爸犯过严重的错误”，班主任脸色变了。

学校派人来上海，查出阿爸的帮会问题。从此他被打入冷宫。有些觉悟高的同学，自觉疏远冷淡了他。那一年，乌兰诺娃率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赴香港演出，途经北京，向舞蹈学校借六名小演员，其中有他。他高兴极了，更卖力地练习。出发前几日，风云突变。最终名单公布，一个各方面不如他的男生顶替了他。

十多岁的孩子，谁受得住这般落差与屈辱。他去找校长戴爱莲，要求退学。戴校长说，论出身，论成分，本人就来自资产阶级家庭，只要真心喜欢跳舞，可以一直跳下去。他犟劲上来，非走不可。戴校长最后说，你就是块跳舞的料，离开这里，你什么都不是。他想念姆妈，想念定海桥简陋温暖的小窝。北京到上海的硬座是十三元五角，他攒了三个月零花钱，偷偷买一张票。铺盖都没带，连同户口一起，丢在北京。

邻里传言，说他吃不了跳舞的苦。他不解释。黄宝妹听说了，赶来劝他，说北京多好，

吃皇粮，有前途。他不响。最后姆妈讲，这小孩铁了心，一定有他的道理，随他去吧。“困难时期”过去不久，多一张嘴吃饭，供应还是紧张。陈禾主动包揽了家务，择菜，生煤炉，擀面，切面条子。蔬菜只有一种，茄子，也叫落苏，水煮落苏，清蒸落苏，落苏汤面，顿顿落苏。干完活，他去踢球。四四九弄的尽头，从前是一片乱坟滩，“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埋过人和军马，后翻平为球场。张宏根、袁道纶等名宿从小在这里踢球。有居民称，曾在月光下，看见一匹无头马绕场狂奔。正是工人足球轰轰烈烈的年代，附近几公里，国棉十二厂、十七厂、十九厂、十七毛纺厂、中纺机、上水公房……到处有足球场。更多的时候，他和小伙伴在弄堂里踢。地上放两个书包当球门，二对二，三对三。有人讲，他踢球像跳舞。

渐渐的，陈禾踢出名气，先是入选杨浦少年队。在沪南体育场的一场比赛中，他连过七人，最后连守门员也过掉。加上相貌俊秀，鼻梁挺拔，有点像外国人，“迪纳摩”的绰号从此叫响。17岁那年，他入选杨浦队，赴重庆参加全国甲级联赛。一个月踢了8场比赛，他替补出场5次，攻入2球。这支全部由工人和学生组成的球队，最后位列全国第23名。回到上海，球队就地解散，上班的上班，念书的念书，像一场梦。唯一真实发生过的证据，是每人领到两斤白糖。

南京部队足球队的主教练找来家里，开门见山对姆妈讲，想带陈禾去南京。姆妈怒火中烧，小猢狲去趟北京，丢了户口和铺盖，回来连学都上不了，成为弄堂笑柄，现在又要走，走拉块？教练说，户口不要紧，部队会解决。姆妈起身去灶间，摔摔打打。教练只得告辞。

他送教练，一路低头不语。临别时，教练开口，不要管你姆妈，我带你走。他说，啊。教练说，我机票退掉，等你两天。两天后早上，这个路口碰头。他度过百爪挠心的四十八小时。到底没去。趁姆妈上班，一个人嚎啕了一场。

一年后，他进入国棉十九厂，当一名学徒工，同时在厂队踢球。厂队教练也是退役国脚，看见他大为诧异：基层有如此人才。

四四九弄里有一座小庙，香火旺盛。每逢初一、十五，姆妈去庙里上香。运动一来，和尚散尽。红卫兵抬出泥塑菩萨，打翻在地，架火焚烧。烧到一半，菩萨突然站起，又被推倒。终化为灰烬。

一只老母鸡踱到跟前，是当年欺负姆妈那家人的。陈禾飞起一脚，母鸡咕咕叫一声，落到主人家门口，一动不动。男人冲出来，骂，谁踢我家鸡？陈禾盯着他，一字一顿说，我踢的。男人一声不响，低头捡了鸡，退回门里。

拖一网兜足球，一脚临空抽射，球炮弹般蹿入金姓人家花园，花盆粉碎。接着一脚。又来一脚。金家儿子在窗口看见陈禾，赶紧把头缩了回去。一顿狂轰滥炸，良久，金家老伯出来开门，满脸堆笑。陈禾指着一地狼藉，说，我捡球，可以吗？老伯说，当然当然，要不，我帮你捡？

姆妈劝他，多少年的事，不要提了。他梗着脖子，一副不罢休的样子。他不是个睚眦必报的人，但这笔账，一定要算。

十九厂成立民兵组织，点名要陈禾去。红袖章一戴，神气的很。平时厂里值班，碰到春节、国庆，集体去南京路巡逻。夜里，“沈大成”二楼打地铺。小兄弟们围着吃香烟，牛皮吹吹，再弄点夜宵吃，蛮开心的。

半年后，厂里推荐陈禾参军，东海舰队海军航空兵。体检顺利通过，厂里开欢送大会。一共六个人，每人送一支钢笔、一个带“国棉十九厂”字样的笔记本。到领军装那天，他一早赶到沪东工人文化宫。军干部把名单从头看到底，又从底看到头，没他。他心头一灰，晓得事情坏了，多数还是阿爸的问题。四周欢声笑语，到处是抱着绿军装、喜形于色的青年男女。他黯然退出人群，瘟头瘟脑，一个人走回家。

灰溜溜回厂里上班，不久，民兵资格被取消。以往称兄道弟的小伙伴，看他的眼神变了。他一肚皮委屈，没法跟人说，只得埋头干活。说是钳工，实际是车铣刨磨一肩挑。陈禾天资不错，加上用功，拿到行业比武全国第二名，很快晋升八级钳工。就这样低眉顺眼地活着。一晃多少年，小陈熬成了陈师傅。

三十岁不到，陈禾成为顶尖的纺织机械专家。别人修不好的机器，他一听声音，便晓得问题在哪里。领导想提拔陈禾，让他当值班长，下一步是车间主任。他说，不高兴。领导说，为啥。他说，车间女工多，烦。心里想的是，算了吧，不会给你们一次次羞辱示众的机会。七十年代末，纺织局组织专家去香港购买一批机器。领导推荐他。他本想拒绝，领导拍胸脯讲，啥年代了，肯定没问题。临出发，领导来找他，讪讪说，组织上还是有一定的顾虑。他冷笑，顾虑啥，怕我跟香港女人跑了？拂袖而去。他像一下子想明白了。这么多年，他提心吊胆，夹紧尾巴做人。现在，他不在乎了。

去他妈的吧。他什么都不要了。他已决意如此度过这一生。十九厂给过他容身之处，他也对得起十九厂。曾经恩怨，一笔勾销。他，定海路贝肯鲍尔，四四九弄阿兰德龙，东宫舞王，从这一刻起，自由了。

从此没好好上过班。规定八点钟进厂，早上七点五十八分，副厂长站在大门口，抬起手表，看法看法。他走过去，说，看你个卵。借口杨浦队、纺织局足球队训练，经常性旷工，实际打麻将。一次厂队集训，教练来车间找，同事说，陈禾一早出去踢球了。打电话问，纺织队没比赛，杨浦队也没比赛，教练不响。事后跟他说，你厉害哦，有比赛也踢球，没比赛也踢球。他哈哈一笑。到后来，干脆请长病假。怕姆妈担心，每天准点推自行车出门，做出上班的样子。出平凉路左拐，溜之大吉。领导搞不懂了，这又是踢球、又是病假，什么情况？他找纺二医院的医生，医生也是球迷，说不要紧，今朝礼拜两，你礼拜四再来，多吃点鸡鸭血。出了医院，他直奔菜市场。到时一检查，胃出血“四个+”，等于长期带病训练，轻伤不下火线，应该表彰。领导没话讲。

那天陈禾在邻居家打麻将，有个戴黑纱的朋友，倚着门口问，可以进来吧？他顺口说，进来好了。一会功夫，陈禾去平凉路公厕小便，觉得不对，浑身发冷。当天发烧，送去医院，每天早上挂六袋盐水，晚上挂六袋盐水，连挂十三天，高烧不退。查不出原因，医生也一筹莫展。后头几天，他两腋夹冰袋，肛门塞退烧栓，苦头吃足。姐姐陪姆妈到医院看他，姆妈问，最近得罪什么人没有？他想来想去，想到黑纱的事情。姆妈跺脚，哦呦呦，你不晓得，这家老太太生前有多厉害，你还替人家做主。赶紧叫孙子带上锡箔，去人家家里磕头。说对不起啊，我爸做错事，替他赔罪了。门口焚化锡箔。大约过半小时，他开始退烧，出一身大汗。第二天出院。回到家还跟姆妈嘴硬，医生用了十三天的药，是该好了嘛，要相信科学。

在定海桥，长久以来，菩萨，祖宗，神仙，鬼怪，自然而然，伴随每个人的一生。邻居老伯过世，保险柜钥匙死活找不到。家人去浦东乡下请仙姑，设坛作法。不一会，帷幕后传出老伯的声音，说钥匙在哪里哪里。回家一看，果然不错。定海港路有个王瞎子，算命远近闻名，号称半仙。姆妈找王瞎子算命，王瞎子说，你子女众多，老来享福，但最后的时间，没有亲人在身边。

姆妈有心血管疾病。八十岁那年，姆妈做了心脏起搏器植入术。当晚，姆妈昏厥，送进重症监护室。医生摇头，情况不太好，家属要有心理准备。姆妈一直醒不来。白天，姐弟轮流照顾，夜里，陈禾坐在姆妈床边，死盯着监视器上的数字。姆妈有时嘴角翕动，仿佛经历一场恶战。他心里祈祷，姆妈姆妈，一定要撑牢啊。

姆妈昏迷了三十三天，终于醒转。睁开眼睛，长叹一口气，讲，伊拉走啦？儿女们问，姆妈，啥人走啦？姆妈说，看到很多穿古代的衣服的人，有几个恶狠狠推她，叫她快走。她不肯，急得大哭。正拉扯着，有个大王模样的人讲，算了算了，放她回去，再给她十年。姆妈就醒了。

姆妈出院后，陈禾悉心服侍。每晚黄酒烧热，给姆妈泡脚，据说可以活血。夜里，他睡姆妈隔壁，时刻关注姆妈的打呼声。人睡着了，耳朵也醒着。一旦声音不对，他立刻翻身起床，慢慢推醒姆妈。姆妈睁眼，他笑嘻嘻，姆妈姆妈，做噩梦了对吧，不要紧的。早上起来，先看姆妈嘴唇，不发青，不发紫，他就放心去买菜。菜拎到家，简单处理一下，去邻居家打一圈麻将，回家做午饭。有时路上碰到老队友，对方大惊小怪，迪纳摩，长远不回娘家了（指去俱乐部踢球）。他笑笑。姆妈不识字，不会打电话。那些年，他没在外头吃过一顿饭。有一回，姆妈午睡起来，一个人跑去弄堂口剪头发。他打完麻将回家，人不见了。到处寻不着，急出一身汗。

春去冬来，眼看快到第十年，陈禾心里发慌。姆妈像无所谓，乐呵呵的，生死由命的样子。他安慰自己，哪来什么大王，一定是姆妈糊涂了，瞎讲八讲。他跟朋友们打招呼，这段时间不要打我手机，怕的。秋天的一个下午，他带小学生足球队训练，手机响了。他一哆嗦。果然，姆妈突发脑梗，送进医院。他骑上助动车，没命地赶。骑到平凉路隆昌路口，被警察拦下，说他超速。他跟警察解释，家里有人病危。警察说，快跑。

姆妈又一次挺过来，后遗症是时常神志不清，三天好，三天坏。好的时候，笑眯眯，思路清爽；发作时，一把揪住他头发，杀气腾腾，你是谁？除夕夜，一家人围着饭桌看春晚，小外孙女突然说，外婆在哭。他心头一惊，姆妈泪水涟涟，却问不出个原因。临睡前，姆妈睁大眼睛，一会说这个来看她，一会说那个来看她，都是过世多年的长辈。他说，姆妈，不要吓我呀，隔着被子抱住了姆妈。这一夜安然度过。年初二上午，姆妈吃了半根香蕉，突然腹部绞痛。赶紧送医院。春节期间，医院空

荡荡，值班医生没几个。姆妈嘴唇焦裂，有气无力说，想喝水。他递上水杯，医生说，不能喝，喝了就没救了。他盯着姆妈因痛苦而扭曲的脸，意识到可能这是最后的分别。他坐在抢救室外面的楼梯上。凌晨四点，听见有医生出来，叫某某家属。他一个箭步冲过去，说是我是我。医生说，老太太不在了。瞎子预言惊人的准确，最后的时间，亲人不在身边。

他不信也信了，这是命。他就是后悔，没有坚持给姆妈喝水。一样要走的，为什么不让姆妈喝口水再走呢？

姆妈出殡那天，四辆大巴坐满，豆腐羹饭摆了二十几桌。邻居都说，老太太人好。陈禾是长子，主持姆妈后事，冷静，有条理，没出一点差错。从姆妈去世到追悼会，他没落一滴泪。等忙完这些，回到家里，整理姆妈衣物，看见姆妈睡的小床。一个人就这么没了。泪水吧嗒吧嗒掉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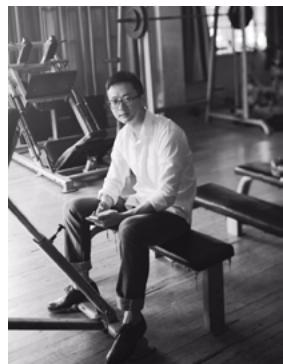
姆妈去世后十一年，四四九弄拆迁。冬至日，烟火缭绕，家家烧锡箔黄纸。老祖宗要搬地方了。陈禾听了和尚的话，没办祭祀，显得轻松而落寞。据说有一户人家，搬场当天，连夜驱车数百公里，将家中供奉的菩萨送回苏北老家。时代变了，菩萨也告老还乡。

拿一笔拆迁补偿款，周边置业已是奢望。昔日“下只角”，今朝东外滩。天女散花般，老邻居纷纷落户南汇、松江、奉贤、金山……陈禾不愿远走，租了一间十九厂的老公房。一室一厅，有个朝南的小阳台，天暖时方便晒被子。也蛮好。

陈禾想，拆迁，也像转世，抹去旧日光景，描绘新的画卷。而他们这些拆迁户，就是定海桥散落的前世记忆。以后，随它盖什么中心也好，建高档小区也好，跟他没关系了。

那天他买了锡箔，趁保安不注意，潜入从前的弄堂。四下无人，空气安静，野猫警惕地看着他。房子还没拆，灰砖封住口鼻，漠无表情。走到老家门前，点香，焚化冥币锡箔。他在心里说，姆妈，儿子不孝，让你受苦了，姆妈。

他在一个小火车站，突然肚子疼，急得到处找厕所。出来时，火车已经开动了。他跟在车后面跑，气喘吁吁，到底没追上。回头一看，姆妈站在月台上，手里抱一个箱子，笑眯眯看着他。他醒了。天光已经大白。姆妈收到钞票了，他想。盘算着，来年清明，再给姆妈烧一幢纸房子。



路明

大学教师，物理学博士，写作者。

生活亲历者

如果我们相信他人的存在，如果我们关心，那么我们写下的就有了意义。这是一个非虚构栏目，讲述亲历者的生活，但这生活里折射的往往不只是亲历者一个人。



图片来自 [Pedro Gonzalez](#) on Unsplash

非虚构 横越美国

约翰·斯坦贝克 | 发现经典

然而除了独处之外，寂寞似乎没有解药。

01

寂寞的美国人

其实还是没多久以前，一个人一旦出海，他的存在便会随着停止两三年，或永远。当加了篷子的马车出发横越这片大陆时，留在家乡的亲朋好友或许再也听不到这些流浪者的消息，日子继续过下去，问题一个个解决，决定一个个做出来。就连我都还记得那时电报只代表一件事——家里有人去世。但是仅在一段短短的时间内，电话改变了一切。如果在这篇流浪的叙述中，你们觉得我似乎砍断了联系着家庭悲欢、家中小家伙犯现的恶行、小小家伙长牙的时刻以及生意上成功与苦闷的那条线，那么我告诉你们，事实并非如此。一个礼拜有三天我会在某个酒吧、超级市场或轮胎与工具杂物服务站，打电话到纽约重建我在时空中的身份。在那三四分钟内，我像拖着尾巴的彗星一样，有了属于一个人的名字、责任、快乐与挫败。那种感觉就像在两个空间中来回闪避，是一种冲破声音藩篱的沉默爆炸，那是一种奇异的经验，就像在一种已知却又异化的水中快蘸一下的感觉。

计划中，我的妻子会飞到芝加哥与休息一小段时间的我会面。两个小时之内，至少理论上如此，她会切穿一段我需要开车开好几个星期才能爬过的地球弧线。我被塞在串起印第安纳州北部州界的宽广收费路段上，这条路会经过艾尔克哈特、南本德与盖瑞，我变得很不耐烦。道路的特质说明旅行的特质，笔直的道路、来往车辆发出的嗖嗖声，还有不变的速度都令人昏昏欲睡，当距离一点点剥落，无法察觉的疲惫也慢慢开始蔓延。白昼与夜晚本是一体，沉落的太阳既非开车的请柬，也非停车的命令，因为交通会持续循环下去。

晚上很晚了，我才把车子停进休息区，在一个永远不关门的大型快餐厅里吃了一个汉堡后，带着查理到修剪得很浓密的草地上散步。我睡了一个钟头，但是远在天亮之前就醒了。车上有正式的西装、衬衫和鞋子，不过我忘了带个可以把这些衣服从车上运到饭店里的箱子。事实上，我不晓得车上还有哪个地方摆得下一个箱子。在一盏弓形灯下的垃圾桶里，我找到了一个干净的皱褶硬纸箱装衣裤。我把干净的白衬衫用地图包起来，然后用钓鱼线绑住纸箱。

了解到自己在拥挤交通的怒吼与压迫下有容易惊慌的倾向后，我在离天亮还很久时就上了路。我想在东大使饭店 (Ambassador East) 结束这段行程，因为我在那儿预订了房间，而且说实话，我不想再迷路了。最后，灵机一闪，我雇了一位夜间营业的出租车司机带路，果然，之前绕的路真的离我的饭店非常近。即使饭店的门房与服务生觉得我的旅行用品很奇怪，他们也没有流露出心中的想法。我把用衣架挂着的西装递给他们，打猎外套的大口袋里装着皮鞋，衬衫则折叠平整地包在新英格兰区的地图里。駕驶难得一下就被带到一间修车厂中停放。查理住到狗旅馆去洗澡与理容。虽然他已经这把年纪了，但还是一条很虚荣、很爱漂亮的狗，不过当他发现自己被单独留了下来，而且还是在芝加哥时，平常的镇静态度就完全走了样，他大声吠叫着表示他的愤怒与绝望。我把耳朵遮起来快速离开，埋头往我的旅馆走。

我想东大使饭店的人都认识我，而且对我印象不错，但是当我穿着皱皱的猎装抵达饭店时，没有刮胡子的脸覆盖满了旅途的风尘，再加上一对因为开了大半夜车而出现的惺忪睡眼，这种好感也派不上用场。当然，我之前已经预订了房间，不过房间在中午之前可能无法清出来，饭店曾仔细解释过他们的立场。我了解，而且原谅了这里的管理方式。我的立场是要一个浴缸和一张床，不过既然这也可能，我只好把东西都堆在大厅的椅子上，睡到房间备妥为止。

我看到柜台人员的眼睛里闪着不安的情绪，连我自己都知道我跟这个高雅、昂贵的愉悦地方格格不入。他向管理助理打了个暗号，也许用的是心电感应法，接着我们就一起找出了解决方法。有位房客刚好为了赶飞机提早退房，他的房间还没有清理好，物品也没有准备好，不过在我的房间准备好的前，饭店欢迎我暂时使用那间房。就这样，智能与耐性把问题给解决了，皆大欢喜——我有机会洗个热水澡、睡个觉，饭店也避开了让我留在大厅的厄运。

那个房间自从前一个房客离开后，完全没有人动过。我坐进一张舒适的椅子中脱靴子，甚至还脱了一只靴子下来，这时候我开始注意到一些事情，然后注意到更多更多的事情。在短得令人诧异的时间内，我竟然把洗澡和睡觉这两件事都忘了，我发现自己深深陷入了寂寞哈利的生活中。

当一只动物在某地休息或经过某地的时候，会留下压扁了的叶子、脚印，或许还会留下粪便，但一个人在一间房里住过一个晚上后，房间会印下他的个性、传记、最近的历史，有时候还会留下这个人未来的计划与希望。我相信人的性格也会渗进墙里，然后慢慢释放出来。这或许是一种可以解释鬼怪与显灵之说的讲法。即使我的结论也许不正确，但是我对人留下的足迹却非常敏感。除此之外，我一点都不羞于承认自己是个无可救药的偷窥狂。只要经过没有拉帘子的窗子，我一定会往里面瞄一瞄，每次听到与我无关的对话，我也一定不会非礼勿听。我可以自圆其说或甚至自抬身价地辩称我的行业就是要了解大众，不过我想其实我只是单纯地好奇而已。

当我坐在没有经过整理的房间里时，寂寞的哈利开始成形并开始有了实体。我可以感觉到刚才离开的那位客人所留下的七零八落的物品。当然，就算查理的鼻子并不完美，他也一定可以知道得更多。但是查理现在正在狗舍里剪毛。不过即使如此，哈利仍然真实得像我所遇到的任何一个人，或者比许多我遇到的人更真实。他并不特别，事实上，他属于数量相当大的一群人当中的一个。也因此他成为美国每一个研究所关心的对象。在我开始拼凑出这个人之前，在我让一大群美国男人开始紧张之前，我要先声明，这位房客的名字并不是哈利。他住在康涅狄格州的西港 (Westport)。这个信息来自好几个衬衫上的洗衣条。男人通常住在他洗衬衫的地点。我只能猜测他经常到纽约工作。他旅行到芝加哥的主要目的是出差，不过在其中加了点传统的余兴节目。我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因为他在好几张饭店的信纸上签名，每个名字都签得有些歪斜。这似乎表示他在商业界并没有太多自信，还有其他的地方也有这样的迹象。

有一天他着手写给他老婆的信，最后也进了垃圾桶。“亲爱的：这儿一切都好。曾试着打电话给你姑妈，但没人接听。我真希望你在这儿陪我。这是个寂寞的城市。你忘了帮我把袖扣放行李里，所以我在马修费德店 (Marshall Field) 里买了一对便宜的袖扣。我写信的时候正在等着 C.E. 的电话。希望他能带来合……”

就像信上那个亲爱的并没有来这儿为哈利把芝加哥变成一个比较不寂寞的地方，这个人的客人也不是带着合约来访的 C.E.。他的客人是个一头褐发的她，擦着淡色的口红——烟灰缸里的烟屁股，还有桌角的高脚玻璃杯可以证明。他们喝了 Jack Daniel's 威士忌，一整瓶——空的瓶子、六个汽水罐，还有一个曾经装过冰块的桶子。她用味道很浓的香水，并没有留下来过夜——第二个枕头有人用过，但没有人睡过，除此之外，丢掉的面上也没有口红印。我觉得她的名字应该是露西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

么认为。或许因为她的名字本来就是露西儿。她是个很紧张的朋友——在哈利休息的时候抽着烟,有滤嘴的香烟,但每根熄掉的烟都只抽了三分之一,就再点上另外一根,还有,她并不是把烟捺熄,而是把烟拧熄,每根烟的底端都是断的。露西儿戴着一顶那种用排齿梳固定在头发上的小布帽。有根排齿断了,床边的那根断排齿和一根金属弹簧发夹告诉我露西儿是个褐发女郎。我不晓得露西儿是不是专业人员,不过至少她在执业。她有良好的职业习惯。她不像业余者在各处留下太多的东西,而且她并没有喝醉。她的杯子是空的,但是红玫瑰的花瓶——管理阶层的殷勤小礼——有 Jack Daniel's 威士忌的味道,这对玫瑰并没有太大的好处。

不晓得哈利和露西儿都谈了些什么。不晓得她有没有减轻哈利的寂寞。一种不明原因的感觉让我对这点抱持怀疑的态度。我认为他们两个都做了大家认为他们会做的事。哈利不应该慢慢喝酒。他的胃无法消化——垃圾桶里有坦适的包装纸。我猜他从事的是一种神经质的工作。寂寞的哈利在露西儿离开后,一定又一个人把酒全喝完了。他出现宿醉的现象——盥洗室里有两根铝箔管装的解酸剂 (Bromo Seltzer)。

寂寞的哈利有三件事情一直让我无法释怀。第一,我觉得他没有得到任何乐趣;第二,我认为他真的非常寂寞,或许已经到了一种积习成癖的程度;第三,他的一切行为都在意料之中——没有打破杯子或镜子,没有大发雷霆,也没有留下任何欢愉的具体证据。我一脚脱了靴子满屋跛行,想要找出哈利是个怎么样的人。我甚至还看了床底与衣柜里面,他连领带都没忘记带走。我为哈利感到难过。

02

美国与美国人

芝加哥是旅程中的一个休息点,一段让我恢复名字、身份与快乐已婚状态的时期。我的妻子从东岸飞过来作短暂的停留。我很高兴这样的改变,重新回到自己熟悉与信赖的生活中——但这里却让我遭遇到写作上的困难。

芝加哥破坏了我的连续性。在生活中,这并不碍事,但是写作却不行。因此我没有把芝加哥写进来,因为这段过程牛头不对马嘴。在我的行程中,芝加哥之旅愉快可喜,但在写作上,这段行程只会制造不协调。

当这段时期结束并彼此道了再见后,我必须再次经历与当初同样的失落寂寞感,痛苦的程度不亚于刚开始。然而除了独处之外,寂寞似乎没有解药。

查理同时被三种情绪撕扯——把他单独留下所产生的对我的愤怒、看到駕駛难得时的高兴,以及对他自己外表单纯的骄傲。经过梳理与清洗后的查理,对自己满意的程度,就像一个穿上手工精良衣服的男人,或一个刚经过美容院打理过一切的女人,这些人全都能相信自己通体明亮。查理经过梳理的四条腿变得非常高贵,一头银蓝色的毛发潇洒俊俏,尾巴上的毛球像根乐队指挥棒。整理修剪过的厚胡子,让他散发出 19 世纪法国显贵的风采与姿态,另外,还顺带遮住了他弯曲的前牙。偶然的机会让我知道他没毛是什么德性。有年夏天,他长出的毛全纠缠在一起,还生了霉菌,于是我剪光了他的毛。在刚毅犹如塔楼的狗腿下面,是四条纺锤般的胫骨,既细又不太直;剔掉他的鬚襟毛后,露出来的是条中年狗下垂的肚子。不过查理就算清楚自己不完美的真面目,也没有表现出来。如果,仪态能造就一个男人,那么仪态加上梳理就可以造就一只鬈毛狗。他直挺而高贵地坐在駕駛难得的椅子上,让我了解到获得他的原谅虽然并非不可能,但我必须努力才行。

查理是个骗子,我很清楚这点。我儿子小时候曾参加过夏令营,有次我们做父母的人去进行那种极为乏味的探访。准备离开时,有位妈妈对我们说她必须尽快离开,否则她的孩子会受不了。这位妈妈紧闭着勇敢却颤抖的双唇逃开了,她隐藏住自己的感觉,就是为了保护孩子。她儿子看她离开后,带着无限轻松的表情回到自己的小团体,继续原来正在做的事情,我知道这孩子之前也在玩游戏。因此我晓得,我离开查理五分钟后,他就会找到新朋友,做好安排让自己开心愉快。但有件事情,查理没有装模作样。他很高兴我们又要开始旅行了,连着好几天,他都让旅程更添光彩。

03

意料之外

伊利诺伊州给了我们一个漂亮的秋日,清爽又干净。我们快速朝北前进,往威斯康星州行驶,我们穿过一片拥有良田与高大树木的壮观土地,这是一块属于君子的乡间土地,整齐,围着白栅栏,不过我猜地主一定还有其他收入。因为在我看来,这块地不但似乎没有那种可以养活自己与地主的冲劲,反而像一个需要许多无名氏奉养与协助才能继

续活下去的漂亮女人。不过话说回来,这个事实一点都不会影响到她的可爱——前提是如果你养得起她的话。

从别处知道某块地方的真相,然后接受并了解这块地方,但同时又对这块土地一无所知,不但是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且发生的几率还很大。我从未到过威斯康星州,但这辈子听说过无数这儿的事情,吃过这儿的起士,有些威斯康星起士还具备了世界水准。除此之外,我一定也看过这儿的照片。每个人一定都看过。那么为什么在面对这个地区的美丽、田野、山丘、森林与湖泊的多变时,我还没有准备好呢?现在想想,之前一定是因为威斯康星州丰富的牛奶产品,让我认定这是一大块平坦的牧牛草地。我从未见过变化这么快速的乡村,正因为我什么都不期待,所以看到的景象令我惊喜。我不晓得这儿在其他季节是什么样子,夏天也许因为酷热而显得又臭又不稳定,冬天也许因为阴暗的寒冷而让人呻吟。但当我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在十月初看到这个地方时,天空因乳白色的阳光而变得浓郁,不但一点都不模糊,反而清爽又干净,每株在霜寒中仍透着欢欣的树被衬得更为出色,起伏的山丘全都独立而分隔,完全没有混淆在一起。光线渗入土壤当中,让我似乎因此能够深深地透析一切事物,除了希腊,我从未在别处看过这种光线。现在记起来,曾有人告诉过我威斯康星是个美丽的州,但那番话并没有让我作好准备。那是神奇的一天。整片土地滴落着丰盈,胖牛与肥猪闪烁在一片绿当中,范围较小的玉米丛,杵着玉米应有的样子,站在各自的小帐篷中,除此之外,还有满地的番瓜。

我不晓得威斯康星有没有起士品尝节,但我这个热爱起士的人觉得应该有这么一个节日。到处都有起士,起士中心、起士合作社、起士店与起士摊,或许还有起士冰淇淋。我可以相信关于起士的一切事情,因为我看过一大堆瑞士起士糖的广告牌。很遗憾我没有停下来试吃些瑞士起士糖,因此现在也无法说服任何人起士糖是真有其物,并非出于我的杜撰。

我看到路旁有个非常大的结构体,那是世上最大的贝壳配销处——不过威斯康星州从寒武纪之前就没见过海了。我曾听过威斯康星山谷 (Wisconsin Dells) 的大名,但却完全沒有意料到冰河期能雕刻出如此诡异的地区,这是一片光怪陆离的水流区,经过雕琢的石头,有黑也有绿。如果一觉醒来身在此处,可能会以为自己置身在某个其他星球的梦境中,因为这儿如果不是有种不属于尘世的特质,就是保留了这个世界跟现在很不一样的年轻时期的铭刻记录。紧贴着这个似梦似幻水道周围的,是我们时代的破烂:汽车旅馆、热狗摊、广受夏日观光客喜爱的不入流廉价商品,不过这些丑陋的疤痕都因为冬天而关上了门、钉上了板子,就算仍在营业,我也怀疑他们能否驱散威斯康星山谷的魔法。

那天晚上我停在一个山坡上,这是个供卡车司机使用但很特别的地方。超大型的运牛卡车在此停靠休息,最近来过的卡车留下了许多残余物。一堆堆成山的粪便,还有粪便山上一片片的苍蝇。查理像个进到法国香水店里的美国女人,狂喜地到处嗅。我无法批评他的品味,青菜萝卜各有所爱。这里的味道很浓,很像土,但并不恶心。

随着夜色深沉下来,我跟查理在令他欣喜的粪便山之间散步,一直走到山顶,往下俯瞰小山谷。我看到了令人困扰的景象。我想如果不是因为开车开太久视力有点扭曲,就是我的判断力有点混乱,因为我看到下面的黑色土地好像在移动、跳动以及呼吸。那儿没有水,但却像黑色的液体一样出现涟漪。我快速走下山,想甩开这种扭曲的画面。结果山谷里的地面上全是火鸡,看起来就像有好几百万只,因为数量过多、过于拥挤,所以这些火鸡密密麻麻覆盖住了整片地面。我大大松了一口气。当然,这些火鸡都是为感恩节而准备的。

成群结队漫无目的地兜圈子,是火鸡到了晚上的天性。我还记得年轻时看到的农场上的火鸡为了防范野猫与郊狼如何聚成一堆,成群结队在柏树林里睡觉,这是惟一让我知道火鸡竟然还有智力的线索。了解它们并不代表喜欢它们,因为火鸡既虚荣又可笑。它们总是聚成容易受攻击的团体,然后听到谣言就惊恐不已。所有家禽的疾病都会出现在它们身上,除此之外,它们还会生些自己发明的疾病。火鸡似乎属于躁郁一族,带着红色的肉垂呱呱乱叫,一会儿张尾拍翅做出妖娆的虚张声势状,一会儿又胆小懦弱地挤在一起。实在看不太出来它们跟那些聪明、爱猜疑的野生禽类有表兄弟的关系。不过这里好几千只盖满了整片大地的火鸡,则全都等着要躺到美国大盘子上。

我知道从未看过著名的圣保罗与明尼阿波利斯双子城是件很丢脸的事,但更丢脸的是,我曾经过这两个地方,只是一直到现在仍旧还是没看过。靠近这两座城市时,一大片车潮吞噬了我,有一波波的旅行车大浪,还有呼啸而过的卡车激流。不晓得为什么每当我太过谨慎地计划一条路线时,结果总是事与愿违,然而当我怀着快乐的无知朝着虚构目标瞎闯乱走时,却总是吉人天相,一路无往无阻。那天一大早我就在研究地图,画出

了一条想要走的详细路线。直到现在，我都还保留着那个自大的计划——从十号公路进入圣保罗，然后慢慢转入密西西比州。密西西比的这个 S 形弯道会提供我三条过河的路。走过这个愉快的路线后我打算穿过因为名字而吸引我的黄金河谷(Golden Valley)。看起来够简单的了，或许可以行得通，但是行得通的人不是我。

首先，交通像涨潮的海浪一样击中了我，带着我往前行，前面是一辆有半条街长的运油车，像块闪亮的船难残骸般在我前面蹦蹦跳跳。后面是个装了轮子的硕大水泥搅拌器，搅拌器上的大榴弹一路走一路转。右边，根据我的判断，是座原子大炮。我跟平常一样，既惊慌又迷了路。于是我像个愈来愈虚弱的泳者，侧身往右边挤，进入一条令人心情舒爽的街上，直到被警察拦了下来，他告诉我，卡车以及同属卡车之流危害社会的坏蛋不得进入这条街。他又把我推回了如狼似虎的车潮中。

我开了好几个小时，一直都无法把眼睛从环绕住我的巨兽身上移开。我一定已经开过了头，不过我从头到尾都没有看到河。我一直都没有看到河，也一直没有看到圣保罗或明尼阿波利斯，我只看到川流不息的卡车，我只听到马达嘶吼的声音。空气中弥漫的柴油毒气，在我的肺里燃烧。查理也开始咳嗽，但是我实在挪不出时间来拍他的背。我看到了一盏红灯，说明我正走在疏散路线上。我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搞清楚那是什么意思。我的头不停地在转，失去了所有方向感。但是那张标志——“疏散路线”——却持续存在。当然，这是一条为了逃离尚未投掷的炸弹所设计的逃亡路线。就在美国中西部的正中间，突然出现一条逃跑路线，一条因为恐惧而设计的道路。在心里，我可以了解，因为我曾看过人群逃亡的画面——堵塞的路完全无法动弹，人群争先恐后地翻越我们自己设计出来的峭壁四处逃窜。突然间，我想到那整片山谷中的火鸡，心中质疑着我凭什么认为火鸡愚蠢。至少，它们有一样东西比我们强：它们还蛮好吃的。

我花了将近四个小时才穿过双子城。听说这两个城里有些地方很美。我一直都没找到黄金河谷。查理帮不上一点忙，建造一样东西好让自己将来可以从这个东西中逃出来的比赛，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上月球只是为了赶快从月球上逃回来，也不是他会做的事情。查理看到了我们的愚蠢，也原原本本地接受这些——愚蠢。

在这种嘈杂的环境下，我一定是在什么时候过了河而不自知，因为我之前就已经回到了十号公路上，并且一直在密西西比州的东边朝北走。乡间在我的眼前展开，我停在一家路边的餐馆旁，身心俱疲。那是家德国餐厅，香肠、德国泡菜一应俱全，吧台上吊着成排晶莹剔透却没人用过的啤酒杯。当时，我是店里唯一的客人。女服务生并不是什么传说中的冰岛女王，而是一个脸臭臭的瘦小家伙，她如果不是一个有烦恼的年轻女孩，就是个精力非常充沛的老女人，但是我看不出来她是哪一种人。我点了腊肠、德国泡菜，然后亲眼看着厨师取下香肠上的塑料套，把香肠丢进滚烫的水中。送上来的是罐装啤酒。腊肠非常难吃，酸泡菜也糟到了侮辱人的地步。

“请问你可不可以帮帮我？”我问那位既年轻又年老的服务生。

“什么事？”

“我想我有点迷路。”

“迷路是什么意思？”她说。

厨师靠着他的窗子，把赤裸的手臂摆在送菜台上。

“我想要到索克中心，不过好像不太知道该怎么去。”

“你从哪儿来？”

“明尼阿波利斯。”

“那么你在河的这边做什么？”

“嗯，我在明尼阿波利斯好像也迷路了。”

她看了看厨师。“他在明尼阿波利斯迷路了。”她说。

“没有人会在明尼阿波利斯迷路，”那位厨师说，“我生在那儿，所以我知道。”

女服务生说：“我来自圣克劳德，我也不可能在明尼阿波利斯迷路。”

“那么我猜自己在迷路这方面挺有天分的。我现在想去索克中心。”

厨师说：“如果他能一直走这条路，就不可能迷路。你现在在五十二号公路上。过圣克劳德，继续待在五十二号公路上。”

“索克中心在五十二号公路上吗？”

“不会在其他地方。你一定是外地人，竟然在明尼阿波利斯迷路。我蒙着眼睛都不会迷路。”

我有点不耐烦：“你在奥尔巴尼或旧金山会不会迷路？”

“没去过那些地方，不过我敢打赌，我一定不会迷路。”

“我去过德卢斯，”女服务生说，“圣诞节我要去苏瀑。我的阿姨住在那儿。”

“你在索克中心没有亲戚吗？”厨师问我。

“当然有，不过并不是像他说的旧金山那么远。我哥哥在海军服役，他在圣地亚哥。你在索克中心有亲戚吗？”

“没有，只是想去看一看。辛克莱·路易斯是那儿的人。”

“噢！对。那儿还立了个牌子。我想应该有不少人去看那儿吧。对小镇有点帮助。”

“他是第一个告诉我这个地区的人。”

“谁？”

“辛克莱·路易斯。”

“噢！对。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只看过他的书。”

我确信她正打算说：“谁？”不过我阻止了她。

“你说过了圣克劳德，然后继续待在五十二号公路上？”

厨师说：“我想那个叫什么名字的家伙已经不在那儿了。”

“我知道。他已经死了。”

“不会吧。”

本文摘自《横越美国》，注释从略。



约翰·斯坦贝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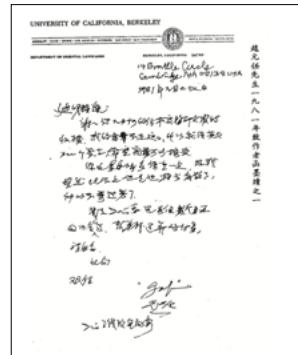
1962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生共创作 27 部作品，代表作包括《人鼠之间》《小红马》《愤怒的葡萄》《伊甸园之东》等。其中《愤怒的葡萄》获得 1939 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和 1940 年的普利策奖。

发现经典

这里是已经出版、我们认为不应该被湮没、遗忘和打成纸浆的旧书。



1944年，赵元任在哈佛寓所跟女儿赵如兰谈论音乐。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品格，在各报纸上大都陆陆续续的有人写了，但是我回忆往事，关于姑父治学的方法、研究的热忱跟他工作精神的认真，略述一、二。

二、初次看见赵先生

在六十多年前（大约一九二〇年左右），我从天津南开中学放寒假回北平，因为祖母、三叔全家都住在北平，我去看祖母，我是她从小带大的，她非常疼爱我。当我回到北平之后，才知道姑母（杨步伟女士）也从日本学医回国，在绒线胡同开了一家森仁医院，祖母叫我去看看姑母，我从小就离开她，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不敢一个人去，后来还是三婶陪去的。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早晨是一个寒冷的下雪天气，我们到医院，里面的人很多，谈笑之声不绝于耳。当我们走进客厅时，就听见姑母大声对三婶说：“这是时逢吗？”后来姑母给我们一一介绍屋里的客人，才认识了赵先生，她特别对我说：这是赵元任博士，他在清华教书。赵先生笑嘻嘻的不说话只点点头。但是给我深刻的印象，温文儒雅，很少说话，谈起话来风趣而幽默，一见而知足学者的风范，这是眼赵先生第一次见面。后来我就离开了北平，回南京去了。第二年得到唯一的好消息，就是姑母跟赵先生结婚了。之后，他们游历国外，数年中一直没有什么信息。

三、在清华大学二年多

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春天，忽然接到姑母来信告诉我，替我找到一份工作，要我立刻去北平，我就整理行装，动身上路。到了清华园先暂住在姑父、姑母家中，他们住在清华学校门外的南院一号，那里都是教授们住的宿舍，那时我才知道姑父是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导师。清华学校那时改为国立清华大学了。它内部有三种不同的制度：一、清华学校（是留美预备部，学制为八年）。二、国立清华大学（四年学制）。三、清华国学研究所（未定年度）。那时是清华极盛时代，曹云祥做校长，梅贻琦是教务长。国学研究所的导师有：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讲师李济等诸位先生。助教有：赵万里、梁廷灿、浦江清，王庸是李济先生的助教，我是赵先生的助教，我有这份工作，可以多听课跟多学习，自然很乐意接受。住在姑父家里，朝夕相聚，他们待我非常亲切和爱护，随时教导我看语言方面书籍，学习国际音标让音跟记音方法、打字、语音实验等。在这二年中，得益良多。打开了我走这一门学科的道路。我们曾经到江浙两省属于吴语区域各县乡镇，调查吴语方言。由北平出发先到南京，同行的人除姑父跟我之外，有姑母、梅先生、楼光来先生的小姐，到南京后，只有姑父跟我两人各处去调查。从南京沿着京沪杭铁路，每站下车，如镇江、丹阳、吴锡，再乘小火轮船到宜兴、栗阳，又转同无锡……各处寻找学校学生作发音人，记录该处方言。有时一天跑二、三处，常常夜间找不到旅馆，连小的客店也找不到，只好借宿在乡间农村人家。我还记得有一次夜间由无锡赶火车到苏州的短程火车，只有四等长板椅的统车厢，搭车的人并不多，我们上车去，因为太疲倦了，各人用带的小手提箱做枕头，想休息休息，也因为太困了，不知不觉的我们就睡着了。等醒来时，满车漆黑，我们望外一看，才知道前面几节车厢已经开走了，只有我们这节车厢仍停留在原处。姑父对我说：“现在也不容易找旅馆，只好就在车上睡到天亮吧！”想起那时京沪铁路的交通，还算方便的，尚且如此，后来在那些乡下找发音人录音，实在也太辛苦了。姑父身体一向也不很好，我很担心他在路途中生病，总劝他每天少调查一点，他笑着对我说：“那回家的日子就要耽搁了，不是更费时间，也更多辛苦几天吗？”由此我对于姑父工作认真的精神跟浓厚的兴趣，实在应当效法的。我在旅店里常常深夜

本文摘自《赵元任早年自传》（2017年2月），由博集天卷授权发布。

一、噩耗传来

二月二十五日傍晚，我刚吃过晚餐，忽然接《新生报》的一位记者小姐打电话来说，赵元任先生已经去世了。我问她怎么知道的，她讲“美国麻省打来的越洋电话。”我听到这消息，心绪立刻烦乱起来，所以她问我关于赵先生的生平，我回答她的话，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说的。我还不敢太相信这是事实，我就打电话给钱院长，他说他已经接到赵如兰（赵先生的大小姐）的电报，这才证明赵先生是因心脏病去世的。追思去年三月一日我姑母病逝加州后，曾经姑父回信给钱院长说：“韵卿去世，现在暂居小女如兰剑桥处，一时精神混乱，不敢即时回 Berkeey（柏克莱），并且亦不能再称‘回’柏克莱了，……也不能说‘回’家了。”当我看到姑父给钱院长信的副本中，可以看出老来丧去伴侣悲伤的情怀，可想而知了，我看了这几句话，也不由得眼泪直流。事隔还不到一年姑父也随着离开这世界了。当我们听到这信息时震惊得许久不能说话，悲哀的心情，无法形容。前几个月连接到他两封信，知道他身体还好，最近也没有他生病消息，没想到这么快就与世长辞了。真叫我们无穷的追思跟怀念。附姑父去年九月二十二日及十月七日在麻省剑桥如兰处的来信，看到姑父信上的笔迹，就感觉到他写字时发抖，精力衰退的现象。

前几天（三月七日）接到刘绍唐先生来信，希望我为《传记文学》写一点纪念赵先生的文字，因为近来我的血压很不稳定，而且偏高，最近半年以来都在休息之中，对于写作方面，更是不敢多费脑力。在我心绪烦乱的情形下，实在写不出什么，但为了纪念姑父、姑母，却是义不容辞的。关于赵先生一生的事迹，学术地位，为人的

醒来，还看见他的房间里灯光亮着，我想他总是写日记或看调查记录。我们结束了一个多月调查的工作，回到南京，在家里住了几天（那时我父母都住在南京），就跟姑父、姑母一同回清华园。

（一）调查跟整理的工作

当我们回到北平后，休息了一个星期，姑父除了上课外，继续整理调查的材料，写成《现代吴语研究》一书，交给清华大学出版，书中语音符号都是用国际音标，那时在北平的印刷局还没有铸国际音标的字模，所以只有我一个一个的用手写，再画成表格照相影印，说明及汉字方面，都由印刷局排版，这本书出版后，成为国人方言调查的创始，是研究吴语的参考资料，也是不朽的贡献。同时赵先生又写作了一本《新诗歌集》，当时出版，因为乐符没有法子排印，他找我帮忙绘成乐符，再照相制版，汉字部分都是排印的，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自从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出版以来，绝版了也有二十多年，应海内外声乐界的要求，再重印一个改版。这个集子里的歌的路数是 Schubert.Schumann 的艺术歌那一派的东西，可以作高等音乐教材之用。里头伴奏的音乐也都是当音乐作品来作的，像有些歌的琴谱也可以当一个琴曲来单独演奏的，里头的歌大半是独唱的，例如教我如何不想他，茶花女中的饮酒歌等，这都是刘半农先生作词，还有“他，小诗，也是徽云”，都是胡适之先生作词的。关于合唱的，例如《劳动歌》《上山》等，合唱起来比较热闹一点。徐志摩先生作词的《海韵》特为写作男女合唱团跟一个 Soprano Solo 合唱的歌。这本歌集的谱曲完成，赵先生费了很多的心力。直到现在销路都很好，也是不朽之作。

我们在清华二年多的时间，每天的工作总在十小时以上，姑父跟我虽在一个大办公室内，可是我们的工作进行，除了有些不懂的地方需要请教他以外，我们差不多整个的时间都各事其事，从不闲谈浪费一点时间，尤其姑父对于工作特别认真。他的这种态度，实在令人钦佩。

（二）赵先生的日常生活略述

姑父因为自己的身体不太健康，对于自己衣着和饮食都特别注意，日常生活，也非常有规律，姑母照应他的起居也是无微不至，数十年如一日，姑父每日早晨必需用冷水冲澡一次，看十几分钟报纸，早餐后上办公室工作到十二点，回家午餐，饭后休息少许，上办公室上到下午五、六点才回家，晚餐后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他的书房里，不是看书，就是打字或写文章，常常家里有女客跟姑母高声谈话，他还是能安静写作。有时到客厅里弹一会儿琴，又回书房工作，直到十二点以后，才真正休息。姑父一向睡眠不好，如有亮光或有响声，就不能入睡。他拥有一间大书房，书架上放有各种类别的书籍。我知道他各方面的常识很丰富，他的学问也很广泛，真可以说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他的一生最喜爱的，就是音乐、照相，凡有名的舞台歌剧演出或音乐演奏会，他跟姑母都要去欣赏的。对于饮食方面，姑父、姑母都很有兴趣，他们也都欢喜上馆子，可以点自己爱吃的菜，在家里就办不到，而且各饭馆的口味也不一样。因为吃饭的问题，姑母就想到在清华园外开一个小饭馆，后来取名叫“小桥食社”。这在赵太太写的《杂记赵家》上面也提到过。

（三）姑母开小桥食社

赵家很好客，在清华园的朋友们都知道的，不但家里常常请客，就是平常每天也都有客人来吃饭，每逢放假期北平城里来拜访他们的朋友很多，所以他们用了一个厨子，所谓厨子，不像大饭店里的大师傅，做出菜来是色味具佳，那些家庭厨子都是稍能做几样菜而已。他们自家找来的厨子也用不好，有的只做几天，就要换一个。中国菜吃腻了，换个做西餐的，北方的、南方的厨子，常常换来换去。姑母就出生意跟几个太太商量，何不请几个好一点的大师傅掌灶，做菜、做点心；开一个饭馆，既有不同的好菜吃，又可以省了家里用厨子。他们太太们商量之后，大家都很赞成，就要了学校大门外小桥过去的三间小空屋，整修起来，姑母到北平东城找了五芳斋三个厨师，就预备开张了，姑父听到这件事，很不高兴，回家跟姑母大吵。姑母的脾气，决定的事情，就是要做。房子已修理好了，门口贴了一副对联：“小桥流水三间屋，食社春风满座人。”等到开张那天，好几位教授夫人都去帮忙，那知道头天来了二百多人来吃饭，他们向来也没有做过这些事情，把他们忙得七手八脚，乱得一塌糊涂，厨子也来不及做菜，不到两个多钟头，把买来的菜都吃得光光，而钱也没有收回来，有时熟朋友来了，姑母就说“我请客”，生意越好，钱就赔得越多，所以不到二个月，

本钱四百多元也多为请客跟自己吃光了。姑母后来自己写了两句自嘲的话：“生意茂盛，本钱干净”。后来让给别人开了。

四、史语所成立

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语言组在北平成立。傅斯年先生派事务员吴巍（号亚农）从广州到北平来帮助赵先生筹划一切事务，因赵先生在北平之便，就在东城江擦胡同租了一所四合院的平房，作为办公之用，就是历史语言研究所。三月中旬语言组的同仁就开始办公，研究员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三位先生，助理员也有三个，刘学浚、陶燠民跟我，另外还有几位事务人员。在那里不过数月，傅所长由广州到北平接洽借北海静心斋、蚕坛，分作历史组、考古组办公之用，语言组后来搬到东城洋溢胡同，租了盐务处的前后两幢楼房，叫面一幢为语言组办公，后面一幢赵先生自己租下住家。那时历史、语言、考古三组虽分为三处，可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北平正式成立了。我们在那里有二年多，关于研究的工作正在进行之中，高本汉原著“中国音韵学研究”的译稿尚未完成，语音实验室也正添置仪器。这时中央研究院奉命集中南京，史语所也只好随政府迁移。那时南京所址正在计划在鸡鸣寺下兴建，我们暂时留在上海曹家渡小万柳堂办公。数月后姑父急于先赴南京策划语音实验室的工程，我也跟着他先去南京。

（一）在南京工作——调查方言计划

我们到了南京后，休息了两天。姑父就与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陶孟和先生商量借他们所的一间房间作办公室，因为他们研究所也在鸡鸣寺山下，离我们新所址，不过二百多公尺，为了监督工程方便，就在那里暂时借用。各样齐备，我们就开始办公。赵先生曾拟订两个大的计划，语言研究跟语音实验；研究方面，语言组做研究工作的同仁全体动员，预备在几年之内，把全国境内汉语方言及非汉语语言都能调查一过，整理出来，作以后研究语言参考的资料。这实在是个大的计划。实验方面，策划建造一个规模宏大的语音实验室，预备把所有调查的语言材料，都用仪器灌制成永久性的音档，以便以后随时供给听写及整理之用，所以在动工兴建史语所时，赵先生急于离开上海赶到南京，最主要的是设计语言室的蓝图，并亲自监督工程。在那段时期姑父实在太忙了，一边监工，一边拟订调查方言字表。在半年之中，已拟订了三千多字的方音调查字表及一千多字的单字表，最常用的语汇。这两种字表所用的例字，都经过他仔细选择，要顾及到调查各种汉语都可以应用，也真是煞费苦心。

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秋，史语所新屋落成，姑父跟我就先搬进去办公。后来在上海的各组同仁都陆续迁到南京了。我们语言组自迁移南京后，研究调查工作大都依照赵先生所拟计划进行，由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春起到二十六年（一九三七）春，我们全组研究人员就开始进行语言调查的工作。非汉语方面的调查是在李方桂先生领导下进行，调查了傣、苗、瑶、傈僳、藏、两广境内的僮及其他非汉语等。在汉语方面，则在赵先生领导之下，二十三年春开始调查安徽徽州府所属的六县，那里因为交通不便，所以语言也较复杂，各县四乡都调查一过。这次调查大都是罗常培先生纪录方言材料，赵先生也参加了。顺便游玩了一次黄山。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五月我又跟随赵先生、李方桂先生调查江西省境内方言，我们由南京起程乘船到九江，乘公路车到南昌、吉安、吉水、赣县等地搜集了五十余处方言材料。当我们抵达赣县后，我们都住在赣县立中学。休息一天，第二天正预备进行调查赣南一带方言。那天晚上该处专员王友兰先生跟该校校长设宴招待我们，到了夜间赵先生忽然发高烧，又吐又泻，方桂先生跟我也有些不舒服，可是泻了几次，也就好了。姑父一病数日，医治无效。只好打电报给姑母。我们调查工作也无法进行了。等姑父肚泻略好一点，我们就动身回南昌。那时姑母已先在南昌等我们了，大家起程回南京。

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秋到二十五年（一九三六）春，我们语言组同仁，由赵先生带领调查过湖南、湖北两省各县城乡的方言都调查一过。二十六年（一九三七），我们正预备进行调查福建全省方言时，中日战争爆发，战火弥漫，无法进行了。在这两年中语言组同仁（汉语方面）在赵先生领导下，完成湖北方言调查报告。此书虽是五个人分工合作，但是从头到尾都是赵先生全盘策划及起稿等各项工作。这本报告在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七月七日清稿全部完成，交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因大部分排成纸版，工厂被炸毁，继续重排，所以经过两次重印，在三十七年（一九四八）

才出书，出版后，为国际的语言学者所重视，也成为方言报告的蓝本。

(二) 语音实验室完成

语音实验室的建造，共分为四大间，关于设计、绘图等一切，也都是赵先生亲自策划的。曾经在美国订购隔音纸板及其他隔音设备，如双层玻璃窗、四层隔音板门等。室内的四面墙壁及天花板地板，全部都用八层隔音纸板铺成，下面加上地毯。隔音的完备，真是无以复加了。又向国外订购语音实验的各种仪器，如最新式的录音机数架（那时录音用的仪器非常笨重，如一个很大的扩音器，一个大的十二寸的电动转盘，另外发音的电容微音器，还用上两个大水电池），都是灌制铝片音档的仪器。此外还有，音浪计（记声调用的）、音叉，留声机及其他实验仪器数十种，在当时差不多是应有尽有了。赵先生感觉到扩音器的效力不够好，他自己拟订一个超高率的扩音器，请中国电气公司制造，效果比美国所购置的要好几倍，不但音质清楚，扩大的程度也要高一、二倍。他对于电子科学的知识，实在很丰富。我们所调查的语言都灌制铝片音档，将近千张。此外并购置各国语言会话留声片二十余套（每套大约二十四大张），还有中国各地戏剧、相声唱片，都是为研究方言之用，也有六、七百片。我们这语音实验室，真可算是尽善尽美了。凡参观史语所的人，除了看古物及藏书外，语音实验室也是他们所赞赏的，在当时可以称谓东南亚首屈一指的了。我们利用它，也完成不少研究语言材料的工作。可惜好景不长，迁到南京不过四年多，中日战争起来，我们研究所就撤退到后方了。

五、撤退到后方

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日渐明朗。情势也越来越紧张，八月十三日中日战争开始，日机在上海浦东一带轰炸。姑父在那前几天就生病了，发高烧数日，请医诊治都未能痊愈，据医生诊断为恶性疟疾，身体虚弱不堪，一听响声，就浑身流汗不止。姑母生怕姑父的病耽搁下来，好不容易托人购得两张江顺轮的大菜间舱位，决定让如兰（赵大小姐）照应姑父先到汉口，再往长沙。姑母则在家整理一切琐事，把姑父的文稿及数十年所写的日记包好寄到长沙。八月十五日南京被日机轰炸，人心慌乱。过了几天，姑母带了三个女儿及随身衣服，才乘轮船到汉口去了。在南京的房屋及书籍，后来被炸毁，全部都损失了。这段事情，姑母在《杂记赵家》中，描写得特别清楚。

再说自南京第一次遭到日机轰炸，以后不断被日机日夜地疲劳轰炸，有的人跑到后方，有的就往乡下乱跑，城内白天好像真空了一般。史语所傅所长当时通知大家同仁开会说：“研究所先发给每人半个月的薪水，暂时疏散，如有愿意到长沙去的，自行先去。”我们史语所已早有准备，在七七事变以前，就找木工钉木箱，把重要的古物、文稿、吾档、档案、书籍等先装箱运出，第二批运出的是全部书籍及个人应用的书籍。全部东西都先运往长沙。我们带着家眷的后来也决定赶到长沙，借圣经学校一幢楼房办公。

不到数月，战事日紧，长沙也常遭到日机轰炸。我们所里为保存所有古物、书籍的安全，所长招集各组主任开会，大家一致赞同，决定搬到云南昆明。

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一月里从长沙动身，我还记得同行的人，有章元善家、丁绪宝家、赵先生家跟我一家，雇了一辆长途公路汽车，经过广西省的柳州、龙州过镇南关进入法境越南谅山到河内。再乘火车到昆明，史语所有一部分同仁，也都陆续的抵达昆明了。

六、出国与回国

在昆明不到一年，姑父接到夏威夷大学聘请他去讲学，他们那时就全家整装去美国檀香山了。后来耶鲁、哈佛、跟加州各大学聘请他讲学，所以在国外就四十多年。他们曾经也回国来三次，都是开“院士会议”，逗留的时期很短，只有一九五八年回来住了三个多月，那时台湾大学的沈刚伯先生提议中文系台静农先生给这一系列的请赵先生演讲，在台大出版，现引用赵先生在《语言问题·序》中说：“表示这一系列的演讲是讲语言的，不是讲文字的。但是因为讲的时候常常引些各种语言材料的例子，因此全体用了磁带录音的方法录了下来，再听写下来，所以在演讲的时候，一边用录音机灌制音带，再由台大的几位同学做这很费耐性记录的工作，他们在董同龢先

生领导之下，运用国际音标的纯熟，可以比得上任何国的同等资格的语言学生。”姑父说得真是不错，在整理《语言问题》的同学们，据我所知道的，其中已经查三位现在成为语言学家，我想也不为不受赵先生的影响。

赵先生在国内外出版的专著约有三十多种及论文一百数十篇。都登载历史语言研究所四十周年纪念刊跟“中央研究院”院士及研究人员著作目录中。他在学术上的贡献实在很大，不愧为名满国际的学者。

七、在美杂记

一九五九年夏，我申请亚洲协会补助去美，在加州大学做研究工作，并跟姑父商量整理《云南方言调查报告》事（这本书已在一九六九年出版）。到了旧金山机场后就远远的看见姑父他们，真是高兴得很，下了飞机后，姑父开车回家，他们叫我暂住在那里。柏克莱是加州大学所在的地方，也算是一个文化城，路上非常清洁又安静，他们住的地方，离街市较远，在一个山坡上，路的两旁柳树成荫，风景宜人。当我走进大门，就是大客厅。左边一间书房，架上放满各类的书籍。楼上有四间卧室，我们都住在楼上。居高临下，从窗户中可以看到全镇，在晚间街市的灯光灿烂，远眺可以看到旧金山市的灯光，真是一美极了。他们房子后面有一块很大的空地，园中栽种各种花木及莫树，还都是姑母一手所培植的。他们的每日生活，一如往昔，姑父除到学校上课外，在家里大部时间都消磨在看书或写作上。

我在赵家住了七个多月，他们对我的爱护和亲情，实在使我感到无比的温暖，甚至比在父母面前，还要亲切。姑母终日忙碌，闲时我们常常谈到回忆的往事。她曾经跟我说，想把她一生的事情写成书发表，果不其然，全凭着她的记忆完成了《一个女人的自传》跟《杂记赵家》。有时她对我说这几年来在家里做饭，觉得做饭麻烦，口味也腻了。所以姑父喜欢上饭馆去吃，那么落得省事，所以我们常到外边吃饭。每一个礼拜总要到旧金山去吃三、四次，有客人来正好请他们出去吃了。在那里住了七个多月，他们计划到东部去旅行，看如兰他们，姑父也替我向加州大学申请了一笔旅费，同他们一起到东部去旅行一个多月。我在剑桥如兰家里住了几天，还是第一次看见表妹夫卞学鑑，他是 MAT 的教授。我在那儿参观哈佛的图书馆、博物馆。后来，我个人预备到华盛顿及纽约去游览，所以就跟他们分手了。等我回到剑桥跟姑父他们一同回柏克莱。那时我也打算结束了这一年的研究工作，预备同台湾去。姑母跟我说，希望我留下，姑父介绍我在加大继续作研究工作，我住在美国实在感到没有什么兴趣，所以我还是决定回来。

一九六七年普林斯顿大学办了一个“中国语言学研究计划”聘请关于研究中国语言的学人，参加他们作研究工作。一九六八年春接到该研究计划来信，聘我当高级研究员，借这个机会又可以跟姑父姑母他们见面了。我常常想到他们两位老人家住那里，也很寂寞的，又没有人照应他们。但是我这次是在东部纽泽西州，离西部相当远，也不能常常相见。

八、一对为人所羡慕的佳偶

在五年前，有一位记者在美国柏克莱到他们赵家访问，说他们是一对神仙伴侣，姑母对他说：“我们吵吵闹闹争了五十五年，但也和和乐乐地共渡了大半个世纪。”我由这两句话，想到他们二老的个性实在有些不大相同，连姑母自己都说“我们两个人的脾气就是如此地过了数十年”。姑父是天性纯厚，道德风范、有修养，对人和蔼可亲而不多言，从不争长论短，说话风趣而幽默，总要经过三思而后再行；但是姑母的天性豪爽而果断，思想灵敏，心直口快，无话不说，又热心愿意帮助别人，他的脾气想要做的必不中止。我想跟她认识的熟人，大都会知道她的脾气。可是他们生活在一起七十年之久，姑母对于家中一切大小的事情都是亲自料理，对外的交涉，也不用姑父操心，孩子们的抚养，姑父本身一切饮食及冷暖，姑母都是亲自照应，爱姑父的心，可想而知，由此可以让姑父专心研究跟写作，他的成就，姑母也有很多鼓励和帮助的。我常常听到人家说赵先生怕太太，实际上赵先生有好些事情都尊重姑母的意见，有时他们也少有一点争论的，因为姑母噪音大，性情也急些，姑父也顺从就不争了。其实他们争争吵吵的地方还是不多，倒是可以说“他们这一辈子恩恩爱爱地过了六十多年”。

赵先生不但在学术研究方面有莫大的成就和贡献，就是办事的才干跟智慧，也非常

人所能及的。我们在一块工作，差不多十几年，他的为人，在我的印象，真是少有的，从未骂过人，就是讨论学问时，也都是和颜悦色。答应人的事，是一诺千金，一定履行，真是一位典型的学者，值得我们效法。

赵先生及夫人去世之后，并未举行葬礼，经火葬后，把骨灰撒在外海中，只是他们生前的愿望。至于他们所有的书籍跟他们所住的楼房，听说在他们遗嘱里，把他们一生所余积的产业，全部捐赠给加州大学了。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十卷 第四期



本文摘自《赵元任早年自传》（2017年2月），
由博集天卷授权发布。



杨时逢

安徽石埭人，20世纪知名语言学家，一生治学专注于汉语方言的调查和研究。他的姑母杨步伟是赵元任的夫人，因此他的人生轨迹和治学历程与赵元任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1926年，杨时逢自金陵大学毕业。同年7月他到清华学校研究院担任助教，一直到1938年赵元任赴美，在此期间他一直作为赵元任的助理，协助赵元任的教学、语言调查和研究工作。1927年9月，赵元任赴上海、江苏和浙江等地调查吴语，杨时逢亦一同前往。此次调查最终形成了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这是中国首部用现代语言学方法研究方言的著作，影响深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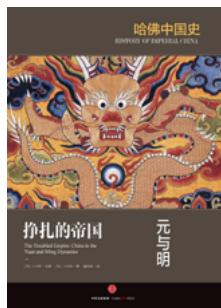
发现经典

这里是已经出版、我们认为不应该被湮没、遗忘和打成纸浆的旧书。



来自 zhang kaiyv on Unsplash

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正统御驾亲征却遭土木堡之变，被瓦刺虏去，是另一个靖康之耻。天启近乎文盲，最大爱好是当木匠。弘治终身不曾纳妾，是国史中唯一一个一夫一妻制的皇帝。建文不知所踪，留给后世无穷遐思。崇祯勤勤恳恳地亡了国，自挂歪脖子树。这就是大明王朝，一面钳制民间至“片板不许下海，寸货不许下番”，另一面却有金瓶梅、黄宗羲和张岱，而这一切，都能在太祖朱元璋那里找到起点。



卜正民所编的六卷本《哈佛中国史》，这套书的切入点和《剑桥中国史》那种我们熟悉的通史不大一样，当中卜正民自己写的《挣扎的帝国：元与明》这一本尤为明显，第一章写莫名其妙的“龙见”，即元明时民间对龙的记录。元代第一次出现龙，是 1292 年在太湖边，随后又有多次龙见，直到 1367 年 7 月 9 日，一条龙从废太子府的一口井中一飞冲天，八个月后，元朝的军事统治终结。到了明朝，除了朱元璋即位的第一年夏天之外，整个洪武年间都再无龙见，因为“既然有一位龙主登上了宝座，群龙就要俯首听命”。卜正民说，龙见就像威尔士的黑豹，是无能为力的农民借由自然力量，“用以对抗难以捉摸的国家权力”。朱元璋自认仁主，但自他称帝之后，甚至连龙都消失了，这最好地证明了卜正民对朱元璋的评价：“本想把中国变成一个道家的乌托邦，但后来沦为了法家的古拉格”。

与荒诞不羁的后代们相比，朱元璋显得极为严肃勤勉，他也一直真心相信自己是个好皇帝。李洁非在《龙床》里列举写了朱元璋种种善待百姓之处，他对粮食和农事甚至有一种几乎病态的敬畏，晚年留下的《皇明祖训》里，朱元璋自我评价为“凡吾平日持身之道，无优伶进狎之失，无酣歌夜饮之欢；正宫无自纵之权，妃嫔无宠恣之专幸……晚朝毕而入，清晨星存而出，除有疾外，平康之时，不敢怠惰”。这些话并没有什么过誉之处，朱元璋选性格仁爱慈善的朱标为太子，也足见他内心对何为仁君并非没有判断，但与之对应的，却是仅胡惟庸一案，朱元璋就杀掉数万人，这个案子加上明初的另一个大案蓝玉案，冤死之人超过十万。一个案子延绵十几年，官场上下无人不惧，永远在抓反革命，永远能抓出更多的反革命，而且自胡惟庸被杀、朱元璋罢左右二相、废除中书省之后，中国的制度完全走至另一个方向，帝制中那一点点宪政的影子（卜正民语）也至此荡然无存，李洁非在书中说，虽然从几千年国史的大趋势来看，社会权力一直越来越远离“公”的范畴而向“私”的范畴集中，“但是权力变成彻头彻尾“大私无公”的东西，确确实实是在朱元璋手中完成的”。

周辅成说“毛泽东活着的时候，谈明史是很危险的”这句话时，毛刚去世不久，他大概是从吴晗的经历里有此感慨。这也是读明史时让我最困惑的部分，吴晗从被胡适推荐进入清华大学史学系起，一直专治明史，一九三四年，二十五岁的吴晗就写出了《胡惟庸党案考》，将此案来龙去脉写得极为清楚明白（整个过程和国史中的种种冤案一样，可用“莫须有”概括），最后的结论也可谓看透了朱元璋：“明太祖自身出身寒贱，寄迹缁流，且又赋性猜嫌，深恐遭知识分子所讥刺。在他初起事的时候，不能不装作礼贤下士的神气，借作号召，及至大事已定，便不惜吹毛求疵，屡兴文字之狱。又恐知识分子不为所用，特颁《大诰》，立囊中士夫不为君用之目。一面算是严刑示威，一面却也不无带着一些嫉视的阶级意识。《大诰》中所列文士得罪者不下千人。在胡蓝二狱中所杀的几万人中大部属于知识分子……这是明太祖巩固君权的方法，也是这几次大狱的起因”。但几十年之后，官至北京市副市长，很清楚自己属于“高级知识分子”（即朱元璋最为忌惮的那批人），并且已经亲自参与了反右运动的吴晗（他主持了对储安平和罗隆基的批判，还在那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底为什么毫无警惕甚至洋洋得意地写了《海瑞罢官》，让海瑞痛痛快快大骂皇帝一场，难道他真的无法判断当时头上之人，是嘉靖还是太祖？

档案

贫瘠的一年，危险的明史

李静睿 | 小鸟年度专辑

“大梦将寤，犹事雕虫”

2022 年难以总结，不管在哪个意义上都是如此，它因为过于壮阔，而显得分外贫瘠。我总想到 2008 年，汶川地震后我去前线采访，坐在军用直升机上看着已成废墟的北关县城，那时候我以为自己这辈子不会遭遇更大的事情，不会目睹更大的废墟，但 2022 年来了，周围的世界在明面上维持了一种基本秩序（或者说创造了更为繁复的秩序），但我们都清楚看到了在这种森严秩序之下的东西：废墟。

我家楼下的核酸亭在一夜之间被拆了。前一天回家我还看见它，第二天早上出门它就消失了，地上留下几个钉子。如今我记下 2022 年读过的这些书，就是钉下一颗钉子，死死钉在地面上的钉子是不容易被拔起的，它留在那里，反复提醒我们，这里曾经有个核酸亭。

2022 年其实没有读什么书，从阅读层面来说，这确实是我空前贫瘠的一年。书在这一年先是显得奢侈，继而显得多余，上半年我还在勉力维持一种看似正常的阅读节奏：读点文学，读点新书，读点外部世界都在讨论的东西。到了下半年，外部世界在我这里既过分沉重，又渐渐消失，我孤零零的，莫名其妙身不由己，一头掉进了明史。到了年底，我勉强爬出来重读赵越胜的《燃灯者》，居然又撞到周辅成先生说：“毛泽东活着的时候，谈明史是很危险的。”

读明史的感觉就是如此，不断和日常发生某种撞击，从这一点来说，阅读和谈论明史当然是危险的。我所记下的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奇谲之处，也谈不上什么见识，它们不过是钉子，指向一个核酸亭。

太祖：仁主和暴君

十年前我读过一段时间明史，那时候对明史的爱好不过基于趣味，明朝自洪武至崇祯，共计二百六十七年，当中有数个放在任何朝代都算得上奇奇怪怪的皇帝：嘉靖沉迷修仙，阁臣最重要的才华是要能为他写青词。万历二十八年不上朝，甚至有人说他是一直偷偷摸摸躲在后宫里抽鸦片。正德一生不羁荒唐，自己封自己为“总督

嘉靖：权术与修仙

海瑞写著名的《治安疏》是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嘉靖修仙多年，已是将死之人。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前半部分写严嵩倒台，后半部分写海瑞罢官，剧中有大量虚构内容，但刘和平准确写出了嘉靖朝那种亦紧亦松的奇妙氛围。嘉靖不是朱元璋，《治安疏》言辞激烈，甚至有“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这样放在洪武年间够海瑞被砍一百次头的话，嘉靖在震怒之下，却一直留着海瑞的命，甚至到了万历年间，海瑞仍是著名的“忠臣”，名留青史。但嘉靖也不是万历，黄仁宇写过，万历年间甚至经常有官职出现空缺，因为皇帝和群臣斗气，迟迟不肯核定人选。嘉靖可不是这种皇帝，他既要天上的仙名，也要人间的权力，从少年时代入宫即位时和群臣那场“大礼仪”开始，嘉靖就一直牢牢把权力握在自己手里，他重用严嵩，却也一直留着严嵩的对手，即徐阶、张居正等人，因为他深知如此才是制衡之道，群臣分了忠奸，自己斗得头破血流，他就可以安然位列仙班。



直至严嵩倒台，嘉靖也并没有任由这种制衡被打破，他只杀了严世藩（还是下了两次决心后才杀），严嵩最后虽然落魄，但嘉靖终是让他善终。在严嵩倒台后，嘉靖表现得极为失落，甚至一度想过退位，韦庆远在《暮日耀光》中就说，“嘉靖对于严嵩余情未断，表现得很明显……他对于群臣继续揭控严嵩，请求追究其罪责的言论极为反感，因为严嵩父子的所作所为，其中相当部分是秉承皇命或得到皇帝首肯，然后定案或施行的。嘉靖与严嵩在一定意义上说来，是穿着连裆裤，休戚与共的。过分深揭严嵩，难免触及皇威，或易于引发对皇上德行有亏的联想。”正因如此，嘉靖几乎是立刻斩了刚因揭劾严嵩被嘉奖升官的邹应龙，君心难测，在嘉靖这里可谓淋漓尽致。

从这一点上来看，嘉靖倒是深谙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中总结中国传统史学哲学中的“奸臣模式”：“奸臣欺蒙君主，滥用职权，结党营私，施横作恶，致使国运败落；一旦除去‘奸臣’，圣明重开，万众欢腾。”海瑞的《治安疏》虽然让人震惊地勇敢，甚至被后人称为《直言天下第一疏》，但思想上并没有超越这种模式，文中认为嘉靖想要比肩尧舜，不过“诸臣言之，陛下行之，此则在陛下一振作间而已。一振作而百废具举，百弊铲除，唐、虞三代之治粲然复兴矣。”反而嘉靖很清楚，除掉奸臣又如何呢，奸臣上面是自己。

嘉靖在位四十五年，除了险被宫女合谋刺杀，可谓顺风顺水，在执政层面上基本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考验，他也被公认为是明朝皇帝中最聪明的一个，但他将自己的才能和热情一半给了修仙，一半给了权术。嘉靖以操纵群臣为乐，却对真正的治国毫无兴趣，这也是海瑞痛骂之处，嘉靖的儿孙也效仿了这种风格，隆庆上任后纵情享受，万历数十年不上朝，很多大臣从头到尾没有见过他，三个皇帝加起来一百年，大明王朝由此转衰。

去年重看《大明王朝》，一开篇就是国库亏空，嘉靖让内阁和宦官们一起想想怎么弄钱，严嵩父子由此想出“改稻为桑”。管浙江的胡宗宪说改不了，几百万老百姓要饿死，但严党的人说皇帝的话就是“国策”，说改就是要改，“全浙江的人死光了也要改”严世藩指挥下面的人，瞒着胡宗宪炸堤毁田，“把那九个县给我淹了”。胡宗宪站在决堤的新安江边哀叹：“几百万生民，千秋之罪，如此伤天害理，翻遍史书，亘古未有。”这一段并非史实，小时候看了也就看了，去年看着锥心地痛，这种分明虚构，却又分外现实的碰撞，既属于艺术，也属于历史。

历史是公正的吗？当然不是，但历史和命运一样，确有一种天日昭昭（这是岳飞真正的遗言）的不可操控感。朱元璋可谓善终，但以他几乎疯狂的控制欲，他也未能

控制住最为重要的皇位继承问题，太子朱标早死，建文帝朱允炆被亲叔叔朱棣逼宫，可以说朱棣以最为朱元璋的方式，做出了朱元璋最恐惧的事情，这也算历史的某种公正。而在嘉靖这里，历史有另一种报复，他事实上死于不断进服的丹药，一个自青年时就在求长生的人，最后求到百病丛生。正如李洁非说，原本“我们看不出有何原因能够妨碍他享受‘清平乐’。然而一股奇怪的力量偏偏让他自滋事端，且沉溺如此之深，在毒素的攻逼下却残生。其实，最终被自己所坚信不移的东西所击倒和戕害，往往是唯我独尊者无法逃脱的命运。”

这两年沉迷于读历史，可能正是想看到这种命运不断重现，想看到时间给出最终的正义。

三案之后，一点火光

这一年读的明史里，除了二十年来反复读过的黄仁宇，我最喜欢的是温功义的两本书，一本《三案始末》，一本《明代的宦官与宫廷》。《三案始末》薄薄十万字，把梃击、红丸、移宫三案讲得清清楚楚，这大概是在黄仁宇之后，我读过史观最正、又最适合我们这种普通读者进入的明史书了。这次重读《万历十五年》，才发现温功义的书是重要参考书目。温功义算不上什么正宗历史学家，他以报人出身，四九年之后“因性情耿直而被排挤，赋闲在家，以诗文自娱”，他这才开始研究明史。和吴晗成为鲜明对照的是，我觉得温功义正是从明史看透了很多东西，《三案》开篇就写帝权和相权之争，可以说每一句话都在讲述历史，又每一句话都在敲打现实，他看得清楚，虽处处不得意，却反而能在乱世之中自我保全。



“三案”几句话难以概述，它们看似不过宫廷事件，却被公认为中国古代政治史一个分水岭，自此政治已经完全被党争所代替。温功义分析三案的源头为“明代自始便是以各个部门之间相互制约来增重帝权的，随之而来的便是诸臣之间相互勾结，渐成门户。到了明末，门户更多，争斗益烈，而且内外相结，自后妃、诸王、内监、外戚、阁臣、九卿、言官、外吏，以至去官乡居的名人、学士，无不涉及门户之争，各有一派。”从1615年“梃击案”发，到1645年弘光覆灭，这三十年是明朝党争的顶点，李洁非总结为“知识分子集团与传统皇权的分歧终于表面化……这一现象，表面看是权力争攘，深究则将发现根植于知识分子批判性的强劲提升和由此而来的新型政治诉求。在此过程中，知识分子集团不光表现出政治独立性，也明确追求这种独立性。他们矛头所向，是企图不受约束的皇权，以及所有依附于这种权力的个人或利益集团（皇族、外戚、太监、侍臣等）”。

到了这个时候，黄宗羲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为东林党人，因两次上书弹劾魏忠贤，先被削职归籍，随后下狱，狱中自尽而亡。黄尊素的案件在崇祯时获得平反，黄宗羲在刑部会审时甚至想当场刺杀当年陷害他父亲的许显纯和崔应元等人，崇祯称他为“忠臣孤子”。父亲平反了，自己被皇帝嘉奖，但黄宗羲可不是下跪谢恩之人，他经历由崇祯至南明乱局，又经历顺治和康熙两朝，写出直指君权的《明夷待访录》，“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因为皇帝不过是“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黄宗羲还说，“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从海瑞到黄宗羲，中国的知识分子终于在浩荡天恩之下，寻找到一点点自由的声音。明朝不是什么一个好朝代，它残酷而荒唐，但它确实也留下了那些火光，关于自由，也关于美。十年前我读史景迁的《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史景迁说，在清兵入关之后，已近中年的张岱从此醉心于修明史，是“决心尽其所能一点一滴挽

回对明朝的回忆”，这也许有过度阐释之嫌，我相信王朝更替并不能真正影响张岱的精神世界，张岱就像自己那本《陶庵梦忆》，无论何时，他都能找到自己的琅嬛福地。史景迁说：“在张岱眼中，生活多是光彩耀目，审美乃是人间至真。精神的世界一如舞台生活，神明的无情操弄和人的螳臂当车之间并无明显区别。我们所称的真实世界，只不过是人神各显本事，各尽本分的交会之处而已。张岱一生都在探寻这种片刻。”读明史的一年就这么结束了，既经历了（并非）神明的无情操弄，也经历了人的螳臂当车，我相信的东西一如黄宗羲和张岱的人生，张岱说“大梦将寤，犹事雕虫”，他笑话自己，却又何尝不是鼓励自己，大梦将醒，史不可逆，我们这些小小人物，唯有埋头各自雕虫而已。

本文涉及图书：

温功义：《三案始末》《明代的宦官与宫廷》

李洁非：《龙床：明六帝纪·修订版》《黑洞——弘光纪事》《野哭：弘光列传》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窦德士：《嘉靖帝的四季：皇帝与首辅》

吴晗：《吴晗论明史》《朱元璋传》《胡惟庸党案考》《吴晗讲历史》

韦庆远：《暮日耀光：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

史景迁：《前朝梦忆》

卜正民：《哈佛中国史》之《挣扎的帝国：元与明》

刘和平：《大明王朝1566》

顾诚：《南明史》



李静睿

以前是法律记者，现在写小说。出版有《慎余堂》《北方大道》《微小的命运》《小城：十二种人生》等。

小鸟年度专辑

关于过去的一年，我们写下我们知道的和记住的。按照文学、文化思想、社会思考等系列发布。



电影《阿尔卡拉斯》(2022)剧照

屠杀邻居的事，《邻人》写的就是波兰人也这么干过，不很稀奇。

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再次想：当现实十分荒谬可怕时，虚构的尝试变得轻薄乏力。另外在技术处理上也会遇到很多麻烦（比如要用多少文字向并不身处此地或此时的读者解释说明那些荒唐、复杂、含混、多变的规则和局势而相对于整体不显得累赘）。还是要靠非虚构。像这种事，小说怎么写，写不过非虚构。



这本是四五月间我手边仅有的几本书之一（其中还有一本是《破碎的生活：普通德国人经历的 20 世纪》，它们都是理想国的第一季度的新书，因而未被打包运走），

在三月底，本来的生活突然中止之前，我们全村正在搬家，然后我过了从来没有过身边东西那么少的两个多月，每天穿同一件摇粒绒外套，一直穿到夏天，邻居也少了一半，动作快的在此之前已经搬离，剩下的突然与我产生了比以往更紧密的联系，有好有不好。例如拖着泡沫箱走回家时，沿途的窗里有人看你，猜你得到了什么食物，通过什么途径，“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有人问我，“为什么可以搞到菜？”我想他的意思是，“我只是个家里蹲，不是你想象的有好饭碗或有能耐的人，”我心想。你要不要吃什么，变得与别人相关，他们能知道你冰箱里还有什么，过着怎样的日子。夜里我们去村委会排队领食物。有人去自留地里摘自己种的菜，不一会儿警察来将其劝回，说有人报警。精力旺盛又失业在家的隔壁邻居十分友善而过于热情。当有天她的院子里一直安安静静时，我不禁回想前一天半夜里是否确实听到了有人来将她及其家人带走的动静。妇女们成群结队地在村边仅有的一条小路上散步，真正地抬头不见低头见，以往我没注意过村民们是这样爱散步。当她们嘻嘻哈哈说着自己当真给鱼做了抗原测试、给虾又能怎么做时，我心里冒出了洛夫克拉夫特的名字，他著名的小说《印思茅斯小镇的阴霾》（里面有一群封闭、排外、长得像鱼的海港小镇居民），他所有小说和本人给人留下的那种“打了一个哆嗦”的感觉。那篇小说开头就说：政府秘密发动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搜查和逮捕、恫吓抗议团体，坊间有关于疫病和集中营的模糊报道云云，我觉得这个小说放在现在可能不好发表。我不适应过那种跟人关系密切的生活，那段时间对我来说已经太过密切了。我想起我写过一个很短的故事叫《心愿奶鱼》，里面那个春游时跑了躲起来的人就是我，那是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有次秋游或春游，可能就是忽然不想跟大家一起玩了，不喜欢排着队走，想自己去玩，我把这主意告诉了一个叫李莎的女孩，她说好呀，我们就自己去玩了，最后躲在一个沙堆后面，老师和家长找到附近时，李莎站起来走了出去。我妈跟我说：以后不能跑了；跟李莎不值得太要好。我觉得以后想跑还是能跑，就自己玩，不带李莎。

“生活是痛苦的，令人失望的。因此，继续写新的现实主义小说是无用的。”米歇尔·维勒贝克在为创造克苏鲁世界的 H.P. 洛夫克拉夫特写的传记《反抗世界、反抗人生》开头第一句话就说。但很难想出能够避免联想或超越现实的非现实的点子。卡夫卡也想不出来，像“一个晴朗的早晨，K 被陌生人登门拜访”那种。

害怕 / 厥憎异族、商业、情色、不洁，世界臭不可闻，生活是有传染性的噩梦，这是洛夫克拉夫特的（或维勒贝克笔下的他的）世界。我觉得那本传记比传主人的书更好看。虽然有个有克苏鲁神话背景的游戏是我的最爱，但洛夫克拉夫特的书我并不太喜欢，似乎那不是一种冷静理智地对敏感、阴暗、病态的创造，而是发自内心的打着哆嗦的、惊惶不安的倾泻，副词和形容词堆砌到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质地也很粗糙，湿黏滑腻，无边无际的黑乎乎一大摊 / 团泥潭泡沫，就像他笔下那些东西。也是恐怖幻想类小说，我倒很喜欢 2021 年后浪出的《被毁损和被染病的》，名字又让人想到莱维的《被淹没和被拯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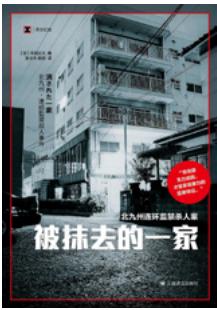
档案 去年， 我时常想知道那些人.....

顾湘 | 小鸟年度专辑

很多犹太人，还有普通德国人，
还有那些既是受害者又是迫害者的人。

村里的习俗：一年一度，村民们全部聚集在广场上抽彩，以此决定用石头砸死谁。有人可能会勒死你的狗。邻居们从早到晚盯着、打探、揣度和评价你的生活。敌视外国人，认为他们是魔鬼。有时你自己是外国人。丈夫或妻子跟路上的人都是一伙的，他们监视你、算计你，向人打你的报告，等着你落网。婚姻是个圈套。这是雪莉杰克逊的恐怖小说集《有花生的最后一天》里写的。

在一个小镇的一个月里（比一个月还多两天），一些人每天像上班一样，按时去杀另一些人，按时（或提早）收工，周日也不休息，他们本是彼此的邻居，讲一样的语言，住在楼上楼下，然而其中被杀的图西族人从某天开始被叫作“蟑螂”，胡图人开始想要杀掉所有“蟑螂”。幸存者们讲述他们白天躲进沼泽，天黑出来觅食。一个个刽子手们也回忆说：“有人不习惯杀人，会有人帮助他”，“对于那些假装在砍人的，我们会强迫他们当着同伴的面杀一个人”，“有的人以勇猛开始，又以勇猛结束。有的人始终都不勇猛，完全是出于被迫。还有一些人，随着时间过去，勇猛驱散了恐惧。有的人工作的时候很勇猛，但一旦停止杀人就又会害怕。他们只是在混战中热血沸腾而已。”“从我杀的第一个人开始到最后一个人为止，我没有对任何一个人感到抱歉。”以前只能在婚礼上吃到肉的人，大屠杀期间一天比一天吃得饱。有了这个新营生，我们变得生机勃勃。”这是《与屠刀为邻：幸存者、刽子手与卢旺达大屠杀的记忆》。标题叫“农活”的一章里写到，杀人者们并不想念因杀人而放下的农活，杀人成了另一种农活，“当他们回来时，看起来既劳累又带着笑容，互相开着玩笑，就像收获时节那样。他们对生活兴致勃勃。”屠杀像种地一样以手工劳动完成，而且以季节性种植的节奏展开。在那场屠杀中，12 个星期里，约 80 万图西人被杀，这一“农业式的屠杀”效率远远高于纳粹（利用化学武器及工业技术）对犹太人和吉普赛人的屠杀。



非虚构的还看了本译文纪实系列的《被抹去的一家》，讲一个连环监禁杀人案：事实婚姻关系的一男一女，松永和纯子，他们囚禁了女方的一家子人：爸爸、妈妈、妹妹、妹夫、妹妹和妹夫的两个小孩，包括纯子在内的这一家子人不抵抗、不逃跑，非常顺从，沦为奴隶，在松永的命令和指导下互相折磨、残杀、肢解处理尸体，既是受害者，也是凶手，一个接一个死掉，都需要松永亲自动手，此外被囚禁的还有一个房产中介和他的女儿，中介也被折磨致死。最后只剩下纯子和中介的女儿，直到中介女儿终于跑掉，这桩事情才被揭露出来，松永与纯子被捕。怎么会这样？所有那些耸人听闻的事都会让人忍不住想问一声。即使看过各式各样的事，本质上都差不多，仍会被每个事件、每种处境和各种细节所吸引、震撼，犹如观看人性在低洼处形成的漩涡。

为什么不逃跑？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感到羞耻？历史上的犹太人也常被如此发问。莱维的《被淹没和被拯救的》始终是回答这一系列“为什么”最好的一本书之一。除了上面说的今年出版的新书，我今年重看的旧书有莱维的这本，还有他的《周期表》，还有齐格蒙特·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莱维的书太好了以至于一下子不知该从何说起，最好没看过的人都去看一看。比如说《被》里的一章“灰色地带”，讨论了既是受害者又是迫害者的人，“如果我们想真正地了解人类，如果我们想知道，当类似的考验再次降临到我们头上，我们应该怎样保护我们的灵魂，甚至如果我们只想了解一个巨大的产业工厂里到底发生着什么，那么这些形象是不可或缺的。”

莱维写的有两句话我记得特别牢，一句是说，是可以抛下所有逃到别的国家去，“但这要很多钱和勇气——而我和家人及朋友们两样都缺乏。况且，从近的看，事情似乎还没那么糟。”这句话我总是以为发生在第一章：名叫“氯”一章，之所以是氯，他说他的祖先和这一惰性气体很像，“不是说他们身体怠惰，他们反而必须相当努力来赚钱养家，以前还有‘不做没得吃’的道德信条。但他们的精神无疑属惰性。他们事迹虽然多，但都有静态的共同特点，一种不介入的态度，自动（或接受）被纳入生命长河的边缘支流。”他写了他的诸多亲戚们。接下来是我记忆中的自动联想：家族大、牵绊多、负累沉重、行动迟缓，以至于在嗅出空气变味之后迟迟没跑。重读时我发现第一章没有这句话，后来在“钟”那章里找到了它。还有一句是说：“最好的人都死了。”

今年甲骨文出了一本《弃民：美国与奥斯维辛之间的逃亡者》，我看了前三十页，没来得及往下看。似乎是因为毕竟我更关心留下来的人。

后浪出的两本图画书，《缄默》和《鼠族》，分别从“普通的德国人”和犹太人的角度描绘了“留下来的人”的那段“破碎的生活”。《缄默》的主角是个很普通的德国女孩，后来嫁给了一个建筑师，也是党卫队成员，像《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里的一个。《鼠族》讲的是一个犹太幸存者及其家人的故事，书名叫“鼠族”，除了他们后来总是在各种地板楼板夹层之间东躲西藏、被人驱赶、杀死，也许也指，他们一直就在干贿赂啊、为自己动点脑筋搞这搞那之类的事——后期确实也只能这样，可是前期如此，是因为本性里的那些所谓务实啊、精明啊、“犹太人老祖宗的智慧”之类的吧——靠钻来钻去、还有钻营（和运气）活了下来。书里也有一笔带过的反抗者，当然马上被摁灭了。跟莱维写的一样。在大屠杀这件事上，有很多犹太人协助了德国人，否则德国根本不够人力完成这么多工作。“他们拿着大棒，举止就像德国人。”有些犹太人是这样想的：只要他们把一小部分人交给德国人，就能拯救其他人。至少能拯救他们自己。”不过并不能。我们看到，各种帮德国人干活的犹太人，都死了。德国人从战俘里招工，有人去为他们工作，结果比当战俘还要不受保护，被肆意杀死。告密的人比被告密的人先死了。为焚化厂工作的人，“得到更好的面包，但是

每隔几个月，他们也会从烟囱飘走。”令我印象很深的一段，在书的挺前面，那时他们还都穿着自己平时的衣裳，有钱，有实力，有一次，社区通知二万五到三万名犹太人去一个体育场登记谁是“有用的”（年轻有力的、健康的、掌握技能的）、谁是“没用的”（老人、多儿童家庭、等等），他们就都去了，然后就三分之一的人没能回来。2.5~3 万！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乖乖登记。还有一个人，已经熬到了战争胜利，从集中营跑出来，回家，家被波兰人占了，然后波兰人把他打死了。战争结束以后，仍有波兰人想打死犹太人。

我时常想知道那些“普通纳粹分子”，后来怎么了，留意了一下《破碎的生活》里写到：一个人，是希特勒青年团空军成员，第三帝国的热情支持者，于战争末期被俘，后来摇身一变成了自由民主派、和平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一个人，是狂热的德国少女联盟成员，战争期间嫁给一名希特勒青年团领袖，后者也是党卫队士兵，后来从民主德国逃往联邦德国，在政府部门工作，帮助丈夫造了房子，成立了一家独立的商业公司；一个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支持战争，在西里西亚最后的战斗中被捕，遭到波兰人驱逐，在西德读完高中，赴美交流，后来移民美国，成为德国研究教授，是民族社会主义的激烈批评者。

最后，年末，我看了《客乡》。这本书也关于 20 世纪德国动荡的历史进程。开篇写两万四千年前冰川推移、撞上岩石露头、继而沉睡、将岩石打磨得平缓而光滑，一些水变成群山之间明镜般的湖泊，橡树、桤木和松树再次生长起来，仿佛在呼应莱维的《周期表》，《周期表》里有这样一段，莱维写在他意大利军方的矿场工作：“年复一年，山谷慢慢塞满碎石和灰尘，碎石中残留的石棉使它有点滑，像冰山一样慢慢滑动下去，大约每年滑十公尺，它将山壁压出很深的横纹，山下的房子逐年下陷，我住的房子正在静静地往下沉。到处是石棉，像雪一般。书放在桌上只要几小时，再拿起来时就留下书影。屋顶盖了厚厚的灰，下雨时雨水就像从海绵渗出，直到突然整块从屋檐掉下。”有着一样的壮丽、明亮、安详。



中间出现一位建筑师，两次申请加入帝国文化院（由政府提供财政资助，戈培尔亲任会长），和《缄默》里女主角丈夫的职业一样。那个时代的人的背景看起来都挺相似，不过看《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相似有什么稀奇呢？当时又有谁不是少女联盟、青年团的成员呢。他们想要被塑造的目标，本来就是面目相似、整齐一致、千人一面、万人一心、众口一辞吧。在看不见面目时，他们都像是同一个人，讲一样的一套话。

这本书的尾声，很巧的是，写的是拆迁。如何拆掉一幢房子，一幢房子有多少重量，它的重量如何计算，是否就是它容纳过的生活的重量。在读这本书的同时，今年的最末尾，我把最后一点东西搬到家门口准备运走，隔壁院子里有两个工人用柄很长、有韧性、可以弯曲的锤子在砰啊砰啊地逐一砸掉那幢房子的所有窗子。拆房子是从砸掉窗户开始的。

关于房子是如何被拆掉、村子是如何被拆掉的，三年前我就曾观看了北边的大队经历这一过程。在不远处的树林里，我看见过曾经是村子的地方升起一蓬烟雾。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用被拆掉的村子，铺成了从这个消失了的村子通到外面的路，在原本树林间的土路上，铺洒所有房子的碎块、碎砖碎瓦，夹杂着人们没带走的东西——皮鞋、靴子、草席、伞、毛巾、毛绒玩偶，这些生活的残渣，被紧紧压在路里，露出来一点儿边角，铺成一条相对坚实、经得起重车碾轧的路，而卡车一边抛下这些东西，一边变轻，开出树林，开过荒草地，最后卸空所有，一身轻松，扬长而去。一只被碾压得扁扁的机器猫面朝下趴在荒草地里的新路中央，后脑勺和身体看起来

还是很可爱，还是圆的，扁扁的圆，像两个连体铜锣烧。经过好几个月、大半年、一年，我一直看见它躺在那条新的路上，但我没有把它捡起来。最后我自己也仓皇离去，好歹过完了这仓皇的一年。



顾湘

有两个猫，一个美一个胖，著有《为不高兴的欢乐》《好小猫》《赵桥村》《在俄国》等。她也是小鸟文学 Logo 的设计者。

小鸟年度专辑

关于过去的一年，我们写下我们知道的和记住的。按照文学、文化思想、社会思考等系列发布。



电影《机器人总动员》(2008)剧照

档案

如果大卫·格雷伯还在世，会不会认为 ChatGPT 是诗意的技术？

张依依 | Newsletter

全球新近发生的 16 条科技、环境和文化消息。

1927 年五月,年轻的飞行员查尔斯林德伯格驾驶单引擎飞机圣路易精神号从纽约市起飞。他接下来 33.5 个小时的飞行,成为了人类史上首次独自完成的不着陆跨大西洋飞行。短短 42 年之后,阿波罗 11 号降落月球,第一个人类走出登月舱,完成了一次月球行走。20 世纪,技术是以这样惊人的速度在前进的。但这种速度并没能维持下去。西北大学经济学家 Robert Gordon 表示,到 1970 年,现代生活的所有关键技术都已到位:卫生、电力、机械化农业、高速公路、航空旅行、电信等。广泛的共识是,1970 年至今,创新和经济增长相比于前 100 年显着放缓。在大多数方面,发达国家人民的 2019 年的生活感觉上与 1979 年没有什么两样。

人们开始反复抛出一个疑问:为什么技术不再让人兴奋了?

著名人类学家、无政府主义者大卫·格雷伯将此描述为“一种失望、被骗的感觉”。对于 20 世纪中后期成长起来的孩子,那些出现在科幻作品里的技术未来并没有理所当然地成为现实。“简而言之,飞行汽车在哪里?力场、牵引光束、传送舱、反重力滑板、三录仪、长生不老药、火星殖民地,又在哪里?”

他在 2012 年发表的著名文章《[飞行汽车和利润率下降](#)》中写道,相反,70 年代以来有所进展的医疗技术和信息技术,都是一些模拟。并没有划时代的新技术出现,有的只是旧有的被打碎和模拟,并包装成“未来”。

直到最近,这种令人失望的停滞才似乎终于迎来终结,一些人相信,一种真正的划时代技术出现了:以 ChatGPT 为代表的 AI 聊天机器人,及其背后的大语言模型 (LLM)。

ChatGPT 由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于 2022 年 11 月发布。仅两个月后,其活跃用户就达到一亿,[打破了过往记录](#)——对于 TikTok,这个时间是九个月,Instagram 则用了两年半。如今,每天有 3000 万人在使用 ChatGPT。

ChatGPT 的基础形式是一个免费的网页对话机器人。你问它答,非常简单。让人印象深刻之处在于,它的知识非常广博,且实用性极强。正如 OpenAI 建议的,你可以让他给你解释物理概念、脑暴生日聚会的点子,或是让它帮你编程、改代码。它也可以瞬间生成一些看似需要创造力的东西,比如小说、散文、笑话甚至诗歌。

与此同时,ChatGPT 拥有联系上下文的能力,能与用户产生连续对话,甚至会在表述错误后纠正并道歉。

ChatGPT 的横空出世几乎立刻引发了业内的危机感。过去一个月,与这类 AI 工具相关的新闻层出不穷。先是曾对其投资数十亿美元的微软[宣布将扩大与 OpenAI 的合作](#),将比 ChatGPT 更新的技术引入其产品,包括 Bing 搜索引擎和 Edge 浏览器。

紧接着,一度行动相对保守谨慎的 Google 迅速推出了自己的 [AI 聊天机器人 Bard](#),基于自家开发的大型语言模型 LaMDA,显然直接对标 ChatGPT。同时宣布将会把 LaMDA 集成到搜索引擎中。

但仓促的首次亮相并不顺利, Bard 的第一个演示就被指出存在事实性错误:在关于韦伯太空望远镜的问题下, Bard 回答韦伯望远镜“拍摄了太阳系外行星的第一张照片。”很快就有天文学家反驳,第一张系外行星图像实际上由[甚大望远镜拍摄于 2004 年](#)。

将对话机器人融入搜索引擎是一个万众期待的功能。原因之一是搜索引擎本身存在显而易见的问题:腐化、被广告充斥、愈发难用。“今天,100 亿个查询中有一半没有得到解答,或至少没有得到很好的答案。”微软高管 Yusuf Mehdi 接受采访时表示。[而与实时搜索结果结合](#),也有望解决这类语言模型信息滞后,资料来源不明,甚至可能像 Bard 一样,给出完全错误答案的问题。

此外,2 月 7 日,百度也宣布推出自己的对话式 AI 工具“文心一言”;韩国企业 Naver 则将于今年上半年推出[升级版的 SearchGPT 服务](#)。

盛况之下,回到一开始的那个问题,人类是否的确打破进步瓶颈,迎来了突破性的技术?从想象力上来说,似乎是的。甚至在格雷伯的文章内,他所期待看到的技术之一就是“能与之进行有趣对话的计算机”。

但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格雷伯的论述并非停留在技术需要天马行空的层面。在他看来,之所以我们很难再看到 100 年前持续不断的观念革命,是因为如今资源被集中在少数几个重大项目上,“即使是基础研究,似乎也是由政治、行政和市场需要驱动的,这使得任何革命性的事情都不可能发生。”

“我们正从诗意的技术走向官僚的技术。”

从结果上来看,许多一度看似极具希望的技术最终成为了更大的负担。

18 世纪和 19 世纪新型工业自动化的发明产生了矛盾的效果,使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变成了全职工人;而所有旨在使我们免于承担行政职责的软件,也使我们变成了兼职或全职的行政人员。

行政工作的增长直接导致了企业管理技术的引进。这些技术总是被说成是提高效率和在各层级引入竞争。这些技术最终的实际意义是,每个人都会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推销东西上:基金申请提案、出书提案、对学生表现和基金申请的评估、对我们同事的评估、新的跨学科专业的说明……

大学教授似乎觉得他们不可避免地要花更多的时间来管理项目基金一样,富裕的家庭主妇们也轻易地接受了每年花几周时间填写 40 页的在线表格来让孩子上小学。

事实证明,真正出现的技术是最有利于监视、工作纪律和社会控制的技术。正如我们不断被提醒的那样,计算机开辟了某些自由的空间,但它们并没有带来阿比·霍夫曼 (Abbie Hoffman) 所设想的无工作的乌托邦,而是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它促成了资本的金融化,使工人铤而走险地陷入债务,同时也为雇主创造“灵活”的工作制度提供了手段——既破坏了传统的工作保障,又增加了几乎所有人的工作时间。

顺着格雷伯的思路,不由得让人好奇,ChatGPT 这样的工具将如何改变当下的社会与工作?当人们兴奋于 AI 可以帮自己写文案、周报,甚至论文的时候,它是会将人们从“毫无意义的工作”中解放出来,还是会将这些工作变得越来越繁琐,要求越来越高?

如果格雷伯还活着,他会视 ChatGPT 为诗意的技术还是官僚的技术?

这种对人力更高的要求已经显现出一些苗头。推出了 ChatGPT 的 OpenAI,最近又反过

来推出了一种可以检测文本是否为 ChatGPT 生成的工具。尽管现在还非常不准确，正确率只有 26%，但可预见的是，随着 AI 被融入工作流，未来对于文本的评估会出现新的流程和标准。

评价 ChatGPT 的前辈 GPT-3 时，专栏作家 Stephen Marche 曾如此写道：根据我作为前莎士比亚教授的经验，我认为学术界需要十年的时间来面对这个新的现实：两年时间让学生摸清技术，三年让教授们认识到学生正在使用这些技术，五年让大学管理者决定如何处理。教师已经是世界上工作最繁重、报酬最低下的人了。他们已经在处理一个处于危机中的人文科学。而现在又出现了这个。我为他们感到难过。

人的现实境遇也值得关注。在生成式 AI 的大潮下，除了试图夺回自己作品主权的视觉艺术家们，VICE 采访发现，越来越多的配音演员也被要求签署合同，让渡他们的声音权利，以便客户可以使用人工智能生成最终可以取代他们的合成版本，有时甚至不需要额外补偿。事实上，如今这些对话机器人在宣传里主推的功能，不论是“压缩信息提供答案”，还是“激发好奇心”，距离这个领域所向往的终极目标，通用人工智能（AGI），都仍有很大的距离。对于 AGI，OpenAI 创立者之一 Sam Altman 的定义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同事，你可以训练它做任何事情”。

而对于这种技术会带来的社会变化，这位支持全民基本收入的年轻企业家也有更远的想法。近期接受福布斯采访时，他表示，“我认为，如果 AGI 真的完全实现，我想象它会在各种意义上打破资本主义。”

这个层面上，格雷伯和他的想法似乎是相似的，“如果要发明机器人为我们洗衣服和收拾厨房，那么我们就必须确保，无论是什么取代资本主义，它都要建立在一个更加平等的财富和权力分配的基础上——其中不再有超级富豪或愿意做家务的绝望穷人。”

* 文内引用来源为澎湃新闻思想市场译文[《格雷伯的礼物 | 技术减速主义：我们为什么没等来“飞行汽车”》](#)

IN THE NEWS

科学 / 技术

数以万计的繁星……不对，是卫星！ Jonathan McDowell 是负责维护太空飞行数据库的天体物理学家，今年 1 月他发表了对 2022 年太空发射的分析，包含了很多有趣的数据。2022 年是太空领域创纪录的一年，火箭成功发射入轨 180 次，创历史新高，比 2021 年多出 44 次。发射主要来自美国公司 SpaceX 以及中国的政府和企业。前者目前拥有超过 3300 个运行中的 Starlinks（星链）。这让曾经空荡广袤的太空轨道日益拥堵，2020 年底到 2022 年底之间，SpaceX 不得不将 Starlinks 移开 26000 多次，以防与其他物体发生碰撞。

中国则成功发射了 62 次，比 2021 年多了 9 次。政府在积极地推进太空探索，但快速增长的部分实际上更多来自于商业火箭供应商。去年还有其他一些用于科学探索的发射，包括 NASA 的地表水测绘和海洋地形卫星、日本公司 ispace 的私人月球着陆器和韩国的首次月球任务。

唯欧洲在这个领域呈现出相反的面貌，发射总数从 2021 年的 15 次成功发射，下降到去年的仅 5 次。影响因素之一是 2022 年 2 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欧洲航天局选择了停止发射俄罗斯制造的联盟号火箭。McDowell 预计，今年发射记录会再次被打破。SpaceX 就曾表示，它希望在 2023 年执行 100 次发射——任务将包括其星际飞船的首次轨道飞行，该飞船旨在最终将人类送上月球和火星。

斋戒的科学面。如今，禁食已经走出宗教修行的范畴，成为一些人群中新型的健康潮流。大约有 10% 的美国人表示他们有一定程度的禁食的习惯，但频率存在很大的差异。科学家研究发现，这种行为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不同类型的禁食，如间歇性禁食或限制时间的饮食习惯，已经被发现存在一些潜在的健康益处，比如能够减肥，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并减少炎症，降低慢性疾病的风险。在动物研究中，限制热量和定期禁食还被证明可以延长寿命，但仍需更多的研究来确定这些发现是否适用于人类。

与此同时，禁食也存在一些潜在的缺点和风险，尤其对于存在基础病的人群。比如，禁食可能导致脱水和电解质失衡，导致低血糖。禁食带来的饥饿感、烦躁和难以集中注意力，也会影响生产力和生活质量。相关研究仍处于早期阶段，关于禁食对健康和寿命的长期影响还有许多未解答的问题。专家则提醒说，禁食并不适合所有人。处于某些健康状况的人，

如糖尿病，可能无法安全地禁食，建议在尝试之前咨询医疗保健专家。

播客行业步入中年危机。过去十年是播客蓬勃发展的十年，几乎每一家主要的媒体和娱乐公司都投入了大量资金来推出新的播客，Spotify 也砸下重金买断最热门的一些播客节目。但这种飞涨已经遇到了瓶颈，Axios 分析发现，制作新节目的人越来越少，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去年创建的新播客数量下降了 80%。经历了多年的两位数百分比的增长之后，2022 年的播客听众增长也明显放缓，缩减至仅 5%。

一个困扰这个行业至今的问题是收益。尽管受众广泛，播客广告市场并没有像许多人希望的那样快速增长，相比于去年电视广告支出的 700 亿美元，播客仅有 15 亿美元规模。制作方难以收回投资，许多节目都找不到长期维持下去的方法，选择停更。而且虽然播客看起来门槛很低，分级却十分明显，前 1% 的播客获得了 99% 的下载量，也只有少数大公司能从播客中赚取可观的收入。

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淘汰掉市面上滥竽充数的劣质节目。“已经有足够的播客供人们消费了——实际上现在的播客是过多了。”

大地震之下，土耳其的 Twitter 访问受到限制。2 月 6 日当地时间凌晨 4 点 17 分，土耳其南部以及叙利亚北部和西部发生地震，震级 7.8 级。为自 1939 年以来土耳其发生的最严重的地震。截止 2 月 11 日，已在土耳其境内造成 24617 人死亡，在叙利亚境内造成 3500 多人死亡。由于救援难度极大，还有许多人困在废墟之下，死亡数字预计还将大幅上升。与此同时，地震发生两天后，全球互联网监测机构 NetBlocks 报道指出，通过网络数据会发现，Twitter 已被土耳其的多家网络提供商限制。土耳其当局“没有正式解释”。NetBlocks 则指出，土耳其经常在国家紧急情况下，比如去年恐怖袭击之后，采取类似行动，防止所谓的虚假信息散播。

但此次是 NetBlocks 第一次检测到似乎是针对自然灾害的社交媒体限制。这种限制可能带来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Twitter 在地震后被广泛使用，既用于寻求援助和救援设备，也用于试图与亲人恢复联络。”NetBlocks 主管表示。[被限数小时后](#)，“经过土耳其当局与 Twitter 举行会议，并提醒后者在删除虚假信息方面的义务”之后，访问恢复。

气候 / 环境

复活渡渡鸟。美国生物技术公司 Colossal Biosciences 决心通过一个被称之为“去灭绝”的过程复活渡渡鸟。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古遗传学家 Beth Shapiro 表示，她从 500 年前的渡渡鸟遗骸中提取了详细的 DNA 信息，这意味着理论上有可能让这种鸟复活。该公司计划对渡渡鸟的近亲——尼柯巴鸠进行改造，使其变成渡渡鸟，并引入其本土栖息地“重新野化”。

这家初创公司已经融得 2.25 亿美元的巨额资金，其中一部分将用于资助这一雄心勃勃的项目。但距离真的实现还有未知的距离，很大的问题在于，尼柯巴鸠与渡渡鸟之间究竟存在多大的基因区别？科学家也不太确定。野化也是一个伦理问题，“它不会真的是渡渡鸟——它会是一个新物种。”斯坦福大学基因测序专家 Jennifer Li Pook Than 说，“这在道德上意味着什么？”除了让渡渡鸟复活，这家公司的 CEO 曾预测，猛犸象会在 2029 年之前到达，渡渡鸟可能或早或晚于此。

过去十年里，每隔一天就有一名环保活动家被杀。根据非营利组织 Global Witness 的一份新报告，在过去十年中，至少有 1733 名环境活动家和土地维护者被杀害。这相当于每隔一天就有一个人被杀。巴西、哥伦比亚和菲律宾约占这些谋杀案的一半，墨西哥则在 2021 年成为对于环保人士最为致命的国家。

杀戮是最可怕的结果，但还有一些更常见的暴行，比如殴打、性侵犯、恐吓策略和骚扰。背后涉及的企业力量主要来源于伐木、采矿、农业综合企业和能源生产产业。该报告还概述了对政府和企业的几项建议，如制定和执行保护土地维护者的法律，追查暴力相关供应链的受益者，并建立道德、透明的采购方式。政府和企业还必须参与巴黎气候协议，逐步淘汰破坏环境的生产。

2022 年没有一只印度犀牛被偷猎。这是印度阿萨姆邦 45 年来首次实现零偷猎，是颇为瞩目的保护成就。印度犀，又称大独角犀，其身型巨大，重达 2000 到 3000 公斤，体重可达全长 3.8 米，肩高 1.5 到 1.8 米。这种犀牛曾广泛分布于整个印度北部地区，直到 19

世纪初,由于狩猎运动的流行而迅速消失。据估计,到1908年,其主要栖息地印度卡齐兰加只剩下12头大独角犀。

围绕犀牛角存在一些迷信的认识,认为它可壮阳,甚至治疗高烧、胃病和癌症,以至于整个亚洲范围内都有广泛的购买需求。一头成年犀牛的牛角每公斤能卖到40万美元,尽管它仅由角蛋白组成,并没有经过证实的药用价值。

近年来保育工作取得了卓越的进展,如今阿萨姆邦地区共有近2900头大独角犀。但成功并非没有代价。零偷猎背后是一场极为残酷严苛的保护行动,人权组织在2016年估计,多达50名偷猎者在反偷猎的行动中被枪杀,BBC的一部纪录片也曾报道每年有多达20人以犀牛保护的名义被杀,而引发争议。

[好久没听说的臭氧层空洞,自己悄悄恢复了](#)。一项新的科学评估发现,由于1989年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取得了惊人的成功,禁止了99%的臭氧消耗物质,地球的臭氧层有望在2066年前完全恢复到1980年的水平。2016年议定书还进行了修正和更新,进一步要求各国减少对其他化合物的生产和消费,这预估将在2100年前减缓0.3°C到0.5°C的全球变暖。

值得注意的是,臭氧层空洞、皮肤癌和酸雨,这些上世纪末最为人所知的一些环境危机近年来势头减弱,失去讨论,一些阴谋论乘机甚嚣尘上,声称这些危机从未存在,是科学骗局。然而事实上,它们不再抢占头条往往[正是因为研究引起了重视](#),并且带来了卓有的政策改变。

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围绕它们的讨论消寂证明有效的政策能够带来实际的改变,人类有能力处理环境问题,带来扭转性的进展。而与此同时,错误信息则造成了真正的伤害,削弱人们对科学的信任并更容易掉入阴谋论。例如,即使在全球变暖问题上已经有很强的科学共识,源源不断的错误信息也会让人们难以从中筛选出事实与虚构的成分。

[越来越多的座头鲸离奇死亡,人们呼吁暂停海上风能开发](#)。近期,美国新泽西州的12位市长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呼吁“立即暂停”海上风能开发,直到科学家能够保证这种可再生能源项目产生的噪音不会对鲸鱼构成威胁。

过去两个月里,新泽西州和纽约州的海岸上已经有8头鲸鱼被发现搁浅死亡,死亡原因不明。环保组织呼吁进行更仔细的试点研究,对海上风力涡轮机活动的潜在影响进行彻底的审查,以保证它不会对周边水生物带来打击。矛头主要指向海上风电场开发带来的噪声,包括海底声纳测绘以及用于测试的土壤钻孔。为避免噪音惊吓鲸鱼,一些开发商也尝试投入各种技术,比如使用[所谓的“气泡幕”抑制建设发出的声音](#)。

上一次座头鲸出现这样的异常死亡可以追溯到2016年。但当时大西洋的海上风能勘探还没有开始,因此也有许多人认为,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联,船舶撞击和渔具缠绕才是更普遍的死亡原因。

[印度的甜蜜烦恼](#)。印度政府正积极推进将糖作为原料来提高乙醇生产,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乙醇被视为一种更清洁的燃料,因为它比传统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少20%到40%,而且由于植物在生长过程中能吸收二氧化碳,因此也被认为是碳中和的。然而,环保专家指出,如果纵观整条供应链,这种生产可能存在更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源于土地利用变化、肥料使用增加和生态系统破坏造成的排放。

这种使用也可能导致食品生产用糖的短缺,提高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成本,同时导致更多的森林砍伐,并加剧水危机。甘蔗的生长需要大量的水,印度的许多产糖地区已经面临缺水问题。专家们建议对乙醇生产采取更可持续的方法,如推广非粮食作物或投资于节水灌溉系统。

[夜空光污染在过去十年增加了一倍多](#)。人眼可以在夜空中发现大约5000颗星星,但摩天大楼、路灯和房屋发出的光让我们只能看到其中最亮的几颗。如今能看到的更少了。公众意识活动Globe at Night的统计显示,2011年至2022年期间,全球夜空的人造亮度增加了一倍多。

光污染使人类失去了与宇宙的自然联系,也对生态系统造成破坏,比如扰乱动物的繁殖和迁移模式。此外,光污染还给人类带来不良的健康影响,包括扰乱睡眠周期,增加慢性疾病的风险。

世界各地的一些组织和倡议正努力减少光污染。其中一项尝试是使用更暗、更暖的LED灯取代传统路灯,这不仅消耗更少的能源,还能减少眩光和光入侵。一些城市已经采取

类似的户外照明政策,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光污染的负面影响,同时仍然为安全出行提供足够的照明。

[两个纽约市大小的冰架发生了崩裂](#)。这座冰山名为布伦特冰架,面积为1550平方公里,经过十年的发展,冰架上的裂缝逐渐扩大成为一个巨大的断口,彻底裂开。这里曾是英国南极调查局哈雷研究站的所在地,科学家们在那里研究地球、大气和太空的天气过程。他们一直密切关注所在的冰川动向,随着裂缝扩大,该站已于2016年搬迁到更远的内陆,并未受到最近断裂的影响。

这是两年来南极冰架的第二次重大断裂,即所谓的解体入海,在此之前因为断裂而登上头条的是与布伦特隔海湾相望的拉森冰架。那是南极洲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这样的塌陷,因而引发了广泛的全球关注,许多人将它与气候变化关联在一起。但英国南极调查局的冰川学家认为,冰架的构造非常复杂,此次崩裂是布伦特冰架自然行为的一部分。

[夏威夷将不再销售2升以下的塑料瓶装水](#)。夏威夷州立法者提出了一项法案,禁止销售小于2升的塑料水瓶。如果获得通过,该法案将于2024年1月1日生效,不过有个例外,紧急情况和公共卫生情况下这类小型瓶装水仍可被使用。

该法案意图帮助遏制塑料垃圾数量,解决目前有缺陷的回收过程——近年来对有问题的塑料回收过程的曝光,让更多人意识到,与其寄希望于回收,不如从一开始就使用更少的塑料。限制销售小于2升的塑料水瓶的同时,政府鼓励更多的人使用可重复使用的瓶子和容器,逐步摆脱对塑料容器的依赖。

[英国也将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餐具和盘子](#)。统计显示,英国人每年使用11亿个一次性盘子和42.5亿件餐具,其中只有10%被回收。这导致食品容器和餐具成为海洋垃圾中份额最大的品类。英国环境部长Thérèse Coffey表示,“一个塑料叉子可能需要200年才能分解,因此我们需要尽快禁止这些物品。”

此前,苏格兰和威尔士已经制定了类似的禁令,英国政府则于2020年宣布在英格兰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吸管、搅拌器和棉签。英国绿色和平组织的政治活动家Megan Randles对此举表示欢迎,但也警告:“这就像伸手去拿拖把而不是关掉水龙头。我们需要政府制定更有意义的减塑战略,这意味着制定减塑目标和适当的再利用和再填充计划。”

[阿姆斯特丹建了一个巨型水下停车场,不能停汽车](#)。荷兰城市阿姆斯特丹即将启用世界上最大的水下车库,可容纳7000辆自行车。该车库运用一个创新的数字化系统,可以自动扫描和引导车主找到可用的停车位,并在取车时判断自己停车的位置。

阿姆斯特丹计划到2030年成为“无车城市”,这个全新的自行车库正是计划的一部分。该市是全球知名的自行车友好城市,一直致力于投资于更多的自行车基础设施,鼓励居民使用自行车出行而非汽车,来减少拥堵和排放,同时创造一个更健康、更可持续的城市环境。新的地下自行车停车库将于2023年3月开放,预计将成为吸引骑行爱好者和城市游客的一大亮点。

注:本期资讯的IN THE NEWS部分使用了Notion AI和ChatGPT进行概述,并由作者进行事实检查。AI工具的优势在于能瞬间总结出一篇长报道的要点,非常适合新闻简讯的内容形式,缺点在于会存在少数事实错误,以及许多信息重复和细节丢失。使用者仍需回到原文寻找有意义的细节,或对AI进行补充追问,比如“能否再给我提供一些事实?”“这个研究使用的实验手法是什么?”。还有一个意外发现,ChatGPT似乎可以绕过付费墙,提取特定链接内的文章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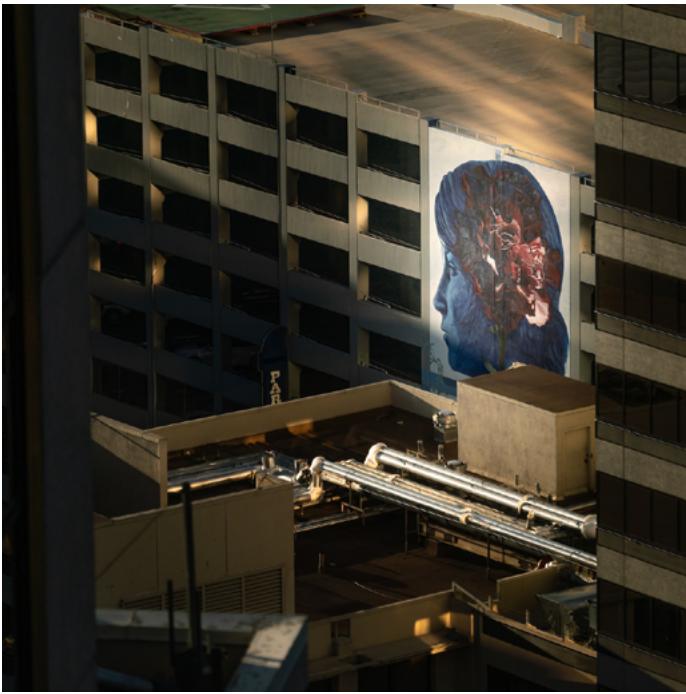
张依依

新闻从业者,关心人类、科技与生活,“所有的鱼”主人之一。平行世界里是个畅想在艺术幻想里的好青年。爱具体的人和别人的猫。

Newsletter

四种新闻信轮周发布,各自以认可的维度覆盖撰写者认为重要的新闻。因而会有重复。不过不用担心,它们也会有不同的解读。重复说明了某个问题在世界的权重。





图片来自 [simon sun](#) on Unsplash

档案

大地震之后，为什么叙利亚人民无法得到同等援助？

Snufkin | Newsletter

我们知道废墟下有人，我们听到了他们的哭声，
但我们没有救援他们的设备

土耳其和叙利亚发生毁灭性地震十余天后，截至昨日，据半岛电视台，已有超过 4.6 万人死亡，超过 8.4 万幢建筑严重受损。本次灾难发生在凌晨，第一次地震的强度被记录为 7.8 级。

联合国呼吁筹集近 14 亿美元来帮助土耳其和叙利亚的幸存者，其中 10 亿美元用于帮助土耳其 500 多万人，3.97 亿美元用于叙利亚西北部。然而，就在土耳其试图应对这场严重灾难之际，人们对叙利亚受害者的担忧日益加剧。

在重灾区土耳其，据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称，在灾难发生一周后，在倒塌的 1.9 万栋建筑中，有 1.5 万栋已经进行了搜查。土耳其承诺对任何涉嫌建筑倒塌的人进行调查，并下令拘留包括开发商在内的 100 多名嫌疑人。

在已经历了十多年来内战的叙利亚，死亡人数主要集中在西北部。该地区主要由忠于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武装分子控制，但也有一部分地区由叛军控制，这使得向人民提供援助的努力变得复杂——多年来，阿萨德一直试图压制叛军，并切断国际社会对他们的援助。据联合国，此次地震发生之际，叙利亚西北部的人道主义危机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共有 410 万人依靠人道主义援助维生。

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 近期向叙利亚当局施压，要求他们停止封锁进入该地区的通道，因为它试图帮助数十万地震灾民。“叙利亚西北部地区感觉被遗弃了，因为没有搜救队能够进入，”挪威难民委员会的 Bahia Zrikem 告诉 NBC 新闻。他还补充道，“国际社会没有做出足够快的反应，没有支持搜救队，辜负了叙利亚人民。”

志愿者救援组织 White Helmets 的领队 Yasser Nini 被留下来徒手在废墟中搜寻，

他告诉美联社，“我们知道废墟下有人，我们听到了他们的哭声，但我们没有救援他们的设备，国际社会和附近国家都不关心。”

《华尔街日报》的 Shelby Holliday 在分析中提到，联合国寻求与阿萨德政府达成协议，以进入叙利亚。最终，阿萨德同意在三个月内从土耳其再开放两个过境点以进入西北部，但这一措施直到地震发生一个多星期后才开始。在他们被批准的时候，已经错过了搜救工作的最佳时机。与此同时，救援组织 White Helmets 批评了联合国的这一举动，他们说，这给了阿萨德“免费的政治利益”。

不过，对于那些在冬季流离失所的幸存者们而言，这仍是好消息，援助机构带来了食品、帐篷、温暖的冬衣、毯子、床垫、医疗用品和心理健康支持。

也有人担心，乌克兰战争和叙利亚旷日持久的冲突等其他危机引发的需求，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这种援助。就在周日，叙利亚军方称以色列导弹袭击了首都大马士革及周边地区，造成包括平民在内的 15 人死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私人筹款和伙伴关系主任 Carla Haddad Mardini 告诉 NPR，叙利亚已经失去了世界的关注，就像许多其他资金不足的危机一样。

Also in the news

西班牙批准月经假、青少年堕胎和变性法

西班牙议会上周四通过了一项法案：允许任何 16 岁以上的公民在没有医疗监督的情况下改变他们合法登记的性别，12-13 岁的未成年人需要得到法官的许可才能改变，14-16 岁的未成年人必须由父母或法定监护人陪同；放宽对 16 岁和 17 岁青少年的堕胎限制，还取消了目前寻求终止妊娠的女性需要三天的考虑时间，旨在让女性更容易在公立医院和诊所堕胎；此外，本次投票还使西班牙成为欧洲首个引入带薪月经假的国家，有生理期丧失行为能力的女性最多可享受 5 天的月经假，根据西班牙妇产科学会的数据，三分之一的女性经历过痛经。

两部法律背后的推动者是平等部长 Irene Montero。她表示，新法律是关于国家保障基本权利。但在跨性别法以 191 票赞成通过之前，人民党警告说，这太过分了，太快了。该党发言人 María Jesús Moro 说：“我们都清楚其他国家已经放弃了他们的‘跨性别法’，因为他们现在知道自己做得太火了，造成了很多痛苦。”然而，西班牙最大的 LGBTQ+ 组织 FELGBTI+ 的负责人 Uge Sangil 对这项新法律表示欢迎。

美国南达科他州限制对未成年人进行性别确认护理

美国中西部的南达科他州本月签署了一项法案，禁止在该州对跨性别未成年人进行手术和性别确认非手术服务。新法律将于 7 月 1 日生效，违反该法律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将面临民事诉讼和失去职业执照的风险。

“南达科他州的孩子是我们的未来。通过这项立法，我们将保护儿童免受有害的永久性医疗程序的伤害”，州长 Kristi Noem 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该法案的反对者则强调，这项措施将对跨性别儿童造成伤害，是政府对医疗决策的干涉。多年来，南达科他州一直被倡导人士称为针对跨性别者立法的试验场。2016 年，该州是第一个通过学校厕所法案 (Bathroom Bill) 的州，该法案要求学生使用与出生性别相对应的学校设施。

根据 NBC 新闻，今年到目前为止，包括南达科他州在内的至少 24 个州的立法者已经提出了限制未成年人变性相关护理的立法。

印度的性少数群体开始为同性婚姻进行法律斗争

在四对同性伴侣提交寻求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请愿书后，印度最高法院将于 3 月 13 日听取关于是否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辩论。

在过去的十年里，印度 LGBTQ 人群的法律权利一直在扩大，其中大部分变化都是通过最高法院的干预实现的。2017 年，印度加强了隐私权，并承认性取向是个人隐私和尊严的基本属性。2018 年，印度推翻了英国殖民时代的一项法律，将同性性行为合法化。宗教方面，印度最著名的宗教团体的领导人要么不支持 LGBTQ 的权利，要么避免发表评论。但在占全国人口 80% 的印度教徒中，宗教领袖与社区交往的方式正在逐渐转变。

尽管取得了这些进展，但在法律上承认同性婚姻与执政的印度人民党的立场背道而驰。议员 Sushil Modi 去年 12 月对议会表示，这种婚姻“违背了印度的文化风气”，不应该把这个决定留给“几个法官”。然而，印度最高法院表示，它可能会挑战政府的立场。

由于同性婚姻没有法律支持,许多同性伴侣表示,他们面临着一系列障碍。例如,即使一对同性伴侣在一起生活了 30 年,其中一方突然去世而没有留下遗嘱,另一方也将没有财产权。同性伴侣甚至无法开立共同银行账户。

特斯拉员工发起工会活动,第二天他们被解雇了

美国工人联合会 (Workers United) 在向美国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 提交的一份投诉中表示,特斯拉近期在布法罗打击工会活动,解雇了 30 多名工人。工会敦促 NLRB 实施禁令救济,“以防止特斯拉的非法行为对员工权利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

本月,一群在特斯拉布法罗工厂就职的软件工人宣布他们计划成立工会,以寻求更好的薪酬和工作保障。但仅仅 24 小时后,公司的解雇就开始了。组织者说这不是巧合。特斯拉首席执行官 Elon Musk 一直直言不讳地反对工会,该公司以对工会组织者采取强硬策略而闻名。2017 年,特斯拉解雇了一位名叫 Richard Ortiz 的工会活动家。

舆论发酵后,特斯拉发布了一篇声明,表示本次解雇是该公司从 2 月 12 日开始实施的与绩效评估相关的裁员计划的一部分,他们在 2 月 3 日就确定了将解雇的员工,该公司表示这一切发生在工会运动宣布之前。

这个月,伊朗的抗议活动还在继续

二月下旬,伊朗发生了几周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一群人在首都德黑兰和其他一些城市彻夜游行。这意味着,在伊朗政府的处决和镇压之后,公民的抗议行为仍在继续。

1 月 8 日,两名男子 Mohammad Mehdi Karami 和 Mohammad Hosseini 因与抗议有关的指控而被处决。40 天之后,人们以游行活动来纪念和哀悼他们的牺牲。联合国表示,这两位男子面临着基于逼供的不公平审判。[据路透社](#),最近几周,伊朗官员仍在呼吁工会在德黑兰的商店和企业内严格执行头巾规定。

人权活动人士说,自去年 9 月抗议爆发以来,伊朗已经有 500 多名抗议者被打死,其中包括 71 名未成年人。近 2 万人被拘留。

日本将把与 16 岁以下儿童发生性行为定为犯罪

日本政府计划将与儿童发生性关系的法定年龄从 13 岁提高至 16 岁,这是该国刑法改革的一部分。批评人士称,该改革来得太迟,脆弱的未成年人迫切需要得到保护以免受性侵犯。

据共同社,日本目前的法定年龄自 1907 年颁布以来一直没有改变,是发达国家中最低之一。政府的目标是在本届议会会议期间提交一项《刑法》修正案,目前提交的建议还包括,秘密拍摄他人的生殖器或内衣,以及分享此类图像均属违法行为。此外,为了解决受害者在无法抵抗的情况下证明性侵犯的困难,修正案还将明确构成缺乏同意的 8 种行为,包括醉酒、下药、滥用权力和心理控制。以及,强行性交或强奸的起诉时效也从 10 年延长到 15 年,造成伤害的猥亵行为的起诉时效也从 15 年延长到 20 年。

耶路撒冷枪击事件之后,以色列平民更容易携带枪支

1 月末,在巴勒斯坦人于耶路撒冷分别发动两起袭击之后,以色列安全部批准了使以色列人更容易携带枪支的措施。部长命令枪支许可证部门加快发放新许可证的速度,从每月约 2000 张增加到每月 1 万张。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人民应该拥有武器。

去年底就职的以色列新政府是该国历史上最右翼的政府,这使人们担心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活动会增加。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Volker Tuerk 警告说,新的枪支计划只会导致更多的暴力和流血。

自 1967 年中东战争以来,以色列占领了东耶路撒冷,并将整个城市视为其首都,而巴勒斯坦人声称东耶路撒冷是他们所希望的独立国家的未来首都。根据巴勒斯坦卫生部的数据,2022 年有 200 多名巴勒斯坦人被杀。遇难者中[包括半岛电视台记者 Shireen Abu Akleh](#)。今年 5 月,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杰宁,她在一次军事突袭中被以色列军队击中头部身亡。

[或许,美国也将开始尝试四天工作制](#)

马里兰州的一些议员本月提出了一项在美国尚属首创的提案,他们希望补贴那些同意尝试每周 4 天工作制的雇主,即那些在不削减工资和福利的情况下愿意将员工的每周

工作时间缩短为 32 小时的雇主。

该法案的主要发起人之一、马里兰州代表 Vaughn Stewart 说,马里兰州提出这项法案的直接动力是最近一份报告,该报告是关于 33 家不同公司的 903 名员工缩短每周工作时间的试验结果。试验发现,大多数公司的生产率和收入都有了提高,大多数参与试验的员工报告压力、疲劳和倦怠程度都有所减轻。更重要的是,大多数参与调查的公司表示,他们不打算恢复每周五天工作制。

有关该法案的听证会预计将于下个月举行。如果签署成为法律,该计划将于 7 月 1 日生效。以目前提出的形式,这个计划将为符合条件的雇主提供高达 75 万美元的税收抵免,雇主必须参与该计划不少于一年,最多不超过两年。他们必须与马里兰州劳工部分享他们项目结果的数据。

墨西哥捣毁该国最大规模的制毒实验室

墨西哥军方上周三宣布,在一次突袭行动中,墨西哥士兵缴获了 50 多万颗芬太尼药丸,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该国官方记录中的最大合成毒品实验室。

军方表示,这个户外实验室是在北部锡那罗亚州最大城市库利亚坎发现的。士兵们于周二突袭了实验室,发现了近 63 万颗似乎含有合成阿片类药物芬太尼的药片,此外还有约 128 公斤的芬太尼粉末和约 100 公斤的疑似冰毒。

就在此次查获的同一天,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就美国每年发生的大量芬太尼过量事件举行了听证会,目前大约有 7 万人有过量服用这些药物的情况。

柏林为年轻人提供 50 欧元用于文化活动

柏林政府正在向 18-23 岁的当地年轻人发放一张 50 欧元的“青年文化卡”(Jungendkulturkarte),让他们得以参与到城市的文化活动中来。这张卡可以用来支付市内各大俱乐部的入场费,也可以用于各种活动,包括歌剧、博物馆和电影院等。这张卡的有效期为 2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人们必须在该市有住址证明,并在网上注册才能获得。

随着生活成本的上升,柏林的文化部门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许多标志性的文化艺术场馆或机构被迫永远关闭。该项目有望为这座城市带来更多活力,并鼓励年轻的柏林人以更低的经济成本重返城市。

柏林俱乐部委员会 (Berlin Club Commission) 在社交平台上庆祝了这一消息,该委员会代表了柏林一些重要的俱乐部和派对组织。文化参议员 Klaus Lederer 评论了这张卡片的重要性。他说:“18 岁至 23 岁的青年文化卡是针对那些刚刚开始了解柏林多元文化景观的年轻观众的,他们经历了近年来的限制”。



Snufkin

撰稿人,做杂志也做新媒体,关心年轻人和他们的新实践,喜欢阅读、观察,然后分享。

Newsletter

四种新闻信轮周发布,各自以认可的维度覆盖撰写者认为重要的新闻。因而会有重复。不过不用担心,它们也会有不同的解读。重复说明了某个问题在世界的权重。



电影《让娜·迪尔曼》(1975) 剧照

然而这的确和很多她拍过的影像一样，是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万青的影像几乎没有公映过，也少有媒体采访。但她有很多观众，一部分她能见到，那是在不同活动地方的小规模放映现场；一部分她根本不知道是谁，有人自发把她的视频搬到bilibili，有人在豆瓣标记条目。在豆瓣上，万青的《早餐室》有大量认真的影评，阅读它们，你会觉得看片子的是那种本身会留意生活细节的人。

万青从来没有正式学过影像制作。她第一个完整的作品是在一个残障人士权益NGO邀请下完成的，后者当时希望有一部宣传片来反映视障群体就业的局限问题，而万青在公益圈做过很多拍摄工作。两者聊完之后，万青觉得这其中的复杂性超出了自己的预期，于是宣传片变成了更长的纪录片。

时隔多年之后，万青再来看自己的作品，会觉得自己当时热衷于借助影像来倡导社会议题，艺术语言和审美都谈不上满意。但当时万青就是这样。她想改变社会，脑子里的思考完全是“自己能帮上多少忙”，影像只是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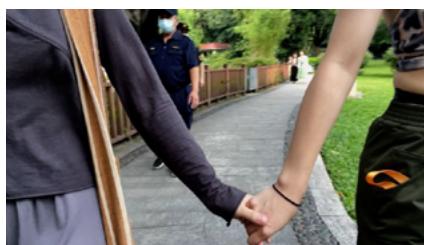
专栏

一个不在游戏规则里的 影像制作者 | 接力访问 013 万青

杨樱 | 接力访问

对一个希望介入社会的人来说，
影像可以如何使用？

2023年1月24日，春节假期，万青在公众号里推送了她的短片，《我请警察散个步》。标题每个字中间都有一个空格，像在反互联网审查。9分钟，很容易看完，镜头一直是从下往上的，让那个向万青要身份证件的警察连皮带都快兜不住的肚子显得更大。



短片是个记录：万青和朋友在公园，突遇查验身份证，对方不说明任何理由，也不让她离开，因此万青提出一个交换条件——一起绕道走一圈，就当散个步。由身体语言和对话构成的拉锯，让人看的时候始终悬着一口气。我怕警察会动手。好在没有。并且所有的对话里最让人记忆深刻的不是来自当事人双方，而是旁观的路人：“你就告诉他嘛，你不做亏心事你告诉他怕什么！”“因为这不公平啊！”万青的回复像是一种解释，但更像是一种普及。她不只是为自己在讲。这个短片给人的感觉也是一样，她不只是为自己在拒绝报出身份证，不只是为自己才记录下整个过程。



这部叫做《盲人不按摩》的影片完成于2015年，后来成了她的毕业设计作品（因为恰好那一年学院放开要求，允许毕业生不局限于论文形式）。她是学新闻的，但之所以选择新闻也是因为她想“改变社会”。她生于1993年，读高中时候，恰好目睹2007年那个举世闻名的拆迁事件：重庆杨家坪钉子户。那座因为施工方提前开挖地基，导致房子高于周边地面十几米的人家，就在万青的中学附近。她每周经过看到孤岛一样的房屋，又在报纸上看到房主举着一本宪法来捍卫自己的权利，现实与媒体叠加，“那种冲击非常巨大”。因为“改变社会”的想法，她填报的两个志愿，一个是环境工程，另一个就是新闻。后来万青去广州读中山大学。她从《南方都市报》上搜寻各种讲座和活动信息，周末就往外跑，从学校的环保社团进入环保圈，又进入了公益圈，从女权、劳工到残障权益，“基本上跑了一个圈”。2014年前后，广州的媒体和公益热度还未完全收缩，用万青的话说，她从2011年来到这里上大学，就相当于“闯到了时代语境里面”。

但她很快抑郁了。政治抑郁是一方面，“虽然兜了一圈各种议题，但发现找不到出路，解决问题的出路，不同议题圈层之间存在隔阂，但问题总是互相缠绕地出现”；其次是和原本投入相当大热情的社群产生了隔阂。“当时参与的性别社群会有比较严重的话语权斗争，会有差序格局，核心圈子会去边缘一些伙伴，甚至发生集体暴力和霸凌，但公共层面你看不到，因为大家不敢说或不愿说，怕说了破坏团结。我原以为搞这些的人肯定都是心地善良心怀正义的人，但是没有想到原来邪恶存在于每个角落。”

最后一重压力来自某个她更没有设想到的事情。影像和很多行业一样，是“圈子”。她报名电影节或者国内的民间电影学校，都没能入围。“我并不熟悉电影行业这个圈子，它其实是一套自己的运作规则，但我并不了解这些，因为没有电影学院的老师或同学或前辈来告诉我。直到后来有一个做过影展的人，他跟我说，如果你没有这种裙带关系，没有人际网络，没有制片运营团队，基本上还是不要去考虑太多影展的事情了。”

有将近四年的时间，万青都在这些关系里挣扎。社会和自己，社群和自己，一部分自己和另一部分自己。她一直没有停止拍摄。甚至拍摄这件事也让她产生撕裂感，就是之前

提及的“议题倡导与艺术表达”的问题。“作为倡导者、行动者的我，和作为影像工作者的我，要如何去平衡两者的关系，我对后者的爱让我有点否定对前者的态度，因为影像要讲包容性，但作为一个倡导者，得有很明确的声音和态度。这里面有一个自我认知的问题。”

万青的情绪变得应激，也不愿意再接触社群，但做影像这件事没有停下来。她有七八个月不愿意碰之前自己拍摄的东西，那时候她试图制作一部片子，探讨“女性、消费主义和劳动”等等一系列复杂的议题，那时候的万青，会倾向于用这样的语言来表述自己的作品：“本片试图从作者的两个面向——2016年参与的中国民间‘反三七过三八’行动实践和家庭日常——切入，结合近当代社会性别现象，探讨一个关于被看、自我观看与反观互构，焦虑与欲望叠织的漩涡。观看时，你将不断面临选择。”



这样的语言，后来也被万青否定了，“跟论文摘要似的”。不过那要发生得更晚一些。这部后来被命名为《七上八下》（2017）的影片至少帮万青做到了一点，听听不同观点者的声音，更深入地分析问题。她开始从一个议题推动者变成一个试图中立的观察者。哪怕是镜头语言，她也希望变得“更精确”。

到了2019年《早餐室》完成的时候，她自己和她的观众都可以发现一个更自如的万青。

《早餐室》是万青的成长，也是她的日常。有人说这是“一部梦呓一样的电影”，也有人说“没有强大的自我的彰显，导演有耐心地可怕”。这两者可能说的是同一样东西。万青把发生在自己生活里，一般人快速掠过的东西以一种既私人、又公共的方式呈现了出来，就好像《我请警察散个步》里那种兼而有之的感觉。

当时万青住在广州深井村，她正在进行一个社区实践：替人理发。万青自学过理发，连自己的头发都是自己理的。她把理发的牌子挂上一辆自行车前，谁看到就可以联系她。地点通常都是别人家里、院子里、店里。一个卖菜的阿姨，因为从来抽不出时间去理发，因此万青就在菜摊边上理；一个卖牛奶的阿姨，就在家里的院子里。至于报酬，万青让对方看着给，也可以以物换物，因此她收到过牛奶、蔬菜，也收到过99元。理发的场景也在《早餐室》里，万青成为一个倾听者，而被理发的人开始讲述从抚养小孩到环境恶化的各种看法。其实理发的频率并不高，“平均也就一个月一个”，但是万青通过这种方式找到了新的人际关系连结，“基于生活情境的，而非观念主导的”。此时和她最初加入社团、又因为厌恶离开社群，差不多已经过去了七八年。

《早餐室》穿插了万青广州生活与重庆原生家庭生活的影像，它有个直白的介绍：这是一部关于地方、身份、情绪、身体和自然的关系的电影；一切源于想换种语言跟世界打交道。其实在豆瓣页面上，这句介绍后面还有一串更复杂的说明，但她已经比之前往日常生活里靠近了一大步。这也是她一直试图在做的事情，从如何更平易近人表达自己的想法，到成为一个怎样的“日常行动者”。当初社群那种热烈但有些单一和排他性的状态已经被多义的生活取代，在万青的理解里，介入社会依然是必须的，问题只是要怎么理解自己和世界的关系，以及在种种限制之下，要如何做。

“不是说共同体和集体本身就是糟糕的、就是坏的，而是说要创造一个怎样的共同体。虽然人性的恶确实是无法消失和消灭的，但是我们可以发明一些有创造性的机制和方法，来制衡人性的恶。”

Q：你最近在做什么有趣的事情？

A：为《盲人不按摩》重新配置口述影像。有一个国内知名设计部的人，发明了一种新的盲文字体并用于药品包装上，他想跟艺术圈的朋友在北京做视障相关的展览，也想把《盲人不按摩》在里边展映。我就想趁这个机会重新配一个口述影像。

Q：什么是口述影像？

A：就是视障朋友看一部电影，那些空环境信息他们是不知道的，这时候就需要口述影

像的辅助，替他有一个旁白的声音，描述现在这个画面是什么样的。

其实当时在拍的时候，正是因为考虑到要让盲人朋友接收到充分的信息，于是砍掉了大量的空镜，让对话非常密。我当时不太了解口述影像，所以做的一个折中处理就是减损它的纯视听语言的部分。

Q：这件事有趣在哪里？

A：因为做《盲人不按摩》的时候，没有把它当成是一个艺术创作作品，完全把它当成公益的、服务社群的东西，所以后来会从镜头语言上感到自否。现在有机会让我重新搭建一个新的关系，也是跨越了七八年的回响，对我来说非常疗愈，感觉很奇妙，有种玄学的兴奋感。

Q：你对这个展映有什么顾虑之类的吗？

A：他之前给盲文字体做展是杭州设计周的时候，即便公益性质但我还是很警惕，当时跟小伙伴商量说不想被大资本收编……其实现在我也不太搞得清楚他跟公司的关系，反正接触交往下来，觉得这个人是诚实的、靠谱，然后我选择相信他。

Q：这么多年你还介意你不在影视圈的权力结构里的吗？

A：现在越发清醒地认识到它就是一个游戏，不同游戏中的一种，只是我没有参与那个游戏。既然不在游戏规则里，就自然不用去想能从中得到什么。

Q：推荐一个你觉得有意思的人？

A：就设计部的这个男生吧！他叫李超，也是工作在主流体制中的年轻人，想做一些不一样的、有点难的、但认为对的事情。

文内视频静帧由受访者惠允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电影《巴赫曼先生和他的学生》(2021) 剧照

他会引用著名教育学家、哈佛大学博士托尼·瓦格纳的理论来作为“好奇学习社区”课程设置的内核:“第一就是童年时候有意义的玩耍,不是浪费时间的娱乐,是有意义的玩耍;第二,青少年时期带着激情的追求,找自己的人生方向,疯狂探索;第三,成年以后的觉悟。这是他全球采访了大概一千多名各行各业人士,尤其是青年领袖之后得出的规律。”“所以我们现在用的三个关键词,好奇、勇气、觉悟——‘觉悟’这个词就是从他这儿来的。”对“好奇学习社区”感兴趣的媒体通常乐于描述一个痛苦万分的学习者如何在这里释放压力、重建自信的过程,报道者本身也对这里的课程设置、师生关系和学习目标心生好奇。在这一点上,池晓总是具有打动人心的表达力,比如他会在2022年底孩子们的17岁成人礼上说:“我希望你们都能做一个眼里有光的成年人。”



环青海湖骑行

专栏

在当下,更要学会 “用擅长的方式 做喜欢的事情” | 接力访问 014 池晓

杨樱 | 接力访问

“做一个眼里有光的成年人”。

和很多创业者一样,池晓很早就知道他想自己做事。他是那种有自信、也想证明自己的人。问题只是在于要做什么。

池晓生于1990年,大学毕业之后在一家教育类NGO工作。到2015年的时候,他所在的NGO已经停止运作,但他从之前负责的青少年成长项目里模糊地建立了创业的方向:教育。只不过作为一个资深游戏玩家,他想把游戏和教育结合在一起。在“全民创业”的2015年,这的确不失为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创意:以游戏作为核心元素来做一所学校。

不过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来看池晓要做的事,都和当时风行的创业标准格格不入。当时的创业关键词绕不开市场大小、增长率高低,即便概念先行,也得不断“迭代”。池晓做的事情,倒是有点像在传统教育体制里面“捡漏”,那些无法适应的人,或许可以是他的潜在客户。

他最初拿到了一些资金,从夏令营的模式开始初步尝试。一切看起来很务实:成本可控,虽然利润不高,但可持续。这个现在被叫做“好奇学习社区”的机构,从最初的一名学生到现在20人不到左右的学员规模。因为因材施教,注定无法规模化发展。事实上它也不会去张罗这件事,在教育和意识形态紧密结合的中国,“好奇学习社区”这几个字已经清晰划定了它可以实践的范畴。但这不妨碍池晓在这个框架里试一试。

通识教育和个性化教育,是理念基础,池晓有更通俗的解释:“让学生对什么都了解一点,然后掌握基本的方法论,能够去探索世界,然后更了解自己——学会用擅长的方式做喜欢的事情。”

不过如果仅仅扮演“挽救者”的角色,也就是对冲传统教育机制带来的焦虑和压力,其实并不是那么难的事情。难的地方在于在一个社会氛围并不宽松的前提下,依然要让人文通识教育的方法变成一种可实践的制度。在搜索对“好奇学习社区”的评价的时候,不难看到“娜拉出走之后怎样”的担忧——孩子们在离开这个理性亲善的环境之后是否真的能维持同样的自信,以及把学习方法应用到真实的生活中去?虽然进行通识教育的大小机构在中国并不那么罕见,但是和主流教育方式相比,任何尝试都可以称作独立的、实验性的。

池晓的“客户”是渴望尝试不一样教育机制的成年人,也就是学员的父母。收入稳定的中产家庭,拥有开放的思维方式,这都是常见的配置。“好奇学习社区”设在成都,而成人礼是在海边举行的。同学们自导自演自创服化道的戏剧是《汉密尔顿》、《我们的小镇》以及《尤里乌斯·凯撒》。在海拔4200米的高原为老师举办婚礼,可以是一项课程。他们会和专业人士进行对谈,也会在公众号上讲述自己到学习社区之后的心路历程,在很多人讲述的末尾,朋友、父母和池晓都会出现在感谢名单里。他们称呼池晓就是“池晓”。



音乐剧《汉密尔顿》

教育是池晓自创业开始自学的一个领域。在和他聊天之前,相比这个项目以何种方式运营,其实我更想知道的是,一个运营创新教育社区的人本身经过了怎样的教育与自我教育?他对个性化教育的感知和自我的成长之间是否有某种遥远的呼应?最基本的是,他作为一个参与制定一整套学习流程的人,他的学习能力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池晓说他认为最重要的东西是反思。

“小时候挺变态的,在那种应试的竞争的氛围下,我小时候特别在意竞争,我连上学走路都要走得比别人快。成绩上总是在比较……最早老师其实对我最多的评价就是小聪明,有很多偷奸耍滑的技巧,但是我会从更高维度反思,我确实最早因为这些所谓的小聪明,获得了一些收益。”



做事课：在海拔 4200 米给老师办一场婚礼

Q：为什么想做这样一个夏令营？

A：没有人做过类似的事情。然后试一试本身又挺有意思。中国很多学生都陷于学习之苦，这个问题我们积累下来的经验一定是可以应用到更广的范围里去，这是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事情。

Q：你会推荐什么有趣的人来接力？

A：安猪，他现在就是一个数字游民。他最早做“多背一公斤”，然后做乡村教育的工具研究，现在在做一个项目，帮助很多人去探索自我怎么获得力量感。

“反思对我来说是一个确实挺重要的东西。我就举一个例子，我小时候一直是当班长，民主投票选上去的那种。当班长以后，我干的其实最多的事就是打小报告。我认为这是好的，这是在帮助同学，在某种程度也是在帮助老师管理班级。就是小学五六年级。到初一以后，我也不是什么班干部了，还是习惯性地想要去借助打小报告来帮助某些同学，这是我当时很真实的心理动机。有一天突然好像就觉悟了：这不是最恶心的行为吗？人家都讲义气，你这是最不讲义气的行为，然后我就想，是不是之前很多我认为对的东西，它有可能是错的。”

“在很多事情上我就积攒了很多这样的点，我经过反思，我经过比较我得到了一个结论，最终其实让我的整个人也受益，其实在学生时代它最多就体现在成绩上。”

“我从初中后半段开始有一点厌学，其实不是厌学，就觉得光为了成绩学习好像也不是一个那么对的事，就会就想要做更多其他的事情，而不只是天天学习。高中就对应试教育有负面反应，可能就是从这种莫名其妙得来的反思习惯里引发出来的。”

这件事他会在自己的创业里找到答案。“因为小时候评判标准很简单，就是成绩，我总是觉得我是学的特别轻松的，我在学习上几乎没有受到过什么压力，在小学和初中这个阶段。但我后来学了教育学，就知道这个东西不是你真正有多聪明，而是其实就是发育得早而已。人的大脑是有发育规律的，硬件没准备好，就不可能理解那么快……很多真正的智商高的、聪明的人，要度过多年压抑的岁月，可能大脑准备好了，心智已经被打击下去了。”

反思的前提是不遗忘。自己得提醒自己曾经做了什么。其实在被问到这些的时候，池晓的反馈速度快得就好像他已经把这一整套过往反刍过很多次。他说之所以可以做到这样，除了小时候养成的习惯，他曾参加过一个由学者余世存主持的研修班，主题就是“自我整理”，不止要回顾个人发展经历，还要思考“自我、家庭和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

“我当时就在说，‘原来这个是那么回事’，‘那个是那么回事’，后面大概有很长一段时间就会刻意去做很多角度的、关于自己的整理。”

在创业进行到第 8 年的时候，一个人所做的事情依然需要不断解释其意义和模式，从商业的角度说不能算顺利。但池晓已经不再从传统创业的视角去看待自己所做的事。

他在鼓励团队时候会说：

“这个时代不太适合做大事，因为你越大，可能死得也越快，死得也越惨。也不是说我们非得做小事，但我们首先要做好事，把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事情做出来。也不是刻意要独树一帜、标新立异，但现在反而就是到了这么一个节点，就是：越是不一样的，但我们认为有价值，别人没尝试过的，恰恰就是我们现在更有使命感去实现出来的。”

如何“学会用擅长的方式做喜欢的事情”，这句告诉学员的话，可能池晓自己现在也在反复琢磨着。

Q：最近在做什么有趣的事？

A：准备一个夏令营计划。我们其实从 2019 年就开始做，去年迭代了一次，今年准备再迭代。就是招 80~100 人，分成 4 个学院，就像《哈利·波特》一样，以学院制的方式来组织夏令营。你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课程，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然后有 260 多种课程，非常丰富的一个大杂烩，涉及到方方面面的知识领域。我给它的一个定义就是学习的节日。最近就在为今年夏天的这个学院制夏令营做准备。

Q：做这个事会遇到什么困难？

A：我们其实不是第一次做。它的难度每次都会发生变化，最早的难度就在于你怎么组织那么多内容，怎么样去协调，而且还得好玩。今年的难题其实是任何教育机构都会遇到的：积极的学生到哪都是积极的。所以要如何充分调动那些不积极的学生？最近在思考这个。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出水马，铁皮连接处需要有东西剪开。此时同行的朋友说，我有一把指甲钳。

“扎带崩太紧，一剪整个就松了。然后我们一冲过去，就回到了自由世界。就这么简单。你也不怕警察过来，他们不会过来。这就是一个很荒诞的过程。然后我们就打车去朋友家。大概是凌晨三点。”

欧飞鸿很懂描述场面时的节奏感，寥寥几句，气氛诡异的午夜行动就会像电影回放一样呈现在你面前。如果把这算做他人生第二刺激的午夜，排第一的可能是 2016 年的一小段时间，他夜里开着小摩托在广州犄角旮旯各种地方喷“烂涂鸦”。看起来就是拿着喷漆乱涂文字和符号，但据欧飞鸿说，这是一种观念艺术。他每次都会规划好路线，有时还会“众筹”烂涂鸦的内容，然后把这个过程用相对理性的方式整理出来，发布到公众号上。“做涂鸦就是（探讨）个人跟城市空间的关系……当代艺术都是观念艺术，东西好不好，其实完全在于艺术家的内心是否清晰、强烈。”



专栏

或许生活本身 也是一种观念艺术？ 接力访问 015 欧飞鸿

杨樱 | 接力访问

如果希望它有创造力，
你至少得是个内心清晰的艺术家。

2022 年广州海珠区封控 20 多天的时候，欧飞鸿和几个朋友决定离开。他们之前已经有了几个成功翻越“边境”的案例，又恰逢村里批准“只出不进”。一切只剩下离村之后怎么办的问题。

“我们那边外面有个高架桥，把桥拦住就整个封住了。当时我们一下子到了外面，感觉很强烈，大马路上没有人，警车开来开去但是又不理你，然后走了一公里左右就看到有拖家带口的农民工，拿着桶、被子和各种行李在走。高架有一些地方比较矮，只要爬上去就可以步行到另一个自由的城区，然后就可以回家了。但是那边都有警车看守。对，就好像是战区一样。”

中间的过程可以略过，大致是拦车把自己运输到了某段“边境”周围，在半夜开始突破。他们要突破的障碍物是两层水马——你可以理解为灌满了水的巨大塑料盒子，高约两米——以及一层铁皮。铁皮之间用塑胶带紧紧捆扎连接。他们等候时机、判断周边局势、被人看到之后为了缓和气氛还聊天并撸了街猫……如此一番之后，荒谬时刻到来了：钻

这个叫做《夜巡》的艺术项目给欧飞鸿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也让他和身边的朋友告别了某种政治上的天真。在这之前，他自称是文艺青年，看很多书，很多电影。不过他更显著的特点应当是“懒散”。他出生于 1978 年的粤西山镇，从广州美院毕业的时候，正遇到 2000 年前后广东经济高速增长，人人向往中产生活，力图奋发。更何况那时候本科文凭含金量还没有被稀释，就算不能一夜暴富，踏实谋生逐步小康肯定不是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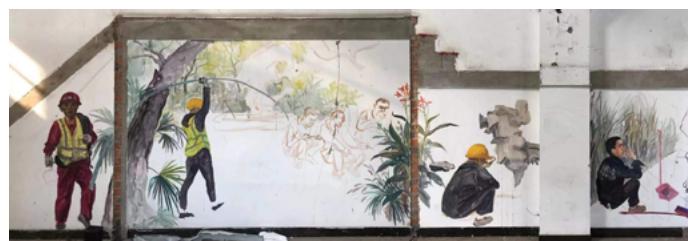
他大学时候受班主任影响颇深，此人说过，“做人就是要游手好闲”。应当承认，班主任的个人魅力涵盖了诸多方面，包括开了东南省份最具影响力的书店，这句话给当时的欧飞鸿带来的心理暗示不可小觑——要到很多年以后，他才意识到这句话仅仅是一句审美化修辞，因为班主任本人实质上为了赚钱忙得不行。

无论如何，他当时的的确没有忙着把自己塞进常规生活。“我毕业之后就不想回家，我爸其实给我找了一个本地中学还是什么的职位，我没去，留在广州装模作样找了一下工作。我是有可能做老师的，校长都天天打电话过来，但我还是没有去。”

当时北京圆明园的艺术家们也是生活模版。“看到他们那种可能，然后广州生活很便宜，又有一些简单的工作可以维持，你就一直在这种状态里，摇滚乐、电影、书……你不想进入艺术系统，但你会看到自己有东西在那里。”

在一个人人生出现某种标志性事件或者机会之前，似乎生活都是模糊琐碎的，尽管这种状态才是基本的日常。欧飞鸿在几个画室教人画画教了好几年，后来又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村子里开咖啡馆，也会接一些商业绘画维持生计。大约在 2008 年的时候，他通过一个叫做《想象阳台》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确认了自己的创作支点；2011 年，他开始做纸模涂鸦，在住所旁边一个服装加工村的工厂白墙上。附近的打工人家属常在江边绿道休闲，他把他们的肖像做成等大的涂鸦，等到数量越来越多，还会有人“看样订做”。他的很多壁画作品会伴随建筑物的消失而消失，比如《入废墟》系列，其中一组画在上海郊区碳素厂房里，如今早就连废墟也不存在。

这样的“懒散”其实像某种抵抗，不愿意进入某种规则明确、结果明确的制度，也不愿意成为某种权力结构的一部分。“懒散”最大的问题并不是收支，而是当一个人希望独自寻找某种游戏规则的时候，他到底要做什么，又要如何评判自己做的事？如果个人的生活



意义没有依托在子女、财富、行业前途等等之上，到底应该放置在哪里？

其实从艺术市场的角度来说，广州本身就有异于上海和北京之处，它始终没有特别发达的艺术商业化氛围。这个城市似乎总有一群半生不熟，又有表达欲的艺术家，想要让自己和自己的作品进入社群、获得讨论，更明确地找到个人风格。广州时代美术馆旗下的“黄边站”一度扮演了这样的孵化角色，在2015年前后，有更多的非盈利艺术空间出现。欧飞鸿在其中一家叫做木马咖啡馆的做了一年策展。这一年，他跟人的接触一下子打开了。“倒不是说他之前社交闭塞，而是从创作的角度看，他始终是孤独的。而做策划人意味着他进入了一种媒介身份，无论是视野还是社交都大大活跃起来。”你找到了一个更舒服、更轻松的跟世界联系的方式。这是很棒的，因为孤身一个人奋斗很痛苦。我是一个没那么要强的人，当然我作为人，还是希望能够被看见、被重视。（木马策展人）这个身份太舒服了，而且你在服务别人的同时，也在吸收别人，最后一起呈现。”

那一年，他策展、做访谈，同时操作线上的媒介传播和线下的作品发布。他发现了更多表达的可能。这可能是欧飞鸿人生最重要的心得之一，和“流动”在一起。直到现在，他在总结很多艺术机构的疲态时都会提到“内循环”——当一个模式被反复应用多年，必然会进入程序化的疲惫期，熵值增加，活力下降，成员离散。此后他和很多朋友希望寻找的东西，就是是否存在一种模式，可以让新鲜的想法和参与者不断流通，彼此启发，并且不会屈从于某个固定的中心人物或者机构。社群是重要的，圈子不是。

这几乎是个哲学话题。当然，欧飞鸿会引用朋友的话说，这也是一个伦理话题。2019年的时候，他遇到了实践类似模式的机会。当年他获邀参加一个美术馆展览项目，不同的艺术家认领整个美术馆里不同的空间。欧飞鸿选了厕所，并邀请朋友陈逸飞做编辑，一起制作名为《刺纸》的杂志。他用细绳把自己做的杂志挂在厕所里，让人随便翻看。杂志是手工做的，融合版画和手工装订的种种痕迹。有一些地方故意模糊不清，这是一种人为制造的障碍，是对注意力涣散的阅读者的无声挑战。



《刺纸》

就这样，欧飞鸿的“社会”身份多了“《刺纸》创办人之一”，即便不了解其他艺术作品，通过这份小众杂志也可以间接地了解他的理念。陈逸飞小他18岁，《刺纸》的很多变化来自两人的合作，互相的激发和默契超越了欧飞鸿以往的经验。

《刺纸》是全手工制作的，本身就是艺术品，但乍看上去，倒像小时候劳动课做的那种作业，只有仔细翻阅，才会发现创造力和工作量惊人，“每期封面由不同的朋友用版画印制，内页则用家庭打印完成，以粗粝的手工风格呈现内容，稿件征集和排版形式会因主题而改变”。因此它不定期生产，通过少量售卖来维持日常运转。这份刊物有个口号，“做期刊是连结朋友的一个途径。”欧飞鸿会给这段形容补上最后半句，“包括还不认识的。”这样的流动性构成了欧飞鸿和他很多朋友们的生活意义——直接表述会让很多人觉得难以理解——“与每个时刻遇见的人相处”，或者说，“无差异的个体连接”。

到目前，《刺纸》一共出品了5期正刊，3期号外，3期报纸。主题涉及快递员生活、监狱生活、月经用品、女性自慰、更年期等……这些内容不会审查来稿，只是会作必要的编排。谁也不知道下一期内容会是什么，至少在上一次接受访问的时候，欧飞鸿说他在换毛期，没啥想法。

他有的时候会零散出售自己的艺术作品，生活似乎始终处于“可维持”的状态。在政治抑郁最强烈的时候，哪怕身边有诸多来自朋友的慰藉，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会觉得沮丧和溃败。但这些都和钱没太大关系。关于钱，他有一个如今听起来颇为微妙的童年记忆——他从小学的时候就认为，自己不会发财。

“小学的时候有一天，早上起床，阴天，微微有风的样子，我站在老家的晒场上望向远处，就觉得远山的尽头有另外一个世界，我以后不会在这里，会去另外一个世界。多年以后，看胡兰成的《今生今世》，他也写他站在家乡看远方，觉得山之外有山，山之外有另一

个世界。我就觉得，哇，原来他小时候也是这样！”

我们在2022年底聊过一次，彼此提及无论是社会还是身边的个人，都没有太多好消息出现。对于一个生活公共性极强的人来说，社会的困顿和个人的困顿同时放大，想要不压抑都难。农历新年之后，他似乎多少挣脱了一点点。对他来说，眼下最重要的事情，还是在各种困难下，“重新在自己的工作路径里面找到新的可能和活力”。



压轴

Q：最近在做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A：在魔都约一起练功，推手。

Q：要怎么一起法？

A：每次练功我都做一张海报，发朋友圈，大家就来。不过这次在上海，因为种种原因，海报上面没有写出地点和时间，都是朋友们私下联系我一起敲定。我会选一些小公园，比如之前绍兴公园，还有高安路和衡山路交叉的一个小公园，还有朋友的书店。

Q：这件事有趣的地方在哪里？

A：推手本身最有魅力那部分就是接手，就是两个人的双手要粘在一起互推。这是一个身体互动游戏，又一点有竞技，但是又不会伤人。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技能。练习推手就会认识新朋友，朋友带朋友，就会有好玩的事发生。

Q：推荐一个你觉得有意思的人？

A：两个朋友吧，张涵露和冯俊华。



文内图片均由受访者惠允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专栏

离开北京之后， 我给自己一到三年的 生活“实习期”|

接力访问 016 Alexwood

杨樱 | 接力访问

到底哪里才是你能实现一些尊严和创造力的地方？

如果没出什么意外，李旸的生活实验现在应该已经进行超过 10 天了。我们聊天的时候，她说她会在农历新年后正式从北京搬去云南大墨雨村。离此地最近的城市是昆明，但按照地图上最显著的标志物算，最近的可能是一个国家森林公园。

“李旸”这个名字从她十几岁出国之后就没有人叫了。所有人都叫她 Alex (倒是没有问父母对她的称呼)，如果是在她做的播客和主持的媒体栏目里，她叫 Alexwood，w 不大写，这样看起来平衡一些。在聊天之前我搜了搜这个名字，出来的都是男性面孔。这在某种意义上正中 Alex 的追求——不是成为男性，而是避免被认定为女性——“名字上尽量不透露任何让人产生性别判断的线索”。

Alex 的社会身份和一系列性别维系在一起，在说她的生活实验之前，必须得先说说这个。她先后读了心理学硕士、性与性别博士，然后在“BIE 别的”主持泛女性内容平台，又在 2018 年开始做一个叫“别任性”的播客，口号是“从性别角度看一切”。要了解 Alex，绕不开所有这些——然后很自然地，会有比较，在各种各样的“主义”、各种各样的“者”，你是哪种主义？哪种“者”？

“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是什么样的人、去做什么样的东西，其实没什么选择可言……我自己想强调的就是自己的边缘性和批判性思维，不去轻易站队等等，对女权主义身份本身也需要有很多的反思。”

“你会看到有些人能够带动极大的受众，短时间内能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力，比如去政治化、强调那种女性力量的内容，girl power、姐妹情谊，内容蛮好，但是不会特别强调政治化的、或者是形而上的东西，可能更多的是轻松的、陪伴性的。然后还有‘女性成功学’，从性别的面向强调个人主义和个人成功，包括‘我们女性’如何更能独立自强、自足赚钱。”

浏览“别任性”的内容列表，的确会觉得它更宽泛一些。歌单、青年女性导演的新作、女性阅读和写作，还有欧洲生态社区，男人的年龄焦虑和“无性恋如何让我们更理解亲密关系”等等。2022 年 11 月底的时候，编号第 128 期的标题是：《在农村生活，是让我很有安全感的事【附「女性生活者联盟」招募声明】》。而 2023 年 2 月 8 日，编号第 133 期的标题是：《彩虹宝宝的新村民生活，我们继续勇敢，希望你也一样》，嘉宾吴晨和蔡睿是大墨雨村的新村民，“墨雨村学”和“碎石农场”的创始人，也是彩虹家庭互助平台“彩虹宝宝”的创始人。Alex 写，“2022 年 10 月，我旅行经过大墨雨村的时候采访了她们，而现在，我已经成为了她们的邻居了。”

这些标题透露了 Alex 近几个月来的生活痕迹——先是和伴侣用三个月在拜访各地的朋友，寻觅一些社区，看看他们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其中的共同点就是“城市之外的非主流生活”。她最终在云南大墨雨村拿好了主意，又在过完年之后正式搬了过去。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对眼下的 Alex 来说，大墨雨村保留了农村的生活形态，但又因为这几年不同外来者的加入呈现了某种现代性，比如性别多元，生态农业或者豆瓣上随便就能搜到的，民宿。这是个理想的过渡地。在这个找寻和斟酌的过程中，她发起了一个叫做“女性生活者联盟”的虚拟社群，参与者得说说自己有怎样的生活技能，比如刷墙，做某种手工，生炉子之类，总之是一种生活实践经验，愿意支持某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到我们聊天那会儿，加入者已经超过了 70 个，像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分享社群。

这些动作都是从“我要离开北京”这个念头出现之后开始的。对此她有一个思考过程：“我不是出于逃离的目的离开北京或者是离开城市，而是觉得这是一个更有机会让我实现建设自己想要的生活的地方。不是说一个地方不行了，换个地方，而是说在想希望到底在哪，在国内的话，现在的希望其实就是这些犄角旮旯。乡村恰恰是能让你还能实现一些尊严和创造力的地方。”

“其实有一个大前提、硬前提，就是生活成本低。一旦生活成本低了之后，我每天几点醒来或者几点起床，就没有什么负罪感。除非我想的是，如果起晚的话，我少了点晒太阳的时间。这边太阳真的很棒，让人觉得必须要在太阳下晒一会儿。”

她描述了在北京的典型的一天（在 2021 年她成为一个自由工作者之后）：

“可能 10 点多、11 点多起醒了，但是基本上从醒了、拿到手机一刹那就进入工作状态了，而且你打开手机一定会有工作信息等着你。然后我会泡红茶就面包。基本在吃的时候就处于工作状态，然后会去我的工作台那边开始处理，无论做播客还是什么的，基本上就是一天就坐在那，直到下午饿了会叫个下午茶。要个咖啡。对外卖是绝对会有的一部分。因为觉得都做了一天，这么辛苦，要 treat yourself。晚上再叫一个外卖，吃完之后，肯定还需要再继续工作，因为我晚上效率会更高，12 点甚至可能更晚才睡觉。如果是相对轻松的一天，就是吃完饭看个片，不再工作了。”



在这之前她描述了在大墨雨村典型的一天（那还是她正式入住之前）：

“这两天终于买到了一个二手手风琴，小时候弹过，现在想重新把它捡起来。今天起来

之后就一边泡咖啡，一边吃饼干，一边玩琴，可能玩一个多小时，然后这个状态跟小时候练琴完全不一样——小时候练琴的时候度秒如年，现在觉得很快时间就过去了。对，然后再坐下来想一想，下午1点了，我今天有什么工作要干嘛。”

“为什么我们在城市里面不能出现这种生活状态？因为（城市生活是）大机器，你就被卷在里面，不跟着走你也得卷在里面，基本上没有太多能够放松的时间。”

你能感觉到她在描述的时候带着相当的愉悦，那种在一个新玩具刚上手时跃跃欲试、努力去设想各种可能、给自己鼓劲的愉悦。而她同时也用类似的愉悦解释自己为完全陌生的“村里的生活”做了哪些准备。

“时间安排（是一个困难）。想知道自己能否DIY一个房子或者做一些改造。我想象每天灰头土脸，可能没时间看书、玩或者做播客。”“我还没有国内驾照，住在村子里一定得有车，否则你拿快递、到镇上去就不方便。”“水还好，厕所要在室内的话，尤其说是用这种现代马桶的话，你就要自己去搞定。化粪池，你在城市不需要考虑的东西，但在农村它不是现成的。”“现在非常冷的情况下，厨房、厕所在室外的确是对自己的负担还有点大。”

“我的收入来自做策划，可能接一个campaign或者做一场活动。2022年疫情的关系，我接的大部分活其实都是线上的，因为线下也做不了……都可以远程做。所以你的生活跟工作是可以剥离开来。”

甚至放大到更抽象的人生观层面的准备：

“疫情后很多朋友都‘润’了，我在国外待了15年才回来，其实一直是有准备的，不知道在国内会几年……回新西兰的话，也是一个选项，但那边太无聊了。然后就一直在北京。在这里年后我会接一个朋友的房子，给自己一到三年的时间，实习期，我蹦一下就够得着的生活，先要保证一定程度的舒适，然后一点点去推动它，包括去积累需要的技能，这个我可能需要一到三年的时间。然后我的战斗值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可以去适应更难的环境。”

这样的准备和实践可能会以不同的话题和方式一点点反馈到她的播客里，毕竟这是她稳定的对外表达的渠道。

“观察自己在生活中的状态，然后观察自己的变化，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自己的生活被别人看到的时候，ta就有可能产生启发，就像我曾经从别人的生活上得到启发一样。我其实也不是从这件事情开始的，包括自己对婚育上的态度，还有想做一个什么样的女权主义者……这些除了是个人操守的追求，更重要的就是让别人能看到：你可以这样。别人也自然就会有更多的勇气去走这条路。”

她不缺泼她冷水的人。在小宇宙平台那期「女性生活者联盟」招募声明下面，已经有人留言让她不要过于天真，“农村的美好流于表面，那些美其名曰的体验不过是有钱人营造的假象。”那期的嘉宾也是一个在实践农村生活的姑娘，她回复说，“我们回来村里住也不是为了追求诗和远方，只是想能自己种口吃的，用比较低的成本有一个自己独立的住处……这种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跟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一样，只是一种个人的选择。”

这样的争论永远会存在，有些人看到的是一种逃离制度化生活和大城市的生活实践，有的人看到是一群“永远都有得选”的优势人群，有的人看到的是“把自己作为方法”，而有的人看到的是所有这些加起来给一个普通农村带来的政治和经济机遇。关于最后一点，Alex没有提到，但是她推荐的接力访问者和这条链条上的再下一位接力访问者都在大墨雨村相关的语境里。他们的视角，可能还需要多得多的人的视角叠加起来，才可能可以稍微完整地理解“Alex来到大墨雨村到底意味着什么”。不过，对Alex来说，就是“实习期”开始了。



Q：最近在做的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

A：每天的时间变多了。你脑子中会飘过，现在能干点什么呢？不是无聊的那种，而是说，就搓搓手，我觉得我现在有时间可以干点什么了！我要干点什么！就是有这种时刻，觉得很不错。这其实是很大的奢侈，恰恰生活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已经长期失去了它。

Q：“现在干点什么呢”这种感觉，之前出现是在多少年前？

A：我都不太记得，应该是小的时候，像暑假、寒假的时候。应该是有过吧。我现在可能就是一个放假的状态，但是我希望能让它变成常态。

Q：你会担心什么？

A：现在没有，因为这些已经在做选择之前就想好了，如果有担忧的话，可能也做不了这个决定了，对。反正在钱这件事情上暂时不会成为构成一个障碍，因为毕竟花销也大大减少了。

Q：推荐一个你觉得饶有意思的人？

A：就我的伴侣唐冠华吧。我觉得他挺合适的，他很早就开始实践这方面的生活，是“共识社区”的创办者。对我对生活方式和生活的想象也有很大的帮助。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图片来自 [note thanun](#) on Unsplash

专栏

慢不下来的人，做了一所“慢学校”| 接力访问 017 安猪

杨樱 | 接力访问

把想的和“把想的真正做出来”是不一样的

搜索“安猪”和“慢学校”，靠谱的结果不多。有两条详细解释了学校的理念，还有一条是学员上课体验的分享。早的在 2018 年，最新的也是 2020 年。

我本来是想和安猪聊“数字游民”的，毕竟[池晓推荐他做接力](#)的时候第一个提及的就是他的这种生活状态：到处跑来跑去，一边旅行一边工作，号称在成都定居，却一年待不满一个月。相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数字游民”是一种特权生活状态，它意味着你可以掌控工作时间和地点，把原本的时空限制转化为为自身所用的资源，况且在过去三年日趋严格的流动管制条件下，做个“数字移民”看起来不仅需要毅力，也得有相当的运气。安猪原名余志海，因为做支援乡村的“多背一公斤”项目一度成为大公司离职做公益的代表人物。大家都叫他“安猪”，也就是英文名 Andrew 的谐音。他从 2006 年就开始这种跑来跑去的生活，没有成家，物质很少。

安猪是个不怎么谈论生活细节的人，他更乐意谈工作。说起和工作有关的一切，理念、初衷、方法、思考……他看起来更放松、更熟练，而且也的确沉浸其中。关于“数字游民”这档子事，和“活得松弛、内心舒缓”似乎不搭边——安猪每到一个地方，最先做的事情就是找个合适的咖啡馆开始工作。

他每天有两三个小时都在处理“慢学校”的事情。这个学校是在线的，形式是这样：若干人进入一个视频会议室，每个人都开摄像头，然后大家开始讨论某个议题。它可能包括当下发生的事情，“比如我们都阳了，如何关照自己，如何面对身边人的不同观点和压力”，可能是成员正在进行的项目或者工作，也可能是某种公共议题。

要进行这样的讨论，你得遵守一系列“议事规则”。比如全部成员都应该打开摄像头，这是为了显示充分的信任；在讨论的时候，每个人尽量袒露自己的真实感受，包括沮丧、愤怒和绝望；表达者练习从第三方的角度观察和阐述自己正在做的事情，而聆听者“不评

价、不建议”，除非有特殊环节，否则只做“澄清式提问”，也就是说，只针对事实提问，把感受和评价留给自己——“你当时感受如何？”、“当时是怎样的过程？”、“为什么你会做这件事？”等等。如果要做回应，应该主要是共鸣式的，告诉阐述者自己被触动的地方，或者曾经有过的相似经历，被启发的某种想法……

“我们不是为了说服对方，不是为了达成某个标准化决议，而是感受和支持。”安猪说。整个对话没有一锤定音的人，同时功利性的目的被降低了。虽然也是付费制，但相比“知识付费”之类的模式，“慢学校”的分享和支持不会有必然的解决方案出现，也不会有所谓的“知识点”。目前“慢学校”有 100 多名成员，最年轻的 20 岁，但主要集中在 30 至 35 岁之间，有一点社会阅历，同时“对生活有一些自己的想象”。

在“简书”上分享自己参加“慢学校工作坊”体验的学员，就是一位想做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的女士。这是一个线下的讨论，在一个农场进行，她称之为“个案咨询”。先自我陈述，“我已经进行了教育咨询师的培训，进行了大量练习，学习了心理学，拿到了家庭教育讲师证，我教书 23 年，有多年班主任工作积累”，她有教育咨询师的专业知识体系是什么？我需要对外公开我的咨询师身份吗？等一系列困惑。她在讲述完这些，就需要背过身去，由其他人讨论之后给出建议。这位女士听完建议拥抱了所有人，你在她的文字里也能看出兴奋感。

很多人理解创业是一种赚钱的方式，有不少年，它和投资、上市、红海、蓝海之类的概念绑定在一起。不过创业其实就是自己做点什么。“慢学校”成员有不少人来自教育和公益圈，“不是特别想走主流的道路”，从广义定义来看，他们都是创业者。

安猪在描述这些成员需求的时候，说起自己当初的感受：“一开始离开大公司很兴奋，觉得终于做上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但一两年之后，你才会发现很多东西你没有准备，面临很多实际挑战。”

“最大的困难就是孤独感。事情是你想做的，但是你找不到合适的人跟你去讨论、去聊天，去让别人去理解你。要讨论的问题是明显的，但是更深层的实际上是缺乏一种被支持的感觉。尤其你长时间找不到答案，就很容易陷入一种焦虑甚至绝望的状态。”

一个人在了解了一圈社会之后寻找自己想象中最合适的生活位置——我和安猪聊到了这种青春期之后的成长需求——并不是人人都会做出的选择。“一些人走出了这一步，一些人始终在犹豫徘徊，其实也是一种很损耗的状态。”不同人变动的时机不同，相应付出的成本也不同。

“回到 10 年、15 年前，整个社会还挺乐观。只要你足够的努力，足够勤奋，你就一定能够开挂。你以为这种成功是你个人努力的结果，其实这只是时代背景。”

“这三年开始下行，其实要更早……试错的成本就变高了。这样的时代很多人没有经历过，以前的开挂之路已经走不通了，大家就走躺平之路，摆烂之路对吧？这是两个极端。”

“但这两条路都是不可持续的，而且它也不是我内心真正想走的路，我会感受到自己想走一条追求深度的路，就是跟自己有更深度的连接，跟身边的人有更深度的连接，跟这个世界有更深度的连接。未必追求所谓的数字和金钱，而是另外一些东西，比如力量和品质。”

“慢学校”的存在基于这种支持性需求。就好像“深度连接”这样的说法，安猪也会用“终生学习”和“修行”这样的词来形容自己在做的事情。其实“慢学校”很像某种社会互助小组，只不过立足点更精英，也更私密。

我问他跑来跑去这么多年，最初作为“大公司驴友”（一个古早的名词），“多背一公斤”的公益人士，和眼下正在进行的移动生活可能有什么不同。安猪说：“那时候可能会更多关注自然和当地的人，偏旅游的面向；现在跑来跑去，会更多想去融入到当地的生活，甚至是了解当地一些民生状态。”

他几乎每年都会做一份年终总结，梳理他认为的年度重要事件。这个常规动作在 2022 年底有了一些他预期之外的变化。“我发现去年的总结跟我前几年的非常不一样，前几年基本上都是个人事件，和家人、团队有关系；去年至少有一半是跟时代相关的，甚至没有直接对应到我，例如 4 至 6 月份的上海，我不在那里，但我依然把它列进去了。”

“所以我一个很大的警醒和反思，我们是离不开这个时代的，特别在这种巨变的时代。我们需要更好地去了解、去感知它。”

Q：你最近在做什么有趣的事情？

A：我最近在做的事情就是慢下来，其实也跟我们共同经历的事有关系，2022 年的确给我很多冲击，特别是最后一个半月。

去年 11 月底之后发生了太多的事情。那段时间我不知道是什么状态，可以说很复杂，首

先是痛苦,另一方面你看到社会转变很迅速,它也达到了一个消解的效果。然后阳了以后,从身体来说,进入一种相对缓慢停滞的状态,有很多的自我感知,所以这一个月给我很多的感触,不管是从时代,还是从个体。

Q: 为什么你觉得这是有趣的?

A: 我感觉这个过程有意思,特别是“阳”了之后,好像我真的可以慢下来,虽然客观来说也是因为自己的身体不允许,很难提起精神,很难集中注意力,有时候甚至你没有意愿去做一些事情,虽然看起来应该去做,但是你就是不想做。

不过那段时间我倒还挺接纳自己的,不做就不做。所以那半个月倒是让我真正慢下来,有更多的感知和思考。

Q: 不慢下来你会怎样?

A: 我可能还是会到处跑跑,然后会焦虑。思考到底发生了什么,困惑,焦虑。

Q: 你之前提到了要从高速增长时候的“开挂之路”转向寻求更深度、更有质量的连接,你觉得一个人要完成这个过程,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

A: 可能我就没有做到(笑)。把想的和“把想的真正做出来”是不一样的,你知道所谓的好理念、好模式或者好方法,可能来自于书本或案例,但是做到是困难的。困难肯定会来自之前的模式或者一些偏见,都是有可能的。

Q: 推荐一个你觉得有意思的人?

A: 在成都做人类学田野的灵子,她选择旅居成都一年的经历挺有意思的。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图片来自 [Roxanne Desgagnés](#) on Unsplash

专栏

做盲文字体， 是我在公司需求之外 额外的主意 | 接力访问 018 李超

杨樱 | 接力访问

一种情感价值，对用户，也是对自己。

一个在大公司任职多年、在大机器里运转得摩擦力越来越小的人，在什么动机下会做“额外的事”？

[万青推荐李超做接力访问](#)的原因，差不多就是想为这个问题找答案，之所以说“差不多”，是因为万青的重点还是放在大公司和大机器那部分，在她看来，这种组织意志和个人意志是难以协调的。或许这是李超最初给她的困惑来源：这个人想推广自己新设计的盲文字体，为什么最后做宣传的时候用的还是“阿里巴巴设计部”之类的名字。

李超实际上是阿里健康设计的负责人。万青说的盲文，正式的名字是“阿里健康体”，的确是以阿里健康设计部的名义和方正字库联合开发的。不过和李超聊天的重点，还是开头那个问题。

他是一个对设计有信仰的人——不是为了工作，而是有那么一点人生救赎的意思。他说“设计可以带来情感价值”，一开始我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好设计的本意之一，但聊到后来，我发现李超说这句话的时候，其中一个面向其实是自己。他很严肃地说，只有这样才能找到生活的意义。

出于完整性考虑，这篇访问以李超的个人口述形式发布。为了阅读方便，有个别语序和字句的调整。

我是商业设计师。“设计师”前面加上“商业”两个字，就代表是一个打工者的角色。公司给我报酬。我从 2005 年开始做设计，年纪不小了，83 年（生）的，所以会寻找一个满足商业目标之外的意义。从设计的本心来说，就是人给社会可以带来什么，我用我的经

验和眼界去换钱，这是（之前）的阶段，现在我更希望设计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情感价值。做设计是一个挺真诚的事，它主要是在解决问题。艺术和设计这两个领域我都做过。艺术（那份工作）主要是服务艺术家。艺术家想怎么样就是怎样，主要是个人要表达什么，设计是服务他人。但是大多数商业设计师是解决商业问题，拿设计换销售数字，拿设计换钱，情感的价值其实不应该忽略。

2020 年我开始做阿里健康，我有很多思考。就是它和卖冰箱彩电、衣服鞋子有什么区别。大多数在社会上工作的人掌握的技能就两个，一个是如何制造欲望，另一个是如何控制行为。比如说做销售、做市场，我希望更多人来买我，这是制造别人的欲望，把时间和金钱投入在我身上。那么控制行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法，这是制造欲望之后的一步，如何完成商业转化，完成得好，就是一个成功人士。

但我进入健康医疗领域的时候，我发现我不可能在这里面单纯的制造欲望、刺激别人买药、看病、买保健品，这和人的本性是违背的，大家都是受不了才做这事。和你不得不去看牙是一样的。要刺激这个欲望，是我不负责任。所以我的结论就是，我应该去帮助他人缓解焦虑，建立信心；另外就是，如何用设计增强他人对我的信任。

阿里健康体，就是我们用商业的方式、借助商业的力量，去做公益的一个行为。其实做生意的人纯做公益的动力是很小的，但是资源在他们手里，那么怎么去引导，这是一个例子。

直白地说，（这事）就是阿里健康在业务发展过程中，需要一个自己的字体，有识别性，我承接了这个工作需求，然后在完成这个工作的过程中，我增加了一个需求，就是你看到的盲文。中国有 1691 万视障人群。我们可以为他们做什么？所以就是这样，今天公司有个任务要我完成，在我自己的团队内，我增加了一个需求，把盲文放进去。

创新的点就在于，这个字体通过拼音的方式就可以输出。比如“上海城隍庙”，你输入拼音就会显示相应的盲文。这样我就希望所有的包装设计师，可以用一种轻松简单的方式掌握盲文。在做印刷品、做包装的时候，可以轻松地把盲文放进去。视障人士有很多问题是难以想象的，比如说疫情的时候，大家都在买布洛芬，家里同时有感冒灵，眼睛看不到的话，药盒都是方的，药片都是圆的，怎么才能让他们减少错误吃药的概率。比如需要长期服药的患者，他又该怎么办。中国获批的药品大概有 20 万，但几乎很少有药盒上有盲文，这批人是被遗忘的。那么家里其他的日用品，比如盐、糖、饮料，什么杯子用来喝水，什么杯子用来刷牙，大家都是怎么识别呢？很多人都是通过生活经验，比如放置的位置，还有就是我们想不到的困难，他们克服了才可以做到我们很容易去完成的事情。我们作为设计师，做这些物品的外观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想到过盲文，难道他们就不需要被关注吗？

这个盲文字体就是一个无障碍工具，和你的电脑里的宋体、黑体是一样的，只要装到电脑里就结束了。我在杭州设计周的时候是做了一个小展区，然后为了推广，用了万青《盲人不按摩》的纪录片，告诉大家视障群体在实际生活里是怎样的。

片子是我找到的，我当时就想找一个真实的视障人士生活的纪录片。我不认识万青，托人四处打听才联系上的。

这事我是给公司做的，但是从深层的价值来看，它不仅仅是服务于公司的，也是服务于人的。做字体的时候也联系了盲协、盲文出版社，去研究做这个事情的技术含量，后来发现没啥技术含量，他们之间转换的奥秘就是拼音。

你看到的盲文都是小点儿对吧？凸起的小点儿，那就是声母、韵母、音调，一个字一个字这么下去，盲人摸下来，就知道文字在说什么。这不是什么高科技，极其简单，但没有人想到去转换成数字软件。然后我们做的这件事，实际上就是告诉你设计可以带来平等，我们生活中很多东西都应该平等地提供给人们，信息应该是对称的，至少在文字上是这样。

我做这个事，投入的精力很大，人力很小，实际上我也没有想太麻烦公司，就是自己设计部和志同道合的设计师共同完成了这个事。公司为什么不阻止？因为这事对公司品牌也有好处。

是的，原则上这个事情我是可以不做，但我还是觉得做很多事情需要讲一个价值意义，有没有价值和有没有收获是两回事。价值是自己定义的，说远一点，人生没啥意义，活着也没啥意义，真的，只有在这个过程中你做了你认为有价值的事情，仅此而已。

所以我这么多年一直在做设计师，因为我觉得这是有意义的。它解决问题。然后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你表达了怎样的态度，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 2010 年加入阿里，做淘宝用户体验设计。之前在广告公司上过班，在唱片公司也上过班，从平面设计到界面设计，然后还进修了服务设计。

万青的其他作品我不了解，看她朋友圈知道她关注文化、关注小众群体，我会觉得她做的事情挺酷，也挺有魅力的。我有一段个人经历和这个有点关系。就是 2003 到 2005 这三年，在北京做地下演出。那段经历让我觉得很多青年文化带有独立思考的东西，万青给我的感觉就是这种，很独立。

我那时候还做了个论坛，叫“中国地下音乐一击”。那时候我每个礼拜或者每连个礼拜去酒吧帮着组织线下演出，无名高地，WHAT 酒吧，豪运等等。

我那时候刚毕业，2003 年的时候，疫情结束没什么事干，对，非典。我又特别喜欢朋克乐。我有个朋友，当时他有个乐队，叫 Last Chance of Youth，青年人的最后机会，对。然后他是主唱，我们当时一起在一家唱片公司上班儿，我做平面设计，他是企宣，业余玩乐队，所以我们上班时候交流，你听什么我听什么，然后去帮他一起做演出，就通过这种方式接触到了北京的地下乐队。原来有那么多，都很固执地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特别帅。

这段经历就让我觉得一个人应该能够独立思考。另外就是，你要清楚你自己在做什么。

我那时候很排斥流行音乐，虽然很讽刺，我在唱片公司就是做流行乐的。大众当时喜欢韩国艺人，喜欢周杰伦，我就觉得你们根本不知道这些音乐背后代表的文化是什么。人们端着红酒说自己喜欢爵士乐，其实他根本不知道这音乐的起源就是黑人，jazz 原来是 jass，而 ass 开头的单词，你懂吧，他很根源，并不是一上来就高雅的。

大多数人看待“价值”这件事，就是换钱，换完钱拿来买东西。大一点的买个游艇，买个岛。我会觉得那个不是终极目标。你到底在做什么？我喜欢“沙子乐队”，主唱是刘冬虹，他有一首歌曾表达的内容影响过我：你买了所有想要买的，你拥有了最好的房子，你上了所有想上的女人，然后你觉得这就是你的人生顶点。但最后你想要的是什么？

我就是想弄清楚自己在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而不仅仅说就是为了钱。

Q：最近在做什么有趣的事情？

A：3 月份在北京 798 给盲文设计做的展览。这也是和一个艺术家朋友合作的活动。

Q：和之前做的展览不一样吗？

A：对，表达上不一样。我们会设计 1000 件和视障人士生活有关的用品。然后会有坂本龙一先生的音乐，还有万青进一步完善后的《盲人不按摩》等，会有很多参展艺术家。

Q：除了残障群体的平等问题，你最近还想了什么？

A：平等是最重要的，虽然“人人平等”这句话大多数时候不现实。然后我最近想疗愈相关的话题比较多。我觉得现在我们和美国 70 年代那阵子一样，当然咱们很多人还比不上那种生活，就是你可以看到消费品用毕即弃，娱乐和消费占据闲余时间，然后衣着从波普走向后波普时代。就在这种社会发展下，人会需要用什么来疗愈自己。

Q：推荐一个你觉得有意思的人做接力？

A：李博，我很好的朋友，策划了“无声合唱团”。他一直在做挺有意义的事。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图片来自 [Lars Zhang](#) on Unsplash

专栏

好的艺术应该是辛辣的 | 接力访问 019 张涵露

杨樱 | 接力访问

当代艺术也可以对社会议题作出力所能及的回应。

2015年初那阵子，张涵露和很多从纽约回到上海的人一样，把工作的未知都看成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可能性。身边年轻的艺术家做的事情让她觉得有趣，整个行业也没有什么既定之规，一切都才刚刚开始。这一切把铁板一块的纽约甩在了身后，她还记得自己硕士毕业之后去求职，身边人都要做三份实习才能获得正式工作机会，要成为一名正式的策展人，得先从助理策展人开始，再到副策展，一步一步，“还要一直 social，才能做到想做的事情”。

只要是想做事，这种向往就很容易理解，在这一点上，政治改革和职业发展都没什么区别。当时的上海也是雄心勃勃。当代艺术的话语高地从来都在北京，但上海希望从上至下调动资源，基础设施先行，以优惠条件让美术馆和艺术空间填满新开发的黄浦江西岸等区域，就此提升整个西岸的地块价值。不过这种房地产开发思路速度过快，张涵露说她没发现太多真正有吸引力的展览，空降的知名展览门票高昂，水平却一般，和本地也缺乏联系。“内容就这么多，突然这么多空间、这么多展览要填，东西就会变得很虚无、很空。”

此时大约已经到了2020年前夕，作为独立策展人的张涵露已经具备相当的行业经验，也透过行业经验看到了自己想做的事情和不想做的事情。

她固然不想做空虚的展览，但是也拒绝跟随一种潮流。“当代艺术的问题可能是会脱离现实，就是变得越来越玄究——其实（要不要这样）完全是看（策展人）个人意愿——变得自说自话，普通大众完全不感兴趣。”

张涵露想要做的不是吸引大众注意力，而是以艺术作为方法，回应当代社会问题。切中社会议题必然会引起公众的思考和关注，但关注本身有不同类型。张涵露并不是喜欢制造噱头的人，她只不过是想用策展人快速学习并掌握某种知识框架的能力，让大家看到一些她认为应该看到的问题。

她曾经把黔桂交界的侗家音乐带到美术馆，作品是一部叫做《甫求工》的侗戏。这不是

什么少数民族文化表演，戏班的成员都是在珠三角打工的侗族人，来自肇庆市金利市，在打工之余自组戏班，大家聚在一起唱歌唱戏。有些乡人开了厂，也会把场地让给大家唱戏。这就好像传统文化在现代生活里的镶嵌方式，遗忘在祭祀庆典、迎宾宴席和恋爱交友时的对歌，渗透到了工厂劳作的闲余，甚至是彼此的微信群和QQ群里。就好像《甫求工》的内容，传统的侗族歌词变成了打工者都会经历的欲望、承诺和别离，这也是19世纪至今这种传统歌唱的现代演变。

张涵露在这个活动背后的工作方式，就是拜访这些侗族工人，观察他们在生活中的创作状态，大概用半年的时间拍摄了一部纪录短片。这场在广州时代美术馆进行的表演是长时间调研和相处的成果，到了现场，还需要辅助布置更多物料说明他们的工作场景，安排翻译，并邀请媒体报道。

“虽然他们这么有文化特点，但是在工业区，他们是一个完全不可见的状态，而且他们说，侗族人口在镇上已经过半。很多人可能1990年代、2000年代就过去，老乡带老乡。产业工人里特别常见的现象，好多代工人已经形成了文化积淀。”张涵露说，“我希望通过这个事件把城乡流动的过程中人们自己的表达呈现出来。围绕乡村的讨论里面，无论是关切还是消费，都容易进入观看他者的角度，他们自己的声音经常被抹去。”

在侗族工人戏班这样的活动里，张涵露放大的不是所谓的传统，而是时间。“改革开放”作为一个固定词组已经耳熟能详，但其中的社会变革，尤其是文化层面的影响，探讨得却远远不够。这些山地出来到沿海地区工作的人的生命历程，可以为改革开放的历史提供多元的叙事。这某种程度上也是祛魅，因为这样的侗族戏班在日常里是辛苦的打工人，可能也是官方旅游节目里穿着五彩民族服装的表演者，他们有不同的身份面向，是复杂的人。

“我觉得中国其实是一个艺术创作热土，这里问题太多太直接了，艺术可以对此作很多灵活的表达；但就像很多事情一样，我们对艺术的理解非常单一。那种很‘高大上’、脱离现实的展览，大家理解这才叫艺术。市场又是一个那么大的力量，这么大的诱惑，很多东西容易变成形式高大上的无聊表达，普通人对艺术的这种理解力很容易被这种主流形式引导，因而对真正回应现实的艺术产生兴趣的机缘就少了很多。”

她对艺术应当做什么有辛辣的立场。“有个朋友说过一句话，类似叫吃你的饭、砸你的锅，我挺认同的。”

“当代艺术的有趣之处，在于它本身保持对我们所处的社会体系的审视和批判，它是‘另类的’，但它又无法脱离主流社会运作。每一件艺术作品都在其内部形成一种逻辑自治，我们称之为艺术的自主性，它不符合其他大部分领域的逻辑，比如经济发展、商业价值最大化等，它天然就是例外。艺术就应该获得公共层面的资源，生产有批判性的内容，这一点都不矛盾，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嘛。只不过这一点我们这似乎还难以接受。”

介入社会现实的兴趣，把张涵露带到了广州。她也第一次短暂（其实也有两年）告别了独立策展人的身份，在广东时代美术馆主持一个叫“社区实验室”的部门。这份工作从2020年开始，到2022年结束。这段在广州生活的经历，也让张涵露意识到了上海和广州对艺术家而言最大的差别：生活成本。

“对年轻艺术家来说，上海那么贵，要租个房子维持自己的创作，就得找个工作，但你找了工作以后，你可能又搞不了创作了。要用艺术来生活下来的话可能他们就不得进入艺术市场，开始适应市场的游戏规则。”换句话说，用某些妥协和适应去置换生存的条件。我们聊到上海对当代艺术的消费——上海是个热衷谈论艺术的城市，只不过它更希望艺术帮助提携消费市场。即便做了这么多年策展人，张涵露还是为街道这样的组织成为艺术驱动者感到惊讶。被认为成果斐然的长宁区愚园路街道，把愚园路上几个巷子口、差不多是两三个保安休息室大小的空间布置成了名为“故事商店”的艺术陈列室，里面放置了照片、手工玩偶和绘画之类的作品，作为城市风貌、历史文化等等元素的宣传。这或许是街道组织者对艺术的理解。但是在张涵露看来，公共资金支持艺术固然不错，但是它并不展示真正有公共性的艺术，而往往只是利用当代艺术推动街区士绅化和“精神文明”治理。此时的当代艺术变成了宣传或者是消费的媒介，它的最终目的，是吸引人流打卡，提升地块的知名度。相对社会议题的探讨，这是一种顺从和宣传——同样是艺术最常见的应用之一。

时代美术馆给了张涵露足够的空间，她发起的项目甚至不必然发生在美术馆里，也可以在别的地方。不过这种理想状态在2022年走到尾声。由民营地产全资运营的时代美术馆因为财务紧张，暂停了展厅项目。张涵露回到了独立策展人的身份，但依然沿用了“社区实验室”这个名称，自己和一个策展助理开始独立做项目。

她的效率够高。到我们见面的时候，也就是 2022 年底，第一个项目已经顺利完成并在媒体上露出。这个艺术项目相当有趣，叫做《澳大利亚：陪审团》。

这是“社区实验室”和艺术家刘伟伟的一次合作，形式是在上海召集 12 个普通市民，模拟陪审团制度进行一次公众评议。议题脱胎于真实事件：一个普通的山东工人想移民。他的生活中有种种负担和障碍，但他就是觉得“国外更自由”。裁决的核心，是此人是应当移民澳大利亚，还是留在中国生活。

项目分为陪审员面试、庭审和陪审员会议三个阶段，陪审员的招募、筛选到组建及最后讨论裁决，都参照了普通法系下陪审团制度的部分方式与程序。12 位陪审员是从二十多位公开报名的志愿者里筛选出来的，他们身份各异，从行业到年龄，唯一共同点是对公共讨论的热情。这 12 人“争论跌宕起伏，话题不断流转，讨论的焦点从司法的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延伸到关涉个体的家庭、性别和亲密关系；继而涵盖到更为宏大的社会家国关系，又转向对知识权力的讨论……”

上面这段话来自“社区实验室”的整理，发表在《澎湃新闻》的“市政厅”栏目。《澳大利亚：陪审团》的初衷之一“是想看看现在还有没有理性地公正地进行一次公共讨论的可能性。”而面试的筛选机制，除了平衡职业、年龄、性别以外，则是看志愿者“能不能主动并相对清晰表达自己的想法，是否能做到中立。”

最后陪审团没有达成一致结论——这也是一种结果。于当事人没有实质结论，但作为艺术项目，“或许已经充分证明了社会公民进行公众议事和平等对话的能力”。

要进行类似的项目，张涵露当然面临资金压力，不过她不是特别紧张。“你只能本着信念和盲目的信心。”她也会准备做一些筹款，其实相比形式高级的展览，这种基于在地调研和创作者实地生活观察的策展准备花费并不多，而且张涵露也并没有抱有功利性的预期。

“我最终想要推动某种改变，但是我同意，艺术它如果有什么效用的话，肯定不是一个马上见效的东西。”

她兴奋地谈起现在运作的迷你机构，“它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实践，就是没有一个固定场所，你不必绑定在某一个可见的东西上面。更具挑战性，当然也更灵活自由。

Q：你最近在做什么有趣的事情？可以稍微展开讲讲？

A：最近“社区实验室”和艺术机构“黄边站”一起，举办了乌克兰小组 Open Group 的展览“我们在你之中”，在广州。

Q：你觉得它最有趣的地方在哪里，或者是你之前没体验过的？

A：有一天我收到了认为这个展览“先锋”和“保守”两个彻底相反的评论，我觉得很有趣，这也是我做策展人以及做“社区实验室”面对的充满矛盾的现实。觉得“先锋”的是来自深圳的两位朋友，ta 们觉得这样坐落在社区里面、独立和小成本、议题性的展览很酷，是 ta 们之前不太见到的形式。而说展览“保守”的是一位艺术家朋友，ta 认为这种小空间的展览“适合展示一些能改造空间实用价值的作品，而不是作品陈列展示”，因为 Open Group 的创作大多为在地的和无形的，所以展览的确很大程度上是文献性和陈列性，我能理解 ta 为什么这样说。Ta 还想了一个方案：在中国找一帮俄罗斯人来提他们小组布展，布展过程就是你们的展览。布展完成展览结束——我们永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Q：做这个展览的困难在哪里？

A：Open Group 的作品不仅有议题性，我们这次还特地选择了几件与战争有关的作品。但同时，他们是对于艺术史和当代艺术语言都有很多深刻思考的艺术家。我想展他们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能够同时与时事 / 社会议题对话，且与艺术史对话，这种“二者兼备”在国内似乎相对来说还讨论不够。

所以目前展览困难可能在于如何吸引同时关注这两个领域的观众。在以往的项目中我也会感到类似的困难。对社会议题感兴趣的观众可能对艺术不太感兴趣，而对艺术界的观众则可能根本不会看打上议题标签的展览。

Q：推荐一个你觉得有意思的人来做接力？

A：要不要采访一下侗戏班的灵魂人物？一个被大家叫作“老板娘”的姐姐。她特别厉害，到金利快二十年了，自己开了厂，也组织大家一起唱戏，他们表演的剧本也是她写的，关于这群在广东工业区生活的侗族人。她写的戏结构复杂，情节跌宕起伏，有点莎翁风范。



杨 樊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小鸟文学出品
卷二十六，2023.02
可以留档
请勿商用
有事联系
info@aves.art